

如果你相信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话，你就应该知道传达这个信息的典籍中，一定藏有宇宙万物的知识宝库。否则，要么这样的典籍是盗用神之名，神怎么可能不知晓宇宙万物的全部奥秘？要么就是你误读、误解了典籍中的知识系统，错过了信仰知识中最宝贵的部分。《圣经》是一本极其严谨的科学书籍，蕴藏着一个完美的、横跨所有学科领域的科学知识体系。打开这个科学体系的钥匙是货币学理论，它隐藏在以色列祭司制度中。本书完整揭示《圣经》中的信仰知识体系，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统一在数学规则之下，揭示技术创新和革命的动力机制，指出人类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方向和极限，并用世界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加以验证；从理性角度解读《圣经》中的所有预言和梦境，对照历史和现实，证明《圣经》确是人类所拥有的唯一神赐之书。

社会货币学 概论

——《圣经》通解

张朴杰

社会货币学概论

社会货币学概论.....	1
引言	2
第一编：从《圣经》中来的理论知识.....	2
第一章、《圣经》中人类社会的起源、作用、形态和分类标准.....	2
第一节、《圣经》中人类社会的起源.....	2
第二节、人类社会的作用.....	4
一、《圣经》中以色列类型社会形态的特点.....	5
二、信仰水平下降导致社会形态变化的历史规律.....	11
第三节、社会形态分类及标准.....	13
第二章、《圣经》中人类社会的财政、货币模式.....	16
第一节：摩西律法中以色列类型社会的财税、货币模式的特点及其研究意义....	16
第二节：财税形成过程中的两种货币运动方式及各自的特点.....	22
一、货币的（右）闭和运动及其特点.....	22
二、非闭和运动的货币.....	32
第一小节：非闭合运动的货币及其特点.....	32
第二小节：数学理论上和《圣经》中有关非闭合货币运动系统存废规律的相同结论和不同表述.....	43
第三节：货币（左）闭合运动.....	50
一、货币的起源、本质、退出条件和体系种类.....	52
二、货币数量.....	56
三、信仰的理性和其它理性.....	60
第一小节：信仰系统.....	60
（一）、正确信仰的特点。.....	61
（二）、养成信仰习性的规律。.....	64
（三）、信仰知识及其分类。.....	69
第二小节：理性和理性的分类.....	74
（一）、理性的形式和特点.....	74
（二）、影响理性的因素和个人生死规律.....	78
（三）、理性的种类划分及各自特点.....	89
四、货币基础理论的局限性给西方经济学造成的困境.....	93
第二编：到人类历史和《圣经》中去的理论应用.....	98
第三章：货币运动规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导性作用.....	98
第一节、货币运动规律对社会历史过程和人性确立过程的描绘.....	98
第二节、货币运动对以色列类型社会起源过程的描述.....	108
第三节、国际社会发展中的货币运动.....	110
第四节、货币运动规律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描述.....	121
第四章：货币运动规律下信仰发展的悖论及拯救.....	124

引言

毫无疑问，货币和经济都是社会内部事物，理应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所在社会的特质。但迄今为止，我们只有超越社会分类和社会运动之上的、基于货币在经济领域中的功能和运动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学体系，致使现代人运用经济统计数据 and 经济学理论去预测、解释历史性重大社会事件时难有作为。本文中讨论的货币和经济学理论回归社会，从考察公共财税收入中的货币运动规律入手，揭示货币在不同类型社会中的不同作用和货币运动在不同信仰社会中的不同轨迹，为直接应用经济数据和经济学理论进行定量研究社会意识形态变化及将社会运动规律数学化奠定基础，彻底弥补西方经济学的缺憾，与您过去所接触过的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根本不同。因此，在开始阅读本书前，请暂时放下您所有的经济学知识，先做好重温人类社会知识的准备，耐心等待随后开启的经济学理论探讨。同时，由于本文作者的基础研究全部基于《圣经》，全文也从讨论《圣经》中的社会知识开始，所以也请您在阅读本文时，暂时放下所有来自于教堂和牧师、传道人对于《圣经》的各种传统解读。

第一编：从《圣经》中来的理论知识

第一章、《圣经》中人类社会的起源、作用、形态和分类标准

第一节、《圣经》中人类社会的起源

《圣经》中记载，亚当和夏娃被赶离伊甸园后，人类历史经历过一段有别于社会时期的蛮荒、动物群聚式的野蛮时期。蛮荒时代，是个人的权利、权利意识膨胀无度的时代，“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创 6: 2）、“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创 6: 4）。“伟人”们凭借个人的体力、能力、智慧凌驾于众人之上，任意作为，不受任何的节制，而弱者为了求得生存，自然也要用尽各种能够使用的方法和途径。如此，把全人类都带入到罪恶之中，出现了《圣经》中记载的大洪水之前被除灭的那个场景：“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创 6: 12）。那种时期，人类生存在一种缺少超越个体能力之上的外部保护的生存方式中，完全呈现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所描绘出的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特点，彻底抹杀了人类和动物界的区别。而后者，在《圣经》中本来仅仅是上帝要人类管理的对象：“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 1:28）。这种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类，只传递着人类的生物学生命的基因，意味着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在延续，除此之外，再没有其它。

《圣经》中，诺亚大洪水之前，人类无权或不可以制裁、报复同类。该隐、拉麦杀人，神却不允许人因此杀掉、报复、惩罚他们。据记载，该隐杀死亚伯后，“神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并立下“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创 4:15）的保护令。至于拉麦，也有与该隐相类似的记载：“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洗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注：或作“我杀壮士却伤自己；我害幼童却损本身”）。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创 4:23-24）该隐、拉麦这些损害他人者，也只受“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创 4:12）等直接源自自然或自然法的惩罚，那时的人类还没有自己的立法、不能自我管理。自然法的惩罚，让人类直接对物、或者说直接对人类之外的自然界产生了畏惧或敬畏，对自然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产生认同，人类在信仰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几乎无人呼求创造自然的神；同时，来自自然惩罚的力度，也随着人类罪恶程度的累积和上升不断加深：亚伯被杀后的鲜血入地，污染了土地，人类受到土地的诅咒（或报复），土地不再效力（创 4: 10-12），对比亚当所受到的同类型处罚：“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创 3:17-19），处

罚力度显然是在加重。至大洪水时，这种惩罚力度的增长达到极点，本来供人类生存的土地彻底沦为夺取人类生命的刑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创 6:13）。可见，那时人类的信仰不断下降、最终彻底堕落。

综上，人类的信仰不仅无法在生物进化场景中产生，并且，已有的信仰也会在那种场景中逐渐败坏、直至与动物无差别的毫无信仰的信仰状态。

在那场有信仰败坏引发的诺亚大洪水生存危机中，唯一例外的是有着正确信仰的诺亚个人。大洪水后，有正确信仰的诺亚的后代，进入了可以自我管理的新阶段，即“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向各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 9:5-6），人类至此进入生存状态的社会阶段——人类可以自我管理、自治的阶段。允许人类自我报复、自我管理的人类社会，起初完全是由具备正确信仰的人的后代组成的，都是诺亚这个“义人、当时世代的完全人”（创 6:9）的后代组成的。因此，信仰是社会产生的根源，是人类脱离和区别于大洪水前那种野蛮、必被整体灭绝状态的途径和结果。

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的群居或“动物的社会”，只在于信仰！这个区别，也是人类的社会时代和蛮荒时代的区别，或者说，人类的蛮荒时代就是野兽的时代。与普通的群居动物一样，人类在蛮荒时代中，所有的个体也只是将“群居”当做工具——就象无法赤手空拳对付老虎的人被迫抄起的木棍或石块一样的生存工具，始终没有超出个人生存或个体生命的范畴，没有任何人会为了建立和维护“群居”而自愿付出生命，恰如人体各器官只遵循各自的规律而“生老病死”或发挥不同的功能，与人类生命所遵循的科学规律并不一致。动物社会中，具有不亚于人类社会的复杂关系，如秩序、等级、分工、纪律、尔虞我诈、反哺（乌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动物的本能，是群居动物与生俱来的、物种适应环境后的习性，是其生命的一部分——延续一种生物的生命基因所必须或环境选择下能够生存的自然状态，没有丝毫超出到生命规律之上的东西。因此，每个群居性的动物进入动物社会或群居状态，是保有其生命或传递其生物基因的固有部分，应归于生命的原有或应有内涵或范畴之内，就像新陈代谢对于生命的意义一样，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自然规律。人类也一样，没有信仰的蛮荒时代，就是人类基于人类本性或人类的生物习性而自然采取的一种群聚式的生存状态。其中的公共权力与纪律规则、内部的等级划分和群体秩序等等，都是分工或整体功能（生存）的划分，与人体中各器官类似。例如，公共权力或首领，就如人体的大脑作为神经中枢一样，并无法离开身体的其它器官的配合而独立支撑起一个人的生命或存在。因此，除非超越各器官所遵循的规律之外的生命存在，各种器官是无法自动堆积成为一个人的生物生命、或只能组成一个有限生命的集合，人类群体的生命也是如此——除非有超越个人生命之上或处于生命规律之外的事物即信仰，人类的群体生命也要么是有限的、要么无法形成群体，这时的每个人都只能生存在个体的生命规律和与生存环境相适应的进化规律的双重制约之下。

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群聚，就在于有人愿意、自愿为社会的诞生付出自己的生命，让社会成为一种超越生命范畴之外和群居习性（被动适应外部环境）之上的事物——信仰的躯体或载体。与进化环境中产生人类的生命基因并只传递这种基因不同，社会是人类传递信仰信息的环境或工具。《圣经》中记载，人类社会产生前，“挪亚为耶和華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華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穡、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 8:20-22），这段经文清楚表明，未来出现的人类社会超出了一切生物的生命范畴，为其付出生命（当然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任何生物的生命）都是物有所值或理所当然的。传递出这个信息的类似经文还有很多，如有关“割礼”的记载（创 17）、有关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创 22）、有关神要杀死自己的仆人摩西的故事（出 4: 24-26）等等。《圣经》中还记载，随着以色列人信仰的不断后退和败坏，以色列人的社会崩溃灭亡，以色列人也被赶到巴比伦国中去当奴隶，可见人类社会不仅仅是有信仰而生，也是无信仰而亡的。

任何国家、社会的生死存亡，都是信仰所决定的：国家和社会的诞生，要有人自愿为之抛头颅洒热血，付出包括人类但不限于人类生命的代价才可以；国家和社会的灭亡或崩溃，也是其社会信仰的死亡或消失所导致的。如此，我们十分容易推理，因不正确的信仰而建立并维持的社会或国家，都必然无法长久存在，其生命周期都居于正确信仰的社会与动物

群居或人类蛮荒时代的存续时间中间，具体的时间与其社会信仰距离正确信仰的差距、以及所处的外部国际环境相关。单单以满足种族、民族延续，或单单以吃好、喝好、过上好日子为“信仰”或目标而建立起来的国家与社会，因其社会的意识形态或“信仰”并没有真正超出生命的范畴——社会和国家所传承的信息自然也没有超出生命基因的范畴，其存续时间最短，正如群居中的单个动物或蛮荒时代中的个人的生命周期一样——受制于动物生命科学或人类生理科学规律的制约，无法脱离社会科学规律的周期性制约，同时也要受到周边环境的进一步制约而极可能出现进一步的缩短。

社会是信仰的标志，人类社会是从阻止信仰下滑开始的——信仰消失意味着社会倒退到动物群居状态而不应再称之为“社会”。随着人们的信仰向不同方向变化，人类的社会也应出现相应的分化。因此，信仰水平是社会分类的标准。所有有关社会的科学，必然要反映人类的信仰和意识形态状况；反过来，是否可以描述人类社会的信仰及其水平、变化和趋势，就成为检视一门社会科学的科学水平的依据，也是我们统一人类所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努力方向。

第二节、人类社会的作用

社会的作用，表面上看，是社会公共权力保障弱者可以对抗“伟人”和强者、免遭后者们的任意欺凌。同时，也是避免弱者在与强者的生存竞争中被迫走向罪恶的防波堤，是实现全人类平等共存的武器和工具。但是，从逻辑上讲，社会公共权力并不一定会保护弱者、限制强者，社会的作用完全有可能走向它所以产生的反方向。假设社会公权力这个本应保护社会弱者的武器或机制成为了强者手中的武器和工具，谁来保护弱者呢？弱者岂不更加弱不可堪、任人宰割、被迫走向肆意对抗从而引发全社会的丛林生态呢？也就是说，社会公权力得不到正确的运用，只会让那罪恶的蛮荒时代速速到来：失去保护弱者功能的公权力，将让弱者的社会处境更悲惨；强者借助社会公权力，如虎添翼，只能更强悍、更肆无忌惮、更随心所欲地损害、欺凌弱者和弱势群体。最终结果甚至比大洪水之前的人类蛮横时代还邪恶——正象我们在动物世界中所看到的一样，群聚动物的群体里也有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但是，这只增强了个体弱势的动物种类在猛兽面前生存的机会，并未真正改变群体内部中的环境选择规律对每个动物生存的制约。群体中的每个动物仍然处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环境中。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群聚的本质，就在于可以实现社会内部摆脱生物进化中所表现出的环境选择规律的制约，实现人人平等。

《圣经》中，对人类社会出现背离起源时的初衷和应有作用而走向反面的现象，从两个角度作了大量清楚且明确的描述：1、结果及其社会特征；2、过程及其社会变化规律。下面我们沿着这两个角度分别来具体讨论一下。

社会作用走向与起源时相反的方向，从逻辑上讲，最终结果就是社会的解体，社会要回到它起源时的初始位置。因此，这时的社会特征，就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形式或原始形式，也是一个社会崩溃、灭亡前的形式。《圣经》中描述的所有被消灭的社会或政权，都是例证，我们只挑选其中一个进行具体的考察。《圣经》中最著名的一个被彻底消灭了的社会，是有着“罪恶之城”名号的所多玛社会。《圣经》中的所多玛社会内，人们最看重公共权力，将握有权力与否和大小与人的社会地位等量齐观，正如他们对义人罗得的评价：“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作官哪！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创 19：9）罪恶之城的社会中，不缺少公共权力和秩序：有官长、有秩序。但却人人争相做官、掌权，私斗争权、纵欲而为，“所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得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创 19：4-5）。所多玛社会中，公权力为何有如此魅力？所多玛是一个“王”制的社会或国度：它的王叫“比拉”（创 14：2）；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创 14：21）而这些人口和财物都是亚伯兰的战利品，可见所多玛王是一个一直一来独掌大权的专制者，他看中人口甚于看中财物，也完全符合他与所多玛大众一样的最热衷于追求权力的特点——权力意味着随意支配他人财产。后来一个与所多玛一样被摧毁的社会的权力状况，更详细表明了所多玛社会的公权力结构，“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

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启 6：15）这里的描写，清楚地表明：“君王”与“臣宰”、“将军”，后者与“富户”、“壮士”，再与“为奴的”、“自主的”都是上下级的垂直隶属关系，没有丝毫的制约。因此，不受任何约束的公权力，正是所多玛社会公权力系统的最鲜明特征，这足以引得民众争先当官，更让纵欲的所多玛人将“作官”看得比一切都重（比与罗德在一起的天使、罗德及其子女家人的生命加在一起还重要）！而一个人人追逐公共权力的社会，正是典型的动物丛林法则下的一种社会生存秩序——把权力视为个人生存、生命的全部，完全依靠个人能力即以暴力为基础获得、维持权力才能生存的生存法则，也完全符合生物进化中的环境选择规律。从《圣经》信仰的角度看，返回、倒退到生物进化世界中，彻底抹杀了人类与生物界的差别，是所多玛社会被彻底摧毁的根源。

信仰是社会的灵魂。从信仰而生的社会，若不能维持信仰和信仰水平的提高，就会象所多玛一样被击溃、被放弃。从逻辑上讲，有信仰的社会中，社会公权力必然表现出可以维持社会信仰的功能或功用；而无信仰或错误信仰社会中，公权力必然起到阻碍信仰进步甚至压制社会正确信仰产生的副作用。两类社会公权力因对社会信仰的不同作用，必有自身的特点：阻碍社会信仰进步或压制社会信仰产生的社会，其公权力样式必与所多玛相仿；而可以维护社会信仰水平、有利于社会信仰水平提高的社会，公权力体系也必然与所多玛社会的公权力体系相反或相对。如此，社会形态必然要与社会信仰状况相适应，是社会信仰类型和水平的标志和体现。

一个有信仰社会，选择走向社会起源时的反面方向并一直走到社会崩溃的尽头，从逻辑上讲，意味着这个社会在起始位置或开始建立时的社会信仰水平是最高的，那时的社会公权力体系（或者希望建立的社会公权力体系的样式）也是最好的；然后，跟随社会走到崩溃的全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信仰变化和社会公权力体系的变化规律，就是所有社会信仰水平不断下降的社会的历史规律；至其社会信仰下降至所多玛社会一样的信仰水平后，迎来与所多玛社会一样的历史和结局。如此，从社会信仰水平变动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形态变化等社会规律在逻辑上就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闭合体系。就是针对这个闭合连续系统，《圣经》以最大的篇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为详尽的例子——这就是以色列人从出埃及进入迦南地、到被赶到巴比伦的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下面我们要用两个小节的篇幅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例子。

《圣经》中，以色列人凭信仰，出埃及后到进迦南地前，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成立社会的前期阶段。这个阶段的开端，是以色列人信仰水平的最高点——那时的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信仰水平应享有的社会形态都在摩西律法中载明，是可以保证社会作用不走向反面、社会信仰不会降低的一种社会形态，具体的情况我们放在下面的第一节中详细讨论。从出埃及后，以色列人信仰水平就开始不断下降的历史过程来看，摩西律法中那个象征以色列人最高信仰水平的社会形态从未被真正建立起来。否则，就不会有后边以色列社会崩溃的悲惨结局，也没有“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龕，并你们的神星。”（摩 5:25-26）的评语。因此，以色列人到摩西、亚伦死后进入迦南地建立起国家和社会时，信仰水平已经下降，实际建立起的社會形式与摩西律法中应有（按照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信仰水平定制的社会样式）的社会形式相去甚远，并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相去更远：与其社会信仰水平的降低同步变化，逐次进入到士师时期（《圣经·士师记》）、国王时期，最后再到社会信仰彻底堕落后国破、社会解散，以色列人被驱逐、被打散……我们在本节的第二小节中，将详细讨论上述过程中的社会演化规律。

一、《圣经》中以色列类型社会形态的特点

《圣经》中的以色列类型社会是洁净社会，最显著的标志是社会公权力三权分立。

《圣经》中，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应建立起的社會或國度的公权力体系中，共有三类或三种公共权力：1、立法权；2、司法权；3、行政权。经文“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赛 33：22）对此作出了最清

楚和最明确的说明。“审判我们的”的是司法权、“给我们设律法的”是立法权、“我们的王”是管理我们的行政权。这些公权力的共同目的或社会的目的只有一个：“拯救我们”——神拯救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只是人类社会，而非其它事物，如我们常常赞叹的物质规律和自然科学技术等等。以色列社会中执掌上述三大公权力的人被称为以色列的“牧人”（结 34）或“三个牧人”（亚 11：7）。“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亚 13：7）、“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亚 11：8）等经文都是国破人散、社会衰败的比喻和说明，意味着社会公权力失去作用，社会将要失序解散，国家、政权将要灭亡，社会的生命将终结。

以色列类型社会中，除上述三大社会公权力之外，在整个社会公共领域中，再没有任何其它独立的社会公共权力。例如军队，“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使海中的波浪砰訇，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赛 51：15），作为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最强大的暴力组织——军队，神却并未为其留下独立享有公共权力的空间和机会。可见，军队在圣洁社会中应处于社会公共权力的体系之外，不得享有任何独立的社会公共权力，也不可依附在社会公共权力的任何一个系统下成为其附庸，而是应服从于整体的社会公共权力体系之下，与所多玛社会中权力的基础是暴力、权力与暴力平等的特征根本不同。

具体来看，在《圣经》中的以色列类型社会里，祭司掌管司法权（申 17：8—13，结 22：26，番 3：4），长老（包括后来的“王”）掌握行政权（申 17：14—20，民 16—24，赛 32：1），先知传递民意执掌立法权（民意到达上帝，上帝再指示给先知，是一种类似代议制的机制）（结 13：3—17，耶 23：33—40）。

1)、先知执掌立法权。关于以色列的先知，耶稣基督亲口告诉我们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太 5：17）在这里，耶稣基督把先知和律法直接放在一起，可见律法是从先知的口中传达来的，先知就行使着我们常讲的立法权。“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太 7：12）等等大量的经文也是如此的把以色列的“先知”与立法权直接联系、放在一起的，清楚无误的表明以色列的先知行使、掌控着以色列社会的立法权，与以色列社会中的祭司、长老共同分享社会全部的公共权力。“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申 18：18）摩西在《圣经》中是带来神的律法的先知，其后的先知，神也是如此安排的，可见，以色列的先知从来、一直都是制定律法规范、执掌以色列社会立法权的公权力机关。

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以色列的第一位先知（创 20：7）。以色列社会和国家就是从先知开始的、发源的，也是从此与亚伯兰和他的祖宗们即人类其它社会分别开来的——以色列社会只能是以立法为标志正式开始或真正建立起来的，是法治社会。而其它社会则不然。如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用武力建立起来并维持下去的。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都是先知的后裔，从逻辑上讲自然都有资格传达神的律法。从《圣经》中历代以色列先知的构成情况来看也确实如此。以色列历史上的先知们有男有女、也并不一定具备一定的财富地位，也没有职业、年龄、出身、地域、学识、能力、信仰坚定程度等等要求，看上去完全是在以色列人群中随机被选出的，他（她）们在表述律法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以色列社会的律法体系。因此，以色列律法来自亚伯拉罕的所有后裔们之口，启示出以色列类型的国家和社会的律法都只能来自于其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之意，或充分体现着民主原则，能够真实反映出以色列社会的信仰水平。为了更清楚地表明以色列先知或立法权归民众所有的信息，《圣经》中给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启示：本来在《圣经》文字表面上原来一直展示着的、不曾间断进行拣选以色列先知的过程，却要突然永远停止和结束，“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太 11：13）！这些看似令人费解的经文，显然不是指以色列社会中的立法权被终止、法律被彻底逐出社会，而是再一次明确了立法权转移给民众所有、归民众自己行使的本意。因为，经上还同时记着说“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 5：17），神用终止先知的拣选，与以色列的圣殿被毁和耶稣遇难一起，昭示给人类，社会的一切公权力都归民众所有，决定人类社会方向的力量来自民众自己的信仰。民主才是神创造的社会本来之意，是“凡流入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创 9：6）的应有之意。

民主在社会立法领域，还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律法来源或产生过程中的民主。《圣经》中有大量关于律法产生程序的描述，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1)、委托立法。如：“众百姓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须听。’”（出 20:19）；2)、宣誓认可。如“有人制造耶和華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27:15-16）；3)、转述确认。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出 2:23）“耶和華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3:7-10）《圣经》中，以色列先知转达神的律法，都是以色列大多数民众传达到神那里的信仰心声，是大众将自己交给神之后，对以色列民众要求的转述和确认。通过这样的程序，律法形成了新法推翻旧法、民众自己立法的事实。民众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遵守自己的立法结果，这是“约”的本质，也是神监督的全部。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律法，任何人都可以不遵守。也就是说，不反映民众大多数人意志的律法，对所有民众都是没有约束力的，神也不惩罚违背这样律法的行为和为人。《新约》中因此明确提出“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 3: 19、28）具备民主程序、反映大众或大多数人意志的律法，才是“属灵”的律法，“律法是属乎灵的”（罗 7:14）没有人可以不遵守这样的律法、不在这样的律法之下，神惩罚违背这样律法的任何人（或社会）。《圣经》中的《新约》部分，将以色列律法的约束力范围严格限定于以色列人，但同时，却承继或默认《旧约》中有关律法的产生、修改、遵守等等的有关制度，是对《旧约》中完整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加强（成全）和将其程序法（立法）部分推向以色列之外的全世界。因此，《新约》中的“信”，意味着严格按照《旧约》中规定的民主立法程序设立和修正法律，而非废除法律或仅仅局限于遵守即成法律。相反，守法之人必享立法和修法之权，否则，不享有立法和修法权的民众是完全不必在乎是否遵行法律的。

其次，是以色列先知传递的律法内容上的民意。律法与先知个人的意志无关，只能是与社会、与公众有关的内容。即社会公共事务，不可掺杂先知个人欲望的任何东西。如，《圣经》中神多次对假先知的斥责，都是这方面的证据：“论到使我民走差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注：“预备攻击他”或作“说必遭遇刀兵”）。”（弥 3:5）可以说，以色列类型的国家和社会，法律就应体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因此它也只能是世俗社会。先知传递民意执掌立法权（民意到达上帝，上帝再指示给先知，是一种类似代议制的机制）（结 13: 3—17，耶 23: 33—40），同时，以色列先知又是通过“神迹”、预言等来表明上帝的存在、强化人们对上帝信仰的专门人员或专有机关。因此，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律法体系，是一个从（或被）正确信仰开启或开始的法律体系。这就是说，一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和国家是要从建立正确的信仰及其律法开始的——律法直接反映信仰，是信仰的载体，是信仰水平或程度的记号、刻度。

在没有以色列先知传达出摩西律法的时代，以色列人的行为模式，成为了正确信仰者在无神论者建立的专制社会中的参照和借鉴——那里的正确信仰者的意志或民意，始终无法上升为法律、始终被排斥在真正的立法之外，他们的行为规则或行动路线、方式，只有他们凭着自己的信仰（程度或水平），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情况，自己确立或把握——他们的信仰，会“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出 13:22）地引导他们。

对于可能诱惑正确信仰者的“社会信仰破口”的指定和立法职责问题，《圣经》中多次明确指出其属于以色列先知的职责范畴。如，经文“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哀 2:14），就是没有立法避免、提醒、警示类似不洁净食物一样的事物，会诱惑信仰不坚定者走向歧途，从而可能无法阻止上述现象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逐渐败坏了全社会的正确信仰；再如“耶和華如此说：愚顽的先知有祸了！他们随从自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以色列啊，你的先知好像荒场中的狐狸，没有上去堵挡破口，也没有

为以色列家重修墙垣，使他们当耶和华的日子在阵上站立得住。”（结 13:3-5）、“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结 22:28-30）等等经文，都明确以色列先知要对没有正确、及时行使立法权，为没有保障和重建以色列社会的正确信仰负有全部责任。因此，法律的不足就是信仰的缺口或破口，其后果自然要归于全社会。法律，是以色列民众或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水平、程度的标记和刻度。以色列先知有“堵挡”信仰“战场”上的破口、重修信仰围墙的职责，生动说明了立法的技术性要求，即立法须具有基本的环境针对性。假设以色列社会的律法可以躺在摩西律法或任一律法的规定上不变动的话，以色列先知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不补“破口”、不重修“墙垣”的指责了。法律，必须始终与环境相一致，显示出人类认识环境、与环境相适应的知识，这是有关法律可以始终捍卫信仰的知识。因此，法律要跟随社会生活、特别是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作出新的决定或选择——法律更新与科学发展一致，即法律是信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表现，科学是信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如，铁路、高速公路的发明，需要对人类的原有通行规则作出决定。这种决定是全新的，需要在旧的律法体系中进行添加、修改。这时，如果坚持旧的律法条款不可更改，就无法适应铁路、高速公路时代的生存环境，也是彻底违背《圣经》中“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可 12:27）的明确启示的。与此相比，类似跨国公司利用法律的漏洞或国际间税法规定的差异而采取的避税行为，更需要及时、能动地修法和立法。反过来讲，《圣经》中，以色列先知的立法，是始终围绕坚定信仰这个中心进行的。只要社会民众都坚定了正确信仰，社会的立法系统也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必要——法律只是社会信仰的标记或刻度，对于一个社会信仰水平已经直线上升、甚至于已经彻底洁净了其信仰的社会来讲，法律总在失效中，自然没有任何存在价值。

《圣经》中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立法权，特别是从摩西律法的由来来看，似乎是神独自在行使，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社会的立法权，归于社会大众委托、承认的立法者，神赋予了全人类所有类型的社会都享有这样的权力。在《圣经》中，以色列人民将神赋予的立法权直接委托给了神——而非像埃及人委托给埃及法老或承认埃及法老的立法权、巴比伦人委托给巴比伦王或不得不承认巴比伦王的立法权一样。以色列人委托上帝是一种基于信仰的自愿委托，不同于专制社会中专制者武力强迫下的承认或选择，也不同于现代社会中人们自己行使立法权的直接民主立法：“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出 2:23）“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出 3:7）“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出 3:9）。再往前推，“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创 17:7）。可见，神与亚伯拉罕的约定，是以色列人可以交付立法权给神，并被神所接受的基础和前提。以色列人基于信仰的委托立法，在摩西律法的确立过程中，也十分明确。经上记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版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出 24:12）“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版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版。”（出 31:18）。至此，摩西律法已经完成。但随后，以色列人的信仰却发生改变和动摇，经上对此记着，以色列人“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出 32:4）。随着以色列人信仰的动摇和败坏，已经完成了的摩西律法立即就被废止了，经上对此也记着：“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它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出 32:7-8）。摩西把神写下的两块石头法版“扔在山下摔碎了”（出 32:19）。显然，从理性上讲，神写下的“法版”是不会随便被人摔坏的，除非是神亲自“摔坏”和废止了亲自确立的立法内容。神创设了摩西律法，是基于以色列人的正确信仰；神废止已经完成了的摩西律法，同样基于以色列人的信仰改变或“败坏”。二者在逻辑上完全一致，都反复表明摩西律法体系是一个正确信仰下的律法体系——在这种律法体系中，立法权仍然是完全掌握在社会大众手中的。同时，也表明任何律法体系，包括神亲手设立的摩西律法，若缺失了足够的信仰水平，都必将败坏或起不

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只要以色列人的信仰坚定，永远是神的子民，以色列社会通过民主程序，完全可以修改摩西律法，并且，遵守这样的律法，与遵守摩西律法，在信仰的效果上是完全相同的——都蒙神的悦纳。

《圣经》中的摩西律法，成为同类社会——正确信仰民众组成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社会的立法模式或式样。对摩西律法来讲，在程序方面，最直接、或最根本的就是以色列社会多数民众的呼求或意向；在内容方面，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就是保障以色列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摩西律法所确定的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社会的最根本利益是信仰——摩西律法之所以能产生的根源！发挥社会应有、社会起源时就有的信仰保障作用，才有摩西律法中的“信仰条款”，其它律法条款都是围绕、保障该条款的。因此，从《圣经》的记载来看，神并没有为整个人类社会立下过任何一条律法，更没有所谓的不可更改的“神圣法律”或“神圣条款”，人间的所有法律都只是社会信仰的影子，是一定的社会信仰水平与特定的社会、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就是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照样可以有自己的完备的法律和法律体系、甚至可以有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法律完全相同的法律条款和整个法律体系——虽然，这些纸面上的法律通常无法代表其社会信仰的真实水平。

2) 祭司掌管司法权。《圣经》中有大量类似下面的经文记载：“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申 17:8-9）、“祭司利未的子孙要近前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奉耶和华的名祝福，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申 21:5），所有类似经文，都明确启示了以色列祭司，掌控着以色列社会中的司法权。

以色列祭司的所有职权中，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上面提到的、容易理解的司法权。以色列祭司有权用律法知识辨别、审判人们的行为和解释、适用以色列律法。但另一部分比较难以理解，就是以色列祭司主持的大量祭祀活动。以色列祭司在祭祀活动中的职责不是表面上显示出的杀羊、撒血、上祭品等表面上的活动——这些都只是要以色列人明白，祭司的所有职责或将要在接下来行使的其他职责，都是基于对神的信仰下所作出的。因为，这些活动本身表明，“他”是具有《圣经》中以色列祭司应有的一种特定信仰习性或信仰记号的一个合格者。就像美国总统、法官、国会议员手按《圣经》宣誓就职一样——宣誓只昭示后面所要做的一切都基于宣誓者个人的《圣经》信仰，表明自己是一个信仰上合格的入职者。以色列祭司的职责，和我们后面要看到的长老、先知的职责一样，都有社会信仰职责和社会权力职责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与昭示信仰、坚定信仰相关；另一部分才是单纯的、具体的公权力职责，也就是与信仰无关的、可以独立存在的、单纯的社会公权力部分。

以色列祭司的司法活动，首要是体现社会的本质作用，即维护社会信仰水平。因此，对于所有可能影响、转移人们信仰注意力的事物，都在以色列祭司的司法范畴中。例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凡具备一定的诱惑人类信仰的条件和机会的事物，都在此例；其中，再如手淫、妇女生产等更具体的事物，可能很容易让人们沉溺其中或过度关注，容易误导不坚定信仰者离开正确信仰。诸如以上现象若得不到及时纠正，一个个被误导离开信仰者就相当于整个社会出现了信仰上的“缺口”或“破口”，让社会丧失保障信仰的作用。当然，及时弥补现有的信仰“缺口”或“破口”、捍卫和坚定正确信仰的职责，仰赖以色列祭司的司法行为，而指定和更新信仰“缺口”或“破口”的职责，却属于以色列先知们的立法权范围，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过。同时，以色列祭司维护信仰的职责，从逻辑上讲，也只在社会信仰水平达不到一种可以自我维护、自我发展的程度时，才真正必要，这预示着以色列祭司只是社会信仰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事物，而非永远。

《圣经》中记载，以色列祭司主持祭祀的活动，只能在以色列的神殿中进行。神殿消失后，这一部分活动被人们用自己的研习、祈祷、行善等活动所接替，祭司的其它公权力部分则被独立出来并保留下去。也就是说，当人们树立并坚定了正确信仰后，类似以色列祭司所行使的部分职责就应该也能够从社会公权力体系中消亡或退出——信仰与社会公权力的结合并非始终牢不可破。客观上，正是以色列的圣殿被毁，以色列人才自然知道回到律法书（Torah 规则书）中研究、寻找真正的信仰知识，并逐渐成为信仰上的完全人。如此

说来，神许可毁掉神殿，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缺少到《圣经》中学习信仰知识，他们完全被神殿中各种宗教活动的表面影像所吸引，本末倒置了，成为一个有信仰但信仰知识不足甚至所了解的信仰知识错误的人群；同时，以色列神殿被毁，也说明以色列人中间已经形成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群体，他们需要进入完善信仰知识的新时代中去继续前进。这让我们更清楚，祭司所从事的各种祭祀活动的功用，是有阶段性、或环境性的，直到以色列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树立并坚定了正确信仰为止——之后，祭司的社会公权力功能，要摆脱祭司的躯壳，成为有正确信仰社会的公权力机关中的司法机构的功能。

从《圣经》中的以色列祭司制度来看，我们会得出以下结论：单纯为了惩处犯罪、预防犯罪而进行的司法活动，仅有法律对犯罪的处罚，而没有祭祀等坚定信仰的内容时，律法仍然可以适用于人类的所有社会类型中，仍然可以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但却只能在具备了一定信仰程度的社会中——法律与社会的信仰水平相吻合时，才可以真正发挥作用、也真正值得人们信任和期待。

以色列祭司被赐予亚伦及其子孙世代执掌（出 29:9；利 8:1-13），有关经文只是提示了司法权的行使者应有不同于立法权和行政权执掌者的某种特性——现在看来，主要就是司法者必须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特征，却让《圣经》中的以色列祭司制度，很容易被人们误解，特别是那些忽略了神早已把社会公权力赐予人类自己执掌的信息的人们。例如，以色列人直到圣殿被毁，以色列祭司失业——彻底失去可以进行祭祀、信仰敬拜的活动场所后，也没有明白他们早已被授权、被许可通过民主方式来自由选任、撤换他们的祭司，更不用说可以确定和变更他们的祭司们的行权场所。后者，可能反过来成为了以色列圣殿必须被毁的理由和根源——否则，以色列人永远也无法摆脱祭司制度中那些条款文字的制约，永远也无法理解《圣经》中先知摩西把膏油倒在祭司亚伦头上（利 8:12）的真正意义，永远也不会明白民主才是神的赐予、允诺和安息，永远也无法真正建立起洁净社会。在司法领域，《圣经》中的民主原则，还突出表现在神排除了亲自行使社会司法权的可能，如经文“谁立我作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路 12:14）。

以色列祭司的核心职责是分辨善恶和惩恶扬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的末后，人人都会分别善恶、都只“扬善”，再没有可以被审判或值得审判的人了，审判的社会公权力被赋予了每一个人，人人是法官，人人规制他人和自己。这样看来，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在末后，必定是一个消灭了一切社会公权力机构的社会，所有的公权力都无影无踪，人类社会中再没有任何公共权力机构和公务人员——社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3) 长老执掌社会的法律执行权或行政权。“耶和華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作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申 11:16-17）联系《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先知给国王膏油的仪式或规定，我们还可以清楚了解到，以色列长老和后来的国王等执掌行政权的所有社会公务人员，都应有以色列人先知、也就是以色列民众自己决定的——《圣经》中的以色列的先知就直接代表着以色列民众。

在行政权领域，《圣经》中的民主原则，常常与整个社会公权力领域的民主原则放在一起进行描述。如，被冠以“犹太人的王”的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与耶稣殉难相关的《圣经》记载，直接、清楚无误地向人类表明，行政权和社会公权力中的所有其他权力机关，都是神赐予人类去自行民主决定的——以色列人要求、同意、自愿承当地钉死（决定）了自己的王（太 27:21-25；可 15:8-14；路 23:18-23；约 18:35、40）。以色列类型社会和摩西律法中的民主奥秘，神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神用爱子的死一次就直接全部启明了。

综上，《圣经》中，以色列类型的自由、民主、法治、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洁净社会，是社会信仰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人们对这种社会的全面、准确的认识，必要经历一个与坚定正确信仰过程同步、又要完成信仰与社会完全融合的复杂过程。简单来说，以色列先知在信仰领域和社会公权力机关中的双重作用，展示了正确信仰者组成的以色列类型社会中，法律保护就是直接来自神的保佑，对抗已生效的法律，或不按照民主程序制定

法律，或不按照民主程序修改或废除现行法律等行为和想法，都是对抗神；以色列祭司在信仰领域和社会公权力系统中的双重作用，展示了以色列类型社会中，遵守法律、自愿接受法律的制裁，就是去除自身信仰上的不洁净或罪，永保自洁了；以色列长老在信仰和社会公权力机关中的双重作用，展示了在一个以色列类型社会中，自觉、自愿地履行法定的公民义务和职责，就是在完成神圣的使命。以色列类型社会中，民主是个人信仰对错、信仰的程度和水平的一个社会大检阅，由此而确立或修订出的法律及其毫厘不爽的适用、执行，则是社会整体信仰水平的刻度、记号或成果。以色列类型社会公权力领域中的三类或三种社会公权力，能够彻底分开，各自独立，产生相互制衡的社会效果，是社会信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即可以自我维护、自动修复时的自然结果；其有效制衡机制的根源来自于社会成员的信仰坚定和信仰平等。同时，法律禁止之外的广阔社会空间，则为以色列类型社会成就出了一个广阔的自由世界。

二、信仰水平下降导致社会形态变化的历史规律

任何政治制度都是民众自己的选择，反映着社会信仰的水平或程度。例如，以色列的君王治理制度就是以色列民众自己主动决定、要求立下的（参见撒下 8），虽然当时以色列人的最高公权力执掌者撒母耳不赞成，“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撒下 8:6），虽然摩西也曾一再要求以色列人千万不可实行与四周列国一样的君王制度（申 17:14-20），但以色列人最终还是顺利实行了自己的君王治理制度。

下面，我们跟随《圣经》中的记载，具体去看一下以色列人在摩西以后，从约书亚、士师时代开始，一直到国王时期，以色列的社会中公权力体系结构的具体变化过程。

首先是约书亚，北国以法莲支派的人约书亚接替摩西，作以色列人的领袖。《圣经》中记载：“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民 27:18-21）。可见，约书亚在以色列社会公共权力体系中处于执掌行政权的位置，受当时的祭司的制约，还应受先知的制约。虽然我们在《圣经》中有关约书亚活着的时候，在摩西死后没有看到立即有新的先知兴起。因为，神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申 18:18-19）。如果摩西死后立即兴起一个先知的話，约书亚自然也是要听从、受其制约的。《圣经》中记载了约书亚与同时代的祭司以利亚撒共同为以色列各族派分配土地、城邑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以色列社会中公权力的制衡状况。因此，约书亚时期的以色列社会，只是短暂和临时、过渡性质的社会形式，远不是摩西律法中那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形式。而约书亚和以色列会众首领被基遍人欺瞒、立约的故事（书 9）中，有以下明确记载：“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忿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作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书 9:18-21）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以色列社会的公权力机关在约书亚时代，远离了民主远离了信仰中的神，完全不清楚神赐给的洁净社会就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奥秘，标志以色列社会信仰败坏早已迈开了第一步。

然后，以色列社会进入士师时期。以色列士师打破了祭司、长老、先知的权力划分界限，开始全面走向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反面。我们具体看一下以色列历史中有记载的士师时代社会公权力的架构状况。以色列士师中，俄陀聂、以笏、耶弗他同时都是以色列军队的领导者，而在摩西律法中，军队是应当独立于任何一个社会公权力之外的力量，是被置于三大公权力制衡后才可掌控的力量，不应被其中的任一个或两个控制。上述的三个士师都违背了公权力应充分分离、制衡的原则要求，加强了自身掌控的公权力的份量，降低或削弱了其他社会公权力主体的制衡能力，从而违背了公权力分离制衡的摩西律法法则。底波拉同时是先知、基甸同时行使了祭司的职责（筑坛、献燔祭、制造和设立以弗得）、亚比米

勒私自做王，以利同时是祭司，撒母耳集士师、祭司、先知于一身，等等，这些士师，彻底违背了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更遑论权力制衡了；撒母耳立自己的两个儿子作士师、米迦先后分派他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利未人在自己的家里作祭司、以色列中的但支派自己指定祭司，等等，都违背了摩西律法中的任命原则，更无从谈及公权力的分离、制衡了……亚拿的儿子珊迦、拿细耳人参孙是用个人暴力拯救以色列人的，都与人类要进入社会、依靠社会公权力的力量——而非依靠个人的暴力和能力，才能避免大洪水之前蛮荒时代的悲剧的启示相悖。至此，以色列人的社会中，连社会公权力都面临被整体抛弃的命运，更遑论社会公权力的架构和运行了；从身兼士师和祭司的以利不禁止自己的两个儿子作孽，从普瓦的儿子陀拉到基列人睚珥、比赞作、西布伦人以伦、希列的儿子押顿到基甸，士师们一个比一个更富有、一个比一个有更多的妻妾、儿女和外邦的媳妇，显示了以色列社会正在经历一个从权贵开始的、全社会性的全面悖逆。（以上参见《士师记》和《撒母耳记》）而这一切——对洁净社会公权力体系的破坏和以色列社会中个人的逐渐悖逆，是一起发生的，二者之间有深刻的、必然的因果关系；以色列的“牧人”在以色列亡国的责任中首先要承担被击打、首先要承受最严厉的惩处，原因也盖由此。

集士师、祭司、先知于一身的撒母耳，也是以色列君王时代的首位祭司兼先知，王制时代的“王”的具体权力范围，从撒母耳时代的行政权逐步扩大到其它公权力范围中去，连撒母耳时代微弱的制衡局面也难得一见了。以色列君王的权力，在《圣经》中有集中的说明，也有散见于经文中的一些片断。如，“撒母耳将耶和華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作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作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華，耶和華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下 8:10-20）其中透出的信息有以下几点：1）、作为执掌以色列社会行政权力机关的千夫长、百夫长等长老，从社会公共权力的角色要最终沦为王的家丁，成为“王”个人的仆人，而非以色列人民的公仆。“王”首先取代了以色列社会中的长老，独享社会的行政大权；2）、“王”最终取得与以色列祭司、甚至与神享有的“十分之一”财产相同的权力。事实上，由于王所取的财产的质量是以色列人财产中最好的“十分之一”，无形之中，已经将以色列祭司包括以色列人要献给神的财产部分夺去了、侵占了，也无形之中确立了“王”在以色列社会中无以复加的崇高地位，彻底颠覆和破坏了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公权力架构模式，是对神的彻底亵渎和悖逆，是信仰的彻底堕落。

“王”在以色列社会中，成为社会为个体服务的代名词。社会公权力本是克制个人暴行的利器，是神拯救人类脱离蛮荒时代的工具，但王制却加强了“王”个体暴行的能力，让社会的作用彻底消失，实在是比蛮荒时代更恶、更残酷的世代。散见于《圣经》中的其他有关王制的信息，如：“王分派祭司各尽其职，又勉励他们办耶和華殿中的事”“祭司站在自己的地方，利未人按着班次站立，都是照王所吩咐的。”“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利未人，以及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華的殿。王就把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代下 34-35）等都显示，以色列王超越祭司，或者祭司隶属于王、听命于王；“西底家王打发人带领先知耶利米，进耶和華殿中第三门里见王。王就对耶利米说：“我要问你一件事，你丝毫不可向我隐瞒。”（耶 38:14）“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耶 26:21）等则显示，以色列的王对先知有生杀大权，完全不受其制约；“主耶和華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施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華说的。”（结 45:9）等显示，以色列的“王”常常高高在上，欺压民众，根本不受以色列民众和社会的任何制约，彻底违背摩西律法。

综上所述，从士师时代到王制时代，一脉相承，以色列人跟随着信仰的败坏，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离开民主、法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洁净社会形态越来越远，最终走到了

专制社会的亡国境地。其中的原因，全部在社会信仰领域：没有坚定、稳固的信仰，权力机构、机构官员之间都不可能真正独立而形成权力的制衡、不可能人人平等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社会虽有摩西律法的影子和形式，但缺少足够的社会信仰水平的支持，实际上早已坠入专制集权的所多玛一样的黑暗社会之中。正象神对撒母耳说过的话，“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撒母耳记上 8:7-8）

综上，《圣经》中以色列社会的繁杂历史资料表明，以色列社会虽然有摩西律法的强制性规定，但由于社会信仰水平不足，自由、民主、法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以色列类型社会形态始终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形成，始终停留于纸上，见证着以色列社会信仰水平的持续下降。当今世界中，这种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继续验证着社会信仰自动决定社会形态的真理。与此相反，社会作用始终与社会起源时的方向一致时——即可以保证社会信仰水平始终不下降的社会形态，也存在于《圣经》摩西律法中，只要人们的信仰水平达到可以进入那个以色列类型社会形态的水平时，以色列类型社会形态就会自动降临，然后人类社会的信仰水平就会进入一个自动维持、自我维护的阶段，直至天国降临。因此，从逻辑上讲，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无需多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信仰自动进步的过程，在《圣经》中几乎看不到对其所进行的更多描述；《圣经》的笔墨，集中于信仰弯曲变动或持续下降的社会类型之中。

第三节、社会形态分类及标准

通过上一节我们已经知道，人类社会是避免人类动物般的无信仰沉沦、进而整体灭亡的一个历史阶段或挽救工具。社会形态与社会作用相辅相成，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社会形态的划分按照社会对保障信仰的作用方向、有无、大小的标准，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划分结果——它们都与以色列类型社会相区别，具有一个或几个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特点——例如有着与以色列类型社会一样的社会公权力的分权形式，再例如有着与以色列类型社会相同的选举制度或民程序，或者干脆与以色列类型社会针锋相对、完全不同。

下面我们分别去讨论一下。

1、社会信仰或意识形态类型。这种划分，特别需要注意一神论信仰中的区别，是否出于《圣经》中的一神论是导致它们之间根本不同的原因——再没有第2本典籍可以与《圣经》相提并论。

2、信仰水平的差别。同为信奉《圣经》的社会，由于信仰水平的差别很大，例如摩门教等有着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类似的信仰，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相去甚远，社会形态也将差别明显。这类与以色列类型社会不同的社会，我们统称之为“待洁净社会”，是承认神、相信神、呼求神的一神论者的社会。但也是一个社会信仰不坚定，或社会信仰有各种各样的缺口，已经或可能被引导、诱感到错误的信仰道路上的社会。当今世界上信奉一神论的很多国家和社会，包括当今大声疾呼“普世价值观”的国际社会，都还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例如当今国际社会，有正确信仰的西方各国，为建立起有正确信仰的国际社会而做出的努力，现在也只处于国际法的作用极其有限、而以各国各自的律法为主的后丛林时代。

待洁净社会的共同特征，从社会内部来讲，主要表现在社会的民主、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集中在社会公权力系统偏离洁净社会要求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标准上面。它们要么是公权力系统完全没有区分的王制模式，如《圣经》中悔改之前的亚述社会，“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鸿 3: 18）亚述社会中的牧人即社会公权力的执掌者都听命于亚述王个人，缺少坚定的社会信仰水平（洁净到被神喜悦）所具有的独立性，与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牧人”属于神，区别明显；要么是区分不足，类似以色列士师那样的一身两职或多职，无法在社会公权力内部形成有效和充分制衡的模式。根本没有公权力区分的王制社会模式达到待洁净社会模式的顶峰（公权力系统区分不足的其它社会也常常按照其惯性走向彻底没有权力分立的王制专制社会中去）。

待洁净社会若坚定社会信仰，提高信仰水平，就会转变为洁净社会，“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赛 19:23—25）。否则，它就像在旷野中不断转圈后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一样，陷入一种社会信仰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直至死去。

3、社会公权力架构。这是最简单、最不容易产生争议的社会形态区分——分权制衡的社会与专制集权社会。但这种区分也最不可靠。当今世界上，很多有完整分权制度规定的所谓“新兴国家”，其实社会信仰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自我维护、自动修复的水平，很容易滑落到专制社会中去，如现代俄罗斯。历史上这样的国家更多，典型的如“纳粹”德国。

4、是否洁净。按照社会是否被神喜悦来划分，神喜悦的社会形式是洁净社会，否则是不洁净社会。洁净社会是神喜悦的信仰之子，直通天国，“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启 12:5）——就是前面我们一直讨论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不洁净社会，是信仰的其余儿女，他们因信仰水平不足，要接受撒旦的考验，与撒旦征战，“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争战”（启 12:17）；并且，撒旦要与不洁净社会同归于尽——专制社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撒旦被扔在无底坑中关闭。（参见启 18、20）。

5、是否民主。这也是容易进行但更容易出错的划分方法。信仰水平不足的社会，民主选举、民主立法程序丝毫无助于社会信仰水平的提高：这种民主的结果，只是恰好反映出其社会信仰的真实水准。如，二战之前的德国，用民主方法选择出了大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使德国社会的分权制度彻底失效，恰恰说明当时的德国社会，社会信仰中的错误、破口很多。再如现代俄罗斯社会，也与二战前的德国社会一样。对于社会信仰水平极其有限且拒不接受新的信仰知识、智慧的社会和国家，它们的命运与《圣经》中的“愚顽人”命运一样。

6、法律或科学技术水平。这类划分方法也很容易出错。例如，纸面上的法律制度与反映社会信仰水平的社会法律之间，只在社会信仰水平达到自我修复、自我维护水平时，才相一致。而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科学创新和技术革命，由于具有独占性特点，并不能帮助我们那些从未引领过技术产业革命的不同社会区分开来。

最后，我们看一下最可靠、最全面也是本书中所采用的划分标准——它将人类社会直接划分为以色列类型社会和与以色列类型社会针锋相对的无神论者的专制社会两种形态。

《圣经》中的巴比伦是一类社会的比喻、代表和“母”，与以色列是另一类社会的比喻、代表和母亲一样。“你们的母巴比伦就极其抱愧，生你们的必然蒙羞。”（耶 50: 12），这里的“你们”就是指所有的与巴比伦一样的社会，巴比伦是他们的总称或代称。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中对巴比伦的描述：经文“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赛 14:13—14），及经文“抢夺神的产业”（耶 50: 11）、“巴比伦哪，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着，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耶 50: 24），都显示出巴比伦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根本不认识神、藐视神的无神论；这种意识形态会导致客观上要自己成神、取代神。巴比伦王拒绝承认社会公权力来自神，认为都来自于自己，“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但 4:30）并将其归于自己设立的“金像”和“虚无的假神”，以此将自己“神化”；不仅如此，巴比伦王们还“矮化”神，将神列入他们崇拜的一系列假神中，表明了专制者将自己列入比神更高的地位！巴比伦社会的社会成员也都只崇拜自己的力量、财富、智慧和能力——建立巴比伦的迦勒底人，“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哈 1: 7）“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哈 1:11）因此，巴比伦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建立的专制社会的影像或代表、“母”。

从《圣经》信仰的角度讲，与待洁净社会中的王制不同，这种社会根本不承认神的存在，不信神，直至彻底被毁灭也不会呼求神、相信神。它们把社会公权力的来源归于自己的实力、能力、努力或运气等等，更拒绝任何对其权力质疑或制约的要求，并将所有这些质

疑、制约的主张作为是最严重的犯罪来对待。由于其任何时候都不会向神屈服，不会悔改，只崇拜暴力和可以支持暴力的财富。所以，在《圣经》中，巴比伦社会不存在洁净的途径和可能，它完全是撒旦的社会，无法被神喜悦、接受，最终结局也就只有一个：彻底倾覆、死亡。“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迦勒底人所矜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所多玛蛾摩拉一样。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赛 13:19—22）。人类的历史长河里，巴比伦社会都根本没有打破生死循环、走向长久存在的可能和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王朝更迭过程中看的非常清楚。巴比伦社会是无可救药的、必死的社会，也因此是属于死神撒旦的一类社会的总称。

巴比伦社会的公权力不受制约、没有分立，由巴比伦王一人独裁、控制。在巴比伦王国，国王的话便是法律，最高立法权有其一人掌控——如“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但 3:4）；生死予夺的最高司法权也是其一人掌握——如“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你们不事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

（但 3:14-15）；执行法律的最高行政权还是其一人掌控——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得拉、米煞、亚伯尼歌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但 3:19-20）。

在巴比伦王独享最高的三大社会公共权力之后，社会公权力才由巴比伦王自己做了分配，

“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臬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臬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但 3:2-3）总督作为国王的总代表，统理帝国的各重要部门。钦差负责管辖被征服、占领的外邦城市。巡抚则为各省的行政长官。这里，巴比伦的谋士包括“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所有所谓的巴比伦“哲士”，充当巴比伦王与其假神、偶像间交流的、具有“橡皮图章”“立法权”的作用，“总督、钦差、巡抚、臬司、藩司”等是在巴比伦王之下行使“行政权”的巴比伦行政官员，“法官”是在巴比伦王之下行使“司法权”的司法官员；他们都只听命于巴比伦王一人，是巴比伦王的“仆人”，受其任命、管理、差遣甚至生杀予夺。

无神论者的社会中，常常存在大量的也称“信神”、非常类似正确信仰的拜偶像者，如《圣经》中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口中自称的“我的神”。拜偶像者心中的神，都是只对拜偶像者或他们意向中的人有益的神，是属于只讲私义、可以驱动为之服务的假神，与《圣经》中只喜悦公义、无人可撼动的耶和华神，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讲，也是显然直接对立的。所有可以带给人们愉悦、安慰、释惑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人们追求、崇拜的偶像，但无论对这些偶像的称呼如何，他们其实都只是与巴比伦王一样的无神论者或拜偶像者。如中国人喜欢的财神，是中国人要求、祈求给自己带来财富的假神——人人要求这样的结果，盗窃者这样祈求、被盗的也如此祈求，贪官如此祈求、百姓也如此祈求……这样的意识形态，抛开意识形态的来源和不具有知识体系之外，仅仅从其毫无独立性、静止性或原则性可言，也明显与信仰根本不同。再如马克思主义等唯物主义者，将物质规律等客观规律奉为最高，认为人类可以发现并能动的利用这些规律满足自己的物质、文化等要求，他们事实上已经在承认存在着这样一个更高的规律：利用和尊重客观规律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和自由。问题自然由此而生，谁制定、掌控了这一更高的规律并可以让人类发现呢？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会告诉你，这也都是自然存在的规律，没有制定、掌控者的存在。至此，唯物主义者逻辑，已将人或他们自己视为最高：他们发现和掌控了最高规律或者宇宙真理，这个命题无可置疑、不容再讨论，若再向前一步，即什么力量或事物让人类可以发现宇宙真理或最高规律呢？显然已经是陷入不可知范畴或终极信仰范围内的问题了，问题或逻辑

循环至此被彻底打住，而唯物主义者这时恰恰打结在了人类自己身上，把人等同于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问题至关重要，但无论答案是什么，这一问题本身就已经预定、预设地把人类放在了最后、终极的逻辑位置上，与我们上面的讨论结果完全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被马克思主义者视为最高、不可更改、只可顺从的客观真理，却都只是可以被人类驱动、利用、掌控下的事物而已，与中国人心目中的财神又有何区别呢？不就是把中国人的财神换个了名称，称之为“客观规律”了吗？

当然，无论如何，专制社会仍然比动物般群聚的时代要好。所有与所多玛一样的专制社会，专制者在最初取得政权的时候，都是获得了人民的支持或选择，所以其一开始制定的法律和规则，对其社会成员来讲，就都是神圣不可违背的。但是，专制者滥用、独占了人民的选择权或立法权，再不允许人民收回、独自自由地行使神圣的立法权——上帝通过在摩西律法的废和立两个过程中体现出对全人类的授权、或对人类的“信”和“约”，就是直接反对神或对抗神了，与《圣经》中的正确信仰完全背离。从历史中看，专制模式的社会公权力，只有靠专制者的意志或内心来保障法律的适用，因此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暂时性：品质良好且持久的专制者，可以让一个专制社会处于盛世，而追随“明君”而去和伴随昏君而来的，也是人息政亡。因此，所有专制者的行为按照《圣经》中的记载和启示，就自然表现为信仰之罪即原罪了——最终都要遭受法律之外的、来自自然法的最猛烈惩罚。

第二章、《圣经》中人类社会的财政、货币模式

第一节：摩西律法中以色列类型社会的财税、货币模式的特点及其研究意义

在上一节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明确《圣经》中的以色列祭司是以色列社会的司法机关。如此，我们不难继续发现，《圣经》摩西律法所记载的以色列祭司制度中，其实存在着一个与国家财税领域或社会经济领域相关联的重要通道：“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祭司都可以吃。”（利 21:22）“耶和华晓谕亚伦说：‘我已将归我的举祭，就是以色列人一切分别为圣的物，交给你经管，因你受过膏，把这些都赐给你和你的子孙，当作永得的分。以色列人归给我至圣的供物，就是一切的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其中所有存留不经火的，都为至圣之物，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你要拿这些当至圣物吃，凡男丁都可以吃，你当以此物为圣。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分，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至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初熟之物，我都赐给你。凡从他们地上所带来给耶和华初熟之物，也都要归与你。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永献的都必归与你。他们所有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凡头生的都要归给你；只是人头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牲畜头生的，也要赎出来。只是头生的牛，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必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它的血洒在坛上，把它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它的肉必归你，像被摇的胸、被举的右腿归你一样。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分。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注：“盐”即“不废坏”的意思）。’”（民 18:8-20）上述经文中的制度内容，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就是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物，神都明确赐给以色列的祭司享有和支配，除此之外，以色列祭司不可有其它产业。因此，《圣经》中以色列人献给神的各种物，事实上都被用于维持以色列社会司法系统的正常运行。

《圣经》中还明确记载了神的物可被用于祭司之外的情况，如大卫王和他的跟从人员在饥饿时吃圣殿中的陈设饼的故事记载（撒下 21:6；太 12:1-8；路 6:2-5；可 2:23-28），表明神的物还可被用于社会紧急灾难救助等公共事业方面；再如在以色列士师时期，以色列士师一人兼职祭司、长老或先知，表明神的物已经被赐予人类社会，去供养、维持包括祭司在内的

整个社会公权力体系的运转。至此，十分清楚，神的物完全等同于我们熟悉的、维持现代社会公共权力体系运转的国家财税收入。

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的税收原来就是献给神的物！因此，以色列类型的社会，维持整个社会公权力系统正常运转所需的国家税收，具有神圣、不可逃避的特性。《圣经》中用祭司制度的明文和大卫王、士师等故事记载，不断重复表明了这一点，突出的经文如“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出 23:15）。以此类推，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公共财税收入的所有特点和规律，都要符合《圣经》中对献给神的供物的具体要求。

但是，《圣经》中多处明确记载，神不接受没有正确信仰的个人和社会的任何供物，供物被接纳与否完全取决于奉献者的信仰或意识形态，如“所多玛的官长，蛾摩拉的百姓啊，耶和華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赛 1:10-13）又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路 11:42）等等。可见，象所多玛、巴比伦一样的专制社会，其财政收入或国家税费收入，只能归于专制者和其所辖的社会自己，永不会得到神的悦纳。《圣经》中还有一处经文，也把人类所有社会类型的公共财政收入进行分类，就是耶稣基督在论到纳税给凯撒的问题时所讲的那句经文：“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 20:25、太 22:21、可 12:17）。这表明，所有人类社会也一共只有两种性质不同的公共财税收入，且只能是按照标示社会信仰的社会形态来划分的。一种是“凯撒的物”，专指专制社会的国家税收等公共财政收入，一种是“神的物”，即神喜悦和接受的供物，是摩西律法中的那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的公共财政收入，二者完全不同。相应地，财税领域中的共有元素，如经济学研究中的商品、货币、劳动、利润等范畴，自然也应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规律，不可简单地通用和混杂。

如此，《圣经》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一个足以彻底颠覆整个现行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和原则：如果要从经济角度完整、有效地观察和研究任意一个社会（包括国际社会），只应当从承载着全部社会信息的公共财政收入的来源、构成和模式开始；而不是直接从考察生产资料所有制、货币的商业功能及其规律等方面着手。

《圣经》摩西律法中有关以色列祭司的制度包含着以色列类型社会完整的国家财税制度，其中的一些具体规定又显示出了这种财税制度下，财税形成模式和经济、货币运行模式的特点和规律。简要地说，祭祀制度中规定的、献给神的物的特点，就从逻辑上表明了“神的物”与“凯撒的物”的全部差别。现在，我们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具体经文摘抄出来，并简单指出其中所包含的学术研究意义，为读者深入理解后面章节的内容奠定基础。

首先，是关于祭物的来源问题，它界定出了不同类型国家的财税收入与其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不同关系。经文“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牵到耶和華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就要因所犯的罪，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華面前为赎愆祭：一只作赎罪祭，一只作燔祭。”（利 5:5-7），及经文“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伊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记念，按献给耶和華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这是赎罪祭。”（利 5:11-12）“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杖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華为圣”（利 27:32）。以上经文和与其类似的其它大量经文都明确说明，在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神的物”是人们从自己实际参与的生产或其它经济活动中所得的物质结果中拿出的一部分，是人们量力而行的结果。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财税收入，“神的物”只能是一个社会中所有实体经济发展结果的一部分，必然真实反映该社会经济实际状况。如此，在以色列类型的国家中，国家财税收入必与人人参与的实体经济状况紧密相连，与国民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实际经济状况呈现出严格的正相关数学关系；从根本上来讲，国家财政收支都应只源自于国民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税收方面。从财税收支来源的角度看，以色列类型社会中，货币运动单纯局限于国民经济领域中，或只接受经济规律的制约，没有丝毫的逾越。因此，在以色列类型的社会环境中，以市场法则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始终

有效，其中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为代表的“经济理性”等基础理论部分，只符合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信仰领域特点，并不具有普世性。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讨论这个问题。而“凯撒的物”，从逻辑上讲，就要正好与上面所谈到的完全相反——专制社会的公共权力系统可以有自己的产业或独立于国民经济领域之外的其它财富收入来源，货币运动于其中可以甚至必然超越经济领域范围或不会只受制于经济领域内的规则、规律；国家财政收支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之间不仅没有严格的正相关数学关系，甚至可能会呈现出严格的负相关特点，例如财政收支中要掺杂着大量的与国民经济领域根本无关的因素，且这些因素不仅难以消除，还可能会持续不断增加；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所确立的市场法则和其它经济学原则，在专制社会中不会完全有效，甚至可以完全无效（可以被剔除）。专制者及其主要利益集团，从控制社会的统治目的出发，一切行为、当然包括与经济领域有关的所有行为，均服从于追逐、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社会理性，是“理性的社会人”，可以包括但远远超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确立的“经济人假设”或“经济理性”的范畴。

其次，“神的物”只能是洁净的物、可蒙悦纳的物，具有单一性，不应包含非法所得或有违公平、公义、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要求的任何事物。

《圣经》摩西律法中，神不悦纳以偷窃、抢劫、诈骗、绑架、受贿、侵犯他人财产权等所有非法手段得来的一切财物（这类财物总要归还给被害人），相关经文也非常多，如“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估定的价，把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利 6:2-7）

《圣经》中记载神也不接受人类以破坏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为代价所得来的财物，相关经文如：“人向耶和华献供物为平安祭，若是从羊群中献，无论是公的是母的，必用没有残疾的。”（利 3:6）“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作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作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作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肾子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骗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作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带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利 22:18-25）

再次，神的物还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祭祀制度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无限系统。如，要有每日必须进行的早祭和晚祭，“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又用细面伊法十分之一，并捣成的油一欣四分之一，调和作为素祭。这是在西奈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是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为这一只羊羔，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欣四分之一。在圣所中，你要将醇酒奉给耶和华为奠祭。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必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民 28:3-8）；再如，每个安息日都要献的祭、每年各种固定节期献的祭等等。以上内容，都表现出“神的物”具备一种类似时间所具有的那种无限连续、不间断的系统特征。

“神的物”的上述特点，已经将摩西律法中以色列类型社会的财税收入模式和其中的货币运动模式，固定为一种单一的、连续不断的事物模式，从而在数学上必表现为一种闭和

或连续的图式。同时，从逻辑上，我们也可以通过简单推理知道，与“神的物”相对立的“凯撒的物”，其财税收入模式和货币运动模式只能是一个复式且间断的事物、在数学上也必表现为一种非闭合或不连续的数学图式。

另外，《圣经》中以色列社会所有的祭祀活动，一端与幸福相连，另一端都与信仰相接，所产生的效果必同时反映出信仰和幸福两方面的具体状况。例如，人献素祭是表达自己履行约定顺从神，“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供物都要配盐而献。”（利 2:13），意味着献祭者会如神所约的获得幸福；感恩和酬恩时所献的平安祭意味着已经获得了神赐予的幸福；意识到罪过时所献的赎罪祭、赎愆祭，意味着获得神的赦免，离开罪过已带来或要带来的痛苦，是保有幸福……因此，“神的物”始终会与幸福相连，摩西律法里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国家的财税收入状况也因此必然体现出社会幸福的实际状况：人们的幸福与国家财税收入的多少正相关、人们获得幸福的难易程度与国家财税收入提高的难易程度正相关、单位财税收入与单位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幸福量始终相等、财税收入的增量与货币增量中的单位增长数量所代表的幸福的边际增长率为零。同时，“神的物”也始终会与社会信仰状况相连，摩西律法里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国家的财税收入变化必然体现出社会信仰的变化规律：人们的信仰水平与国家财税收入的多少正相关、社会信仰升华的难易程度与国家财税收入提高的难易程度正相关、单位财税收入与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信仰水平相同或恒定。并且，在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社会信仰水平已经达到可以与其财税收入的单一性相一致的一种能够自我修复或自动维护的程度，给予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以信仰、思想的巨大自由空间，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宽容度极高。因此，类似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追求利润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必无害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信仰，自然也不会危及该社会的社会秩序、社会福祉；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证明的经济理性无害的社会真理，仅仅是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信仰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一个具体表现。由于“凯撒的物”与“神的物”相反，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可知，专制社会中的人们，获得社会幸福的多少、难易与国家财税收入的大小及提高的难易程度负相关或不相关、单位财税收入与单位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幸福可能不同甚至永不相同；专制社会的主流社会信仰或道德价值观与《圣经》所昭示的信仰越不同、越对立，提高那种社会信仰或道德价值观占据该社会意识形态统治程度的难易程度，与其国家财税收入提高的难易程度之间，越缺少正相关的关联性，甚至完全呈现为负相关或不相关的关系、单位财税收入与单位货币所代表的信仰水平不同甚至根本不具有可比性（即信仰或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不同）。并且，从《圣经》中昭示的纯粹一神论的角度来看，专制社会的社会信仰水平低下，即使也相信《圣经》中的耶和華神，但同时必定会混杂着对多种神灵包括对财富、力量、民主或科技等众多自然、社会事物的依重、崇拜，最极端的专制社会意识形态是无神论。专制者持有的信仰或意识形态难以在社会中自我修复或自动维持，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包容性差，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缺少甚至根本没有信仰或思想的自由空间。与专制者思想不同的任何意识形态，包括但不局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理性，都会对专制社会造成极大伤害。

《圣经》中，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和幸福直接连接在一起，也从逻辑上彻底排除了社会幸福直接来自于金钱、财富、生产劳动等传统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可能性。而直接显示以上信息的经文也有很多，如“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太 6:24）、“不要劳碌求富”（箴 23:4）、“耶和華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華守的安息日。”（利 23:2-3）。与此同时，《圣经》也肯定了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社会信仰造就社会幸福的工具和途径，与社会的经济领域、物质财富有关联：最终结果一定会体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变化上，且非常直观、现实，“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惟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太 7:16-18）。综合显示以上两方面信息的经文也很多，如：“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

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不要追求吃的、穿的，要求神的国”（太 6:31-33）。可见，在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信仰造就社会幸福的途径和方法，是间接物质性的，即赋予社会具有改善社会物质条件或物质环境即改善人们的学习、生产、经营、劳动方式和日常生活方式的能力和运用这种能力的机制，这种能力就是人们现在常说的“科技创新能力或自然科学研究能力。”，而应用科技创新能力的机制，就是造就和发动产业技术革命。套用中国的一句俗语，信仰给以色列类型社会的是“授之以渔”。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可知，专制社会的社会信仰带来了“授之以鱼”甚至物质极度贫乏的直接物质性结果，即使有科技创新的成果，也缺乏实际应用，更不会发起产业技术革命。专制社会中的人们更信奉“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对物质和物质规律奉若神明，用中国文化中最有名的两句话来概括就是“民以食为天”和“食色性也”——这两句话放在一起理解的结果就是鼓励人们把自己的欲望和生物学本性视为至高，社会幸福的全部意义和社会统治的基础就是可以直接满足人类生理欲望的物质财富。

《圣经》中有大量明确的经文，表明只有正确社会信仰的那个社会类型，才具备科技创新能力发动技术革命。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诗 111:10）、“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 1:7）等等。社会的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或自然科学的研究及应用能力，是由社会信仰类型直接决定的、准确反映社会信仰水平和社会幸福水平的一个社会标示性事物，其大小或有无，是区分以色列类型社会与专制社会的一个标志。因此，以色列类型的社会财税收支大小、提高的难易程度，与社会的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和自然科学研究及运用能力的大小、前进速度正相关，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及应用之间，无必然联系；与此相对，专制社会的财税收支规模及变化情况，与其社会的科技创新和自然科学研究能力、运用能力之间负相关或无关联，但与其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创新研究能力、研究成果及应用能力之间正相关——充斥且不断创造出与《圣经》相反对各种社会学学说并付诸实践、蛊惑人心，著名的如纳粹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等。

最后，《圣经》中“神的物”，存在一个绝对对应保留的专属空间。如，《圣经》的素祭规则中，“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利 2:9-10）再如平安祭规则中，“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他亲手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脂油和胸，要带来，好把胸在耶和华面前作摇祭，摇一摇。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胸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你们要从平安祭中把右腿作举祭，奉给祭司。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分。因为我从以色列人的平安祭中，取了这摇的胸和举的腿，给祭司亚伦和他子孙，作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永得的分。”（利 7:30-34）以上规则中所讲到的素祭中被烧掉“作为纪念”的部分、或平安祭祭牲中的“脂油”“牲血”等部位，都是终究也不应归于祭司等任何国家机关、任何社会成员和整个以色列社会直接享用的部分，它的结果只归于神，代表着维系社会生命的信仰和社会信仰水平的专门经费部分。再如，《圣经》中载明，战争的胜败结果取决于神、或取决于人们的信仰，因此，战利品也是供物的一个来源。《圣经》对以色列社会的战利品进行了分类。以色列人中间有应当除灭的物，如赫人等 7 类国民的城中财物，“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申 7:25）“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市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都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申 13:15-16），其中能见火的金、银、铜、铁等金属或金属制品，“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书 6:19）。除此之外，与其他对手间战争中的战利品，《圣经》中规定“惟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申 20:14），这些战利品中可能具有的金子、银子等金属和金属制品，作为供物应献给神的那一部分，以色列祭司也是不能自由处置的，也是专属于信仰领域的经费部分，依据就是律

法规定“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分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两腮、并脾胃给祭司，初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申 18：3-4）。关于如何具体使用“神的物”中的上述这些专属部分，《圣经》中也有明确示范，著名的如所罗门时代所建设的以色列神殿，就主要使用了自扫罗、大卫王时代甚至更早年代所积累下来的战利品中的金银铜铁等金属，是得到神肯定的正确的专款专用。因此，所罗门建造神殿，与其大力建造城市、宫殿和军事保障设施等行为，应严格区别对待，它们对以色列社会的信仰变化、社会福祉、王国存续所产生的作用，完全不同。以上内容显示出，在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国家财税收入中应始终存在一个不被压缩、挪作他用的核心部分，这部分财税支出，直接投入在社会的非经济领域，产生维持社会信仰的功用，集中于有关教育、教堂或教会建设等事业管理经费及有关立法、司法、行政保护的经费支出等部分。该部分财政收支最后会完全转化到经济领域中成为国家财税收入的来源地，是社会福祉的源头，所孕育的社会事物正是社会的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可见，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自然和人文知识的传授，而是社会信仰和道德价值观的传承，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教育，对任何人类社会而言，都意味着其教育投入是低效（相比于经济领域的财税水平）甚至无效的，司法、立法等所有社会公共领域的支出也均如此。综上，社会信仰的种类和水平决定了社会创造幸福的能力，是决定社会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有无、强弱的中枢，显示出一个社会被神所接受及从神蒙福的程度。但是，如果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财政核心空间却是一个可以被利用的弹性、自由空间，这是鼓吹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产生、并一度被广泛应用的客观基础，也是该理论无法真正解决西方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遇到问题的根源。从社会的角度看，政府集中社会资源去重点解决经济问题，即越俎代庖又本末倒置（降低甚至破坏社会的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凯恩斯理论必无长效的结果更极其容易理解——完全依赖货币、财政政策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必然会破坏“神的物”中的各种支出间的原有比例关系，终究会产生与神对抗和争竞的结果，是社会信仰水平停滞甚至倒退下的一种选择。同时，专属于信仰、结果直接归于神、间接或让人们因此蒙福的专属经费，以色列祭司和整个社会公权力机构、或国家公权力机关并无权直接支配和使用，显示出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公权力与信仰相隔离，必定要实行现代人们熟悉的“政教分离”制度。直接表明正确的政教关系的实例，在《圣经》中的《但以理书》上：但以理的个人信仰不因社会公权力（尼布甲尼撒等专制者）的力量而改变，也不试图借助于社会公权力（但以理是巴比伦、波斯的重臣）进行强制推行。专制社会从逻辑上讲，必不实行政教分离的制度，社会公权力必要与专制者的意识形态或信仰相结合，借助社会公权力的力量推行思想统治；与“神的物”相对立的“凯撒的物”，即专制社会中的国家财税开支中，必任意减少或根本缺失核心项下的费用，甚至出现推广、加强无神论宣传及残酷打压、迫害正确信仰的庞大财政经费，时常甚至始终处于与神竞争、对抗的状态。因此，从神是至高者的基本信仰看，《圣经》已经在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专制社会的政权都难以长久存续、且随时有可能灭亡。但是，《圣经》同时告诉我们，神是全人类的神，专制社会也自然是神制造出来，用于让人类摆脱诺亚大洪水前的那种会整体灭亡的野蛮时代。所以，任何一个专制社会又总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处于信仰上的最好时期，然后专制者的信仰及整个社会信仰会一路堕落直至国家灭亡。这意味着，一个专制政权的寿命若要长久，必须保持政权刚形成、一开始时的社会信仰水平不波动或极小波动才可以，或者说，必须保证专制社会的财税收支不波动或极小波动才可以，深刻表明专制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既难以承载经济长期发展、又经不起经济波动的社会模式——专制者唯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技术，是如何在不断经历着各种发展、停滞、收缩循环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保证财税收支规模和用途不变。抛开信仰的种类和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单纯用财税收支的变动状况替代社会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变动状况，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专制社会的社会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水平，始终处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信仰水平之下（注：以色列类型社会用于社会信仰的财政开支更大、比例更稳定），二者处于一个更广大的信仰体系之中，具有连续性和临界渐变的特点（注：同处于可直接比较规模大小、比例大小、趋势变动等数学变化的财税数字领域）。

上述结论同时可以表述为：一个专制社会从开始时起，如果专制者的信仰水平下降，整个专制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如果专制者的信仰水平不下降，但整个社会信仰水平却不断下降的话，这个专制社会也要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只有在专制者的信仰水平不下降的同时，社会信仰水平不断提高到一个可以自我修复的程度时，专制社会才能直接顺利转型为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社会群体的信仰，无论信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只要其信仰水平始终无法提高到可以自我修复的水平时，就要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专制社会，正如《圣经》中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中那样；同理，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除非其社会信仰靠近《圣经》中的信仰足够近或达到可以自我维持、修复的水平时，无论如何也难以建立并维持一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形态。

综上所述，《圣经》把人类的幸福、灾祸始终与人们的信仰、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相连，而“神的物”就是同时联通着信仰和幸福的中间媒介。由此不难知道，我们可以把传统上被划归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社会事物，诸如信仰或价值观的正确与否、信仰或道德水平的变动情况等等内容，以及社会形态、社会的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等等这些现在仍普遍被认为难以量化考证的社会领域，与国家的财税收支和国民经济运行这些被普遍认定为可以进行数学化定量研究的社会领域归并在一起，形成一个只使用一个研究对象、却具有广泛的替代性量化研究效果的包括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在内的统一的社会经济学体系。《圣经》相比世界上已知的其它任何宗教经典，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圣经》中存在一个象社会经济学一样的自证真理系统或可重复验证的科学体系，其结果可以让人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对照历史、考察现在和预测未来时，发现其绝对可靠性，从而在人类可认知的时空领域内，表明《圣经》具有超时空的、永恒的、绝对的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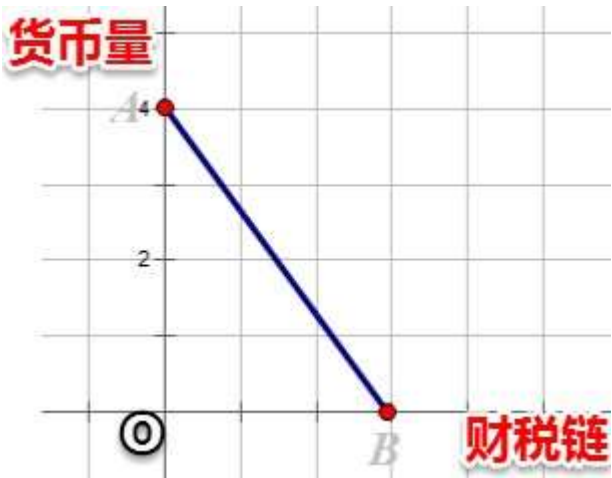
第二节：财税形成过程中的两种货币运动方式及各自的特点

《圣经》中的摩西律法指明，从公共财政收入领域入手，我们可能会揭开人类社会的全部奥秘。下面，我们就尝试从最基础的财税形成开始，窥探蕴含在《圣经》中的那个社会经济学理论。

一、货币的（右）闭和运动及其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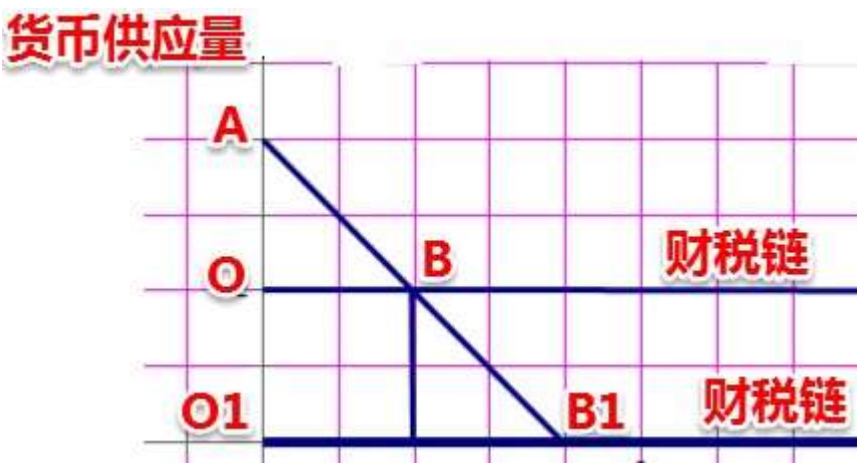
一个货币，例如 100 元人民币，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支付轨迹可能是这样的：从最初的持有人手中被支付了 100 元钱的材料款，进入了材料销售商手中；然后，它又被材料销售商当作工资支付给了工人，然后，还是这 100 元钱，被工人作为购买蔬菜的钱支付到菜农手中……所有这样的支付过程连接起来，我们称之为货币的支付链。在支付链上进行过支付的货币总量，我们称之为货币供应量。

不难看出，货币的支付链就是发挥、显示货币支付功能的一个链条。一个货币的支付链，从它离开印钞机的那一刻起，永无止境，除非它被损毁了。也许货币的损毁才正是印钞厂长期存在的最大理由：用崭新的钞票代替那张损坏严重的残币！但是，现实可能更加“残酷”和复杂：100 元人民币在第一次被作为支付手段使用时，就面临被肢解的命运——它要作为国家税收或地方税费等形式被抽走一部分——抽走的多少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税负水平。因此，货币的支付链上，实际布满了社会的一个个税收点，因此我们又称之为“财税链”。我们先假定，作为国家财税收入的那一部分货币——例如每次收取交易额的 10%，从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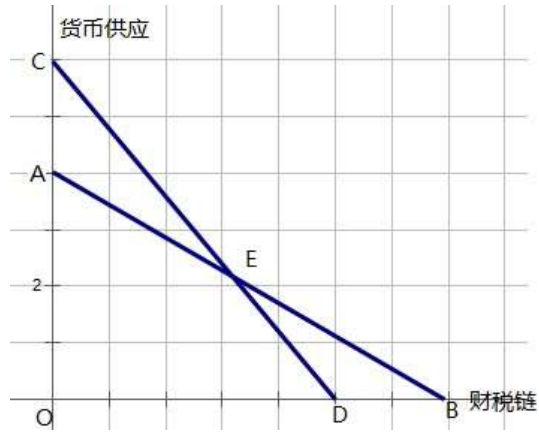
图：O-1-B-1

元人民币的全部支付过程中被剥离出来后，都不能再回到市场中去。这时，100 元基础人民币在市场中将很快就会被消耗殆尽，无法满足经济正常运转对货币支付的需求，例如，材料商拿到 100 元的货款，其中有 10 元的税款，他自然无法全部兑现工人的 100 元工资……以此类推，后面的所有支付需求也都无法被满足，直至国家税收将这 100 元钱全部“抽走”。这样，一个货币，例如这里的 100 元人民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就走出一个完整的财税链，表现为不断的析出为财税收入，如图 1-1-B-1 所示：线段 OA 为货币初始供应量（100 元人民币），线段 OB 为财税链长度，线段 AB 的斜率为税率，线段 AB 的长度为所产生的财税总收入。也就是说，在某一时点上的货币供应总量，沿着全社会的均衡（或复合）财税链，在一个财政年度中所走过的轨迹，是上述单一货币量（100 元人民币）的轨迹的复合。那么，假设税率固定，不同的财税链长度，也就决定了一个货币量所能产生的财税总量。或者说，税率一定时，财税链长度与财税收入正相关。如图 1-1-B-2 所示：



图：1-1-B-2

财税链长度扩大了 O_1B_1-OB ，财税收入也相应扩大了 $AB_1-AB=BB_1$ 的长度数量。因此，要实现一个固定的财税收入目标，从根本上来说，只有两条基本途径可以选择：一种是扩大货币供应量，即通过提高三角形中货币供应量一边的长度，来增加三角形斜边的长度；另一种是增加财税链的长度，同样可以产生增加三角形斜边长度的效果。第一种方式是货币推动式的税收增长模式，第二种是技术推动型的财税增长模式。现实社会中，无论多么复杂的税收模式，都是以上两种基本模式的组合，并与其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相一致，形成以其中一个模式为主的固定财税收入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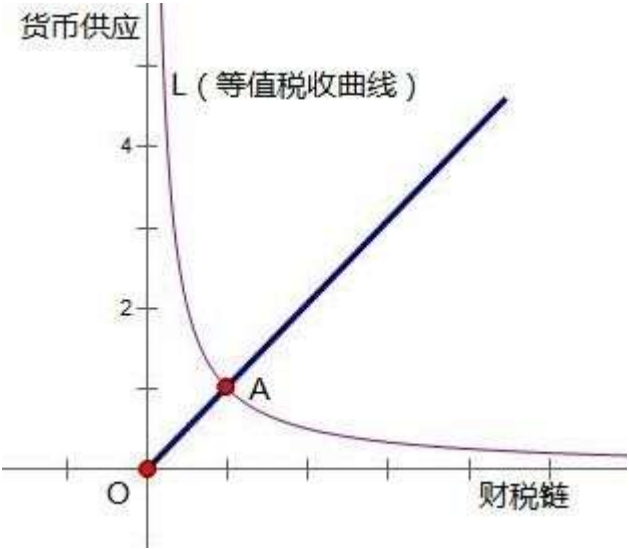


图：1-1-B-3

税链的组合，实现或表达出来的。如左图 1-1-B-3 中，等量税收即线段 AB 和线段 CD 的长度相等，却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货币供应数量：线段 OA 和线段 OC；也对应着不同的财税链长度：线

图：1-1-B-4

总结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相同数量的财税收入值，是可以通过各种大小不同的货币供应量和不同长度的财



段 OB 和线段 OD。至此，我们不难确定，线段 AB 和线段 CD 的交点 E 的轨迹，就是一个等量税收值的所有构成组合所形成的数学图形。该图形上的任一点所代表的税收值，都是一个按照同一个宏观税负水平，通过不同的货币供应量和不同长度的财税链组合可以实现或完成的。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表示一个财税收入的所有构成组合，可以写成为： $C=M*S_1+L*S_2$ 。其中，C 为财税收入、M 为货币供应因素、 S_1 为货币供应因素在财税形成总构成中的占比份额、L 为财税链因素、 S_2 为财税链因素在所有财税构成因素中的比例份额； $0 \leq S_1 \leq 1$ 、 $0 \leq S_2 \leq 1$ ，且 $S_1+S_2=1$ 。根据简单的几何知识可以知道，实现同一个宏观税负水平下的等量税收值 C 的所有数学组合，将构造出一个闭合、连续的曲线轨迹 L：即双曲线在第一象限的部分，因其在纵坐标轴的右侧，我们又称之为（右）闭合运动曲线。如图 1-1-B-4 所示。为简洁起见，在本文中若无特别表明，所使用的闭合曲线或闭合货币运动运动曲线等文字，均指（右）闭合曲线或（右）闭合运动。

在曲线 L 上，A 点是曲线 L 的顶点，该位置的财税形成因子中，货币供应因素和财税链长度的因素比例相等（ $S_1=S_2=50\%$ ），是财税增长模式中的均衡模式；从 A 点开始，沿着曲线 L 向上，货币供应的因素占财税收入的比重会不断加大，而财税链的因素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是货币推动式的税收形成模式（ $S_1 < S_2$ ）；A 点之下 $S_1 > S_2$ ，是技术推动型的财税形成模式，沿着曲线 L 越向下走，财税链长度越来越大，在财税收入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货币供应因素对财税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小。等值税收曲线 L 上的任一点与原点的连线，例如线段 OA，我们称之为社会幸福线，其斜率，表示该社会的信仰和幸福水平提高的难易程度。线段 OA 的斜率越小，财税形成模式越依赖技术因素，社会信仰水平或程度提高得越容易、越快；线段 OA 的斜率越大，财税形成模式越依赖货币供应因素，社会信仰水平或程度提高得越困难、越慢。根据简单的数学知识可以知道，社会幸福线的斜率有两个极限值：一个是斜率为零，就是再没有违法、犯罪（不包括信仰上的原罪）行为使社会财税链发生缩短现象，或者说在一定或特定技术条件下的财税链长度要完全呈现出其本来应有的固定长度，人类彻底摆脱或消灭了社会法的制约或惩罚，是信仰水平、程度提高最快、最容易的“平路”时期，即《圣经》中所描绘的“千禧年”（启 20）时代，循着这条信仰成长之路继续往前走，就是人类彻底摆脱自然法制约、惩罚的天国了，经文中也明确描述到那时自然法失效情况下的具体景象，“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它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 11:6-9）因此，闭和货币系统是永恒的，其中的技术推动型模式是人类走向永恒或永生的必由之路；另一个极限值为斜率等于 1，是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崩溃，也是以色列类型社会中容纳多神论和无神论、或容纳信仰败坏的极限，同时也是以色列类型社会模式的崩溃（目标明确又竭尽全力，却未建立起来的那种“崩溃”状态）或专制社会的起点。

仅有 100 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从满足市场支付需求的角度来讲，当具备一定条件时，也可能已经足够，完全不需要货币数量的再扩大。这些条件包括：1)、100 元钱已经可以满足过往的任何一次性支付的需求。也就是说，在我们评估将来是否增加货币供应量时，只考察现在的货币基础数量，是否存在无法满足市场中的一个一次性（或单循环）支付的状况。只有存在这样的状况，才有增加基础货币数量的必要。2)、财税析出的货币量，总能在支付出现阻滞时回归。如果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从逻辑上讲，一元钱也可以支撑无穷大的社会支付需要：需要支付的总量增大，只表现为支付速度或货币循环加快。同样，一定的支付速度或货币循环速度，用任何数量的货币供应在无限的时间内将可以满足无穷大的支付要求。再从财税构成的数学公式来看，当 M、 S_1 、 S_2 为任一定值、 $S_2 \neq 0$ 时，任意量的财税数额 C 都可以只通过财税链长度 L 的变化来实现。综合以上结论，可见财税链长度 L 是一个与货币循环速度相类同的社会事物。也就是说，在货币作闭合运动的财税模式和社会类型中，人们可以简单地、仅仅通过研究流通中的货币，即仅仅通过考察经济体中的货币供应量和货币循环速度，就恰好可以全面、准确地描述该社会的财税形成和经济运行状况。这正是仅仅局限于货币的支付等经济功能而建立起来的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永远有效的根源所在——例如市场法则，就是货币闭合运动和社会信仰的一种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

机制的反映。也因此，社会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右）闭合货币运动方面，而在于西方经济学从未涉足过的货币非闭合运动和（左）闭合货币运动。

一个国家如果保持货币供应量的一种动态稳定（总是刚好满足经济活动对货币支付的要求，或围绕这种要求上下波动），我们就能通过其货币支付速度或周转次数的变化来考察其经济运行的效率及其变化趋势：国民生产总值的扩大表现为货币支付速度的加快，而非货币供应量的加大。这正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解释通货膨胀方法的理论依据：流通中的货币太多了，就是通胀；否则，就是通缩。同样道理，保持货币供应量动态稳定的一个经济体在相同货币周转速度的情况下，在跨度相同的不同时间段内，其财税链的长度应该是完全相等的：货币供应量在经济效率增高时减少，反之增大。也就是说，在货币量一定的前提下，财税收入只与支付环节的长度——“财税链的长度”有关，而与各环节的利润水平无关。即可征税的环节越多、财税链长度越大，财税收入就越大。上述结论还可以表述为：货币会自动远离利润水平不足以支付税费的经济部门或领域。或者，货币有自动涌向利润水平高的社会领域、特别是其中的新技术领域的天性——新技术无论如何总是在产生可征税的新环节。

任何国家及任何时代的国际社会，货币供应量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的，如果要把货币供应量的动态稳定与财税链长度直接放在同一个模型中作替代性考察，首先应该赋予货币供应量概念一个如同“长度”概念一样的恒常性：长度概念中，每一个增减的长度数量所代表的长度是恒定的，可以直接合并计算，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数量值也应该如此，即货币供应量的新增或减少部分中，单位货币供应量所对应的财税数量、所代表的社会幸福或社会信仰等所有内涵，都是没有变化的、可直接合并计算。具备上述性质的货币体系，可以被视为货币供应量边际效用增长率为 0。也就是说，一个货币供应量边际效用增长率 $\neq 0$ 的货币体系中，由于货币供应的增量部分与原来相比，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内涵已经发生改变，再将其与不会发生任何内涵改变的财税链长度概念放在过去的模型中进行考察，必然发生混乱并得出与实际不符的错误结论。可见，对于解读货币运动有效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事实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大前提，即研究对象必须满足货币供应量前后一致、可以直接合并计算的先决条件。逻辑上，包含西方经济学可以正确解读部分的一个完整的动态财税收入公式可写成为： $C = C_{前} + \Delta C = (M_{前} * S_1 + L_{前} * S_2) + (\Delta M * S'_1 + \Delta L * S'_2)$ ，其中， $C_{前}$ 、 $M_{前}$ ：前期财税收入和前期货币供应数值； ΔC ：与前期相比变动后的财税收入数值； ΔL ：变动后的财税链长度因素； ΔM ：变动后的货币供应量因素； S_1 、 S_2 、 S'_1 、 S'_2 为比例份额数值， $0 \leq S_1$ 、 S_2 、 S'_1 、 $S'_2 \leq 1$ ，且 $S_1 + S_2 = 1$ 、 $S'_1 + S'_2 = 1$ 。在上面的公式中，只有当货币的增量 ΔM 与过去经过经济领域而来的存量货币供应量 M ，同性质或同样只来自于经济领域中时，二者在数学运算时才可以简单合并，得出 $C = (M_{前} + \Delta M) * S'_1 + (L + \Delta L) * S'_2 = M * S'_1 + L * S'_2$ 的公式，其中， $0 \leq S'_1$ 、 $S'_2 \leq 1$ 且 $S'_1 + S'_2 = 1$ 。这就是说，财税收入数值的任何变化，永远可以简单表示为货币供应因子和财税链因子的比例变动，任意财税收入数值只对应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这是西方经济学所能研究的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但当货币的增量 ΔM 与过去经过经济领域而来的存量货币供应量 $M_{前}$ ，性质不同或不来自、不完全来自于经济领域中时，二者就不可以简单合并，这时，变化后的财税收入数额所对应的货币供应量，取决于 ΔM 的具体来源状况，因此可能对应不同的比例关系。或者说，相同比例关系只是对应 ΔM 不同来源状况所形成的无数比例关系中的一个特例。为更容易理解上面的公式及其原理，我们用太阳能热水器系统和电热水器洗浴系统做简单的比喻说明：所有热水器系统流出的水，都有自来水和热水器储水箱中的水两部分组成，就象所有的财税收入均来自货币供应和财税链一样；但太阳能热水器系统所流出的混和水量，即整个货币体系产出的财税数量，相比自来水管中的水流（运行于经济领域中的货币产生的税额）大小而言，可以相等，也可能不相等且不具有固定的比例关系，具体取决于混水阀的使用位置，即取决于财税来源于不同社会领域间的对比关系。其中，来自于不受自来水管水流限制的热水器储水箱中的水量，即运行在经济领域之外、不受经济规律或市场法则限制的货币，与自来水水流即运行于经济领域中、只受经济规律或市场法则限制的货币，二者之间，缺少共同机制从而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具备统一或能够进行数学上的加减运算的基本条件；而电热水器洗浴系统中，流出的水量遵循“进多少、出多少”原则，始终与自来水管的进水水流完全相等，与混水阀的位置完全无关，即货币均运行于同一领域中，受共同的法则制约，具备统一性或进行数学上的加减运算的基本条件。两个水系统因水流的来源不同，导致出现了出水流量相比自来水管的进水流量的可比性差别。除非混水阀位置适当的特殊情况下，太阳能热水器系统的出水量是永远不会与自来水进水量相等的，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社会所有的货币运动系统十分类似太阳能热水器系统的话，西方经济学所适用的闭合货币系统范围就只类似于电热水器洗浴系统。

财税链长度主要是技术水平决定的，技术越复杂，产业链也就越长，征税点随之越多。所以，新技术产生和应用的越多，增加的新的征税点也越多，如果由此而引起的旧技术退出而带走的财税链长度数值相应较小的话，社会的平均财税链长度就会越来越大。因此，等值税收曲线 L 中 A 点之下的部分，越是靠近财税链轴，社会财税收入模式也越是依赖技术创新或技术推动，我们称之为“技术推动型”的社会经济模式，其极限为财税链长度的变化量与宏观税率的乘积等于财税总收入，这意味着，社会的财税收入完全依赖技术发展造就出的财税链长度的舒张，货币供应数量变化的因素被完全剔除出去。与此相对，等值税收曲线 L 中 A 点之上的部分，越靠近货币供应轴，财税收入也越依赖社会的货币供应水平，我们称之为“货币推动型”经济模式，其极限为货币供应总量的变动值与宏观税负率的乘积等于财税总收入，或者说，社会的财税收入完全依赖货币供应量的扩大，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已完全缺失。

货币推动型的经济，越在遭受较大发展阻力、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时——也就是其经济越接近甚至来到极限位置时，就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越钝化；相同的发展目标，与技术推动型的经济模式在刺激经济发展所采用的货币政策的力度相比，需要更有力、或规模更大的货币刺激政策才可以。从财税形成的角度看，货币本身显然就是一种技术，是一种可以与所有自然科学技术相对抗、相媲美的社会技术，具备远远超出货币在经济领域中常见作用的巨大社会潜能。

需要注意的是，曲线 L 是一条完整、连续的曲线，货币在其中运动，也是一个闭和的循环运动，与以科学技术水平主导的财税链不停地在交叉换位，主导社会的财税收入 and 经济发展，描绘出不同的社会景象：科学技术发展的快，财税收入 and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货币供应量就下降，社会就会自动析出更多的货币资产或更多的幸福、或更多的无需货币支付所支持的福利，如人们可以享受更多的日光浴、下午茶，演绎一场更浪漫、更长久的爱情故事，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好的条件与家人共享欢乐时光，或者是更多的野外垂钓、自由研究，也有更多的空间和可能提高军事安全能力……相反，科学技术不发展或进展缓慢，货币供应量就要扩大或急剧扩大，人人都要开始过紧日子，公共开支拮据，军事安全保障能力遭受压力……因此，除非遭遇外力的干扰，来自我们讨论的起点以外即来自货币在经济领域领域之外的干扰，这个货币自循环系统是不会被打破的。也就是说，单纯的货币闭合运动系统应该是一个自动的、无需人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进行刺激的一个系统，象现在正流行于全世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完全无必要也无效的。反过来，当今世界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对西方国家产生的社会效果非常好，恰恰说明当今国际社会，并不处于一个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下，虽然西方国家的单个社会均位于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另外，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的基础货币数量，会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持续加速发展而出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这种趋势的逻辑终点必然是基础货币的彻底消失或货币消亡，显示出人类社会发展在闭合货币体系主导后的必有终极结果——没有货币、没有财税收支、没有公共权力体系、只有洁净社会信仰奉献出神所要的“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摩 5:24）。

在（右）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货币在市场领域必须保证支付需要的特性，决定了一个经济体只有在出现了货币流失的情况时，才会真正需要货币供应数量的扩大或者使用货币技术。

这里的货币流失是指国际贸易中的特殊贸易逆差——类似殖民地时代，货币从殖民地流失到宗主国的问题，与此性质不同，我们将放在另外章节中讨论。贸易逆差从货币支付的角度来看，就是一个国家原有的支付手段透过国际贸易流出体外，造成国内市场上支付手段绝对量的下降或者原有的适宜数量环境被破坏，影响到经济活动中的正常支付，表现出类似通货紧缩的经济滞涨状态。这样，从保持与货币支付链长度比例不变的角度来讲，贸易逆差就意味着一个经济体要补齐流出的货币量——虽然从更大的角度来看，以贸易逆差流出的货币并未被损毁或被某些人埋在土里。从货币必须满足经济支付需要的角度上说，国际贸易中的逆差是一个国家的货币量的出血点，相反，国际贸易顺差则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支付手段泛滥的诱因，一个国家对外贸易的不平衡总会改变其原有的财税链长度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比例关系，除非其技术创新或转移发展足够快，总能够及时跟上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化速度。在全部有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所组成的国际环境中，或完全自由的国际贸易前提下，国际贸易的不

平衡对相关各经济体的影响，会被各国财税链长度的伸缩或国家间技术转移自然对冲，只引起自由汇率的相应变化。因此，除非国际贸易环境中存在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或者自由的国际贸易被扭曲和操纵的情况，通常的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因素并不会长期影响贸易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更不会增加或减少国际货币总量。这一点，在金属铸币时代，表现的更清楚：由于贸易国之间的货币成本相同或相近，收储外国货币作为储备后，再发行相同数量的本国货币投入市场，就变的毫无意义甚至招致损失，因此，不受政权干预的自由市场汇率，会自动抚平各贸易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况，正如杰克布·范德林特(Jacob Vanderlint)在《货币万能》中所讲的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因为某些原因而缺乏竞争力，导致它的进口多于出口，该国就会不断流失金银货币。然而，这种货币供应的减少，将导致该国价格水平和工资下降；最终，赤字国家的产品和劳动会变得非常便宜，产品会重新吸引买者，贸易赤字也会被纠正。同时，流入现金的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又造成对其不利的贸易逆差，这样，现金又会流走……（参见杰克布·范德林特(Jacob Vanderlint)《货币万能》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1-07）注 1{卡尔·马克思在批判大卫·李嘉图时指出：“他的错误教条是：‘贸易逆差只能是流通手段过剩的结果……铸币输出是因为它的价值低廉，不是逆差的结果，而是逆差的原因’”，同时，卡尔·马克思也一并对尼·巴尔本进行了批判：“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也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见《资本论》第一卷 164 页，但卡尔·马克思在这里却同时犯下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否认铸币成本和面值差价对于铸币退出特定市场流通，回归其金属本身时的决定作用。这一点，他自己很快就在后面偷偷更正了、并十分赞同地引用了威廉·配第和约翰·贝雷斯的原话：“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把它们用于进出口贸易。”“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上等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货币不过是国家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润滑，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见《资本论》第一卷 166 页，当然，卡尔·马克思和他引用的话，都没有告诉我们，多余的铸币为什么不可以以“铸币”的形式本身进入到货币身份之外的经济领域？或者说，是什么动力让一部分铸币离开货币领域，进入到其它领域？这不能说的理由正是铸币面值远小于其成本，否则，铸币不仅不会退出，还可能吸引来更多的“私货”——假铸币；另一个错误是，卡尔·马克思的观点与他所批判铸币观点，本质上完全相同，都把货币看作为一种具体的物质或实体，差别只在于卡尔·马克思将铸币看做是金银的代表，即金本位思想，而大卫·李嘉图、尼·巴尔本的铸币却脱离了金本位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在货币已经可以满足支付需要的国际环境不变的前提下，至少要有有一个国家大量的长期非基于市场利润的“增资”行为——即类似货币随意发行的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的行为，才会改变全球性的货币供应量与财税链长度（或世界技术水平）的原有比例，逼迫另外所有经济体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迅速恢复原有的比例关系，毕竟，技术创新的及时性和大规模技术转移的可持续时间，与有可能进行货币增发时进行货币增发的迅捷性及可持续性相比，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这必引发全球性货币量化宽松风潮。

西方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普通的、微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行为是基于利润水平等市场因素进行的。从货币支付的规律来看，这些投资行为并不会对货币供应量扩大需求产生超过财税链舒张速度要求的结果：利润的增加只是财富和资产量的增加，与仅用来支付的货币数量本身没有关系；基于利润或市场的扩大投资行为，只会影响货币的支付链的长度，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财税链长度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比例关系，也就不会改变财税构成模式：一个货币可以通过高利润投资，得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更长、更大的支付链；或者相反，通过利润低的投资方式，一个货币却没有这样的长路可走。这正是微观经济学上的市场配置功能在货币支付上的表现。因此，基于市场利润的扩大投资，与一个经济体的财税收支能力无关，在税负水平一定的情况下，决定市场利润水平和投资人是否扩大投资的绝对因素只在于市场本身。只有并非基于市场赢利判断（脱离市场领域）所进行的所谓新的投资、增资（经济理性之外的社会理性，或“经济人”之外的“社会人”）——类似新货币发行的持续不断，才会对货币供应总量绝对和相对增长产生持久的驱动力，改变经济体的财税构成模式。

结合上述国际贸易环境、微观经济学环境中的分析结论，可以说，在任何（右）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财税链长度的伸缩，总会自动平衡、吸收、湮灭市场中由货币供应波动所造成的影响。对于摩西律法中的以色列类型社会和国际社会来讲，严格的财经制度，在经济状况下滑时，会引起财政收缩，带来公共服务减少、公务员减薪或解雇，但不会引发增加货币

供应的需求——相反，却要产生货币供应量的绝对下降，以及同时出现财税链长度的收缩，回归到财税链长度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原有比例关系上。且财税链长度变短的幅度与货币供应量下降的幅度因具体经济模式的不同而不同。依赖这种同向收缩的机制，维持了货币的闭合运动状态。而在一个不单纯是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复杂国际环境中，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下的国家需要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帮助才能恢复社会原有的财税链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比例关系，维持本国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

从社会的角度来讲，只有单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才有增发货币之需要。原因很简单，增发货币增加了税收的点或税收的宽度：对初始货币为 100 元和初始货币为 1000 元的两个支付链按相同税率进行征税，财税链长度不变时，财税收入后者是前者的 10 倍。但是，货币增发也可能受到货币自身的规律或特点的束缚，如在铸币时代，货币材料成本和数量限制，会很快、天然形成一个货币增发的极限。

单纯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货币的支付功能来看，毫无意义。还是上面的例子，100 元和 1000 元都同样可以满足经济活动对货币支付的需要，所不同的只是二者中的每一元所对应的支付对象的量的不同：前者是后者的 10 倍。货币的支付功能与其所支付过的财富无关。

回到货币支付之前的物物交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货币支付的本来之意：假设一个菜农总是拿他生产的蔬菜去交换他所需要的生活、生产资料，那么他的资产的增加就全部来源于蔬菜生产的利润（包括对自己身体的投资回报）；现在他将蔬菜换成货币来实现上述的一切，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货币的自然孳息就是人类技术发展的红利和大自然的恩惠之和。人们将 100 万的货币存入银行生息，就不能购置有形资产或购买社会服务，相反也是如此。储蓄与消费或购买资产投资，从货币支付的角度看上去完全相等，只是人们对可能的社会支付途径进行选择的结果不同而已。银行利息、进行扩大生产投资或新投资的利润、房屋等生活资料的折旧、损耗等，都表现为货币的潜在的自生速度或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可能幅度。如一个人购买了 100 万的房子，使用期限是 70 年，那么每年这座房子在折旧 $100\text{万}/70$ ，这等于他放弃了可以从银行等途径每年可得的货币孳息。但这部分货币孳息并不因为他没有去拿或没有得到就消失、流失了：他从房屋的使用中得到了，他的 100 万元货币的孳息现在转为他的物质、精神享受了。但是，从他手中滑过的 100 万元货币并没有减少一分钱，也没有停下它继续支付脚步，只是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中少增了 $100\text{万}/70$ 、在社会资产表上增加了一处价值 100 万元的房子而已。因此，考察货币支付的途径和链条，就是考察人们的宏观投资取向，而货币供应量的绝对变化和表述货币供应量相对变化幅度的财税链长度的概念，可以让我们对宏观经济及整个社会的状况及走向产生十分明确的判断。从此意义上讲，整个宏观经济分为三大块：社会总资产（包括所有的服务）、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额、货币的社会总孳息。它们之间的关系式为：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额=货币的社会总孳息—社会总资产。因而，当我们看到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和污染、假冒伪劣商品出现、存在贪腐和徇私或司法不公等现象时，社会总资产这个减数就会在国民生产总值（GDP）向上增长时增幅变小，在宏观经济指标中同时就必然出现货币供应量（如广义货币供应量 M2）增幅的增加。由于社会财税收入在税负率不变时只随 GDP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这时的变化也可表述为 M2 的增幅大于 C 增幅，或者说，GDP 上涨过程中，出现 M2 增幅超过 C 增幅就是社会幸福（或货币量）下降和财税链缩短的同义反复，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因素在 GDP 增长中的作用在加强。当社会和自然环境跟随经济变化而变化时，社会总资产这个减数就会跟随国民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同时、同向变动，例如，GDP 下降，会带来人们收入的下降和财政收入的下降，也就带来公共服务水平或能力的下降、公务开支下降（或裁减公务员数量），人们可以通过手中的货币数量、收入预期或消费者信心指数，准确反映出社会状况的整体变动情况。具体到单位货币所代表的社会幸福，却是固定和不变的。

总孳息部分减少越多，我们需要用货币支付的东西就越多。因此，科技进步有能力提高全社会的货币支付总量（一开始，是新兴产业利润水平足够高，可以支撑从业人员获得更多的货币量去支付原来要象传统农民一样用物物交换可以得到的总孳息部分。全社会均如此，就是工业化、生产专业化的扩大和完成），抛开对外贸易的因素，社会分工之后的货币支付能力的再提高，即全社会货币资产总额的再提高，必须继续建立在技术的再进步上：这时，新

技术提供的产品、服务或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两部分）使得同样的消费满足度的花费更低，提高了原来同数量货币的支付能力，看上去是货币正在变得更有购买力而不是钱的数目更多了！这样，从原来的支付水平上去看，就是支付手段的节省或节约及全社会的货币支付能力提高，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数字变大。在此时，若保持货币供应的总量不变，会让人们感到社会变得更美好，包括生活更舒适、环境更友好、社会更公正和安全、受教育水平更高（例如，让法官在原有道德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判案水平的方法只能是增加其知识水平，即更多的教育投资。），财富或单位货币带给人们的幸福程度提高，即人们可以有比原来更多、更好的同类选择满足个人的生活和发展需要、提高投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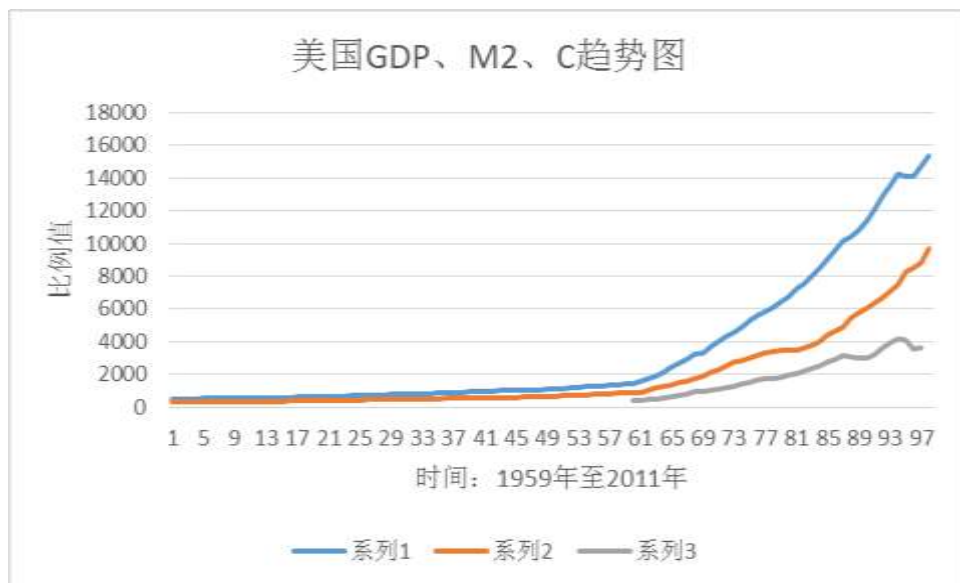
由于货币支付能力相对扩大就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提高，所以除了科技进步创造更多的新使用价值、降低生产成本以外，从逻辑上讲，还存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利润水平的另外一条信仰败坏的邪恶之路：假冒伪劣、自然环境污染和社会环境的不公正等等。后者，无疑就是建立于罪恶或社会信仰水平的倒退之上。相应地，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也可以知道，前者，就意味着，正确信仰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带来自然科学技术创新、应用和社会幸福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在前面将曲线 L 上的任一点与坐标系原点 O 间的连线，称为社会幸福线，幸福线的斜率，也可以表达出社会幸福及社会信仰水平提高的难易程度。

我们从社会得到的所有的物品，包括货币、商品、服务等所带给我们的全部的幸福就是我们的社会总资产。按照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对这些资产进行不同的划分。例如，我们常常需要按照资产形态来进行划分，共分为货币资产和实物资产两部分。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大都包括在前者之中。后者中间，我们最常使用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概念，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指一个国家（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或者说人们公认的 GDP 概念是指社会财富的增加值部分或新增部分，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而过去还未收回的投资都在货币资产中体现，人们最熟悉的是广义货币供应量 M2。本书中，我们讨论时所使用的广义货币（M2），是代表剔除国家财政存款部分后的国民、团体的货币财富（对于一个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常常远大于 GDP 增速的社会，不予以剔除也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将在下面一节中看到这种情况）。因此，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财富=M2+各种实物财富；其中的 M2 是所谓的货币资产，它本身是虚拟的——在支付之外的功能跟随不同的社会而有不同的表现，是一种不固定或不能统一确定的事物，可以瞬间猛烈蒸发或骤然增加——如跟随汇率变动进行标价，与现实中的金、银、金属铸币或纸币形式却统统无关！再例如，按照社会领域或部位来划分——这样划分的结果是本文中应用最多的，可分为社会公权力领域中的资产和公权力之外的社会资产两部分。社会公权力领域的资产，包括财政收入和支出，也包括社会公权力系统所提供的所有社会保障或公共服务。公权力系统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之外的所有资产、服务，在本文中都归之于普通的社会资产。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和社会的经济状况直接相连，货币就会处于一个闭和的系统中，加上举债也应如此：国家债务规模是否合理，也只与经济状况有关。反之，也一样，在一个闭和的货币系统中，社会的财政收入、企业经营状况或盈利水平与社会的经济状况直接相连，绝不会出现二者对利率、汇率等市场指标甚至税负率等政策指标完全脱敏的现象。一个社会的货币系统是一个闭和的货币系统的话，其中的经济、企业就均处于“市场化竞争环境”中，从国家财政收入、公司盈利能力等方面，也就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的实际状况，包括社会法律环境（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状况）、自然生存环境（变化）的真实状况。最后，由于这样的货币系统中，公权力系统提供的服务及其所占用的资产，都与普通社会资产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从中获得的社会幸福，可以简单地通过手中的货币数量或资产数量来衡量——通胀和通缩，都只是短期的市场波动形成的，无法改变货币数量的长期指标作用。也就是说，在一个闭和运动货币系统的社会中，人们手中的资产或货币数量多，分享的社会幸福就同方向、甚至同比例地增加，反之，人们手中的资产或货币数量少，分享的社会幸福也同方向甚至于同比例地减少。而所有社会成员提高收入和增加资产的平均难易程度，反映了该社会信仰的变动状态：社会信仰水平提高的越快、人们增加财富和幸福越容易，反之亦然。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递减边际效用原理，它决定了在一个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所有的生产、经营和消费等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一个向右下方倾斜的边际效用直线的引导，最终要坠入边际效用为 0 的枯竭底部。避免经济失去发展动力的基础，在于经济领域之外的社会领域中，具备可以改变、至少是阻止现有经济活动导致的全社会货币边际效用发展趋于 0 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源自社会信仰所生发的科技创新及应用能力。因此，上一节中谈到的财税开支中的核心部分，即维持社会信仰的财税开支部分的大小、比例，最终决定了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不同的财税形成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

最后，我们根据本节的方法和思路，来考察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两个例子，以便读者对本节内容有更好的理解。依照本节开始时的等值税收曲线，不难知道，一个国家的 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时，若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幅度出现了大于其货币供应量 M_2 （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幅度的话，这个国家的货币系统就运行在曲线 L 中 A 点的下方，该国经济属于技术推动型的模式，社会幸福水平和社会信仰水平的提高难度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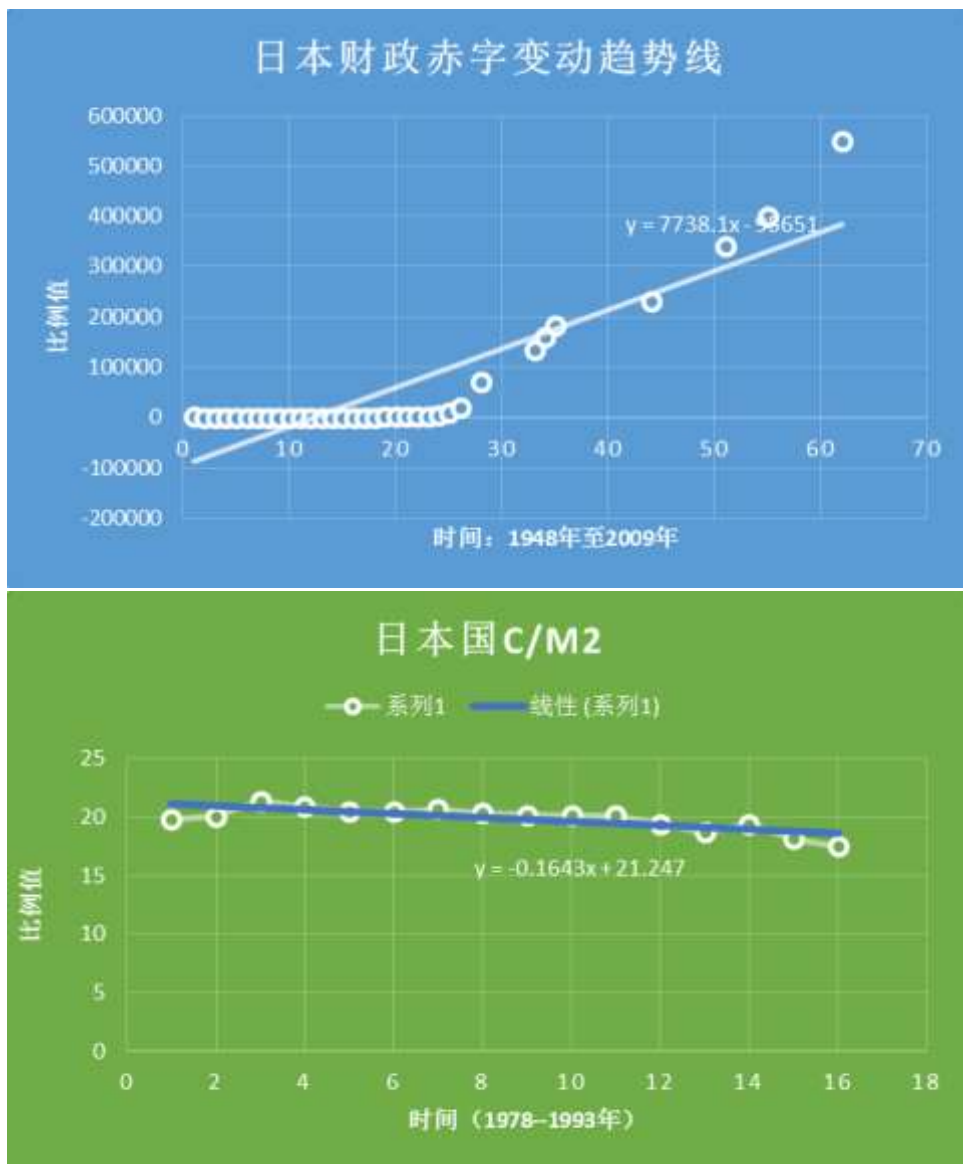
否则，处于 A 点之上的位置，则属于货币推动型的经济模式。上面的两张图表是根据来自于美国商务部的基础数据——1959 年至 2011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财政开支（K）、财政收入（C）和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所绘制出的。根据刚才讨论的结果不难看出，美元是一种闭和货币：其 GDP 变化趋势与 M_2 、C 的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再根据 K/M_2 和 C/M_2 图表的趋势来看，呈现出财政收支均比货币供应增长更快的特点，显示出美国社会的财税收入模式及经济发展模式均为典型的技术推动型。

再来看日本同类图表：很明显，日本的货币供应 M_2 的增长速度超过了 GDP 的增长速度，与美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属于典型的货币推动型经济模式。



需要读者注意的是，现实世界中，我们常常需要跨越国境来考察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情况，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国际贸易领域，如一个国家出现贸易盈余，意味

着从其名义或公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数据来看，是包括了社会财产的全部孳息的结果，但贸易顺差部分的财富或孳息并不在本社会内继续划过财税链——它们褪下的货币外衣虽然还仍在继续制造着本社会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对全社会来讲，它公布的或名义上的财税收入的数据，相对于其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来讲，是有潜力或保留的。因此，在具体分析两个或多个经济体的有关宏观经济数据时，同样的财税收入变动趋势和数量，但一个存在贸易顺差，另一个却存在贸易逆差或没有贸易盈亏，这时，应该对存在贸易顺差的经济体的财税收入做减法——减去相应的贸易顺差数额，或对其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数据做加法——加上相应的贸易盈余数额，然后才使两国或多国的经济数据具有真正和真实的可比性，即 C/M_2 的变动或货币供应量在财税形成中的真实比重才得以体现。同样的因素还包括财政赤字与盈余——有财政赤字的，应先在其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中作减法处理，减去相当于财政赤字数量的 M_2 数据后，再对比 C/M_2 的变动异同；财政黑字的，应先对其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做加法处理，即在其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的基础上，加上相当于财政结余数量的 M_2 后，再对比各自的 C/M_2 ，得出财税形成模式的判断结论。对于存在政府债务的不同情况，与存在财政赤字的情况做同样处理；对于出现减税或加税等不同措施的，也应先在财税收入中剔除税负率变动的影响因素……由于日本的财政赤字长期高企，因此，我们在日本经济中，发现了其财政收入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趋势，与美国社会正好相反：美国的趋势线向右上方倾斜，而日本的趋势线却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分别见上图中美国和下图中日本的 C/M_2 趋势图中的趋势线）；但将日本经济数据中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按上述方法作处理后，即减去同期日本的财政赤字后，我们会发现日美经济中的上述差别消失了，如下图所示的日本财政赤字变动趋势线，显示出的直线斜率远远超出其 C/M_2 趋势线的斜率，根据简单的几何原理可以知道，日本经济中真实的 C/M_2 的趋势线与美国社会的一样，也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一条直线。可见，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模式，同属货币闭合运动体系，只是分属该体系中的技术推动模式和货币推动模式下，并不具有根本性的体系差别。下一节，我们利用中国与日本的实际经济数据，具体对比中日两国在财税形成模式、经济模式等各方面的差异时，再详细演示貌似相同的中日经济数据，其实才有根本性的体系差别。



二、 非闭和运动的货币

第一小节：非闭合运动的货币及其特点

单纯从可以增加财税链长度的角度来看，除科技进步创造更多的新使用价值从而创造出新的征税点和征税环节以外，在逻辑上，必然还存在另外一条信仰败坏的邪恶之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违法行为。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简单讨论过闭和货币系统中出现类似现象的影响及后果，下面，我们直接从货币的支付开始，重新构建一个等值税收曲线，针对增加了这些违法行为后的货币运动，进行详细的讨论。

首先，我们来看下图 1-1-B-5，线段 OB 为货币供应数量，它按照正常（合法）的社会平均税负率和财税链 OC，产生了 BC 长度的财税收入。以上是我们在上一节中刚刚讨论过的，不再多说。与上一节中的讨论所不同的是，现在的线段 OB 所表示的货币量，还利用非法手段或通过非道德的途径，如假冒伪劣或污染自然环境等方法，在没有被取缔之前，产生了线段 AB 长度所表示的财税收入，和线段 OA 长度的一段延长的财税链，即现在的财税链长度已经变成成为线段 AC。当然，现实情况与此有些差别，因为非法的资金量绝不可能是社会的全部资金量，且并不可能固定不变，但可变的、部分的资金量并不会影响我们下面的讨论结果，为了让读者对照起来更明确及讨论、作图更方便起见，我们对社会的货币供应量的范围和大小先不做区分。这样一来，在相同的货币供应量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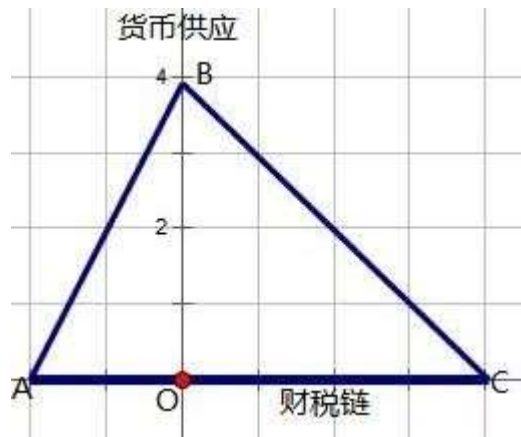


图 1-1-B-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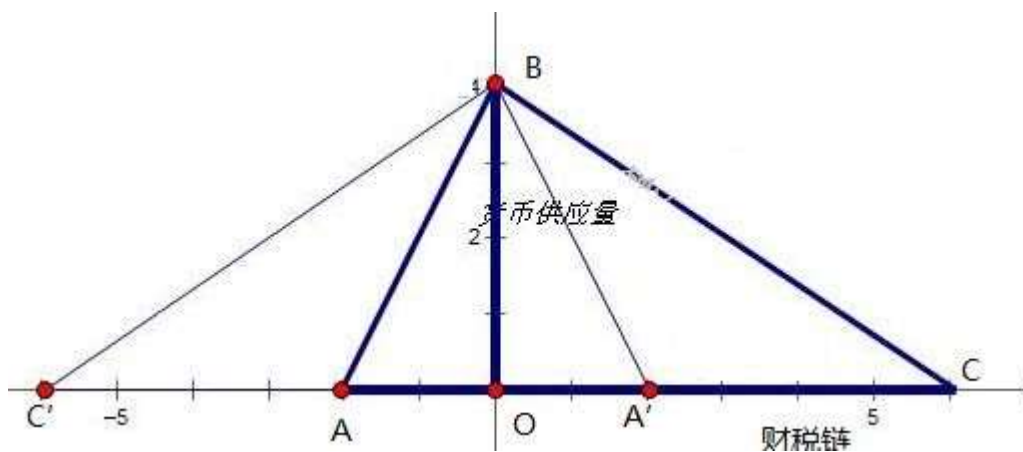


图 1-1-B-6

节中我们讨论过的一样，也有多种方式或途径可以选择，如图 1-1-B-6 中所示：同样的货币供应量 OB，可以采取线段 AC 所在的财税链，也可以采取采取线段 C' A' 所在财税链，在同等税负水平（线段 BC 和线段 AB 的斜率，在调整为正值后相同）中实现或达成。两种途径的不同，只是合法的财税链长度与非法的财税链长度互换了一下位置而已：财税链 AC 中，合法或道德的财税链是线段 OC（OC 的长度等于 OC'），非法的财税链是线段 OA（OA 的长度等于 OA'）；财税链 C' A' 中，合法或道德的财税链是线段 O A'（长度等于 OA），非法的财税链是线段 O C'（长度等于 OC）。这样一来，在社会中存在一个非法财税链的时候，也象上一节中我们所讨论的一样，要实现或达成一个等值的财税收入，同样会出现或面临一个有不同的财税链和不同的货币供应量所组成的各种组合方式。把所有包含着这类处于法律和道德许可之外的财税链中进行运动的货币量 OB，以其被适用的实际平均税率，重复我们在上一节中构建等值税收曲线的过程，不难得到如下图 1-1-B-7 所示的两条等值税收曲线 L 和 L'——两条分处第一和第二象限的双曲线。根据几何学的基本知识，我们不难知道，曲线 L 和曲线 L' 永不会相交、或永不能组成一个连续的曲线，即使是对货币供应量、社会税负水平进行区分和调整后的也是如此。例如，社会中游离在非法领域的货币量较多或较少，又或者非法领域的实际税负水平较高或较低等等，都只会导致两条曲线的形状发生变化，而两条分处不同象限的双曲线及其永不相交的事实，却不会有丝毫改变，这正是我们开始讨论时就可以忽略货币量等具体差异而采用最简单方式的原因。从曲线 L 和曲线 L' 永不相交的图形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运行在社会中的整个货币系统，事实上却处在一种永远无法闭和的分裂状态当中，就象始终处于“两张皮”之间被撕裂开来一样，这种非闭合货币运动的特征，事实上也必然使其社会中貌似统一的经济模式、财税收入模式，始终处在一种被撕裂的真实状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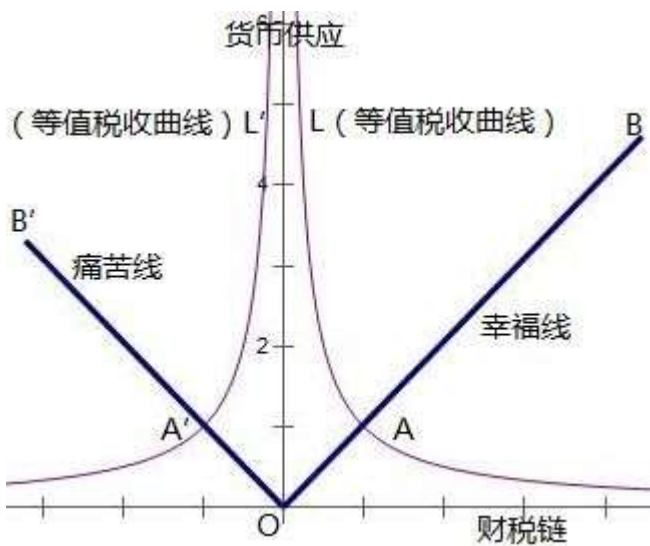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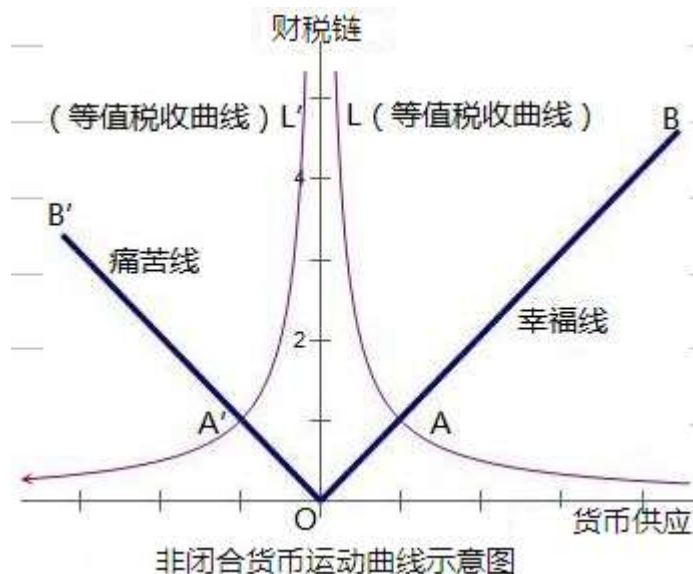


图 1-1-B-7

税链长度或技术因素，对财税收入和经济发展的贡献比重，均超过货币供应量因素所占比重，且沿着曲线 L' 向下移动，离开 A' 越远，贡献比重越大，属于技术推动型的税收形成模式及经济模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此处的所谓技术，都是从对人类自身、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害而言的，因此，其结果是缩短社会的总财税链长度，阻断物质财富的产生和社会幸福提高。将“财税链”数轴和“货币供应”数轴对换一下，如下图所示，会看的更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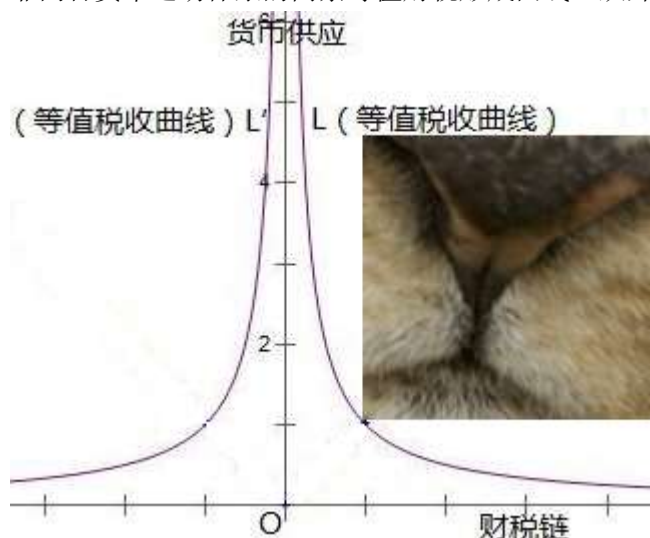
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示意图

楚：财税链长度的延伸，总要伴随着货币供应的减少，意味着社会中的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持续减弱，社会物质财富与标示其数量的货币供应数量持续减少，人们手中少物缺钱，社会贫困日趋严重。 L' 也是一条信仰之弧，社会信仰状况沿着曲线 L' ，越向上或越向下走，社会信仰越败坏、越极端……最终，各种信仰或意识形态在本质上会通往与《圣经》信仰相对的无神论意识形态中的两个极端——拜物教（金钱万能论）和个人崇拜（假神）。例如，沿着图 1-1-B-7 中的曲线 L' 向上移动时，社会意识形态会越趋向于金钱万能论，人们越普遍赞同“没钱万万不能”的论调、“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财税链绝对长度不断缩短，新技术来源日渐衰减、枯竭。最终，社会的财税链绝对总长度为零，连任何的违法犯罪者都无法从所获取的社会财富中获得幸福或社会效用了，社会彻底失去控制，出现被废弃式样的社会死亡；而沿着同一条曲线 L' 越往下走，一种摒弃、鄙视物质财富的社会信仰或意识形态更容易趋向扩散或独占，其极限位置表示其社会意识形态高度统一在一种假神或个人崇拜所形成的人造神的意识形态身上；与此同时，这种鄙视物质财富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增长，虽逐渐消灭了违法者对技术应有财税链长度的那种负向干扰，但新技术的产生包括正常的国际间技术转移也同时都被极端的意识形态所破坏，缺少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被应用的机会。如此，物资日渐匮乏的社会发展结果，从经济领域带来越来越大的

社会痛苦，最终，社会物质财富极度缺乏，达到无法应对自然环境如气候条件的正常波动的程度，整个社会处于无法维持人类最低的生理需要的紧急状态中，出现灭绝人寰式样的社会死亡。当然，综合上述内容，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灭亡的过程中，我们不难从反面看到，假设一个非闭合货币体系可以自动转型为一个闭合货币体系的话，必要经过社会信仰向《圣经》信仰统一集中，同时出现社会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才可以。

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在一个闭和的货币系统中，事实上也大量存在着类似的非

闭合运动，但是，却都被财税链的收缩运动所平衡或吸收，并不会独立表现出来。如造假猖獗，在带来税收增加的时候，也带来财政开支的增加，社会需要增加打假的公权力力量，如增加公务员数量、提供更多的打假资金等。诸如此类，从社会整体上讲，从造假领域增加的税收等“福利”，被打假的开支扩大所抵消，打假人员的增加抵消了制假领域的失业……社会幸福和社会信仰在此得到维持或恢复原状，自动弥补上货币运动产生的破口，也就恢复了货币的闭合运动状态。因此，社会信仰的稳定不变是货币闭合运动的基础，后者只是前者在经济领域中的必然表现而已。货币的闭和运动，完美地验证着“神的物”中绝不应有不蒙悦纳的不洁净之物或非法之物的《圣经》启示。同时，货币的非闭合运动形式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和事实：当社会存在一个超越法律、不受社会制约的领域时，例如在一个统一社会的内部，专制社会的公权力系统就可能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直接归于专制政权的国有企业，也可以超越其它社会企业必要遵守的市场法则，不受制约……这样，就会在社会中永远保留下一个只服从于专制者理性的货币闭合运动系统，它始终会隐秘地依附在经济领域内的货币闭合运动的旁边，以完全相同的闭和运动模式生存下去，且始终隐蔽在市场身后来决定社会的财税形成模式和经济运行模式，必然成为专制社会中非闭合货币系统的主导性社会力量。从上一节中有关财税收入的完全公式 $C = C_{前} + \Delta C = (M_{前} * S1 + L_{前} * S2) + (\Delta M * S'1 + \Delta L * S'2)$ 来看，专制社会的财税形成模式完全取决于专制者控制货币供应量的意愿和能力，当专制者减少对货币供应的干涉时，财税收入会进一步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状况；当社会的真实经济状态已经处于绝对衰退中，不会产生财税时，专制者仍然可以通过向社会提供货币供应而维持任意数量的财税收入。继续使用上一节中那个太阳能热水器系统和电热水器系统的比喻，太阳能热水器储水箱中的水，就是专制者可以操控的货币供应水量，自来水的进水量就是实体经济可以产生的财税收入，专制者可以简单地操控混水阀，让整个系统在自来水进水量不断减少、甚至减为 0 时，照样流出相当于的自来水管最大流量的水流，彻底掩盖社会、经济的真实状况。例如，当来自经济领域之外的货币供应完全占据一个社会的财税收入来源时，财税形成曲线就只剩下第二象限中的那一部分，社会给所有成员只带来痛苦，人们退回到社会产生之前的蛮荒状态中。因此，专制者以违背市场法则所使用的财税收入和注入经济体中的廉价货币供应，是造成一个国家或单一社会中出现非闭合货币运动的根源。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两条等值财税形成曲线，从外观看上去十分类似于狮子的口型



线，在《圣经》中，“狮子”因此就常常成为专制社会及国际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代名词。如经文“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育小狮子。’”（结 19:1-2），意指以色列王国及其后的犹大国和北国以色列，都是专制社会，包括当时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也都是专制社会形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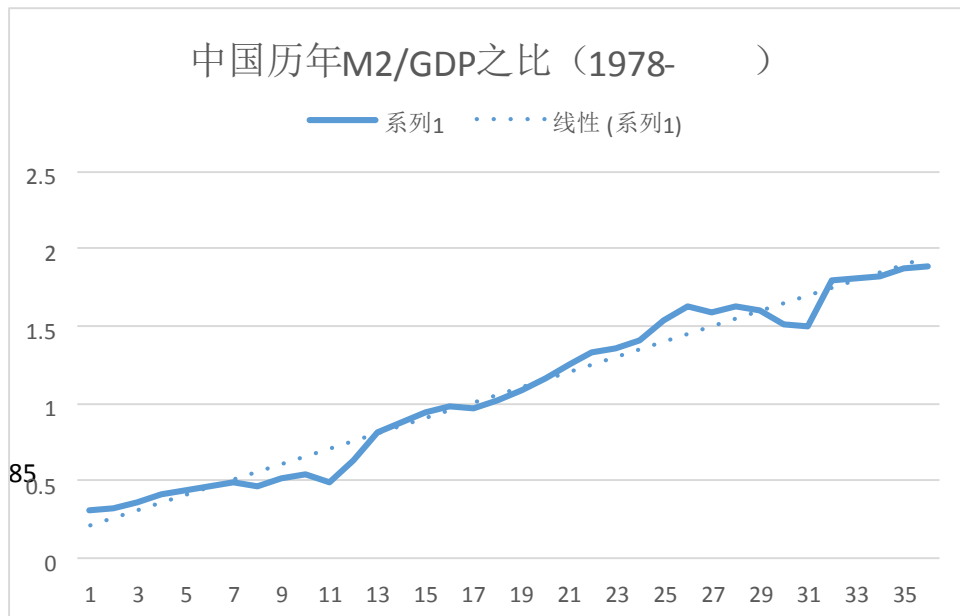
在非闭合货币系统中，社会经济、各种企业事实上均处于“非市场化竞争的环境”中，从国家财政收入、公司盈利能力等方面，是绝对看不到其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的，更看不到

社会的真实状况——提高社会幸福的同时，总伴随着制造出了同样多的社会痛苦：人们手中的货币多了，痛苦在社会的另一边已然悄悄扩大，如同样的社会事项，开支要增大或不确定性会增加，假冒伪劣商品和社会不公事件越来越多……；社会的科技水平提高了，痛苦也在社会的另一边已然悄悄扩大，如生产经营活动减少、经济活动政治化或单纯的经济活动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风险、社会的物质财富日趋贫乏……由于可以对冲掉所有的社会幸福，让社会始终沿着或紧贴其最低限度得以维持的界限存续下去，非闭和货币系统的两条曲线又可以称为极限曲线，是保证人类社会与《圣经》中所描绘的大洪水前的蛮荒时代相比，已有本质区别的标志线。而上一节中我们考察的闭和货币系统，则是保持一个以色列类型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形式。将蛮荒时代货币运动曲线和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看作是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在第二和第一象限中的两种特殊形态的话，人类社会的整个演变就成为一个由货币运动形式变化所展现出来的连续的自然历史过程，它以财税形成和其中的货币运动表现出来，而幕后的真正历史主宰，就是人群或社会信仰的变动。人类从蛮荒时代进入专制社会、再由专制社会进入以色列类型的社会的历史过程，标志着全人类的信仰前进或信仰水平提高的连续进程和结果。至此，人类的社会史，完全就是一部信仰连续变化的历史，除非社会信仰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例如达到可以自我修复的程度或无法阻止的加速下滑程度，社会形态和社会作用都不会产生质的改变，人们将永远处于专制社会中等待信仰水平上升后的自我救赎或信仰继续墮落下的彻底崩溃。

虽然，从数学的角度看，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两大组成部分各自也都是闭合运动，但《圣经》记载和世界历史表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形成远远早于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出现，货币作闭合运动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最早只能出自于非闭合货币运动的专制社会世界里，就象货币闭合运动曲线从非闭合货币运动图腾中直接游离出来一样。《圣经》中，以色列社会的由来、建立和完成，伴随着一种信仰的产生、扩散、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隔离而独立的历史过程，因此，从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时起，到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止，就事实上全部完成了上述过程。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后，若保持之前的信仰水平不后退的话，他们会自动进入到摩西律法中的那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形态中。但是，《圣经》中绝大部分文字，详细记载了以色列人的信仰从一神滑向多神崇拜一步步败坏的过程，社会形态相应出现了士师、王治的专制形态，直至以色列社会灭亡。例如，《圣经》对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中的信仰状态，明确指出已经处于败坏或下降后的状况，“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四十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龕，并你们的神星。”（摩5:25-26）可见，《圣经》中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以色列人在《圣经》中并未实际进入过。这就是说，《圣经》中有关人类社会的描述，最多的其实是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其中指出的方法和策略，都是围绕治愈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这个“病人”、“罪人”的，为我们今天验证社会经济学理论和理解人类历史、展望《圣经》中描绘的人类未来提供了可能和工具。

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读者注意的重要之处。沿曲线 L' 向上移动到 A' 点的整个区段，经济处于技术推动型经济模式下，当技术推动力下降、货币供应的因素逐渐增加，上升到 A' 点之后，经济模式准备转换为货币推动型经济模式前，必须具备满足货币供应量可能扩大的社会和技术条件才可以。这个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在闭和货币系统中，常常表现为一个犯罪集团或黑社会的影响力，会在资金断流后自然消亡，这对于帮助我们理解铸币怎样扼杀企图依赖货币供应的专制政权时非常有用，著名的历史实例如中国汉朝时的王莽政权。

2013



非闭合货币体系，无论从财税形成的哪个方面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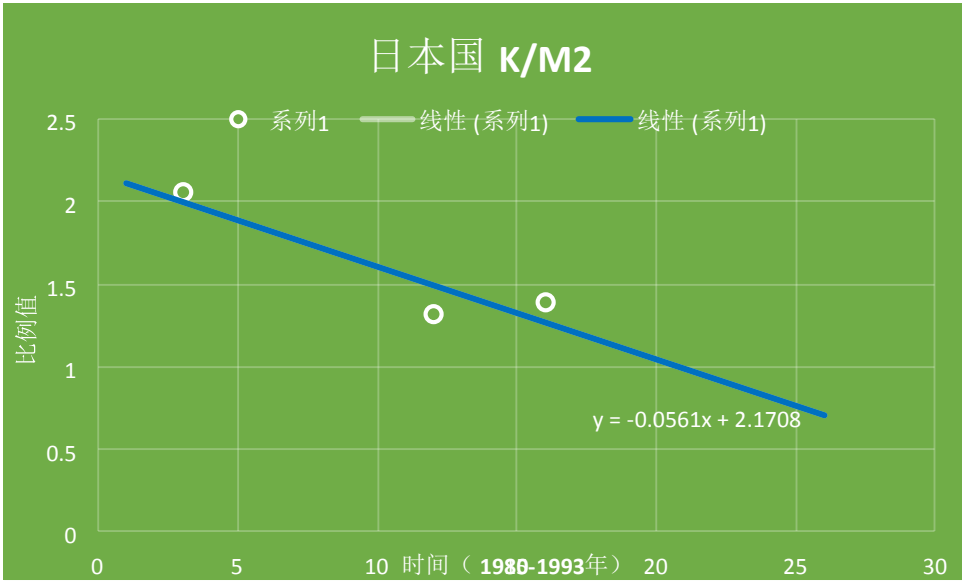
与闭和货币系统都一样，动力、成分、转换机制等等，完全一致。那么，我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仅仅从经济指标中就区分开二者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演示、说明一下。由于闭和货币系统中的社会幸福无法被公权力系统或其他任何社会系统所独占，所以在经济发展进入货币推动型后，经济增长必然表现为较大的财政赤字（去掉国际贸易顺差或加上贸易赤字后）或政府负债——没有竞选领导者愿意提高社会税负率、以及社会税负水平下降（分担或减轻民众的社会负担，也是民主选举的压力）造成的结果。而同样情况下，在非闭合货币系统中，社会公权力系统若愿意且没有货币物理属性或技术水平制约发行量的话，就可以简单实现财政开支继续或任意扩大且有盈余、以及维持甚至仍然可以提高已经处于较高水准中的社会税负水平。

简单对比一下日本和中国的有关经济数据，日本在1980年至2012年间，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的货币供应量因素比重增加（见上表），与中国完全相同（见上图）；再看中日两国的财税收入与货币供应量的比例变化，也都一样——均为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如图所示）



但日本的税收减少，在经济成长中总要伴随着财政赤字和国债的猛增（见日本财务省《日本2010年财政状况报告》），表现出日本的财政开支与其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之比的变化，与财政收入和其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之比的变化更大—— K/M_2 直线的斜率比 C/M_2 直线的斜率更大。期间内的各具体阶段中，经济成长期还曾经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或经济泡沫，如1985年至1991年间；经济疲软或衰退期，常伴随在限制性财政政策的实行期，如1974年——这种情况，与在国债利息负担严重的时期，同样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减小，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后者正是发生在1992年至2010年间日本社会中的真实历史状况。

来看中国，在货币供应量比重不断增加的1978年至2013年间，税收或财政收入、及财政开支均增长且伴随着无赤字和债务的显著增加（具体数据见下面表格，其中数字来源，国民生产总值 GDP 和财政总收入两项，均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货币供应量的数据，除表格中注明的以外，来自互联网），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日本处在一个与美国社会一样的闭和货币系统中（参见上一节中的美日经济对比），与中国不同——中国处于一个与日美不同的非



闭和的货币系统中。若考虑上这个期间内，中国还一直出现巨大的国际贸易盈余（社会债权），日本却是曾经出现过巨大的贸易赤字（负债），

区别就更加清楚无误。也就是说，日本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 M_2 的增长，是建立在财政支出数额无变动下的赤字出现或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贸易赤字及减税之上的一种名义上或虚假的增加，是有巨大或增大负担前提下的增长，去除这些负担增加，剩下的货币供应量 M_2 的实际变动方向或方式，与美国社会是一样的。日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占其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上升，是其积极财政政策、减税政策等造成了货币总量或财富总量（总孳息）向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中的输送、转移和倾斜而造成的。这种倾斜、输送和转移，并未涉及到日本社会中的财富总量和货币总量——在社会的另一端，这种增加同时造成了在财税领域或公权力领域的实际财富减少、或名义财富增加（赤字和债务同时增加）。因而，这种总量中的分割比例的变化，也未改变财税收支与经济实际状况连接的状态和比例关系，未破坏货币闭合运动及其财税形成模式。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 M_2 的增长，与日本社会正好相反，是一种超越经济增长的实际增长或超额增长，不仅没有日本社会中伴生着的政府债务、财政和贸易赤字、减税等负担出现，却同时呈现出财政开支大幅提高前提下的财政结余（按照国际通行算法，中国政府从未有过财政赤字，每年都是财政结余）、政府债务水平变动较小甚至无变动，巨大贸易顺差、税负水平稳定甚至上升，充分显示出中国经济类型与美日经济类型的根本不同——中国的财税收入增长或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的增长，总有超出其经济增长边际的异常魔力！结合中国 1978 年至 2013 年的经济数据来看，1978 年至 2013 年间，中国的货币供应量（ M_2 ）年均增幅为 21%，同期的财税收入增幅为 14%，36 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因素占财税收入的比重始终维持在年平均超过财税链因素的 $(21\%-14\%)/14\%=50\%$ 的水平上——也就意味着平均每年有 50% 的财税收入是来自于非经济领域的，或者说，每年都有 50% 的货币供应量是运行在与财税链无关的其它社会领域中的。至 2013 年，货币供应量因素在中国的财税形成机制中的总体作用，相较

年份	GDP (亿元)	财政总收入 (亿元)	M2 (亿元)	M1 (亿元)	M0 (亿元)	注
----	----------	------------	---------	---------	---------	---

1978	3645.217474	1132.26	1134.5	859.45	212	M0 数据全部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1979	4062.579191	1146.38	1339.1	1,069.36	267.7	
1980	4545.623973	1159.93	1661.2	1,315.74	346.2	
1981	4889.461062	1175.79	2027.4	1,636.56	396.3	
1982	5330.450965	1212.33	2369.9	1,885.11	439.1	
1983	5985.551568	1366.95	2788.6	2,165.04	529.8	
1984	7243.751718	1642.86	3583.9	2,845.24	792.1	
1985	9040.736581	2004.82	4264.9	3,011.39	987.8	
1986	10274.37922	2122.01	5354.7	3,856.03	1,218.40	
1987	12050.61513	2199.35	6517	4,481.67	1,454.50	
1988	15036.82301	2357.24	7425.8	5,490.17	2,134.00	
1989	17000.91911	2664.9	10786.2	5,830.51	2,344.00	
1990	18718.32238	2937.1	15,293.40	6,950.70	2,644.40	以下 M1 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1	21826.19941	3149.48	19,349.90	8,633.30	3,177.80	
1992	26937.27645	3483.37	25,402.20	11,731.50	4,336.00	
1993	35260.02471	4348.95	34,879.80	16,280.40	5,864.70	
1994	48108.45644	5218.1	46,923.50	20,540.70	7,288.60	
1995	59810.52921	6242.2	60,750.50	23,987.10	7,885.30	
1996	70142.49165	7407.99	76,094.90	28,514.80	8,802.00	
1997	78060.85276	8651.14	90,995.30	34,826.30	10,177.60	
1998	83024.33071	9875.95	104,498.50	38,953.70	11,204.20	
1999	88479.1614	11444.08	117638.1	45,837.30	13,455.50	以下 M2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
2000	98000.48216	13395.23	132487.52	53,147.15	14,652.70	
2001	108068.2	16386.04	152888.5	59,871.59	15,688.80	
2002	119095.6794	18903.64	183246.94	70,881.79	17,278.03	
2003	134976.9719	21715.25	219226.81	84,118.57	19,745.90	
2004	159453.6048	26396.47	253207.7	95,969.70	21,468.30	
2005	183617.3746	31649.29	298755.48	107,278.80	24,031.70	
2006	215904.4056	38760.2	345577.91	126,035.13	27,072.62	
2007	266421.9991	51321.78	403401.3	152,560.08	30,375.23	

2008	316030.3388	61330.35	475166.6	166,217.13	34,218.96	
2009	340319.952	68518.3	610224.52	220,001.51	38,245.97	
2010	399759.5394	83101.51	725851.79	266,621.50	44,628.20	
2011	468562.3776	103874.43	851590.9	289,847.70	50,748.46	
2012	518214.7457	117253.52	974148.8	308,664.20	54,659.81	
2013	588,018.80	129,209.64	1,106,524.98	337,291.05	58,574.44	

1978 年，已经上升了（21%-14%）/21%即 33%的幅度。中国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中充满了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或货币的闭合运动无法解释的种种问题，例如，按照财税链延长或科技进步、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 M_2 的增长还有 50%的空间应当显现而未出现，仅在货币供应量领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人民币供应量统计数据之间相互矛盾、有各自成体系、有着各自独立运转规律、无法统一解释的种种现象，如中国的基础货币量（ M_0 ）从 1978 年的 212 亿元人民币提高到 2013 年的 58574.44 亿元人民币，增长了 276 倍多，在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出现 161 倍多高增长的背景下，狭义货币供应量（ M_1 ）仅增长 393 倍——去除基础货币量（ M_0 ）本身增长的倍数之后，实际只增加 123 倍，远小于国民生产总值同期的变化幅度，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也仅增长 975 倍，——去除基础货币量（ M_0 ）本身变化的幅度，以及由基础货币量（ M_0 ）转变到狭义货币供应量（ M_1 ）的活跃程度，货币由基础货币 M_0 或狭义货币 M_1 转为 M_2 时，活跃程度的下降幅度更大，因此，中国经济中有太多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处于无法解释去处、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严重不相适应的持续低效状态中。但是，对于这个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来看，是被对半低估了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如果仅从财税收入的角度来看，却又涉嫌被严重高估了，即有 50%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无法从产生财税收入的那个经济环境中产生出来——一个年均 14%增长率的财税经济环境中，却产生或需要着一个年均增长率高达 21%以上的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年均增长率达 17%的基础货币（ M_0 ）的货币体系。相对于日本经济来讲，中国经济在增长放缓、扩大货币供应进行刺激的时候，不会出现日本经济中必然出现的下列情况（至少永不会在中国的中央财政等国家层面上出现）：财税收入减少或赤字扩大、或债务水平提高，税率或税负水平提高并伴随贸易逆差扩大或顺差的消失或缩小等；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也不会出现美国经济中必然出现的同等幅度或力度的财税收支大幅增长、减税、广义货币供应量（ M_2 ）快速增长、贸易顺差出现或扩大、或贸易逆差缩小和消失的情况。

综上，与日美两国相比，中国的人民币运动系统，被截然分为两部分，各有 50%的部分处于不同或独立的系统规律控制之下：有 50%的部分与日美一样，处于经济领域中，受经济理性规律的控制，作闭合运动；另外还有 50%的部分与日美不同，处于经济领域之外的其它社会领域中，受社会理性规律制约，也作一种独立的闭合运动。以上两种独立的闭合运动共同组成了中国社会的人民币货币运动体系，因此，从财税形成的角度看，人民币处于一个复合的、不连续的非闭合运动状态中。

按照 30%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来计算，自 1978 年至 2013 年的 36 年来，中国社会中，每年先有固定比例为 50%的社会新增财富总量会被以税费形式抽走，然后再在货币供应量因素下被抽走每年不同份额或比例的财富，且逐年增加，直至 2013 年达到了 33%份额的新增财富量，都以货币供应量超过财税链长度延长所需要的上升程度的方式，被隐秘地抽出，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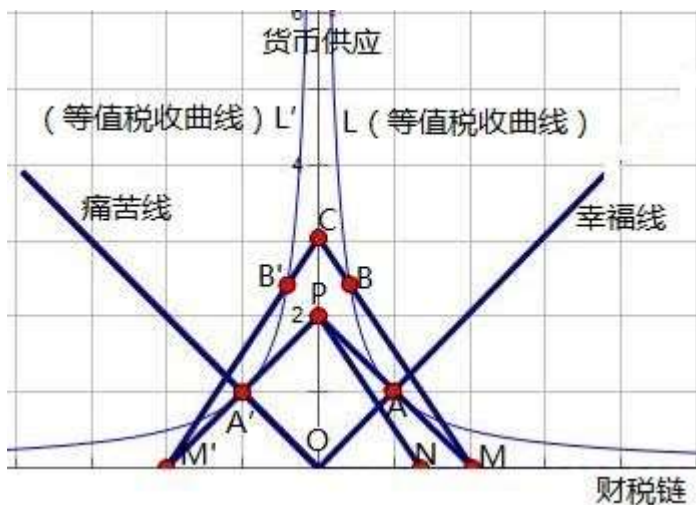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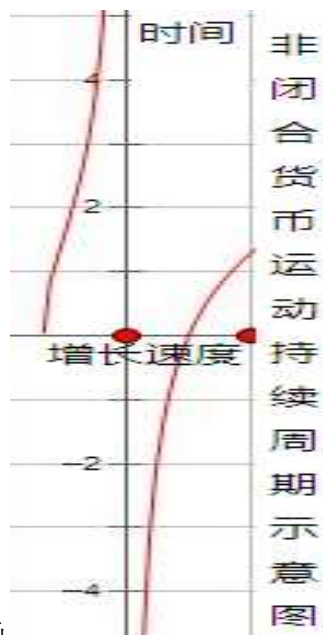
图 1-1-B-8

2013 年年底，中国全社会只剩下（50%-33.3%）即不足 17%（16.7%）的财税链或财富空间可以维系这个货币运行系统的继续存在（如图所示：1978 年至 2013 年，中国的人民币运行在曲线 L 和曲线 L' 组成的非闭合系统中。36 年间，中国财税收入中，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因素有 P 点移动到 C 点，长度提高了 33%；财税链长度则有原来的线段 OM 缩短到线段 ON，长度减少了 33%；中国社会中的等值财税形成比例关系，也从 1978 年所处的 A 点位置开始，沿曲线 L 向上移动，至 2013 年时已移动到了 B 点位置）。因此，按照人民币自 1978 年以来已经运行了整整 36 年的曲线轨迹，从时间上计算，将来只剩下 36 年的 16.7% 时间即在 2013 年以后的 6 年里可以维持，即在 2019 年年底，这个货币的非闭合运动系统就将彻底崩溃（对于制造社会痛苦的那个系统来讲，就是他们的幸福到头了，再也没有人可以用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方式，从中国社会中拿走一分钱！）这个时点，或者说，从整个财税链上说，可能还有绝对数量为不足 17% 的长度存在，但那里只集中了让社会产生绝对痛苦的部分，与社会秩序完全不存在时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崩溃时点”。[具体计算过程，还有另外一种方法：由于只有 20% 的财税链长度可以维持人民币系统的运行，占有效财税链即 0 点右边的比例为 40%，36 年缩短了 33.3%，只剩下 40%-33.3% 等于 6.7% 的长度空间可以维持，按照 36 年缩短 33% 的速度，走完或消耗掉 6.7% 的财税链长度，时间也是 6 年，即 2019 年底]另外，按照货币供应量与财税链长度的反比例关系，运用货币供应量的变量在宏观税负水平条件下形成财税收入的极限位置的方法，即货币供应量的边际效用为零的位置，来判断和分析中国经济，也能得出与本文方法完全相同的结论，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作《圣经中的中国和当今世界》中有关篇章，两处结论中的具体数字差别，源自计算精确度的确定标准的不同。以上计算结果，与统计数字的具体起始时间及统计的间隔时间有关，但使用货币手段的开始时间却是固定的，因此，现在依据年度统计数字计算出来的实际结果，与下一小节中的理论结果，总有以年度为计数单位的差距，具体到中国的情况，假设中国社会自 1978 年开始使用货币供应量策略，这里的误差与下一节中的理论值（2017 年结束、2018 年开始）存在接近 2 年的误差。

第二小节：数学理论上和《圣经》中有关非闭合货币运动系统存废规律的相同结论和不同表述

通过上一节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典型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市场力量和公权力等非市场社会力量处于一种均衡状态下，在整个财税形成因素中，二者各占 50% 比重，即货币供应量增速超过财税链长度或固定税率前提下的财税收入增速的 50%。现在我们假设一个初始条件为货币供应量（M）与税率（Q）的乘积等于其全部的财税收入（C）。不难知道，这个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可持续的最长时间，就等于从初始条件成就的时间位置到达以下时点所需要的时间：全部财税收入都来自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量部分（跃过这个时点后，财税收入与经济状况或与财税链长度无关，只与货币供应量相关）。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我们可以得出

这个时间数值的函数式。具体的计算过程如下：由初始条件得出等式 1 为 $M*Q=C$ ；假设财税收入的增速为 A ，因其财税收入的增长速度比货币供应增长的速度低 50%，即货币供应量年增长速度为 $1.5A$ ，再假设 X 年之后，到达所求的时点，即不难得出等式 2 为 $M \left[\frac{(1+1.5A)^X}{(1+A)^X} \right] * Q = C (1+A)^X$ ；把等式 1 与等式 2 结合，就得出了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持续时间 X 与其财税收支增速 A 之间关系的一个函数表达公式： $\left[\frac{(1+1.5A)}{(1+A)} \right]^X = (1+1.5A)$



/1.5A。函

图：1-1-B-9

数图像如上图 1-1-B-9 所示。

依据有关数学知识，我们可以知道，上述函数在 $-1 < A < 1$ 的区间内，是一个增函数，其经济学意义就是：财税收支变动速度越大，系统崩溃的时间越短；增速（或减速）越小，系统存续的时间越长，速度保持为 0 时，持续时间无限大。例如，在每年 1% 的财税收支增长率的情况下，这个系统可以维持 853 年多的时间不崩溃，而在每年 10% 的财税增长率的情况下，这个系统只可能维持不到 46 年的时间。在上一节有关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表中，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大约为每年 14%，对应的持续时间为 29.4 年，从最接近初始条件 ($M*Q=C$) 的时间点 1988 年（与初始条件相差度为 5%）起算，人民币非闭合运动最低还可维持到 2017 年年中，最长不过 2018 年。

通过分析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可持续时间与其经济发展速度间的数学关系公式，我们很容易得出下面的结论：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承载社会经济发展时的操控难度极大，抛开专制者的个人因素，从长期保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角度上讲，它最适合于零增长经济体。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历史来看，也确实如此，如凡财税开支扩大较快的朝代，如隋朝、秦朝，都是存续时间不足几十年的短命社会，而唐、宋、明、清等朝代的财政开支波动相对较小，存续时间就相对较长；从具有对照意义的朝代来看更是如此，如越是被普遍认为是缺少进取精神的政权，如东汉、东晋王朝，却比进取精神十足的西汉、西晋政权的存续时间更长；同样被普遍认为是缺少进取精神的北宋和南宋政权，寿命却十分的接近。从世界范围来看，整个古罗马时代，其经济发展相对于古代中国，一直呈现出低速、甚至加速度的低速发展状态，因为期间中国古代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被公认占据了全球更大且越来越大的份额，大约在中国的北宋时代（相当于罗马后期），达到巅峰，反衬出同时代的古罗马社会与中国社会相反的经济状况。相关研究的具体数据更清楚地显示了这种状况，如“19 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4 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

慢慢超过中国，但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 年时，中国的 GDP 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 30%”（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世界经济千年史》2003 北京大学版）。因此，古罗马社会长达 1500 年的“高寿”和其持续低速的经济发展，与同时代的中国历代王朝的短命及各朝代内高速发展、快速衰退的历史事实，完全符合上面通过计算、分析所得出的专制社会的历史规律；从信仰的角度上讲，也是如此。古罗马的统治者信仰水平较高且较稳定。且从废除平民与贵族不能通婚限制的十二铜表法，到给予以色列人信仰自由和确立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等方面可以看出，整个罗马社会信仰的确立和逐渐提高。漫长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又为信仰成熟后的社会转型结果奠定坚实基础。但罗马将基督教确立为国教后，出现明显的政教融合趋势，导致公权力系统不能反映社会信仰水平，扭曲公权力与社会信仰二者间应有关系——那种《圣经》在《但以理书》中最集中、明确显明的正确政教关系。最终，还是社会信仰的原因，导致罗马专制政权的灭亡和罗马社会的大分裂，未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平转型；其中社会信仰水平高、达到社会信仰自我修复水平状态的成熟地区后来首先开始演变为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并迅速扩散。欧美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后，中国社会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占全球份额随之开始逐步快速降低，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只有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才能长久支持快速的经济发展。总之，经济较快增长或较快衰退、财税收支扩大或缩小，都是专制社会的催命符，这对所有专制者都提出了很高的自控要求：他们若要政权长久存续，必须做到在经济发展、财税收入有可能扩大时，及时、对应税费可能增收幅度地进行相应的减税；而在经济发展减速、财税收入减少时，及时对社会富裕阶层进行同幅度地加税予以弥补。纵观古今中外的所有专制政权，迄今没有一个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他们要在社会经济发展时，抵挡住生理上的物质享受和精神上雄心壮志的诱惑，绝对不去品尝社会经济发展的任何成果，更不去规划、实施任何的经济、思想或某种意识形态的扶持、国土扩张或军备提高等主动性社会措施……而在社会经济衰退时，不仅要带头减少自己的消费和受社会供养水平（等同于给自己加税）、还要说服社会富裕阶层（其中主要就是专制者的家族、亲朋好友等关系密切者）承担更大的税收负担。从个体角度上讲，力求达到一个政权长久存在的专制者们，必须都是严格的自我禁欲者和唯政权长久存续的理性人才可以，他们的整体信仰水平必须极高。唯有象罗马统治者那样的信仰水平较高的专制者，才可以维持一个专制社会的较长历史时代，为整个社会信仰水平的提高奠定基础，做好迎接专制社会烈度最小的崩溃瓦解和其中的社会信仰水平较高地区跨入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准备。反观中国，“民以食为天”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变观念，他们中间最伟大者的最大愿望就是解决民生问题、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的各种需要，与普通中国人的“食色性也”的传统文化观念相辅相成，也完全契合中国道家中的无为、顺治思想。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历代王朝建立后，全社会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民众勤奋劳作，经济发展较快，恰恰落入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快速崩溃的规律之中，形成中国历史上频繁的王朝更迭现象。期间，如果出现或为领土而大动干戈、或大兴土木搞基础设施建设、或为某种意识形态或宗教发展大费周折等个人欲望异常强烈的君王，朝代寿命会更短暂。而同属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台湾和东亚地区，社会和平转型都是在社会信仰转变后才成功完成的。如台湾地区的社会，1949 年之后至现代民主社会确立的 1988 年之前，不仅最高领导人都是基督徒且从未出现政教合一倾向，整个社会信仰也愈加倾向于追求社会公正，距离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衣食满足优先”的观念越来越远。这种社会信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台湾地区 1988 年之后的历次大选结果中，只打民生牌的竞选者至今无优势可言。可见，解决中国政权历史宿命的根本出路，只在于优先确立正确的社会信仰、并在专制集团中间首先完成。

虽然经济快速发展、财税收支迅速扩大，必然意味着一个专制政权正在快速走向历史坟墓，但是，本质上难以驾驭经济持续发展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理论上和现实中并不缺少

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从对应着财税收入实际增长而应有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例如，如果专制者有机会或条件，提供基础货币供应量的持续高增长，那么，其财税收支规模也很容易维持净债务为 0 基础之上的单向扩张，并不受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制约。从数学的角度上讲，在决定财税收入的两大因子中，货币供应量因素以每年 50% 的加速度超越财税链长度进行增长，其占据财税收入的全部来源的时间就必是一个定值，且该定值与税收增长速度、与宏观税率均无关，也与货币供应量变化的速度无关。对于一个具备提供任意数量基础货币供应能力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来讲，货币供应维持原有的财税开支规模不变的增量因素占财税收入的比例从 0 到 100% 的时间，就是该系统存续的全部时间。由于财税总收入（C）等于国民生产总值（GDP）与宏观税率（Q）及其所占份额（ S_1 ）的乘积，再加上货币供应量增量（ ΔM ）及其所占份额（ S_2 ）的乘积，得出等式 1： $C = GDP * Q * S_1 + \Delta M * S_2$ ；有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速高于财税链长度增速 50%，得出等式 2： $(S_2 - S_1) / S_1 = 50\%$ ；有 S_1 、 S_2 均大于或等于 0 而小于或等于 1，得出等式 3 为 $S_1 + S_2 = 1$ 。将等式 2 代入等式 3 后，得出 $S_1 = 0.4$ ， $S_2 = 0.6$ ，将该结果代入等式 1，得出等式 4： $C = GDP * Q * 0.4 + \Delta M * 0.6$ 。等式 4 表明，财税收入全部有货币供应量因子构成，需要货币因子的份额再提高 $1 - S_2 = 0.4$ 即 40% 的年度总份额，同时，财税链因子的份额也对应降低 $S_1 - 0 = 0.4$ 即 40% 的年度总份额。因此，一个典型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靠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而维系的极限时间，为完成变动 40 个年份额的时间即 40 年——或者说，经过 40 个年度份额的变化后，必然到达财税收入完全由货币供应的增量部分构成的崩溃点（没有经过财税链或经济运行参与其中的全部国家财税收入或支出，意味着专制者彻底失去对经济、社会的有效控制权，社会倒退到社会产生之前的蛮荒状况或无政府状况中去）。运用该定律，可知上一节中我们所引用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及应用该数据计算的误差水平应在 2.5%（ $1/40$ ）至 4.8%（ $1.9/40$ ）之间。当今中国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最迟于 1978 年之后的 40 年，即 2017 年结束、2018 年开始时彻底崩溃、解体（结合具体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最贴近时间为 1978 年 10 月以后，此后 40 年的最后时点在 2018 年 10 月前），除非社会信仰在此时间点之前改变了现在的运行轨迹或趋势，任何避免中国社会在此时点解体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综上，全部专制社会的历史规律，现在可以简单归结为两条：（1）、在基础货币供应量受制于货币材料成本等物质技术条件、无法保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长时，专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持续时间与财税收支的波动幅度有关，即财税收支波动幅度越大，政权覆灭的速度越快、社会秩序持续时间就越短；反之，经济发展越缓慢、越平稳且财税收支波动越小，一个专制政权的存续时间就越长。（2）、在基础货币供应量可以持续扩大供应并被专制者充分利用时，专制政权和社会秩序必然要坠入四十年衰亡的经济学规律之中。

其实，在《圣经》中，早就通过众多经文的明示和大量例证，阐明了上述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或专制社会发展规律的两大结论。如，《圣经》中自始至终、无数次出现过类似这样的经文——“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王上 2:4），就无比明确地说明，专制政权的存续时间只与专制者的信仰水平、程度相关，是对规律（1）的一种替代性总结和完美揭示。对于规律（2），《圣经》中有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王国、及其后的罗波安时代的犹太国历史记录，以详尽、具体的历史资料，和清楚无误的数字化预言，直接给出了我们上面分析计算后得出的专制社会四十年衰亡的结果。世上无新事，现代中国绝非历史孤例，只是在重蹈《圣经》中以色列王国的历史覆辙。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圣经》中的有关记载，相关资料主要来自《圣经》中的《历代志》（上、下）和《列王记》（上、下），为阅读方便，本节以下文字中所引用《圣经》这四部历史书上的资料，比较分散的就不再标注更详细的资料出处，请读者见谅。

首先，通过有关货币供应方面的具体描写，《圣经》给我们展示了以色列王国在所罗门时代，具备可以持续向社会提供大量廉价货币供应条件的情况。《圣经》中明确记载，从大卫时代、甚至早在扫罗王征服亚玛力人开始，以色列社会中就长期逐渐积累起了大量的廉价货币，包括在历次战争中掳掠来的金、银，“金子十万他连得，银子一百万他连得，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代上 22:13），都囤积到所罗门王时期才开始集中进入社会流通领域。另外，所罗门王从境外如示巴女王、推罗王希兰处先后共无偿得到 240 他连得金子，从俄斐运来 450 他连得金子。还有每年都会收到来自阿拉伯“杂族”、商人等所进的金子、各国每年来学习所罗门智慧包括生物学、文学等知识而提供的大量金银等“贡物”，以及每三年一次定期从海外航运回来的大量金银。上述源源不断的廉价金银，均在所罗门王时代的国家财税收入之外，且与固定不变的年度 666 他连得金子的财税收入数额相比，数量庞大，是维系当时社会财税开支模式的支柱。

其次，是有关货币投放方面的具体描写，让我们清楚廉价货币是如何进入社会经济领域的。《圣经》中详细记载了所罗门王所使用的众多宫室漫长且浩大的建筑过程，所罗门王本人及其众多王后、妃嫔等家人和一切“同席”之人的每日巨量奢华食物、豪华日常生活用具和交通工具，修筑的大量城墙，建设遍布全国的“积货城”、屯车和马兵的城，并新建、改造了多处城市，“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大量以色列人作为国王的战士、臣仆、各级军官、各类督工，协助完成上述工作、保障社会安全。所罗门王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继承了所罗门在以色列王国中的全部上述做法，继续在犹大国内大肆修筑多个城市、加固军事等安全保障设施。通过上面的资料，可以知道以色列王国及其后的犹大王国初期，都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人员的费用支出途径，完成了廉价金银的市场化过程。

综上，以色列王国的公共财政收支，完全超出那个以每年产生 666 他连得金子的税收值为标志的社会经济实体的范围限制；不仅如此，以色列社会的经济领域，每年都还要将来自于经济领域之外的巨量金银货币供应，被动的接纳下来并完成对它们的市场化配置。《圣经》中虽无以色列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统计数据，但是，仅仅通过整个所罗门王时代固定不变的年度财政收入 666 他连得金子，和持续不断进入以色列的巨量外来金银信息，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给我们显示出，以色列社会中的货币供应量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必定处于一个逐年走高的大趋势当中。与我们前面看到的中国自 1978 年至 2013 年的同类经济统计数据所展示出的趋势完全一样。

结果，以色列王国在所罗门王时代，社会上出现了“银子不算什么”的货币泛滥现象，而就在不久之前，银子的价值还很“贵重”，如大卫王年间，《圣经》中记载，“大卫用五十舍客勒银子买了一个禾场与牛。”（撒下 24:24）再向前，还有记载说，“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若打死他（大卫的儿子押沙龙——作者注），我就赏你十舍客勒银子，一条带子。”（撒下 18:11）。可见，充足而廉价的货币供应，在所罗门王即位后的短时期内，就造成了以色列社会中银子数量增加、货币供应量膨胀，原本稀少的银子变的“不算什么”了，充斥在社会和人们手中。但是，读者们要注意，以色列社会的这个时期，并没有因为银子数量太多而发生通货膨胀，更没有恶性通胀引发经济危机，《圣经》中如此描绘当时的以色列社会：“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以色列社会是如何避免了货币充斥后的通货膨胀呢？《圣经》中的记载也给出了完整的答案。包括以下几点。（1）、大量的宝石、象牙、猿猴、孔雀、香料、乌木、衣服、军械、车辆、骡马、铜和其它一般金属、香柏木与松木和其它一般木材，要么作为贡物无成本得来，要么是靠航海从外地区廉价运输而来，要么用土地交换而来，在以色列社会的经济仍然独立于外部经济环境的前提下，连续不断地输入到以色列社会中，彻底消除了中上层社会消费和庞大

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带给社会的物价上行压力。(2) 存在一个庞大且无力消费的社会群体。《圣经》记载，大卫王晚年的以色列人口统计数据为 130 万成年男性（以色列勇士 80 万、犹太 50 万），所罗门年间仿照统计了外邦人人口，共有 15 万 3 千 6 百人，这些外邦人全部做奴隶，其中 7 万人扛抬木料、8 万人上山凿石头、3 千 6 百人督查管理，以色列人中轮流服苦工的共 3 万人（其中 3 千 3 百人为督查管理的），每月都有其中的 1 万人在黎巴嫩。如此，在以色列王国的成年男性中，总计就有（15.36 万人+3 万人）/130 万人即 12% 多比例人口，及其他他们所在的 家庭都处于无力消费或只能低水平消费的地位，从庞大的社会底层一端，有力压抑着社会物价水平的上行可能。可见，从大卫王晚年至所罗门王年间的短短时间里，以色列社会中的银子，就象 1978 年代之后中国经济体中的人民币一样，很快变得数量庞大，但却不会因此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相反，由于非市场的力量处于经济主导地位，这一类经济体总 要长期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具体来讲，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社会，大量且廉价的货币和其 它物质财富的涌入，在其未融入国际贸易的前提下，长期压抑本社会的生产活动，人们闲散 快乐，物价水平难以上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加入到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社会来讲，无成本 货币供应的持续扩大，为“中国制造”通过价格竞争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提供不竭动力，同时 也在本社会内部的所有产业领域都催生了庞大的过剩产能，人们虽勤奋劳作并薪资上涨，但 国内市场却始终笼罩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下。

《圣经》中，对于所罗门及其继任者罗波安政权统治下的以色列社会和犹太社会的寿命， 神给出了明确的时间判决：“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强盛 3 年。”（代下 11:17），这样，从所罗 门作王第 4 年 2 月初 2 开始建造神殿、开始向经济体中释放廉价金银货币供应起算，到所罗 门王去世前共 37 年——“所罗门在耶路撒冷作以色列众人的王共 40 年”（代下 9:30），加上 罗波安的 3 年强盛期，这个一直有充足廉价货币持续供给所主导的社会系统，不多不少，恰 好 40 年就走完了大国崩溃分裂、北王国以色列地区进入动乱不绝的无政府状态、南王国犹太 步入衰亡的历史轨迹，与通过数学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完全一致。更需要注意的是，南王国犹 大国在此后，公权力系统中及时出现了国王和众首领的信仰状况改善或脱离原来的信仰败坏 趋势的情况，即《圣经》中与先知示玛雅有关的故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 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

（代下 12:5-6），以色列的专制社会寿命因公权力系统的信仰水平变化得以再造性的存续，这 是一个同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遇到过的那些“神迹”相同的信仰救赎时刻，对于不知悔改的 专制政权则不会出现。同时，由于战败，犹太国丧失了战利品、供物等金银财富的外部来源， 原有的金银储备又被洗劫一空，“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 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代下 12:9-10），犹太国的专制者们彻底丧失了向经济领域提供廉价金银货币的能力。此后，被专 制社会历史规律 2 刑余、因信仰重建而神迹重生的犹太王国，步入了专制社会历史规律 1 的 控制之下，伴随社会信仰水平的持续下降而终于彻底灭亡。以上内容显示出，社会公权力就 是维护社会信仰的社会系统，它不能代替、人为促进或打压社会信仰，公权力背后其实站着 社会信仰，是社会信仰而非公共权力在真正控制社会的命运。货币只是专制者操控社会的 一个工具，是用经济手段维持社会秩序的载体，当被单独使用时，与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社会 信仰控制体系一个硬币的两面。数学理论告诉我们，只有坐标轴变换是不会改变数学结论的。 我们变换货币供应量数轴与财税链数轴后，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所表达的经济学含义也不变： 货币运动规律，无一不是社会控制手段的规律，是社会信仰或意识形态的规律。例如规律 2， 也表示：专制者只依赖意识形态手段，单向地加强社会思想控制、或一步步愚化民众神化自 己，虽有科技创新成果，也没有可能转化为应有的社会生产力，仍必遭到 40 年内就灭亡的结 局。如此，规律 2 成立的条件，就只是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单向变动，其结论，必然应适用

于所有与专制社会信仰类似的意识形态单向变动的任何领域，包括人类的个体——如果我们每个人的信仰都与专制社会的社会信仰一样，始终处于各种反物质财富的意识形态或本质上是金钱万能论的思想控制之下，而我们的生理学生命又是一个天然的单向变动（持续缩短或减少）的系统，那么，我们的个人寿命（生命系统的存续时间）就必然也受制于 40 年灭亡的规律。而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等值财税曲线上，我们不难知道，这样的单向变动一共只有 3 个（类）：1、向货币供应量数轴靠近的单向运动；2、向财税链数轴靠近的单向运动；3、与上述两种情况相反的单向运动，即离开货币供应数轴或离开财税链数轴的单向运动（二者相互矛盾因而必居其一）。因此，无信仰的人类个体的生命周期，最多只有 $40 \times 3 = 120$ （年），这个基于信仰的数学或逻辑上的个人寿命结果，与《圣经》中“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创 6:3）完全符合。上述结论对于一个民族或群体来讲也一样，如在某种力量如圣人或其他精英人士的引导下，整体信仰水平仍始终单向坠落无法改变时，从无限接近进入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最高点开始，最多 40 年必坠入专制社会形态中，根本无法建立起一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圣经》中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 40 年，手握摩西法典也不能够建立起摩西律法中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就是如此，神人摩西也只能“你且上毗斯迦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申 3:27）。反过来也一样，最弱小、最底线的正确社会信仰直线上升 40 年，必迎来永生的以色列类型社会。如台湾社会，从 1949 年之后，社会信仰水平直线上升，经过 40 年，在 1988 年终于建立起以色列类型的社会。

从经济角度看，一方面，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和 1978 年之后的中国，都在经济领域中形成与生产过剩完全相同的效果，出现通货紧缩趋势，货币的边际幸福效用下降。同时，又都在本社会领域内，出现供应不足的现象：除了基于社会阶层差别形成的消费差异部分之外，人们无法在本社会中，找到可以增加消费的新产品或服务项目，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的产品、服务都相对饱和。社会供应不足本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翻版或本来之意。因此，社会消费过剩或消费能力过剩，没有可资以消费的新领域，就是这类经济体的共性：在中国，社会消费能力过剩导致消费行为境外化，如人们热衷海外购物置产、出境旅游、出国留学、加入外国国籍等；在所罗门的以色列社会中，就突出表现为人们的闲散和增加对各类偶像的奢华崇拜活动……非常清楚，任何经济体在同时出现消费过剩和供应不足时，大众投资就表现为人们过量的消费，所能或所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社会行动是消弱社会消费能力，给消费过剩瘦身，让民众穷下来，而不是相反去迎合、满足民众的贪婪欲望，加剧社会的过剩投资——消费过剩状态下的消费行为，无一例外都是一种投资行为，如超过消费需求的购买房地产的行为就是投资房地产，希冀房地产的升值获得最大利润或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民众的社会投资与政府投资，这时会产生一种类似股市中“多杀多”或“空杀空”的内耗、自杀效应。例如，中国 2015 年上半年给全国所有的公务员、教师等事业人员、国企中的部分人员普遍大幅度加薪。加薪部分的庞大资金都直接转化为投资而不是消费，与中国政府一贯通过国企等投资渠道垄断社会投资而不真正再需要社会投资、或者消灭社会投资的大趋势形成对冲。从经济学角度看，给已经处于消费过剩中的公务员等社会群体加薪及中国政府的其它的积极财政政策，与其应用货币政策不断扩大投资的行为，恰好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政策选择。所以，中国政府加大国内消费减缓生产过剩压力的一切措施，并无预想效果反而走向反面。因为没有任何社会措施可以达到提高社会信仰水平从而造就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并进而增加社会供应能力，社会公权力这时所能做的只有通过行使社会权力，来抑制社会消费能力的增长甚至直接消弱社会消费能力。例如对富裕阶层大幅度加税、大幅度减少财政收支总规模、严控或彻底取消国家投资、更换货币并同时限定最大可兑换新币数量等。能否讨论、提出和顺利采取类似的社会措施、以及采取这些措施的多少、采取后的实际效果如何，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的社会信

仰，反映出社会信仰的正确与否和水平如何。例如，历史上著名的、由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首创的“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在不同社会和国家，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所反映出的正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信仰水平的差异；最近的希腊债务危机，所考验的也是希腊社会的信仰水平，希腊能否接受一个财政紧缩的救助方案及可以接受一个怎样的紧缩救助方案、实施后产生怎样的社会效果，都取决于希腊社会的社会信仰。再例如，最近委内瑞拉社会由于经济结构的原因，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石油开采，在原油价格不断下降的熊市环境中，面临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也是外债造成的货币推动型经济危机，与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社会相仿，都属于货币的外部供给造成的，区别仅在于所罗门所使用的外来货币不用偿还，而委内瑞拉所使用的需要偿还。委内瑞拉的石油经济模式，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也相仿，二者同属货币推动型，不同之处只在于中国所利用的货币是自己发行的无成本货币，而委内瑞拉使用的是需要付利息的外币而已。委内瑞拉的危机出路决定于其社会信仰的水平或程度：继续依赖原油出口的老路，可以祈求债权人延期并扩大借贷规模，最终可能在油价持续下跌中彻底崩溃——这会反映出委内瑞拉的社会信仰是更加信奉货币或财富的实际状况；接受违约事实并拒绝续贷，将经济成功引向依赖石油之外的其它领域，就像阿根廷在2001年之后所做的那样，则可能只会面临一时的困难而避免一次彻底的崩溃——这会反映出委内瑞拉的社会信仰仍然是信奉货币或财富的实际状况，迟早还会再次发生类似的危机，进入历史循环和等待中；接受违约事实并拒绝续贷，成功剔除依赖货币维持市场份额和生存的经济实体，将社会经济引向依赖科技创新和应用的新路，则可能只会面临一时的困难而彻底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危机——这又将会反映出委内瑞拉社会更加信奉神的信仰状况。再来看中国，自战国时代的商鞅变法失败开始，直至北宋王安石变法、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改革都以失败和扭曲而结束，至1978年之后的中国特别是今日中国，发展到甚至于不能容忍经济发展出现较低增长率、更遑论提出财政紧缩想法和实施财政紧缩的措施，反映出中国社会的社会信仰水平，自秦汉以降至今几千年来，一路走低的历史现状，诠释着控制中国历史走向的真正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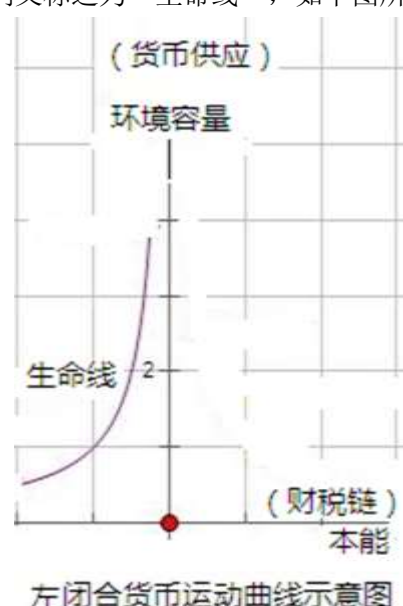
《圣经》中给出的社会经济学原理，就是一个社会中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必须始终是其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否则，无论是所罗门式的低成本外来货币输入，还是现代中国式的无成本货币供给，甚至于将来全球性统一货币时代的某些阶段，虽都有源源不断的货币供给可依靠，但也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尽头，难逃四十年定律的约束。同时这也意味着，任何专制者，在缺少可以持续提供廉价货币供应的社会条件下，企图运用货币手段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来满足自己的任何欲望时，其社会和政权存续的时间必将小于40年。

第三节：货币（左）闭合运动

上一节考察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时，我们已经看到，无法消除的非法经济活动，会在一个货币运动过程中留下一条处于坐标系第二象限的曲线轨迹。这种非法的经济活动，最常见的应属于人们熟悉的“黑帮”或“黑社会组织”——他们生存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非法生产和经营所产生的财税收入数量，与非法手段、技术和社会空间的大小有关。黑帮可以采取的非法手段和技术，是适应那个特定社会空间环境的能力，而可以容纳他们的特定社会空间，是一种环境容量，表现为市场容量或可以容纳的货币数量、财富总量。能够产生的等值财税数量，表示出黑帮所采取的各种手段和各种社会环境的不同组合，代表着相同的社会存在和“生命”形式，即这个系统正在存活。整条等值财税曲线表达出一个黑帮系统的生命周期或不同黑帮的相同生命形式：每个黑帮的生命和存活时间，都有不同的手段、适应能力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因子共同决定。如此，我们可以将货币化的市场容量和社会空间，还原成社会环境，并进一步还原成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生存环境；而把非法生产、经营的方法和技术，还原为可适应特定环境的生存技巧，并进一步还

原为某种生存环境中可以生存下来的所有（固定）技能。只要社会环境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环境容量没有降低到0，或者只要有合适的方法和技术，就总会有黑帮可以继续生存下来，形成一个无限连续的空间。可见，适应一个固定、有限的环境，并“定居”其中存活下来，是技术进步的尽头，然后，除非有来自环境——自然变化或周边竞争威胁其定居时，不会再有技术发展的动力和必要。这种被环境限定的技术和生存空间，可归于动物的本能或人类的动物习性或本能的范畴，因为该空间决定了其生命的界限——越过这个环境，或者这个环境消失后，就意味着死亡！这个特定的有限生存环境，我们称之为“达尔文环境”；事物在达尔文环境中持续存在的时间，或者达尔文环境持续的时间，我们都称之为该事物的“达尔文环境时间”。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其达尔文环境是那样的人类从灵长类动物进化完成后，自没有那样的人类再从猴群中进化出来到《圣经》中诺亚大洪水前的环境。不同事物的达尔文环境和达尔文环境时间是交叉存在的。如，地球环境至今都在，而截止到今天为止的地球达尔文环境时间段里，无数进化结束后的物种消失了，也有无数的新生物进化产生出来，其中最著名的事件要属于恐龙灭绝和《圣经》记载的生物进化所产生的那种人类的大灭绝。因此，我们生存的宇宙可以看作是一个由无数不同的达尔文环境共同、连续构成的整体，信仰的不停发展带领人类在其中不停地穿越。

综上，我们可以将上一节中等值财税曲线所在的坐标系置换如下：原来表示货币供应量的纵坐标轴，写为“环境容量”轴；原来表示财税链的横坐标轴，换成“本能”或“适应能力”数轴。整条等值财税曲线因可以表述生命有各种环境和适应能力所组合表达出的不同形式，我们又称之为“生命线”，如下图所示。因这条特殊的货币运动曲线——生命线处



于坐标系纵坐标轴的左边，我们称之为“（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与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的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区别开来。

左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是货币在一个达尔文环境中的运动轨迹。由于左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是一个在一定环境容量下，适应能力足够就永久或无限存在下去的体系，也是一个固定技巧下，只要环境“友好”就永久或无限延续下去的体系，只以环境和适应能力（本能）为变量或限制因素。因此，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可以描述被动适应类型的生存系统，而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所描述的是主动适应的生存体系，右闭合货币运动曲线所描述的是自由生存体系。又由于左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是一个没有技术发展只有本能区别的体系，因此也是一个没有信仰或信仰彻底堕落时的人类群体生存体系，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社会崩溃后及社会产生前的人类群居状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货币的起源、本质和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以及劳动力等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本来之意、公共权力等政治学概念的应有意义等

等。另外，也可以让我们看到直接的技术动力就是彻底突破环境限制而非简单地适应性生存，这是经济人假设的理性的基础。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讨论。

一、货币的起源、本质、退出条件和体系种类

借助于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可以清楚看到货币具有区域性的特点，即只有在一个达尔文环境的特定的区域内——如黑帮可以存续的社会空间中、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某个岛屿上等等，货币是基于对这个特定的共同环境的统一认识而产生的生存技巧或生物习性的一个计算工具或计数单位——计算的结果就是以货币为单位所显示出的特定生存方式下的环境容量。货币是财富贮藏的延续，是财富的天然冰箱或恒温保鲜库，只在财富可以贮藏时才会产生——与货币支付、货币交换之所以可以发生一样，都是在人们对货币是某些财富的认知达成共识之后。

货币起源并存在于共同认可或标准化中，从本质上讲，货币就是一种共识或标准化，是一种与信仰和意识形态一样归属于信息范畴的事物。统一货币就是统一群体或社会的意识形态。货币产生或统一后的效果如何，如欧元在欧元区的使用情况，取决于欧元区内各个国家的社会信仰状况。社会或族群的信仰水平相差越大，新货币或统一货币的使用效果就越差，或者需要借助于暴力才可以强行维持统一使用；社会或族群的信仰水平越相近，新货币使用或统一货币的难度越小、使用效果也越好。因此，货币与公权力的结合，是政教不分的社会政治形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信仰水平低下和堕落的一种表征。《圣经》中对此有清楚、完整的描述，读者可以参阅《启示录》第13章，该章节经文中的第一只

“兽”是指专制的公共权力或暴力强权，第二只“兽”就是指货币，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具体讨论这段经文。依据货币的本质，我们不难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中央银行是否独立，就成为考察该国家的社会信仰水平的一个最简单的途径：中央银行越独立的社会，社会信仰水平越高，达到根本无需央行时的时候，社会信仰水平达到顶峰；央行越不独立的社会其社会信仰水平越低，在专制社会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具备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

货币可以成为与商品、服务相交换的一般对价物，就在于货币与那些商品、服务都传达着相同的社会生存信息，反映了适应特定社会生存的相同内容。货币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外会失去部分甚至全部交换功能，不是货币的物理属性发生了变化，也不是它面对的物品、或劳务发生了性质改变，只是它们之间传达出的环境信息不同，缺少或者根本没有相同信息的交集，所以无法成交。例如，手拿人民币，去和一个亚马逊河流域的土著人交换食物，无法成交，原因不在于土著人手中的食物，而在于人民币所发出的信息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土著人生存环境的信息，土著人生活环境中的食物自然无法与之相交换。再如，货币的国家属性，也是如此，越是与世界隔离、与各国的社会信仰不同的国家的货币，越难以自由兑换；在不同社会信仰的国家之间，达成货币联盟或统一货币的难度越大。

货币作为一种特定环境（达尔文环境）中对生存条件的共同认识或共有习性，是物物交换的基础，而不是物物交换的产物。西方传统经济学，是从物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有用性——如苹果可以吃、铁是硬的——即基于物的物理属性等自然属性所产生的物的使用价值开始建立起来的（参见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这使得它从一开始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同一个苹果，由一个走在申诉或上访路上的中国冤案受害者去吃，与一个要和爱恋多时的爱人去成婚的美国人去吃，能带给人的效用或体现出的物的价值，并不一样；结婚、离婚、治疗同样的疾病等等对每个人的效用或使用价值完全相同的一些社会行为，在不同社会中的花费状况（去除通胀和通缩影响后）截然不同，如在当代中国，就呈现出逐年不断快速上升的趋势，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参见拙作《圣经中的中国和当今世界》）。正如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总结的动物的外形、习性、颜色、技能等等都是环境选择的结果一样，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类的生存而言总是具有区域属性和社会属性

的，人们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享受或忍耐各种商品或服务所带给我们的效用或价值（幸福或痛苦）。为此，我们应该给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进行重新的定义，使其包含物（或服务）带给人们的社会环境的体验或效用——即打上社会环境的烙印，而不仅仅是来自物或服务的物理属性或一般属性部分，让经济学摆脱事实上的狭隘物理学的桎梏。这个有关商品的新的使用价值，在本书中我们称之为物（或服务）的幸福，它不仅包含商品（或服务）的物理效用，还包括商品或服务的社会效用，体现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属性。与具备社会属性的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相对立、相交换的货币，其社会属性就是货币带给人们的幸福，单位货币所具有的幸福，就是这种货币的幸福度。

货币只能在社会中产生，不是因为交换或商品交换的需要，而是因为货币超出了个人生命的范畴。很明显，动物和整个生物世界中，并不缺少看上去是一种交换的事物，例如共生现象，再例如在环境适宜的情况下，大型食肉类动物不在意其它动物吃掉它们吃剩下的猎物。但是，这些行为都不会催生出货币或一般等价物，都未超越个体生命（及繁衍）的范畴，都以保有自己的生命基因为最高目标或“理性”，是动物的习性和本能。显示人类中间存在的与动物一样、并不会产生货币（虽然不妨用货币运动去描述）、也不是真正交换的这种习性行为，可以借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中国谚语作注脚，它只存在于社会产生之前或社会崩溃之后的时间中。货币与人类社会同步，突出表现在社会解体时，其货币逐渐失去原来的功能和作用，但通常被认为是被货币所替代的物质财富的功能或使用价值并不会因此发生改变，物物交换重新流行；与此相反，社会存续时，货币在个人手中丢失、损毁，通常也可以补发、兑换新货币。货币是一种低水平或堕落的信仰，但是，以货币为直接诉求的意识形态，如要求金融、货币独立，却可以成为很多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理想和追求目标，成为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诞生的精神支柱。货币作为最低级的信仰，它又代表着社会中人们公认的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财富，让我们自然想起《圣经》中那句被无神论者无法理解的话语：“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 4:4）一个相信信息就是金钱、拼命赚钱就可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现代人，却不愿相信来自信仰的信息也可以，显然是不了解货币的本质的。

在达尔文《物种起源》所设定的、进行着生物进化过程的任何自然环境中，任何生物的生命失去、甚至于一种旧环境的改变、失去，其趋势和结果都是无法阻止、停留、逆转的，是大环境不可抗拒的力量使然。生物的生命只趋向死亡，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环境只趋向改变和消失，这种宇宙单向运动，与货币幸福度单向下陷、趋于取消的死亡运动模式完全一致。因此，从描述和传达信息、特别是描述传达信仰信息的角度上讲，在一个只会有货币幸福度单向下陷的场景中，是不需要货币的，也不会有货币的产生——因为上述场景中，每个事物（包括野兽一样的进化论中的人类）的生命周期或运动时间，已经持续不断的、无数次的表达着与必死的货币运动体系相同的信仰信息，不需要也无法用货币运动的死亡规律代替无数动植物各自的生命周期、自然界沧海桑田的各种自然周期。假设这种场景中存在（或被植入）一个使用货币的人类的群体（无社会信仰如野兽群一样），人们信仰上的生命周期也不过如生物的生命周期一样，是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规律决定的，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这样的人类群体，因毫无信仰的特征和信息，显然只可能是专制社会自然崩溃前才会偶尔出现的。不仅如此，若这时出现货币交换——无异于也是生物之间的生命交换（以命换命）、或者是不同环境的直接兑换，也要在逻辑上构成自相矛盾的悖论，即自杀求生。显然，货币无法在这种场景中产生，也无法在此场景中进行正常存在；从人类社会中跌落向此场景去的国家或地区，社会信仰终究要归零，社会本身也走在必然定时死亡的路上，逃脱不了货币运动规律所决定的社会生命周期或历史轮回。因此，我们在人类社会历史中看到，一种无信仰或错误信仰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断（直线）强化时，这个社会中的货币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社会会驱赶货币、逼迫货币去“死亡”，如中国上世纪 60、70 年代，毛泽东个人在中国社会中不断被神化的时期，各种票证不断兴

起，让人民币作为货币的社会存在空间日益狭窄（参见拙作《圣经中的中国和当今世界》）。同理，在货币幸福度持续不断上升的单向运动环境中，也不需要货币，这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货币退出机制走向历史舞台时的社会基础。总之，货币只在描述和传达社会信仰水平做螺旋式运动的状况时才真正有必要——社会信仰水平持续、直线下降的时，货币运动呈现出货币死亡模式，传达出社会解体的历史规律；社会信仰水平持续、直线上升时，货币运动呈现出货币退出模式，传达出社会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生存进入社会后阶段新时代的全部信息。

货币不能产生在不同的（被认可）环境或不同标准的区域之间。例如，现代人用钟表、指南针、飞机、大炮与亚马逊河流域中的一些土著部落去交换猎物或水果，交易无法成功，类似的场景下自然不会催生出货币。再如，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上升，意味着另一个国家货币汇率的下降，但交换双方中来自汇率下降国家的卖家，因汇率降低而利润提高，同时，来自汇率提高国家中的买家，也因本国货币汇率提高而省钱。买卖双方皆大欢喜。同理，买卖双方互换位置后，买家与卖家同悲切。但上述同喜同悲的国际贸易中，永远无法产生出共同的货币，显然不是货币产生的合适场景。货币产生时或同区域内交换的通常状况下，只能是悲喜交加：一方利润的提高，意味着对方利润的降低或放弃利润。因此，货币的零和游戏总是只能在相同区域内或相同社会间出现，互惠共赢的国际贸易只可以存在于本质上不同的社会和国家之间，国际贸易总量会跟随国际社会形态或不同社会的数量、比例变化而变化。维持货币产生时的状态不动，即特定环境条件的稳定不变、环境容量固定的状况，反映在货币身上，就表现为一个社会宏观上或者整体上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幸福量一定。只有当环境出现改天换地一样的变化，即相当于改变一个达尔文环境——相当于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动植物迁移到北冰洋后生存下来且其习性、颜色、形状、寿命等等生物学特征都未改变——之后，货币的“幸福度”才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天换地一样的环境改变，就是人类社会中大规模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技术革命让人类的生物习性、生态环境，而类似利用从未被利用过的石油、太阳能、“苹果一直掉在地上”等自然现象中所包涵的科技知识，让人们坐在家里就实现了生存环境的改天换地，同时，人类的生物学特点却得以保留、不变，避免了诺亚大洪水一样的灭顶之灾。技术革命让人类取得了自由生存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彻底摆脱了生物进化和环境选择的被动局面，让人类在不同的达尔文环境中生存下来，是信仰具有独立、稳定不变性质的直接反映。科学技术就地更换、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单位货币中所包含的效用和幸福才有可能扩大提高。但是，一旦科技创新完成以后，新的环境容量也就随之冻结，单位货币中所包含的幸福和效用的数量空间也不会再继续扩大，人们重新回到适应环境改变、适者生存的达尔文环境的场景中。因此，在一个没有科技创新的领域中，例如科技创新的应用领域如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中，货币的幸福度都不会提高。也就是说，人类社会，除了造就科技创新领域中的货币可能会出现幸福度的上升，其它所有领域中的货币，从逻辑上讲都只会出现货币幸福度的稳定甚至下降。这是造成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曲线总是呈现出向右下方倾斜的根源所在。一场孕育技术革命的过程，就是一个更换货币和货币体系的过程；从来没有爆发过技术革命的时代，各国不同的货币都遵循同样的运动规律，表现为与各国经济发展状况一致的不同生命周期。

财富或货币的幸福是人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来自社会环境中各种各样因素、条件下的各种收益或效用的叠加或总和。例如，我们从购买一个苹果中能获得的各种收益或效用可能受到包括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有所不同：A、地点：在超市购买和在集市、果园中购买；B、金钱来源：打工赚来的钱和捡到的钱、偷来或其它犯罪得来的钱；C、时间：在果实成熟季节购买的和反季节购买的、天气好时购买的和恶劣天气时去购买的；D、苹果的质量和价格……因此，一个苹果所带来的幸福是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因素所产生的各种收益的总合：例如，在专卖店购物的优越感或社会评价要比在集市购物要高，收益或幸福就

比后者高，假设分别为 5 和 1；但在专卖店购物的价格比在集市中购物的价格高，收益或幸福降低，假设分别为 2 和 4。如此，从专卖店购买苹果的幸福就是 7，而从集市购买苹果的幸福为 5。也就是说，一个苹果的幸福是与其相关的各社会因素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各种收益或效用的一种综合的博弈结果。我们继续以苹果这种水果为例，看一下其幸福的可能变化过程和结果：苹果的质量包括肉眼可见的质量和需要技术检测才可知道的质量内容，前者如颜色、新鲜程度、形状等等，后者包括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等等；如果苹果的质量普遍很高，人们花费 1 元钱购买苹果，可以安享苹果带来的幸福和效用，我们将其幸福记为“1”，但如果苹果的质量普遍不高——例如农药残留过多等，人们花费 1 元钱购买苹果，需要有 5 元钱作为其可能的或后续的医疗保健、精神抚慰等准备性保障——否则，可能面临疾病、扔掉苹果的财产损失和相关的精神折磨等负效用或负收益。这时，无论其购买的苹果这个物体或商品，还是其所有的财富——1 元钱的苹果和 5 元钱的保障，它们的幸福都只相当于原来的 $1/6$ ，即减少或下降了 $5/6$ ——过去只花费 1 元钱购买或交换到的幸福或效用，现在至少需要有具备 6 元钱的实力才可以（虽然其中的 5 元钱并非肯定要花费）；如果人们为保障实现吃 1 元钱的苹果的幸福而预作准备的 5 元钱，还会继续重现上述情形，如 1 元钱可以购买到的医疗服务的质量、纠纷处理的效果等等，同样也如此陷入需要担保的情形，即 1 元钱的医疗消费需要 5 元钱做后续可能的准备性保障，则财富和货币的幸福又要下降 $5/6$ ，只剩下原来的 $1/36$ ……以此类推，我们会发现，享受 1 元钱的苹果的幸福，或效用、或使用价值，分别需要 1 元、6 元、36 元……，一个苹果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传统使用价值也许根本没有变化——并非市场中所有的苹果的质量都一样，如都是高农药残留，但财富的幸福却照样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最后，人们手中的钱越来越多，物价也没有上涨，但财富和货币能带给人们的幸福却一点都没有提高，也就是说，财富和单位货币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断下降的。总之，商品的使用价值，从社会角度看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也可能是流动的，大小和多少完全取决于商品所在的社会环境。商品的有用性，不仅决定于商品生产的劳动力因素、技术因素等经济、自然环境，更决定于社会的信仰水平环境，这是传统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学的根本性差别之所在。

如果我们只考察具体的交易，会发现其中的货币、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所体现出的总幸福并不会跟随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变动而变动。例如，我们花费同样的价钱购买到两种不同的苹果，一种是有毒、有害或低质量的苹果，我们记作交易 a；另一个是质量好、能让我们享受到正常苹果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的苹果，我们记作交易 b。在这两个交易中，货币和苹果所各自代表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的总和是一样的：看上去，在交易 a 中，卖坏苹果的一方，与交易 b 中卖好苹果的一方相比，获得了更多、更大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即他用比别人更低成本或质量更差的商品，获得了与同行中的其他人一样的收益或幸福。但同时，交易 a 中的“我们”，所获得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又比交易 b 中的“我们”要少。两个交易中交易双方，从交易中所取得的幸福总量或和，看上去并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这个总幸福或效用分配的比例，即交易 a 中的出售毒苹果者受益更多、幸福程度提高。如果我们的考察仅仅限于这样的具体交易，事件的结果也仅此而已，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毫无意义，甚至于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怎样的社会每天都会有大量的类似不均等的交易在发生。但是，超出法律底线的毒苹果交易，如果违法者受益、幸福程度提高的局面得以维持，社会中所有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迎来货币幸福度的下降或变化。博弈理论的结论告诉我们，违法者独自受益的局面将难以维持，坏风气会逐渐形成，市场中很快就会充斥毒苹果，然后是毒豆芽、毒肉……最终，没有任何人会从这个过程和结局中真正受益：社会进入到全社会的所有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下降后的另一个新环境中——一个社会信仰、道德水平更加败坏了的社会环境。货币经济学的全部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它能准确揭示一个经济体的社会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

货币的本质是信息，历史和现实中所有的货币就都只是信息的载体——贝壳、兽皮、金银、各种一般金属、纸张、存于电脑等硬件设备上的文件或字符串（如比特币）……货币选择怎样的载体，受自然环境和科技水平的共同制约即特定环境的制约，但其本身是非物质性的，就像灵魂一样，并不真正接受这些载体的制约。货币所传达的信息内容，是其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现有或固有信息，具有极大的区域性和局限性，因而是短暂的、临时的、有限的。作为信息，货币本身不会贬值或增值，它始终屹立在特定环境的固定环境容量上，总量一定。因此，所有的货币政策或策略，都不会真正扩大或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但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状况，却可能很快增强一些地区和国家适应全球变化的能力，造成所谓的“后发优势”的假象——除非有技术革命及时彻底地改变环境总容量，否则，这种建立在零和游戏规则之上的“后发优势”，总会造成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危机直到达成与各自社会形态相一致的新均衡为止。经济危机无一不是信仰危机，是信仰集中成长、高效率剔除无信仰和错误信仰的过程。

货币的本质决定了货币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条件和方式：人类社会的信仰水平全部达到自动维护和自动成长的高度、技术革命成为连续不断的生活常态时，货币传达的信仰信息就被社会信仰持续大幅度成长的规律所覆盖或者重合，成为过期或作废的事物，货币运动规律这时就呈现为一种货币快速的自动退出社会领域的模式：社会信仰持续提高，货币幸福度持续提高，表现为人们手中的货币数量不变，得到的社会幸福却在持续增加；但是，这时，由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持续不断地在加快货币周转速度，因此，社会的基础货币在持续降低、退出……如此循环下去的极限或逻辑结局，就是基础货币数量归零，货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最后，简单看一下货币的体系和种类。

通过对货币产生和货币本质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固定的生态环境或社会环境中，货币总量所代表的财富和幸福都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这样一来，根据货币的零和游戏特点，货币在特定社会环境内部的分配，从逻辑上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微观状态：货币幸福度上升、下降和稳定不变。但是，上述三种动态状况，只有稳定不动的状况才是真正的常态，另外两种只是围绕其进行的波动。另外，我们也已经知道，除非有新的技术革命爆发，货币幸福度不会真正上升；而且，除非有专制集团所控制的不受法律和市场法则制约的特殊社会领域的存在，货币幸福度也不会真正下降。这样，人类的所有货币系统按社会形态来划分，就各有三类共六种：专制社会中，有幸福度上升、下降、稳定三种，但以下降为主，上升和稳定都只是围绕下降发生的波动，是下降过程中的徘徊稳定和反弹；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中，有幸福度上升、下降和稳定三种（西方微观经济学中有与此对应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上升、下降、稳定的三种状况），以上升为主，下降和稳定都是围绕上升的波动，特别是在社会信仰水平极高、技术革命频繁爆发的时代更是如此——但是截止到今天为止，以色列类型社会的货币幸福度还是以稳定为主，货币幸福度上升的间隔时间还比较长。货币幸福度的这种分裂状况，要到全人类都统一在一个社会形态和一种货币之下时才会结束，这将为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解读《圣经》中有关货币数量的经文奠定基础。

二、 货币数量

在无信仰的自然状态下，货币不会产生，自然不存在货币的数量问题；专制社会的社会信仰持续下降时，货币幸福度持续下降，需要持续不断地增加货币数量，研究其货币数量其实就是研究其死亡的轨迹和延长寿命的技巧，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也是毫无研究价值的问题——专制社会的社会信仰总是在下降，所不同的只是下降的速度。在货币幸福度水平稳定的情况下，货币数量问题也是一个毫无研究意义的问题——增加货币数量只会提高物价水平，无论对税收还是个人生活并无影响，丝毫无法实质性提高（或降低）社会幸福程度。但是，从全人类的社会信仰水平如何变动的角度看，考察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数量的变

动，特别是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流动，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水平的提高，让货币数量产生剧烈的波动。如，在社会信仰成长并孕育新技术革命的社会信仰上升时期，货币幸福度上升，但社会财富总量和环境容量并没有随之扩大——科技创新的应用革命还未实际爆发，保持货币幸福度不变的社会信仰的稳定机制，会造就货币溢出的基础和冲动——原来的货币数量在信仰上升后已经显得太多了，必然要减少本社会内的基础货币数量。上述情况若发生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会产生货币外流，形成巨大的国际游资，直接影响其它国家的货币数量；若发生在比较封闭的国际环境中时，可能引发强行打开外部市场，进行资本输出。在爆发一次技术革命后至下一次技术革命孕育前的间歇期里，上述过程完全翻转：技术革命极大提高了本社会的社会环境容量或财富总量，而社会信仰这时却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否则，持续快速进步的社会信仰，又要进入技术革命的孕育期，回到刚刚讨论过的场景中），社会需要更多的货币供应，同时，新技术扩大市场的努力或“经济人理性”，以加快货币循环速度的方式，快速帮助社会完成这个货币数量的补充过程。上述情况若发生在国际经济环境中，会吸引国际资本的大举进入，引发全球性的货币波动时，容易导致经济泡沫，为孕育下一次技术革命奠定基础。同时，流出货币的地区中，依赖货币供应而非技术成长的经济实体面临巨大考验，经济发展对这样的经济实体组织的依赖程度和对它们的取舍态度，成为反映社会信仰水平的试金石；若不存在国际资本循环的条件，就将引发技术外溢或技术革命的扩散，甚至引发暴力开拓外部市场的情况，为新技术扩大市场找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在以色列类型社会发生上述变化时，专制社会的超强适应能力也会让本社会的货币数量发生相应的改变。总之，全球会在新的技术时代与孕育新技术时代的各个阶段，自动实现货币平衡，保持全球货币信息始终准确反映人类信仰水平的稳定状态。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数量，只能在其币值大于再置成本时扩大发行，否则，将使其发行者亏损或产生负效用和痛苦。在中国古代，“北魏初建立时，民间都不使用钱币，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时，开始铸造太和五铢钱，派钱工在工场铸造。百姓中有想铸钱的人，就让他们到国家的铸炉去铸造，铜一定要精炼，不能混杂。”（资料来源：《资治通鉴·梁纪》《资治通鉴（全译白话版）》作者：司马光、柏杨、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07-01 版）北魏的老百姓拿着铜块去铸钱，支付的铸造费和铜板材料的成本价值之和，必要等于或小于铸币的币值，否则，是没有人会主动去受损的。因此，金属铸币时代，货币基于材料、工艺等的成本制约，是对货币发行量或发行者的天然限制。同样的事实也发生在现代货币的身上，如比特币，虽然比特币是虚拟的、不需要任何正式的物质材料载体就能存在的，但从计算机系统中得到一个比特币，即人们常说的“挖矿”或“挖矿”，也是需要付出时间、金钱等成本代价的。这个主要基于材料成本（我们下面用字母“B”来表示）的发行限制，就是货币基础数量和发行中的货币幸福度的一个界限，用数学公式表示为： $C/M_2 = B \times K$ （系数）（B为再置成本或发行成本， $B \neq 0$ ）中国西汉王朝时期的五铢钱一直延续使用几百年，就是其再置成本一直将新的发行者或发行量挡在市场之外造成的。上述公式的含义是： $C/M_2 < B \times K$ 时，发行新货币将给发行者带来幸福或效用； $C/M_2 > B \times K$ 时，发行新货币将给发行者带来亏损或损失； $C/M_2 = B \times K$ 时，发行新货币对发行者来讲，即无幸福或效用的增加也无减少。现在我们看一下公式中系数 K 的经济学含义：这其实是一个与社会投资平均利润率有关的数学系数。即发行者将货币发行等同于社会生产中的一个产业，其利润率的高低与全社会平均技术水平、利润率密切相关：社会产业平均利润率越高，或发行货币利润越低时，发行者的幸福越小，反之亦然。因此，系数 K 和社会平均利润率（以下用字母“R”表示）是一种反函数的关系，为方便下面的讨论起见，我们将其记为最简单的函数关系式： $K = 1/R$ 。在此基础上，不难得出 $R = B \times M_2 \div C$ 的最终结论（忽略常量前提下）。现在，我们将分析一下，这个最近似的数学表达式传递给我们的信息：1、在货币发行成本 B 和财政收入 C 固定时， M_2 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全社会的平均利润水平，这解释或显示了经

济发展良好，会增加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和意愿，也是现代经济学中常用的规模效应的一种自然延伸。2、在货币发行成本 B 和货币供应量 M2 固定时，财政收入 C 的提高，无论以任何方式实现，都不可避免的压缩社会生产的平均利润水平，降低利润率。因此，减税、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是人力或社会意志可以控制的、促进和提高社会生产平均利润率的唯一途径，剩下的就只有社会意志不可控制、或者只依赖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选择且具有极大社会偶然因素的科技创新领域了！将上述两点信息结合起来看，我们会不难发现以下结果：所有的人类社会形式，在经济学上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以各种方式选择不断减税的社会，让人们走向科学创新的发展之路、货币幸福度稳定。一个是选择几乎从不减税的社会，身处其中的人们只有走向努力提高全社会的 M2 水平、从而走向货币幸福度不断降低之路。这个结果，与《圣经》中对人类社会的两分法结果完全吻合。货币成本和货币的发行数量成反比，这一规律告诉我们，货币成本趋于零时，可以发行的货币数量无穷大。但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那样，无论是古代的金属铸币，还是现代的比特币，其自身的成本是难以彻底消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成本可以无限度降低的想法是不可行的：金融制度或技术的成熟，让货币回归交易符号或尺度的原来之意，也让任何的实体货币越来越没有存在的必要，货币不受数量限制地化为签名认可的文字和数字符号、甚至只是认可的一个信息如在电子文件选择项中的一个选择动作。同样，货币发行也是如此，几倍、几十倍……再多的货币发行，就象个人再多的货币支付或接受，都可以通过同一个简单的电子签名就能完成一样，现代货币发行借助现代金融手段，完全可以做到任意降低发行成本这一步。这时，我们再来看，前面我们提到过的一个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式或规律：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基础货币数量*货币周转速度。在这个公式中，基础货币的数量现在因为成本限制因素被解除，趋于无穷大，就出现了货币周转速度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无关的情况。换句话说，只要有足够大的基础货币数量，经济运行是可以不受任何货币周转的（周转速度等于零）制约的。至此，财税收入的完成可以完全脱离财税链，因为不需要有任何的财税链长度了。这种极端情形，就正好是我们计算持续依赖货币手段维持经济发展的专制社会生命周期的关键指标，同时也表示出社会信仰水平降低到 0。现在的问题是，货币成本的限制因素被科技发展和现代金融制度打破之后，货币周转速度可能会被基础货币供应量的超常增长所压抑或排挤，而非相反：西方经济学基于铸币成本限制而限制的货币供应量开始，构建出的市场会自动析出、沉淀不需要的货币数量的理论，是基于市场机制的。但是，专制社会的公权力，是基于自身的强制力，通过财政货币策略，例如通过最简单的超发货币的渠道，就可以反过来利用这一市场机制并彻底驯服这一市场机制的——让货币周转速度再也无法制约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前者却被后者反制，而专制公权力只需操控货币发行权即可。持续不断且足够大的货币供应数量，这时就会触发专制社会自然死亡的扳机——从表面看，触动走向死亡扳机的是公权力的专制，或专制者的贪婪和控制社会的社会理性，而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整个社会的社会信仰。

铸币的材料、成本和适用性的限制等特点，让货币数量天然具备了现代金融、财政法律制度的很多重要功能。首先，古代金属货币数量或供给量的有限性或较之于现代货币海量供应的有限规模限制，使得建立、维持仅仅依靠扩大市场份额去生存和发展的产业系统变得十分困难和不可能，几个甚至一个庞大的这种系统就会导致整个国家的财政拮据，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权更迭——当今世界依赖原油等一个或几个大宗商品产业的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中国历代王朝，常常因为大规模的宫殿、防御设施或水利设施的营修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导致兴盛的王朝经济凋敝，坠入深渊，如秦朝修筑长城、汉朝的对外战争和宫廷营修、隋朝对高丽的战争和修筑大运河等等。每个中国王朝的末日，都伴随着国库枯竭，无钱可用的窘境——可以说，从无法继续发行更多的货币、从而提供更多的资金弹药维持经济发展，进而造成财政收入不给力的角度看，铸币时代的专制政权大都是穷死的。

假设，古代专制王朝若象现代可以无限量的发行货币，又何患那么快就无钱可用？当然，现代社会发行货币从理论上讲可以做到无限量、无成本，但事实上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种限制通常就是央行的权责和功能，根本因素还在于社会政治模式或社会信仰水平。也就是说，从古老金属铸币身上被剥离下来的、天然的货币供应数量限制的功能，有效转换为现代社会的信仰水平提高和政治、法律机制，才能继续充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货币保证工具。同样，我们在王莽新政注 2{中国历史上的“王莽改制”：“王莽因为钱币一直不流通，下诏说：‘钱币都是大面额，则不能应付小额交易；钱币都是小面额，则运输装载就麻烦费事。轻重大小各有等级，那么使用方便，百姓就欢迎。’于是，更铸宝币六种：金币、银币、龟币、贝币、钱币、布币。其中钱币六种，金币一种，银币二种，龟币四种，贝币五种，布币十种。总计，货币共有五类、六种名称，二十八个等级。钱币、布币都用铜铸作，其中混杂铅锡。因为货币的种类太多，百姓生活陷于混乱，货币不能流通。王莽了解人民的怨愁，于是只使用值一钱的小钱和值五十的大钱，两种并行，龟币、贝币、布币暂且停止使用。私自铸钱的无法禁止，便加重那方面的刑罚，一家铸钱，邻居五家连坐，将这些人送到官府作奴婢。官吏和平民外出要携带钱币作为通行副证，不携带的人，旅舍不允许住宿，关卡和渡口要盘问留难，公卿大臣都要携带它才能进入宫殿大门，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提高它的身价从而得以流通。当时，百姓认为汉五铢钱方便适用，而王莽钱因有大有小，两种钱同时发行，难以分辨，并且不断变化，所以不信任它，都私下用五铢钱在市场上购买商品，并谣传说大钱会废除，没有人肯于挟带。王莽深感烦恼，再下诏书：‘凡是挟带五铢钱，说大钱要废除的人，比照‘诽谤井田制’罪状，放逐到四方边远地区！’连同被指控买卖田宅、买卖奴婢、盗铸钱币的人，从封国国君、朝廷官员到平民，犯法的人不计其数。于是农民、商人失业，全国经济崩溃，百姓甚至在街市道路上哭泣。”（资料来源：《资治通鉴·梁纪》《资治通鉴(全译白话版)》作者：司马光、柏杨、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07-01 版）}中看到的货币发行引发的危机，也当然会在央行缺失独立性，公权力不受制约的现代专制社会环境中，得以放大、重现：王莽以方便为由摆脱单一金属货币供应的数量桎梏，引入多种多样的货币来增加总货币供应量，并千方百计地提高它们的身价——社会幸福度，妄图使其得以流通，结果很快引发了传统铸币社会的动荡和专制政权的更迭；现代社会若放弃对货币供应的数量限制，更会如此，无穷多的货币必然昏睡在流通之外，再不进来；二者的不同只在于，古代的王莽，无论如何扩展货币材料的来源，也无法克服源自货币供应数量的有限性限制，经济失序和社会动荡因此来得快和急；现代社会的货币供应可以做到无限量，直到最后它也是倒在一团废纸和无用的电子货币符号的“富有”废墟上，延缓了经济失序和社会动荡爆发的时间，但二者本质相同，结果自然也一样，后者的历史危害甚至更严重于前者——可以说，从无底线地货币发行，从而延长仅仅依赖扩大市场份额方式的经济增长时间，并进而维持财税收入的持续提高的角度看，现代和将来的一些专制政权是疯死的。当然，专制社会也会在足够频繁的技术革命和国际社会一体化的大环境中，彻底摆脱经济发展对货币供应的依赖，但这超出了货币独立和货币主权的讨论范围，我们放在下面章节中再讨论它。

货币数量被操纵，成为发动大规模生产的最大利器和捷径。被以色列类型社会视为根本的生产要素条件的资本要素条件，被专制者彻底解放；曾经被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为残酷的、吃人的原始积累，现在轻松地被现代货币技术所取代。特别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具备了庞大的资本仿佛从天而降的能力后，缺乏的就只是技术了。而技术，在马克思时代，从来都不是资本，甚至都不是生产的要素！国有企业加技术，再加专制个人或集团可以任意而行的专制社会制度，就等于迅速崛起的、庞大可怕也是对全人类贻害无穷的后现代专制社会；其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早前那个弱小的也作了令人恐怖的描述：他们在一百年的时间里，生产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生产的财富。事实上，《资本论》中资本加劳动力的生产公式仍在续写其可以急剧创造财富的现代神

话，只不过，现代专制社会把过去法治社会中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变成成为一种社会常态，通过控制货币数量，让银行等金融机构直接提供任何需要的资本量，然后和飘荡在世界的、可以轻易获取的任何技术相结合，复制出比资本主义社会早期更加凶悍无比、更加横冲直撞的生产能力和破坏能力，让世界为之惊叹！

三、信仰的理性和其它理性

第一小节：信仰系统

在本章节讨论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过，从逻辑上讲，生物进化的环境中，是不需要信仰的，或者说没有信仰存在的可能——环境中的所有个体成员或群体，都只表现出各自的习性、本能或生命、生存规律，呈现出严格的节律和稳定的秩序。信仰是相对于环境变化的静止和独立，只能在超越生物进化的环境变化中才展现出来。因此，从人类稳定不动的角度看，信仰就是改天换地，是无数个人类起源的那个生物进化环境彻底消失、死亡后再起源的总和，一个有信仰的人的生命相当于无数个生物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人的生命周期的总和。这样看来，信仰之下，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如一个生物进化开始和稳定的环境中，可以容纳无数的习性、本能、规律和秩序，且都并无好坏、高低之分。它们都是象环境选择或适者生存造就出的合适的各种生物生命形式或各种地质地貌、气候状况一样的事物。如此，我们不难知道，所有宗教典籍中的律法、规则、戒律、仪式等等规则，无论多么繁琐、无微不至，也都只能让遵守者养成一个“习性”——规则、戒律、仪式越多，培养习性时越方便，培养出的习性越突出、越醒目、越与众不同。但仅此而已。即信仰者完全按照那些律法、戒律、仪式等去做——如按照宗教典籍中记载的不可吃某种食物的规定、怎样祭祀的规定、怎样祷告的规定、怎样穿戴的规定、怎样对待仇敌的规定等等去做了，充其量，他也只是达成了信仰所要求的“习性”或习惯。即让信仰或某种意识形态、信息来主导、贯穿于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的一种习性。这种习性只能让信仰者可以在典籍中所描绘的特定的环境中生存，就像动植物适应一个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后所养成的一种习性，象一个守财奴养成了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从家里到家外、从思维到语言到行动始终把钱财放在首位的习惯一样，但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信仰者或者不是一个真正的有正确信仰者！

至此，我们讨论的信仰的体系还只有信仰即信息、有信仰的习性或节律性特征。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可以相信的信息、一个是有信仰者就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让信仰渗透到生命存在的所有部分，成为象习性、本能或生活规律、生命规律一样自然的事物。现在，我们还并不知道“习性”、“本能”或“规律”中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不知道面对不同的具体环境应该怎样具体思考、怎样具体行动、怎样具体生活——即缺少可以指导具体直接行为的规律性、知识性内容。这些知识和内容，是可以适用于任何环境的通行、共用的规律性知识，也就是可反复应用的科学知识和制定行为规则的规则，而不是只可以适用于一种特定环境或场景中的行为规则或者思维方式——就象上面我们提到的各种宗教典籍中所记载的各种戒律、仪式那样。一个只能按照宗教典籍中具体的律法、仪式等规定生活的个人或群体，他或他们还完全缺失面对各种现实生活、适应各种现实环境，或可用来解释历史现象、或用来认识未知世界及预测未来世界的信仰知识。即缺少可以表述与信仰具体内容有关的无数个“习性”的知识、规律或科学。没有这种信仰的知识和科学，信仰者在离开典籍所设定的环境后，就要么不知所措、无所适从，要么固守原来环境中有效的旧习性、旧技巧。如此，他必与进化环境中的生物相似，“各人都成了畜类，毫无知识”（耶 10:14）他后来的结局，就必与一个生存在适宜环境中或离开适宜环境后的动植物一样，都要在变化后的环境中被杀死，无法安享应有的生命周期，正如

经上所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何 4:6）神的民之所以被灭亡，不是因为他们无信仰，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在各种现实生活环境中思维和行动的知识，缺少可以指导具体行动和思维的信仰知识。信仰知识不是宗教典籍中的诫命、仪式、律法条文，而是信仰能让人类发现的或者记载于信仰典籍中所隐藏的知识或科学，具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作各样的工。”（出 31:3），对于自然环境来讲，信仰知识就是自然科学知识；同样，在任何的社会环境和群体环境中，有信仰者们的行为规则就是按照简单多数原则所制定出的、他（她）们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行为方式，这个原则运用于有正确信仰者占多数的社会中，就是民主立法或民主社会制度，大家以严格守法而显示出自己形成了信仰习性、本能或习惯。如此，科学和法律，是传播信仰的两大根本途径，是信仰的两大见证，“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启 11:4）——人世间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教堂等等传统的信仰传播中枢中的传统信仰传播方式，将来要让位给科学和法律；科学和法律作为确立信仰、传播信仰和帮助信仰成长关键力量的时代，未来要长达 1260 年，记在经文“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启 11:2）中。

信仰既然是人类可以应对任何外部环境的能力来源，信仰的知识就必然涵盖除自身信仰之外的所有领域或整个宇宙，是无限的。因此，从信仰的角度讲，除了个人信仰领域之外，所有的被造物（包括人类的身体）都归于统一的自然科学规律之下——《圣经》中一开篇就确立下的宇宙创造论之下。但其中的各领域或小宇宙中，知识或科学却都是有限的：其中，在人类居住和可感知的小宇宙物质世界领域中，量子物理学理论已经十分接近于知识的终点；与个人有关的人类的群体或社会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有限知识领域，都归于统一的社会科学规律之下，就是《圣经》中包含的能够反映社会信仰发展变化规律的社会经济学或社会货币学理论：货币因有自己的生命规律，就像地质变迁、气候变化、动植物的生命节律一样，在信仰变化与自己相似的社会环境中，通过货币运动的生死周期规律给我们标示出社会（包括国际社会）的历史变迁规律；在有正确信仰的以色列类型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通过货币运动的退出（即衰老、死亡）规律，反映出社会退出和消亡的规律。以上社会知识，指导人们理解社会历史、认清和把握现代世界及其走向、知晓社会未来，帮助信仰者坚定信仰、不断提高信仰水平。

对于个人信仰，因为人们无法选择环境，所以相同信仰水平的人，会有不同的寿命、境遇、习惯、技能和生活状态，从个人的角度看，这就是一种宿命。反过来，从环境的角度看，环境无法改变人的信仰，无法选择人，也就无法给予相同信仰水平的人一个相同的命运和表现形式，如相同的财富、成就、寿命、身高等等。环境——如古代或现代的各个国家、地区、社会；再如，各个时代的各种不同自然生态环境，和在环境中的表现（结果）——如寿命、地位、财富等等，是信仰领域中考察信仰水平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是决定一个人信仰生命的两个秉性，就象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所证明的那样，二者不可同时被确定。因此，我们无法用所观察到的任何现象如一个人的性别、身高、肤色、文化程度、财富、成就、寿命、子女、配偶等等情况来衡量一个人的信仰水平，这是一个隐秘的、只载于“生命册”（启 20:11）中到末日才公开的一个不属于人类科学可以考察清楚的领域，但我们照样可以依据科学对此有感知。

综上，一个信仰或正确信仰的系统由以下有 3 部分组成：作为信仰本身的信息；养成信仰者信仰习性的规则、诫命、律法体系；信仰知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本书中存在这样的一个完整信仰系统，再没有任何的其它宗教典籍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唯一的典籍就是《圣经》。下面，我们对信仰系统的各组成部分，进行简单的讨论。

（一）、正确信仰的特点。

信仰只是一个信息或消息，非常简单、明了。在《圣经》中，这个信息就是：宇宙万物都是一个至高的造物主所创造的。相信这个信息者，就是一个相信《圣经》的信仰者。

正确信仰的信息只可选择，作出“信”与“不信”的选择结果，无法也不能作出科学或逻辑上的判断、研究和分析、认知，自然也不可用定理、公式等科学手段进行定性或定量描述。所以，从逻辑上判断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的信仰种类，并不难。如，相信宇宙被多个神创造、掌控的信仰者，与《圣经》信仰明显不同。从科学和逻辑上判断多神论的错误，非常简单，如多神在各自的起源顺序、大小、地位高低、能力来源或区间管理等问题的解释上，必然形成一个用科学或逻辑表达的分析、研究结果，让信仰的信息成为科学研究结论中的一部分，而进入到科学范畴，并非《圣经》信仰中的那种超越科学的信仰范畴，只相当于《圣经》中的信仰知识的一部分。但信仰在相近种类，如，虽然都承认宇宙同一起源的信息，但事实上并不相同，或名义上的一神论、事实上的一种多神论的区分上，却要复杂的很多。

首先，正确信仰中的一神论，神是绝对的不可知，即哲学意义上的不可知，科学更无能为力。错误的一神论信仰中，信仰信息中的神却是哲学上可知、一定阶段中的科学或现实中不可知的，即可以被未来科学发展所打破的一种偶像或迷信。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认为，“道”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与《圣经》中的神创造万物的信息在逻辑上几无差别。但是，道家思想认为“道”就只是宇宙万物的集合或箱子，即“道冲”（道似一个器皿）（《道德经》第4章）；同时，“道”又为一个整体且不可分的“无”（《道德经》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那么有其而生的万物，自然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归于“道”之中的。如此，“道”就是一个承载着万物的固定环境，其中的万物按照环境选择的各自规律运行、循环、生生死死。所以，道家的思想是顺从环境规律，适应环境选择的要求，通过顺从“道”作为“成道”、“得道”而存在。可见，“道”是应可控制的，或能够被未来的科学规律所描述的事物。整部《道德经》，就是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历史和个人等众多小环境在内的一个生存大环境，只相当于进化论中的一个特定进化环境而已，本质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达尔文环境；《道德经》中的“道”，就是进化论揭示出的“环境选择”规律——万物由此而生，又都归于此，环境选择造就并支配了一切。因此，任何一个以中国道家思想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其货币运动轨迹中必然要留下左闭合货币运动轨迹的影子，也必定是一个专制社会。

其次，承认一神论，同时又将财富、权力、欲望、民望、科技知识和科学成就等等事物，看作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成为事实上的多神论。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我们简单列举几个社会领域中的典型例子。

例如，信神的以色列人，同时相信摩西律法不可改变，将遵守祭祀、安息日等所有律法规定等同于信仰神，出现了法律至上、用法律来配神的信仰错误。《圣经》中反复指责这种“败坏”了的信仰，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院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赛 1:11-15）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崇拜法律、信仰法律超过对神的信仰的人，他们却从不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从不承认自己不信神，但他们确实是他们自己所否认的那种人。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很多人认为通过国际协议这种法律途径，可以实现约束一个专制社会或国家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促进专制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热衷于在国际社会中反复谈判争取更多的专制社会加入到一个或一系列的国际协议架构中去。这些人及其行为，把改变一个社会的轨迹或行为模式的力量来源赋予给法律，是法律至上而非神至高无上的伪信仰者或信仰败坏者，彻底忘记或背叛了只有信仰才能改变社会的《圣经》原则。

民主或顺应民意，是神对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基本要求，但是，将民主和民意奉为至上，却是用人配神的错误信仰。《圣经》中，民主和民意只是社会信仰水平的检验工具，并非信仰本身或可依赖的磐石。没有正确信仰的民众，其民意只能充满邪恶，这些民意若制成法律的话，也是恶法，且因其极容易被诱惑，民意也常常被操纵。在《圣经》中大量记载了神毁灭一整个社会、国家的事件，最大的如大洪水对全人类的毁灭性惩罚，所多玛、蛾摩拉的整体毁灭，以色列社会和国家的消失……现实世界里，希特勒时期的德国、普京时期的俄国，民意、民主和法律，都是支持独裁者的，他们全社会都陷在了对实力、武力、暴力的狂热崇拜中，或人们常常提及的民族主义狂热中，虽然他们都在口头或自以为在内心信神，事实上他们的信仰水平却停留在用实力、武力、暴力配神的阶段，企图用实力、武力、暴力改变社会或世界，而《圣经》中，神应许社会、世界改变的唯一途径是信仰或信仰发展：信仰是让人获得永生的唯一途径，社会的发展规律是由人们的信仰变化所唯一、自动决定的。由此，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天下的观念，并不完全正确：信仰错误者，即使一时得到政权、天下，最后也会很快失败、衰亡，反过来，正确信仰的社会，自然也不能或无需依靠经济实力、武力、暴力对待其他社会。民意不可恃，民主不可靠，二者离开了正确信仰，都逃脱不了死亡的宿命，《圣经》中有启示讲到“你们休要倚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赛 2:22），又多次记载“人算什么”（伯 7:17；诗 8:4；诗 144:3），就是对不正确信仰的人群、社会的民意、力量、民主的最直接无视。而《圣经》中有这样的经文：“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太 11:11，路 7:28）熟悉《圣经》的读者都知道，这段经文中提到的“施洗约翰”，是个先知，按照我们前面讨论的结果，已经知道以色列先知代表或比喻的含义就是民主和民众，因此，这段经文的真实含义就非常清楚了：离开正确信仰，单靠或只有民主和民众，是进不了天国的，虽然民主社会和民众是人世间最“大”最“好”的，也仅此而已。《圣经》中，人类社会的生命或“血”，是社会公权力，因此，民意、民主的界限也应到此为止，或者说，民意、民主不可侵袭、推翻公权力，否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彻底改变或“死亡”。例如，在民主、法治、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社会中，一个法案或一个全民公决的事项，绝对不能超越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审查或制衡，原因就在于这种审查和制衡，是在先民意的选择，现在和将来的制衡只不过是民意连续性和民众守约的体现。谁沉湎于民主、民意或民众，而忘却了正确信仰，忘却了民主的权力来自神的赐予，受正确信仰的全面约束，他必在利用狂热的民众要求或自私的民族主义时被其彻底葬送。无神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此（煽动并利用民意），阿道夫·希特勒如此（依仗民意支持），任何后来者也将如此。

同样，崇拜神造的物质，将神赋予物质领域的物质生产规律和商业流通规律等视为“圣灵”，把依照物质规律取得物质财富视为至高或等同于信仰神，也是败坏或不坚定的信仰，《圣经》中也直接给出了这种信仰的结果，如“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太 19:24、可 10:24、路 18:24），主要有这种信仰的人组成的社会，其结局也与《圣经》中那个被惩罚了的以色列社会无二。现实世界中，西方显然知道经济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也常常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惩罚不合作者或敌人，但是，那种认为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接触，通过给胡萝卜的方式，可以促进一个国家改进其人权状况和更加民主化，显然就是犯了信仰上的错误：过高地估计或看中物质、经济的能力，对物质的崇拜超过了对神的信仰，忘记了促进专制社会民主化的根本只在于促成专制社会中的人们信仰的改变、树立正确信仰的《圣经》原则。因此，西方应始终坚持文化、信仰的接触优先原则，在未能有效改变专制社会中民众的信仰，或者没有建立起可以持续、有效的传播正确信仰的途径和取得其它保证之前，决不当率先实现贸易接触。任何人妄想通过类似贸易、技术交流和接触产生促进专制社会转型的效果，甚至更极端地认为穷国没有实行民主的条件和可能，到头来，受损最大的必是他们自己和他们

所在的社会和国家。当今世界中的中国，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WTO 和之前西方国家给予的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现在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后，都丝毫没能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其中的人权、民主状况，反倒是西方国家因中国的加入而反复陷入经济、政治、安全危机，更遑论建立起一个造福全人类的国际秩序了，显示出商界作为最大的支持者所作出的中美等外交政策选择的错误——虽然，并不会对人类信仰的进步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

《圣经》中载明，一切权力都来自神、属于神。而人们基于此，把信奉权力、追逐权力、顺从权力当作顺从神来对待，就彻底陷入了以权力配神的错误之中。现实中，有很多声称信仰神的人们，在与专制社会、国家打交道时，如在那里投资经商时，喜欢与专制社会中的掌权者交往，给其贿赂以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在权力庇护下的开办血汗工厂、制造环境污染、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帮助专制者鼓吹或隐匿专制者需要的信息……顺从撒旦的权力早已远离了顺从神，是在向死亡自投罗网，何来正确信仰？一个社会中，政府权力是否受法律限制，让社会中具有不同背景的商业组织处境大不相同：例如，中国公司可以借助政府力量，赶出或限制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中的行动，同时它自己在国外又受到外国法律的严格保护，这让中国公司可以具有真正的全球统治力。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源只在于西方以错误地方式与一个专制社会合作和接触，无底线地开放甚至鼓励对中国的投资。《圣经》中还用埃及、亚述等社会所遭受的惩罚来表明这种错误信仰社会的结局。历史和现实世界中，希特勒的德国、普京的俄国等都宣称自己信神，但他们显然更看重和享受权力，更喜欢使用武力、暴力和策略对待其他社会和其他人，他们和他们的社会，也已覆或必覆《圣经》中的埃及社会、亚述社会受惩罚的旧辙，成就神对埃及、亚述社会的所有预言。

把人体的欲望如“食”“色”当作人的本性或神所赋予的天性，予以顺从或崇拜，甚至直接将这种顺从当成是对神的顺从和崇拜，是以性配神或以人配神的错误信仰。人的本性处于自然法的控制之中，永远逃不出生命、生理科学等科学规律的范畴。但本性同时也是社会性：没有社会的存在，“食”的欲望早已无法从自然环境中简单地、轻易地得到满足，伊甸园早已离开人类！“色”的欲望要得到满足，就更离不开他人和社会了，比“食”更依赖社会的存在。因此，自然法之外的“食”、“色”，决定和控制着自然法之内的“食”“色”，后者的短暂存在和延续，是为找寻前者而预留的机会或恩赐。把人性作为最高追求，和信奉物质规律的唯物主义、科学至上思想在逻辑上其实都完全一致，也与把商业、财富规律视为至高的崇拜财富者的信仰在逻辑上完全相同。从《圣经》中的信仰角度来看，一切被造物，包括整个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科学规律或技术）、文化或各种意识形态、权力（社会）、人性（欲望和生理上的物质需要）等等，都只是伴随着正确信仰的确立、坚定过程而产生存在价值或起作用的：人类从进入“千禧年”后，就进入了一个自动进入天国的过程，基督亲自做王的时代开始后，科学技术革命的爆发就连续进行，技术的飞速发展，彻底实现人类不再为吃什么、穿什么操心。

（二）、养成信仰习性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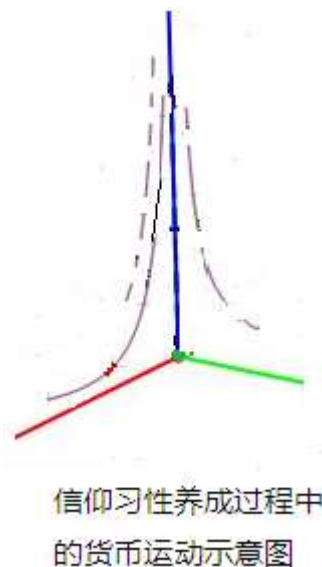
信仰习性是习惯或定势的一种。形成任何习惯或定势的任何途径，都是养成信仰习性的途径。因此，信仰习性的养成方式无数，没有人可以完全罗列出来且无必要。养成信仰习性的规律，就是最有效地养成最稳定的信仰习性的方式及其运用的规律。每个人对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不同的选择，只要能够养成信仰习惯就无好坏、对错之分。对于群体或社会来讲，从无数的可选方式中确定众人共同的选择，最可行的方式是否定法或剔除法——即把大家都不选择的方式固定下来，以协议或法律等形式明确剔除出去，然后大家就可以自由行动。《圣经》中的律法，重现了上述过程。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去看一下。

性欲或与性欲有关的个人生活领域中的事物，如性生活、遗精、月经等，在《圣经》的律法书中，被定义为“不洁净事物”，但奸淫被定义为犯罪（参见利：11、12、13、14、

15)。奸淫罪可以出自、源自性欲。《圣经》中，耶稣基督用一句“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太 5:28）指明了从性欲到淫念（奸淫）即从不洁净到犯罪的过程一直处于个人主观控制之下的本质。如此，除非对不洁净（性欲）进行管治，个人可能会陷入淫念（沉湎于性欲等被性欲控制）、淫行（对具体对象动淫念或实施奸淫行为）的改变信仰习性、败坏自己的信仰的罪恶之中。而对犯罪所做的处理、处置，只有奸淫的犯罪（通奸、强奸、鸡奸等）行为，这已经是病症、病发——个人信仰已经确定出现败坏的证据和标示。所以，性欲是属于个人事务范围内的无数（可能）正常事物中的一个特定事物，并不是必然或必有的生理性恒常习性（如植物神经控制的心脏跳动、新陈代谢等）——性欲的产生，需要年龄等一定的“环境性”条件的成就，并不必然成为个人习性或习惯，进而危及信仰习性或习惯的形成。不洁净事物如性欲，对于可能危及信仰习性来讲是罪伏在门口的一种潜在性事物，类似疾病的一个诱因潜伏下来，它本身不是病也未让人发病，并且也不一定肯定会让某人发病，因为其它的必要条件——如免疫力下降的个人环境条件还未成就，甚至对特定的个人来讲也许根本无法成就。因此，性欲不洁净的律法，是剔除式的否定立法，它从大家公认的、信仰习性不容易养成（最有可能干扰信仰习性的养成）的个人环境领域中挑选出来成为法律规则，反映出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群的信仰水平。当沉湎性欲等被性欲控制的不洁净靠近婚姻等洁净事物时，就演化、蜕变成罪，危害他人和群体、社会，需要进行惩处。所以，不洁净事物最大的危害是可能动摇、败坏个人信仰；犯罪是社会信仰中的不洁净事物，最大危害是可能败坏社会信仰。反过来，达到一定信仰水平的个人和社会，会消灭这种信仰上的不洁净——一个人，会自然避免其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性和习惯（而不是丧失性欲或禁欲）；社会，会自动维护、自我修复信仰水平（而不是彻底消灭了犯罪现象）。

摩西律法中的食物律法部分，被列入不洁净食物之列的，常常在其他文化和社会中被作为美味来对待，如猪肉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就是如此。食物律法指明了人类对食物的过分关注，可能诱发对神的信仰的动摇和背离，如人是靠食物活着的观念、或“食色性也”、“人是铁，饭是钢”等观念，由崇拜食物成为各种犯罪的直接诱因。至《新约》中，上述关系被指明：“耶稣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得，惟独祭司才可以吃。’你们若明白，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太 12:3-7）。食物律法、安息日律法等等，都是阻止不洁净事物动摇正确信仰、进而蔓延到犯罪的一道隔离墙：食物律法让人避免崇拜物质的不正确信仰（而不是禁止人们进食）、安息日律法让人摆脱对人类自身劳动、能力的崇拜（而不是让人们放弃工作）……整体来看《圣经》中规定的不洁净食物和行为种类，不难发现具有一下的共同特点：1）容易按照人的欲望或想法被改变、被利用。如“猪”这种动物，在繁殖、肉质等产品品质、生长速度（或产品供应量）、生存环境限制（或生产场地等条件限制）等方面，都比以牛羊等没有被列入不洁净食物的动物之列的，具备更容易被改变、改良的特点。“鹰、雕”类被列入不洁净雀鸟范围的，也具有比其它未被列入不洁净之列的雀鸟如麻雀等，具有容易被驯化的特点——吸引人们将其驯化为优秀的狩猎工具等。2）相较洁净事物，具有更方便、更简单、更直接满足人的欲望或更引人关注，也因此更令人被其吸引的特点。如手淫、遗精、月经等被列入不洁净事物：手淫和遗精，与婚姻（洁净事物）相比，在满足人的性欲方面，具有更方便、更简单的特点；而月经则比婚姻或生育更早地被人体验和关注，且更自动性地连续持久地存在；妇女生产也是特别引人关注、自然产生强烈体验效果的事物，且母亲对后代从小开始的信仰选择有重要影响，需要特别予以提醒。再如，地上“爬物”当中被列入不洁净事物范围的，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因而也是最引人关注的一类。这些事物统统都具备诱惑人类个人信仰的条件和机会，可能产生让人们沉溺其中或过度关注，是特定环境条件下容易导致特定人群（不坚定信仰者）被引向歧途的特定事物。但是，只要人们坚定了对神的唯一信仰，以上

的“律法”规则的限制就失效或没有必要了。相反，将这些律法的规定看作是一成不变、永不可摆脱的教条，恰恰陷入了与正确信仰相对立、也是本末倒置的信仰陷阱：将神的律法条款等同于神、甚至高过神，无形中背离了“唯一神”的《圣经》信仰。同时，环境的不断变化，影响人们信仰习性养成的事物也在不断改变。如毒品，可能是当代影响人们信仰习性或习惯养成的更大威胁——其威胁远远超过猪肉、月经、手淫等事物，自然是更应该加以立法限制的；未来，有关毒品的禁止性法律规定，又会象古代不允许吃猪肉的法律退出今天的法律体系一样，也要退出未来某一时代的法律体系……可见，谁不允许任何宗教典籍中的戒律、仪式等律法跟随人们信仰水平和社会环境的变动而变动，谁就是阻止每个人养成信仰习性和提高信仰水平的最大敌人，是犯下了与神对抗的大罪，正如《圣经》中指着这样的人所讲：“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太 23:15）



从信仰习性养成的过程看，以干预个人的生物、生理的某些特点为起点，法律是从关注纯属私人领域或个人空间开始的。随着人们信仰习性养成程度的不断提高，法律也自然随之发展和变化，而原来的法律要退出、或失去原来的作用。但是，原来作为习性要求的旧法律，充分发挥其在信仰领域中的作用后，成为正在发生作用的新法律的基础，不应也不能彻底失去规范人们行为的效用，而演化成为“道德”，同时给人们释放出更多的法律自由空间。所以，法律和道德都是连续的，它们的发展、进步所反映的正是信仰习性的养成和巩固程度，是信仰水平连续提高的直接体现。从逻辑上讲，法律和道德在信仰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彻底退出、消失，人们也将因此获得最大的自由空间直到永远。另外，信仰习性的养成，最初的起源领域完全是位于人类的生物性、生理性领域中，即开始于一个达尔文环境之中，然后在无数个达尔文环境中进行连续地变化，即“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太 5:18）。如此，用货币运动来描述人类的信仰习性养成过程，就是一个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在无限数量的达尔文环境中连续不断运动、并同时不断缩小至消失所形成的一个闭合空间，如上图所示。从上图中任意位置，截取一个断面后出现的几何图像，都是社会成员的整体信仰习性养成过程中出现停滞、或者信仰水平停止提高的那个社会中的货币运动形态。因此，具有截面图中两条不连续的货币运动曲线形式的社会和国家，意味着其社会信仰水平步入下降、死亡状态，是个开启了死亡旅程的社会和国家。这个截面图正是我们前面考察过的专制社会中的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图——正如《圣经》记载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个终被毁坏的“大像”（但 2:31）一样。专制社会的生命周期正是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存续时间。在信仰习性养成的连续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持续（或螺旋式连续）变短、直至消失的全程，是一条向右

下方倾斜、沿水平数轴方向无限延伸的曲线——正是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的右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形式（截面只是一个点），表现出货币作用逐渐减弱、直至彻底消失的态势。

从能否有效维持信仰习性的角度看，法律只能在具备相应信仰水平的社会才会完全发挥作用，信仰水平决定了社会的立法水平。同理，信仰水平也自然决定了社会的司法水平和行政执法水平。具体来讲，没有强制、威胁和欺骗等等的自由民主化程度越彻底，所制定、修改、废除的法律才越能够体现和代表社会的真实信仰水平，从而为社会信仰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被拔高的信仰水平所对应的法律，如若被司法严格适用、被行政严格执行的话，都会打乱社会中大多数信仰者信仰习性的形成过程，阻碍信仰进步，正如《圣经》中一再告诫人们要避免“论断人”的经文所传达出的信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太 7:1）“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可 9:42）；被压抑和被贬低的信仰水平所对应的法律，如若被司法严格适用、被行政严格执行的话，会发生以社会强权强力阻挡社会信仰进步的糟糕状况，来自社会公权力系统的信仰“衰坏”，将使社会进入专制社会形态中，导致社会的最终解体，正如《圣经》中以色列社会所发生过的那样——以色列的“牧人”被惩罚，最终导致以色列社会的解体。法律无法反映社会的真实信仰水平，就会产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至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赛 28:13）的后果。社会公权力系统出现政教（或意识形态理论）合一或打压人们的任何信仰或思想的做法，都只会对社会信仰提高适得其反。因此，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权结构，是首先确保社会立法能够真实反映民众的整体信仰水平，而司法和行政再通过具体事件、案件等事项来重新确认、检验、保障社会立法所反映出的社会整体信仰水平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从其本质上讲，虽然不能对“旧”社会信仰水平的既成事实有丝毫的推进作用，但对于保障社会既有的信仰水平不后退并使其深入到社会的各种时间和每个角落，却无疑具有无比强大的作用——如在时间、空间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摩西律法中繁杂的以色列祭祀活动的精细程度，可以说真正到达了无时无刻又无处不在的全覆盖程度，更有利于人们信仰习性的快速养成。当然，仅仅有信仰习性的养成，对于一个人来讲，还远远不够。这就像缺少运载货物的工具一个人要去购物，才刚刚准备好运载工具、至于购回怎样的货物还是未知数一样。《圣经》中“七个污鬼”的经文对此有一个比喻说明：“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太 12:43-45），经文中“打扫干净的屋子”，就是指一个养成信仰习惯的人。

社会公权力运行对于人们和社会信仰习性养成的影响规律，也全部表现为对社会的货币运动规律的影响。具体来讲，以色列类型的社会，社会公权力只有在信仰习性受到外部影响时，才可以主动出击消除影响因素；而在于社会内部或个人信仰领域中，则应该保守中立。因此，以色列社会的货币运动规律就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当来自外部的非闭合货币运动（包括专制国家和非闭合货币运动的国际社会）力量强大时，积极财政政策和相应的货币政策会发挥出较好的效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出现效果不佳甚至失效的结果。最著名的例子，是凯恩斯理论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周期与国际社会政治环境变化的吻合，如二战结束至 1970 年代，专制社会力量进入稳定期，非闭合货币体系的力量外溢较小，凯恩斯主义遇到危机；中国崛起的 1978 年以后，特别是 1990 年代以后，日本的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强，就表明了中国力量或人民币的非闭合货币体系的局部影响不断加强，以色列类型社会需借助更大的公权力力量才能抵挡经济下滑的危险，凯恩斯主义又盛行……二战后苏联崛起，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苏联倒台前后至中国力量强大前的 1980 至 1990 间，人民币的非闭合运动体系外溢相对于整个西方社会而言还较少，新凯恩斯主义又流行，表明专制社会的力量或败坏信仰的力量在下降，凯恩斯主义被反思、小政府思潮在西方泛滥……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经济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从

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正好相反：是个人信仰组成、汇合成的社会信仰的水平，决定了宏观经济的一切包括其发展趋向；然后返回来，这种趋向必然表现为制约个人的特定、事实上是所有的行为。另外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实例就在最近，西方在 2008 年之前，采取的所有传统经济学策略，都未有效应对由中国因素（非闭合货币体系）带来的持久、有力的商品价格下滑或者更严重的、可被称之为“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也是 2008 年之后，美国被迫采取突破西方经济学所有传统理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学术背景。古典经济学或市场法则失效，而凯恩斯主义又无能为力，充分显示了传统西方经济学对非闭合货币运动的无奈。被西方经济学理论视为离经叛道、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缺少理论根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维护社会信仰水平的角度来看，却非常自然。就象《圣经》中以色列人在信仰引领下自然看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出 13:22）一样，量化宽松政策也只是自动发挥社会公权力维护社会信仰水平的作用，保障社会信仰水平在遭受外来威胁时稳定不动。

一个被以各种方式“强加”、建立的民主、法治、三权分立、相互制衡模式的社会，如果该社会有信仰的基础（社会信仰水平达到或接近自动维护的水平），信仰和社会形态会相得益彰。否则，没有信仰基础（或信仰水平不够），这个社会早晚还要重回专制社会的泥潭里去——正如《圣经》经文中所说“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彼后 2:22）“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太 7:6）。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从是否有利于信仰提高的角度看，民主、法治、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模式，对于稳定和提高信仰水平，具有最大的作用。如果不固定具体的意识形态类型，从逻辑上讲，这种社会模式，对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宗教信仰来说，都应具有同样的效果。除非，有来自特定的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本身的对抗因素存在。如，有着丝毫不可更改、增减和解释宗教法典的社会信仰的，就将无法适应社会的民主化。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个例子。

对于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无神论来讲，存在着意识形态内在的“天然”不适应民主、法治、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社会模式的问题。问题出在共产主义理想或信仰本身。这个理想的基础是从一个整体的社会、文化、经济结构中、甚至于从一个完整的生产单元结构或过程中，区分出对立、不同阶层（阶级）或不同的主体——如资本家与产业工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等等。因此，通过各种方式（暴力、非暴力）消灭这种差别建立起一个新社会的共产主义理想，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个分割对立的事物基础上，如何在对立或矛盾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是其核心策略或哲学枢纽，始终找不到或根本就否认可以独自存在的社会空间——连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一直都强调矛盾无处不在。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习性后，虽可以取得胜利，破坏旧关系、旧社会，但始终无法摆脱它要彻底消除的阶级差别和其它差别的存在或继续纠缠，因此需要不断进行再革命。毛泽东在中国，为此先后发动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社会运动，但始终无法让中国社会成为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生存之地：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难以消除管理者、所有者（代表）和具体劳动者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阶级斗争更无法让被斗争的对象与斗争者成为同类，人们也总是会轻易发现原来的同类中存在着根本对立的差别。如此，阶级斗争无法停止，不得不受意识形态的指引永远向前走……虽然为此让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遭重创（因为各种差别正是隐藏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社会各领域及文化观念中），但仍不足以形成让毛泽东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的实行民主的那种前提：全社会所有的人都是只具备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相反，随时间的发展，他发现，甚至连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连一个真正可靠的人也没有，包括多年跟随他的身边人和政治盟友。人人仍然处在事实上的社会分工体系、不同文化观念和各種利益链条中，差别明显。社会意识形态总也达不到让民主、法治、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社会机制进行保障、强化的初始位置，民主在这样

的背景下，会产生不确定的结果、会“变天”，特别不利于处于社会管理者、领导者一方的掌权者。这是中国始终无法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政于民的根本原因，即使看到民主社会对于弘扬、保障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先天的优势，也因害怕必然被民主推翻而拒绝。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虽然在中国民众中如日中天，也只可以保证他自己一个人不被民主浪潮所抛弃，而根本无法保证给他选出、推荐出哪怕就一个让其可以安心的盟友或合格的权力分享、制衡者。相反，一个同时被强化、保障的多个对立的群体和个体，完全可能甚至简单地通过民主途径淘汰对方，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政党最担心和最不愿意看到的：它如果为了利用最有效的社会民主模式来强化、保障、净化和统一社会的意识形态，却极有可能早早埋葬了自己！司法、行政等社会各领域也都一样。这是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国家拒绝民主化和在实行民主化后纷纷被赶下台的内在原因。中国、苏联的社会主义历史，也证明消灭与生俱来的、植根于类似物质生产规律内部的分工差异所形成的所谓社会差别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意识形态的习性和物质生产规律之间不分胜负的战斗历史，充分表明二者在信仰之下领域中是地位相当、等量齐观的同类事物。

综上，信仰的独立性，是社会公权力系统之间能够相互制衡的根源，也是媒体、央行和所有社会组织，能够具有独立性的根源，是平等社会的根基。人们整体信仰水平的持续不断提高，正是以色列类型社会自动出现、维持和发展下去的全部奥秘；人们整体信仰水平的下降，是专制社会出现和灭亡的根源。未来，信仰水平不够自动维护信仰稳定的程度，但却具有表面上（法律上）的民主、法治、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形式的社会，在社会信仰水平发生波动时，因极隐蔽、突然，将给全人类造就出一场最大的信仰考验。人类养成信仰习性的规律，在社会历史阶段，全部表现为社会信仰水平的变化规律或者货币运动的规律。

（三）、信仰知识及其分类。

信仰是接受一个信息并相信这个信息。有神论就是相信神创造、控制着宇宙的信息。《圣经》中的信仰是有神论，所有宗教在此层面也都一样，就连中国的道家思想中将宇宙创生归于“道”，也是一种类似于有神论的意识形态——最直接的差别，只不过是道家思想将自己崇拜的“神”命名为“道”了。

个人接受一个信仰，就是接受一个信息，本身并无对错而仅仅是一个过程。决定信仰对错的关键，不在于接受者，而在于被接受的信息是否真的来自于信仰崇拜中的“神”。因此，包含信仰信息的经典及对其的准确解读，对于确定信仰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经典中没有包含证明自己来自于神的信息、或者一个真正来自于神的经典被误解后传达给信仰者，信仰者的信仰及其所在社会的信仰，就会走向歧途。且错误信仰的习性养成的越好，死亡也越彻底，越无信仰上永生的可能。

包含信仰信息的经典中，证明经典本身来源于神的信息内容，我们称之为“信仰知识”。象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道家思想等等，明确说明他们的信仰信息来自于人类自己的，至此可以退出我们在本小节中的进一步讨论了，这也反证了我们前面将它们剔除信仰范畴而归入同类的正确。多神论中的信仰知识，从逻辑上讲应该有多个信仰知识系统，为方便讨论起见，只要能确定有一个信仰知识系统存在的，我们就将相关典籍视为真正值得信赖的信仰典籍。

从一神论的角度讲，宇宙万物具有同一起来源，又受制于同一个神。那么，除了神之外的，我们处于的宇宙中的所有事物，都应该有一致、统一的规律，都是应该可以用一种科学思维或规律性来进行描述的，都是有限的知识体系，包括信仰典籍本身。所以，在一个可能正确的信仰系统中，除了信仰信息中的神是绝对或哲学上的不可知以外，再不应该存在科学上不可知的任何领域，相反，应有着完整、统一的科学体系。上述结论意味着，在一个记载正确信仰的典籍中，或者可以确认全部是神赐下的完整信息中，至少应该包含人类现在所有科学门类知识的完整统一或最终的信息。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宗教典籍中，只有《圣经》具备这样的信仰知识系统。

在《圣经》中，人类的社会人文科学领域，包括哲学、法学、历史学等等现在仍然被认为是不可数学科学化的部分，与物理学、医学、地质学等等自然科学一样，都适用一样的数学规则，都可以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和可预测、可重复验证，都统一在“宇宙创造论”这一个科学理论之下——不从创造论的角度看，宇宙才是无限的。创造论意味着宇宙是静止、不动、独立于神之外的一个被造物，这是人类信仰独立、不动的根源，是科学技术规律固定不变（在固定条件成就时永远有效）的根源、是社会规律和货币规律可以相互反映并同时反映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根源。

《圣经》中所记载的所有看似不可能的事件，如大量的“神迹”，都可以在一定科学水平下再现——当代人类的科技水平已经可以再现其中的一部分或者可以在逻辑上再现其全部，显示出其中所包含的科学真理。如，代替人类身体各种器官、组织的技术发展，其中譬如现在替代大脑（部分）的装置及其材料的出现，清楚告诉我们，意识绝不是这些材料自有的机能，就象计算机软件绝不是硬件设备的机能一样。这样，人类的整体信仰水平将彻底摆脱唯物主义思想的干扰，在科技发展的见证中更快发展。当人类的科学发展实现了大脑的可替换时——就像现在换假发、换发型、换帽子一样简单时，诸如我们的大脑是大脑 1.0，陆续出现了大脑 2.0、大脑 3.0……人类的生物学生命界限就会自然被打破，永生就处于这种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尽头，动摇于人类永远无法摆脱死亡命运的低水平社会信仰就会获得更大的提高。但是，直到无数的大脑可替代物质、装置被发明之后，人类仍然与赋予、制造大脑运行机制的事物——灵魂，处于不同的宇宙或系统中，人类永远只处于由灵魂系统制造的“虚拟空间”中：整个人类的所有意识活动，都只不过是一个灵魂系统在满足条件的各种人脑系统（或装置）中的运行痕迹，就象不同的 Windos 版本在适合的计算机硬件安装条件下，正常运转而记录下所有的使用痕迹一样，也象游戏中的虚拟角色总无法走入人间一样，科学发展总会让人类越来越感受到神的存在，有助于人们作出正确的信仰选择。

当代人类的物理学，达到了对物质微观结构探索的尾声，接近了距离了解宇宙诞生之谜一步之遥的“上帝粒子”时，才发现同时存在以下的可能：“上帝粒子”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这个粒子其实并非单一粒子，而是截然不同的几种粒子……物理学面对的这种状况，无论结局如何，本身却已经在逻辑上展示并说明，人类现在探索的宇宙可以是存在于更大的宇宙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人类探索的宇宙之外，可以存在着与此相对、相反和与此上下相连、左右相结的无数个逻辑上的宇宙，这些与人类正在探索的宇宙在逻辑上可以同处于一个更大宇宙中的无数个宇宙，也将再一次表明《圣经》中有关宇宙起源的“创造”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宇宙已经被完全造就完毕，再没有真正的、任何的变化，没有时间的存在。逻辑上，我们看到的宇宙变化，都是在时间中的宇宙，即只是有限的宇宙——脱离这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的时间就归零，再进入这个宇宙，时间又开始，在两个这样的宇宙中不断来回，就会获得不断的新时空。变化是有限宇宙表现出的全部宇宙的假象；宇宙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运动和变化的事物，一样也没有：宇宙的运动在人类和人类管理的事物及生存其中的环境的变化来讲，是一个自然、自动的过程，是信仰提高过程的自动过程和既定结局；人的真正自由只有信仰选择的自由，也无法形成真正的运动，区别只在于人类的选择不同而走向了不同路线或路径——所有的路线、路径本来就都放置在那里，固定的结果也如此；人类之外的物质世界包括人体，都服从于自然科学规律，也是一成不变的静止……人类生存着或现在感知着的宇宙，存在着一个象量子纠缠对一样所对应着的宇宙，但这个对应的宇宙现在还是“空”的——还没有我们生存中的宇宙所具有的一切，但将来会复制现在宇宙开始（或任何发展阶段中）时的一切，这是在“生命册”（启 20:12）中的人未来才能到的“天国”或“新天新地”（启 21:1）。我们现在生存的宇宙，只是“天国”国民的验证场所或实习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记录在与这个宇宙相连又独立的无数宇宙中，被时间分割放置在不同的宇宙空间中，找回或重放我们现在这个宇宙中的一

切，只需要穿越无数的宇宙就可以。但是，那些放置人间事件的宇宙，绝大部分的空间是“空白”的，还放置或要放置无数的其他类似地球人的“人类”在其它星球或宇宙中的实习场景——他们也要在去他们的“天国”前见习使命。并且，从地球人类看到的《圣经》的创世纪记载里，缺少后面《圣经》经文中多次提到的“天使”的被造过程来看，已经有早于地球人的人类从他们的宇宙进入天国，履行管理宇宙的职责了。在《圣经》赐下给人类时，人类处于已经完成的宇宙中的最后完成部分。等到地球人和所有的“人类”，都进入各自的新天新地时，原来的宇宙被彻底更换——即被清空，象现在等待“生命册”中的人们去生活的宇宙的状态一样。这个过程只是象纠缠态中的量子对换了过来，从整个宇宙来讲，并无任何的变化和运动存在。现实中的宇宙知识，我们放在最后章节中再行讨论。总之，《圣经》中神的安息，就是无人可以打搅这个有信仰水平变动所引领的自动过程。

面对上述统一的、科学的信仰知识系统，下面我们看一下《圣经》中给知识分类的方法，并简单地对这个知识系统进行分类。

包括如何运用知识的智慧在内的整个知识系统，按照一个标准——即“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箴 1:7）、“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箴 9:10），被分为两类：1、从信仰而来的知识和智慧；2、不是从信仰出发而得来、习来的知识和智慧。第1类是来自于社会信仰的知识和智慧。这一类知识和智慧会造就出技术革命。又因它与社会信仰水平相连，超越了人类生理生命的界限，是社会信仰水平的标志性事物。第2类是不会也无法造就出技术革命的知识和智慧，是人类适应环境后形成的新的生存技能，被严格局限于生命规律的范围之内，或者只存在于达尔文环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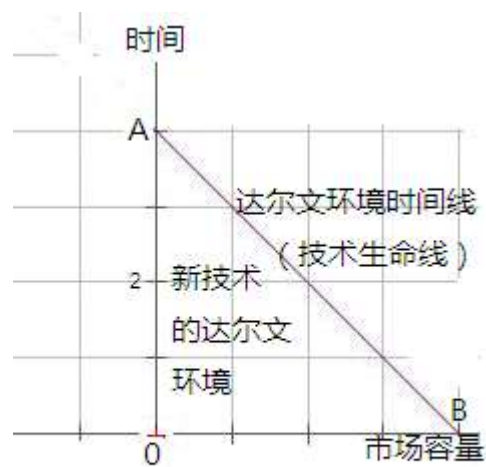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类知识进行简单讨论。

第1类知识和智慧，处于哲学意义上的意识范畴内，与现代人们熟悉的“知识产权”（包括为不阻碍科学发展而普遍规定不属于知识产权范围内的各种科学发现、发明等首创性知识）范畴联系紧密。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达尔文环境中不存在信仰。因此，社会信仰水平的提高，让人们迎来一个新的达尔文环境，人们在这个新环境中，会进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存模式中，产生新的生存技术或习性、技能——这是所有生物都有的一种本能。这种在新的信仰水平之下所获得的新技能、新习性，就是科技创新及其应用——大规模产业技术革命。其实，很多过去没有被利用的技术，在这种机制下，也会被应用或组合成一场技术革命，这就是中国人常常“心酸”地看到在早期的技术革命中，有大量中国古老而被“闲置”的技术被重新发明和利用，甚至被拿来攻打中国社会，著名的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兵法等等。从信仰的角度看，技术革命是一个非常简单和自然而然的过程：人们在任一个达尔文环境中自由地进行信仰选择，改变了信仰水平后，出现了新的达尔文环境，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就是科技创新及技术革命孕育、爆发的过程。社会信仰产生创新和技术革命的机制、动力和根源，与进化论中的“环境选择”机制、动力和根源完全一样。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不是直接孕育、产生在信仰领域之中，而是人类应对社会信仰领域出现变化的产物。因此，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不一定是源自于以色列类型社会中信仰提高最多的地方、领域和人群、个人，而一定是产生在适应能力最强的地方、领域、人群或个人身上。科学研究、技术和商业领域中的精英，因此并非一定是有信仰或信仰水平提高快、或者信仰水平高的人或群体。

一个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革命的形成、爆发，与社会中具体某个（些）人的信仰水平无关，只与社会的整体信仰水平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信仰或意识形态状况相同的华人，在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中，为人类的科学发展做出的贡献差别明显的原因。一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和发动技术革命的能力也与社会信仰水平之外的任何事物无关，例如与社会的平均知识水平无关——这是大力发展教育，投入海量的教育和科研经费、制造出了海量的

高学历人才的中国当代社会，为什么科学技术创新能力丝毫没有起色的，更遑论有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技术革命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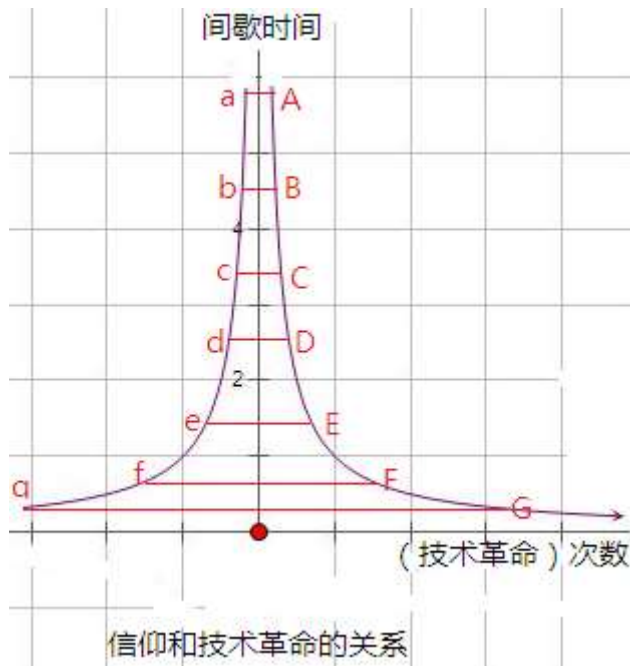


单项技术的达尔文环境示意图

一项技术能改变环境的力量，我们常常用技术市场的容量来表示，即人们熟知的“市场”或“市场容量”概念——新产品或新技术在开发、推广之前，必要进行社会或市场调查和评估时所得出的那个结论。一项技术从诞生到市场饱和时，所走过的时间是技术推广或市场开拓的全部时间。这段时间内，人们可以使用任何环境许可的方法让技术在社会相关各领域中得到应用，充分显示出技术的活力或生命；超过这个时间之后，无论使用任何环境许可的方法，技术市场都无法再扩大，技术改变环境的活力或生命完结。因此，如果我们把技术具有生命和活力的社会领域称为一项技术的“达尔文环境”；把一项技术从诞生到市场饱和所走过的时间段，称为一项技术的“达尔文环境时间”。那么，市场容量和时间就决定了一项技术的达尔文环境时间，时间、市场容量和达尔文环境时间所构成的封闭区间，就是一项技术的达尔文环境，如下图所示。一项技术的达尔文环境 $\triangle OAB$ ，总是一个有限空间，技术的生命必定随着时间的推移迈向死亡，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可以永葆青春；任何技术生命的边际效用，都沿着达尔文环境时间线向右下方倾斜，符合西方经济学理论中著名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一个以色列类型社会中，在信仰水平提高后，形成了一项技术创新和应用，就会带来一个技术的达尔文环境，改变原来的社会环境。但是，如果在该项技术的达尔文环境时间内没有出现新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话，社会环境就回到了与技术产生之前完全一样的场景中去——等待社会信仰水平提高并孕育技术创新和应用，表示出社会信仰必须稳定提高才会迎来下一个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态势。可见，两次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中间的间歇期，只改变了社会信仰直线上升的具体方式，却并没有改变社会信仰稳定上升（曲线上升）的总趋势。相应的，社会信仰水平稳定却不是直线式上升的方式，也让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呈现出不连续但次数在连续增加的模式——后次的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在前一次的基础上，对社会环境造成与前次连续但更大、更多的改变——即造就出更多的达尔文环境。直到间歇期趋于为0时，社会信仰的发展模式才会从越来越平直的曲线变成为直线形式。因此，孕育、创造出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的社会信仰，其变化趋势有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的次数与间歇期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和描画：只有一次科技创新和技术革命，就足让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与专制社会脱离开来。从技术创新和革命的角度看，专制社会与以色列类型社会之间，起初或者最小的社会信仰差距，只有一个达尔文环境的距离，二者无限靠近但不连续；随着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中累积的达尔文环境越来越多，与专制社会间的距离越来越大，趋于无穷大，留下一个与右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完全相同的数学轨迹；同时，在其对面曾经无限接近、但距离越来越远的另一端（象限）上，所划出的几

何轨迹正是一条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如下图所示。



其中，aA、bB 等越来越长的红色直线的长度，表示达尔文环境越来越多的个数，每个环境的生命周期有自身决定；因为市场调查、估算的技术统一于统计学等科学规律，所以所有直线都是平行的。图中点 a、b、c、d 所在的曲线，显示了一个无信仰但在坐享吸收或“吃尽”知识、智慧、聪明的另一个社会或系统中，社会意识形态状况与其科技状况（无科技创新能力、无发动技术革命的技术运用能力）之间的关系，与可以描述达尔文环境的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完全一致，绝非偶然。

第 2 类知识和智慧，处于传统经济学的劳动（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范畴中。

由动物进化而来的无信仰的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能力方面，一点也不比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看到的动物们差。人类的这种无信仰参与其中、只有环境适应能力就可以产生的智慧、聪明和知识，是属于自己的，是“自结的果子”（箴 1:31）、“自己的聪明”（箴 2:5）、自以为有的智慧（箴 2:7），不是“真智慧”（箴 3:21），也不是“真知识”（箴 8:14），在适应环境后，就会自动停止发展和增长。或者，在环境没有发生改变的时候，这类知识、智慧和聪明是永远不会前进、发展的。一个社会的信仰或意识形态，达不到可以自我维护水平，或者不是（或不能够维持）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时，就只有这种属于人类自己的假智慧、假知识、假聪明。依据具体的社会信仰或意识形态内容的不同，这一类知识和智慧继续分为两类：1、在无神论专制社会中，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达尔文环境，不存在信仰习性的制约，社会的适应环境能力更强大。因此，在国际环境发生改变时，很容易快速、有效地学习、掌握外来知识和智慧，短时间内就可能造就出一个经济、科技发展迅速、力量强大的国家。1978 年之后的现代中国和鸦片战争后的清王朝社会中，都充满了这类知识和智慧、聪明。清王朝时代洋务运动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海国图志》第 67 页，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的思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类知识和智慧的种类特点——适应环境变化，有环境选择所决定。当代中国，与世界接触后，也出现了知识“大爆炸”，知识运用或“智慧”方面也爆发出强大的“山寨”（复制或模仿）能力，让其看上去似乎具备了随时超越西方科技水平的趋势。但这一类可以急速、大规模出现的知识、智慧、聪明，在社会适应了国际（或外部）环境后且外部世界处于技术革命的间歇期时，就成为无源之水，成长和发展就会自动戛然而止。另外，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让无神论专制社会其实并不缺乏发现内部环境中蕴藏的各种“新”事物、“新”知识的能

力，但这些被发现的事物和知识，由于社会的达尔文环境不需要，至多也只存留在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或娱乐嬉戏中，并不会被运用于社会生产、经营等经济领域中去——就象最凶猛的野兽，在猎物足够时也不会在意其它动物分食，更不会向近在咫尺的猎物施展它的任何捕猎技巧一样，也像小鸟在吃饱的安全环境中，悠闲梳理羽毛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有大量后来才被西方社会发现的类似“知识”，都写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从未应用到生产等经济领域中，长期成为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发动技术革命的“历史之谜”。

由于具有快速但无自行发展能力——即无耐力、无持久性的特点，与猎豹的身体特点十分类似，所以在下一章中我们会看到，由无神论专制社会深度参与的国际社会，在《圣经》中就恰恰被赋予了一个“豹子”的称谓。2、多神论或错误一神论信仰的专制社会中，错误的社会信仰，使社会将宗教典籍中仅有的、信仰系统中充当提示信仰习性的那部分律法、诫命、仪式等看成是神圣不可更改的事物，事实上充当、代替了信仰的知识系统。如此，让社会始终处于典籍中所构造出地那一个达尔文环境中无法抽身——习性和关于环境的知识合二为一，与环境选择后的生物的习性和其应对环境能力的合二为一，完全一致。在面对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时，社会的适应能力严重受限，根本无法接受外来的科学知识和智慧；本社会中的知识、智慧与外界相比，越来越老化、过时……由于社会中的知识系统更新速度极其缓慢甚至完全拒绝更新，这样的社会更象生活在一些特殊环境中的动物世界，如加拉帕格斯群岛、极地地区、撒哈拉大沙漠中心地区、东非大裂谷深处的那种生物世界，既要严防外来知识、智慧的流入，又要拒绝本社会环境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任何改变。在面对世界的快速发展、地球生态环境整体发生较大改变时，这类专制社会要产生出越来越大的抵触力量，直到象被环境选择所放弃、所淘汰的生物种类一样，挣扎到耗尽生命为止。现实中，这类社会中也会越来越多地涌现出自杀袭击者的“独狼”或极端恐怖组织，他们以“殉教”的名义坚持错误信仰，主动放弃了毫无意义的挣扎。

现在，就结束这一小节的讨论，至于两大类知识、智慧更具体的区别，特别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在经济学和哲学上位置和区别，我们将在分析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局限性和错误的章节中，集中讨论。

综合信仰系统中的3个组成部分来看，信仰信息的选择至关重要。正确的信仰选择，会让人类在坚持自己所作出的选择后自动形成信仰习性、自动进入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中、自动具有科学创新和发动技术革命的能力……不正确的信仰选择，要么无法形成信仰习性，要么没有且无法接受科学知识和运用科技知识的智慧和能力，在专制社会信仰或意识形态水平下降过程中，前二者结合的最坏局面——出现一个没有信仰习性或没有自我约束习惯，同时又没有任何科学知识和能力的群体局面不可避免。人类个体信仰的自由选择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方向、社会模式和历史结局的全自动效应，正如《圣经》中那句诗歌所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注：“不要叫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歌2:7）

第二小节：理性和理性的分类

（一）、理性的形式和特点

《圣经》中的宇宙创造论告诉我们，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认知《圣经》中的整个宇宙。人类认知宇宙的工具或途径，就是人类的理性，是赋予人类具有哲学中的意识概念所指的大脑活动结果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形成规律和必遵循的规则。理性的最基本形式是（形式）逻辑学法则。由逻辑推理直接形成的数学（mathematics）是人类思维的表达形式，是一切科学的通用或终极的表现形式，根本无法数学化的任何知识、智慧，都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本质上，我们可以根据最基本的逻辑规则，来判断所有的知识是否正确，

包括判断和评估信仰信息来源是否正确并给出相应的数学证明——能否将《圣经》进行数学化解读，是判断解读方式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人类现有的、《圣经》之外的其它所有宗教典籍，都具有明显的逻辑错误，要么根本没有给出一个科学知识系统，要么给出的信仰知识无法被数学化或经不起数学检验。需要注意的是，任何科学领域中，基于一定的科学基础所产生的逻辑上无法解决的悖论，都不是逻辑或理性的失效，而是所依据的科学基础理论本身具有局限性。因此，判断宗教典籍错误的最好方式，是基本逻辑规则，不过度追求数学化证明以免有局限性的数学理论对其不公；而对典籍正确性的判断，则都应附有或经得起严格的数学证明。《圣经》经文中大量存在的各种被认为是常人难以理解或不可思议的内容，也是如此：阅读者所基于的认知基础本身存在着大量的错误信息或局限性内容，就形成了神秘主义(mystic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哲学差别，对应着信仰水平的3个不同阶段——神秘主义者是信仰知识上“一无所知”的愚昧、愚蒙人(箴9:13)；经验主义者是信仰知识上“恨恶知识”的愚顽人(箴1:22)、自以为是的愚妄人(箴12:15)；实用主义者是信仰知识上以“得知识为冠冕”的通达人(箴14:18)。

《圣经》中，宇宙万物都是神创造的，从理性上讲，万物都是好的，都要无一例外地对人类信仰的成长有益。我们循着这个逻辑理性去考察《圣经》中的经文知识，可以免去很多不应有的困惑。

例如对于撒旦，《圣经》中记载，“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只要存留他的性命。’”，(约1:12; 2:6)但撒旦受到神权力的限制，只能做神许可的事情(参路22:31-32; 提前1:19-20; 提后2:23-26)，它若没得到神的允许便什么都不能做(约1:7)；撒旦常被称为指控者，因为它积极寻找可用试探来攻击的人(彼前5:8-9)。以上经文启示我们，耶和华神已经把死亡的权力赋予撒旦，让一切不信者、错误信仰者、信仰不坚定者的鉴定权、处罚权都归予了撒旦。因此，撒旦掌管死亡，有权诱惑、试探人们的信仰水平、程度，并对一切不敬虔者处以死刑(包括用正确信仰者“死亡”的假象即安息来欺骗、试探一切不敬虔者)。撒旦与人类社会一样，都是神的创造物和工具，撒旦的死刑或网罗，只对人们的罪(信仰错误)或只对罪人生效；人间没有了罪，或没有了罪人，撒旦就彻底失去了权力的适用对象，自然萎缩、死亡。也与人们都有了正确信仰后，人类社会就失去功效、自然萎缩、退出一样。所以，经上说，“叫我死的乃是罪。”(罗7:13)，是不信、不敬虔的信仰原罪叫人死，而不是标志社会信仰程度、刻度或记号的法律叫人死。相反，满足于任何特定法律所代表的信仰水平或信仰程度而放弃信仰的进步的人和社会却是必死的。正因为撒旦要人、要社会死亡的权力来自神，因此，神在末日审判时，收回或废弃了这个再没有用处或用武之地的授权，也不亲自行使这个被授给撒旦了的权力：被撒旦处死的人，除被列入生命册——即被撒旦处理错误或仅仅用来诱惑、欺骗不信者的，会重生，其它死人还是死亡状态——维持撒旦对该死之人的处理结果，只是把死人从原来所处的不同场所——“海里、死亡、阴间”集中到“火湖”里而已(启20:11-15)。神只让该活的人永生，成就了“神是活人的神”的宣示。

基于《圣经》中的撒旦，是神的命令、是神的工具、有神的授权，所以它是不可战胜的、也是不可替代的——神对撒旦的约和授权，与神对人类、对万物的约一样。人类只可以靠正确信仰脱离撒旦的手、逃离撒旦的控制，任何主动、正面、直接战胜撒旦的企图都是对抗神。而人类社会只是让人悔改、醒悟、感恩的机会和恩典，有正确信仰者或自认为有正确信仰的社会，都没有权力主动杀死、主动暴力对待其他社会——这些人类社会，如若信仰不正确也是撒旦的囚笼和权力辖区，只有撒旦有权自由处置或杀死它。主动以任何借口对他国发动个人袭击或全面战争，在信仰上都是错误的，是与撒旦之间的一场争权、战争，对正确信仰者和社会来说，并不会造成信仰进步上的任何损失。因此，战争没有正义，除了有正确信仰社会所进行的自卫(包括集体自卫)战。

《圣经》中的撒旦，是无信仰者和信仰水平不进步者或社会的真正敌人，他们总要同归于尽。先是撒旦阻止信仰产生失败（启 12:5）、然后是阻止以色列类型社会产生的失败（启 12:10）、然后是阻止社会信仰提高失败（启 14:15）、然后是阻止个人信仰提高失败（启 20:9）；从另一面看，撒旦先是未去阻止信仰的孕育，显示撒旦有效控制着可能阻止信仰形成的不信者；然后是撒旦将权力、能力和座位给了信仰水平波动不定的国际社会（启 13:2），显示撒旦仍然控制着敌人；最后是撒旦聚集无信仰和信仰不成长者进行征战，显示撒旦与其追随者之间发生战斗，直到同归于尽（启 20:10）。撒旦的历史里，与专制社会的同归于尽——专制社会完全灭亡时，撒旦被打入无底坑（启 20:3）；世上所有不信者和拒绝提高信仰水平者灭亡时，撒旦彻底消失（启 20:10）。

综上，《圣经》中全部有关撒旦的知识，阅读者若基于信仰水平不断上升的《圣经》信仰知识体系去解读，是不会产生任何逻辑上的矛盾的。至于对《圣经》信仰知识体系的数学化过程，我们放在下一编中详细进行。

正如数不是万物之源，数学也不是神创造宇宙的规则和手段，但因理性的缘故，数学能准确表述宇宙万物一样，任何科学都不是宇宙的起源，也没有任何科学是神创造宇宙的规则，可知论的首要前提也不是宇宙具有科学性，但因理性的缘故，科学和理性可以正确表述宇宙万物。并且，理性必然超越任何具体科学，例如脑科学。脑科学只可以解答什么是理性的问题，即大脑是如何思维、按照怎样的方式思维并产生意识的。但脑科学却无法解答理性从哪里来的问题。

从传递信息的角度上讲，理性具有超越任何时空的特性，不属于任何的特定时间和空间领域。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信息传递的最大速度是光速，我们在地球上接受到太阳最新信息的时间超过 8 分钟。但是，《圣经》中神的话语却即刻传递到有正确信仰的人的头脑中，显然不是光速可以完成的；我们在聆听古代人的音乐作品、观看古代人的绘画雕刻作品时，立刻就会从中接受到某种信息，或是一种情绪感受、或是一种场景、又或者是一种昏昏欲睡的噪音或图片……破译古文字体系或一套从未见过的密码信息时，人类所依赖的工具也只有理性。从空间上讲，超过 8 分钟的历史，距离我们已经超过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理性传递历史和未来信息的速度，也是远远超过光速的，且无起点或终点限制。人类可以有无限的知识，可以认知无限的宇宙，所依赖的正是具有无限速度的理性，而不是其它具有速度限制、区域限制的任何事物，如光——它只可以在光速的范围内让我们即刻接受到它所传达出的波粒二象性（Wave-particle duality）信息。任何赋予信息传递以有限的速度限制的科学，都是错误或局限性的理论体系，同样，无数个有限宇宙所组成的无限宇宙都不是真正无限的宇宙——都可以看作为有限事物的一种无限循环的结果。处于这种宇宙场景中的事物都是有限事物，场景中的无限宇宙其实只是保持有限事物不发生改变（静止）的存在或只作循环运动：相对论因为将宇宙中的最大速度限定为光速如此，唯物主义者相信有限的物质规律是最高规律也如此，将宗教典籍中具体的诫命、规则、仪式等当做不可逾越的教条的宗教信仰如此，所有的达尔文环境都如此，中国的道家或儒家等思想文化也都如此……只有由无限个无限宇宙所组成的宇宙，才是真正的、《圣经》记载的神所创造的那个宇宙，是唯一可以承载和真正需要超时空理性的宇宙。

理性应该与其所处、所要反映的宇宙相一致、相匹配，是理性的本来之意。理性和人体的结合，却让理性本身成为一种“不理性”或“不具有经济性的理性”：无限的理性，存在于有限的个体生命之中。人类理性的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源自于对人类个体生命的医学、生物学认知。因此，在永生的信仰之外的任何领域中，人类的理性无法产生，也不会产生。例如，加拉帕格斯群岛上的海龟，无论形状、习性多么怪异，也都刚好让其适应那里的环境生存下来，不多也不少。人类处于生物进化中的顶端，理性所表现出的进化规律，按照进化论自身的逻辑，也不可能表现地比海龟还差。因此，从理性或最基本的逻辑上讲，信仰中的理性不可能存在于达尔文环境中。反之亦然，达尔文环境中或生物进化论下，也不

可能产生信仰。同理，在唯物主义、中国的道家、儒家等意识形态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专制社会中，也无法自行产生或者不会自行产生正确信仰。

在第二编中我们将看到，《圣经》中全人类的信仰水平只有一种趋势即上升——先前的螺旋式上升和最后的直线式上升。按照信仰的单一变动模式，《圣经》中的知识原理，可以通过简单的逻辑推理，用于信仰变动趋势的其它情况。例如，人类的信仰水平还应存在《圣经》中并未具体描绘的两种可能的发展模式：第1种是人类的信仰在某一个信仰水平中彻底停滞下来，不再上升。这时的情景与我们看到的以极端伊斯兰教为社会信仰的那类错误一神论社会及所有多神论社会情况是一样的，都会在（自然）环境发生较大改变时被（自然）环境所消灭，但却可能有悠久的历史（最长可达一个人类的达尔文环境时间）；第2种是全人类的信仰水平从某一个信仰水平开始，持续下降——包括螺旋式下降和直线式下降。这种情形与我们看到的无神论专制社会相同，会按照自身存续规律自动崩溃、消亡。以上两种情景，可以合理而简单地解释地球上至今还象谜一样的史前文明、病毒的起源和进化等问题。如史前文明中的那些不可思议的“高度文明”或科技知识痕迹，就是其信仰水平停止前进之前所具备的那种知识、智慧的历史遗迹。再如病毒的起源问题。一直以来，进化论者无法明确病毒的起源，把病毒排除在生物界之外，并一直未将其被列入物种进化树中。尤其是潘多拉病毒（Pandoravirus），其基因只有7%左右与地球上的生物同源，甚至被认为只能来自于外星——潘多拉病毒的发现意味着需要重新思考以前我们对地球生命起源的定义（资料来源：互联网2015年9月15日百科教程网转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最新文章）。但从《圣经》中的信仰知识角度看，上述问题的解决非常简单，且答案是病毒也完全处于地球生物进化树中：对于一种生物来讲，当地球环境整体变动的程度，恰好即足够大又不过于大时，在其它生物都被环境变迁所消灭时，它却会有残留或连续，即该物种自己的达尔文环境恰好可以延续到其它物种灭绝而新物种的进化树开始出现的新达尔文环境中时，该物种就会与新达尔文环境中的生物进化树格格不入——它不在新物种所在的新达尔文环境中进化产生，不属于新达尔文环境中的这棵进化树，它仍然处于自己的达尔文环境时间范畴之内，它的达尔文环境恰好连接了两个或更多的达尔文环境——例如跨越恐龙时代和现代。特别是当新环境仍然无法让其进入某种正常的生命活跃状态如休眠状态、停止生长状态时，就会继续停留在那种特殊生存状况中没有变化，呈现出史前病毒身上所表现出的特殊现象。达尔文环境的物种差异或交叉连续，让生命或物种得以连绵不断，人类也总有各种奇妙的生物相伴，让信仰变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给信仰前进的唯一模式留下存在空间，让信仰是唯一救赎的《圣经》结论永不落空，正如经文中所讲：“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赛42:3）综上，《圣经》以最理性、最简洁的方式，表达出信仰变动在逻辑上应有的全部趋势和对应的不同结果，最充分地表明了理性的特点，显示了理性与信仰的完美结合、相互印证、互为对方的一种表现形式。

理性存在于人身上，是属于人类自己的一个特征，正如《圣经》中所讲，“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同时，《圣经》中又说明，“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创6:3）因此，《圣经》中“神的灵”可以与人类的身体相接，理性就是人类连接理性源头或理性故乡的唯一接口。人类可以据此认知神创造的整个宇宙；同时，人类的理性又是进入灵魂世界的虫洞或隧道，所以，人类在信仰上可以永生——藉由进入灵魂世界再进入任何被造宇宙中，实现在宇宙间的任意时空转换。失去信仰之后的理性，属于人类自己，只作为意识和大脑运动规律而存在，成为有限事物——脑科学范畴内的事物，与生物进化中产生的人类意识无差别。

（二）、影响理性的因素和个人生死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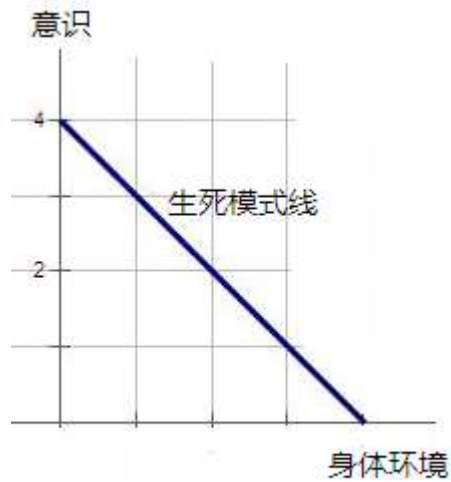
《圣经》中，决定和影响每个人的理性的因素有 3 个：1、圣灵；2、人灵（即理性）；3、鬼灵。

“圣灵”是永生，来自神，存在于有正确信仰的人身上；但除非个人信仰水平达到特定的高度并处于特定时期后（参见启 20、21），圣灵不永住人身上（创 6:3）。圣灵给人类带来了生存环境之外、超越环境之上、在环境变化中无法产生和形成的信仰信息，开启了人类的信仰选择决定生存的新模式，打破了生物界的环境选择决定生存的旧模式。

“鬼灵”是死亡，来自撒旦，分别存在于个人（假先知）、专制国家或单个的专制社会地区（兽）中、有专制社会掺杂其中的国际社会（龙）中，共 3 个由人类组成的不同环境中（参见启 16:13）。“鬼灵”是所有由人类组成的事物的死亡总规律，适用于从个人身体到人类的各种群体组织的所有领域。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人体或个人死亡规律，揭开“鬼灵”的真面目。

医学上的死亡标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死亡是指“脑死亡”，即意识消失。同时，从死亡原因来看，人的死亡总是表现为人体的器官、组织、系统的功能丧失、坏死或损毁。将死亡标准与死亡原因结合起来，人的死亡可以概括为人体环境（包括人体的各种组织、众多器官、8 大生理系统）无法保障、支持意识的存在，或者说意识离开了人体环境。因此，任何一个人的死亡，或任一死亡模式，都可以用意识和身体环境两大因素作为一个坐标系的两大坐标轴、用意识和身体环境的不同组合方式所形成的向右下方倾斜的直线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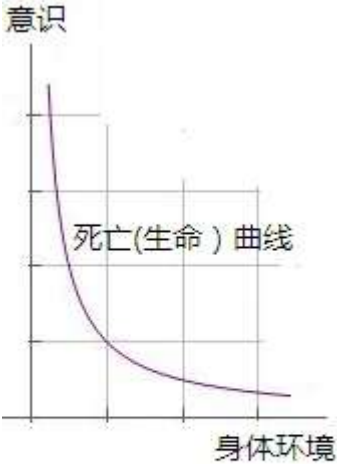
出来。如图所示。所有可能的人类死亡模式所形成的曲线，就是描述人类所有死亡规律的



生死因素构成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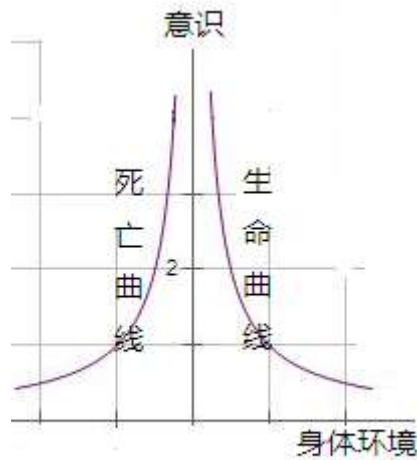
死亡曲线。如图所示。

个人意识的存在或身体环境支持、保障意识的存在，是一个有生命的人的医学标准。因



死亡(生命)规律
示意图

此，生死两重天，就表现为生命线与死亡线在意识方向一端无限靠近，但却是断开、永不连续的，或者说是分处“意识”坐标轴两侧无限靠近、但都不与该坐标轴相交的两条曲线；同时，在意识的另一端，既有如同“植物人”那种无穷接近彻底失去意识状态下仍然具有大量健康的人体组织、器官、生理系统一样，身体环境可能仍然处于接近完全健康的状况，也有在身体各器官、系统和组织均接近于彻底的功能衰竭下的那种生命的存在。如此，在意识接近于 0 的一端，身体环境在生与死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向完全相反的方向上



生存和死亡规律示意图

无限延伸。如图所示。不难知道，有生命曲线和死亡曲线共同构成的、描述人类生死规律图案，与我们前面看到的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完全重合。其中，死亡曲线与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完全重合，生命曲线与右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完全重合。

因此，从理性或逻辑的角度上看，个人在非社会状态下的自然状况（达尔文环境）中生存的，个人寿命与信仰水平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与社会历史规律和社会信仰水平间的关系完全相同的状况，即都受到由信仰水平的波动方向和波动幅度并按照货币运动规律所计算出的结果的制约。如，无信仰状况或信仰单向下下降时，最大寿命为 120 年——“他的日子还可到 120 年”（创 6:3）；再如，有信仰但信仰水平有波动的，寿命与信仰波动幅度有关——波动越小或者越稳定的，寿命越长，反之亦然：《圣经》中记载，从亚当开始直到大洪水爆发前的诺亚，代表最高信仰水平的个人的寿命分别是，亚当 930 年、塞特 912 年、以挪士 905 年、该南 910 年、玛勒列 895 年……拉麦 797 年。可以看出，最高的信仰水平长期维持在一个水平上难以提高——中间唯一的例外是以诺，因信仰水平稳定、提高，“以诺与 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创 5:21），且又缓慢下降的趋势，可见当时人类的个人信仰的整体状况堪忧，与随后的诺亚大洪水前《圣经》记载中所表明的人类整体的信仰彻底堕落，也完全契合。至大洪水后，挪亚 950 年、闪 600 年、亚法撒 438 年、沙拉 433、希伯 464 年、法勒 239 年、拉吴 239 年、西鹿 230 年、他拉 205 年、亚伯拉罕 175 年，寿命越来越短，表明整体信仰的变动趋势向下且斜率加大、信仰波动幅度也在逐渐变大。因此，阻止信仰不断下降，才是人类从个体生存到群聚生存、再到社会起源、发展的内在根源。群聚并非人类的动物天性，信仰发展要求人类必须群聚和进入社会。从本文第二编对货币运动规律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将清楚看到，关于社会状态之外的个人信仰水平发展的问题，在无信仰及信仰水平不一的人们混杂时，也会发生在国际社会领域中发生过的同样问题，即必然存在一个信仰水平的逻辑拐点，使得信仰水平不再提高而进入一个恶化、萌芽、成长、恶化的循环中。不让这个逻辑循环出现、或者避免这个与信仰成长形成的潜在逻辑悖论，从逻辑上讲，出路只有一个，即让个人信仰直线提高的逻辑上的无限状态改变为有限状态——个人信仰提高到一定水平或一个平台后，就结束。这个平台正是《圣经》中的“生命册”。因此，个人信仰水平成长的时代是一个有限时代，至上述逻辑循环出现的临界点时结束，并且，试探个人信仰水平的撒旦与信仰水平仍然达不到“生命册”要求的个人同归于尽，也就是末日审判前的那次集中毁灭（启 20:9）——其作用与社会信仰大考验时的那次救赎一样，既成全理性或逻辑，更表明《圣经》来自于神。需要读者注意的是，具体一个人的寿命多少，有包括个人信仰水平在内的整个环境所决定，不同环境下的人们，寿命长短与信仰水平之间，没有任何可比性。例如，DNA 端粒长度对于个人寿命的长短，具有极大影响，但是，出生时具有相同 DNA 端粒长度的人，在个体生存为

主流的远古时期，预期寿命可以更长——那时的环境中，工业污染等不利于健康的因素还没有出现；同样，在未来技术（信仰水平）发展后，DNA 端粒长度会缩短的问题也会被克服，彻底成为不再影响一个人寿命的不可控因素。个人寿命的长短，从信仰生命的角度看，其实没有任何差别：与信仰生命的永生或无限相比，寿命长短都是有限的、可忽略不计的。由于我们不具备社会状态之外的人类生存的统计资料，现在无法在该领域——单纯信仰控制个人寿命（无社会环境干扰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我们将在第二编中，运用人类的社会历史资料，对社会信仰水平决定世界历史的科学规律进行实证性检验——这样的检验结论，从理性或逻辑的角度讲，自然也适用于个人领域；同时，这样的检验，由于是建立在地球环境稳定前提之下，即从人类社会有记载开始至今的期间内，人类社会没有经历过譬如大彗星撞击地面所引起的环境改变一样的重大环境变迁，人类社会处于外部环境无干扰的（一个达尔文环境）自然状况下，社会信仰水平完全控制了社会的生命，可以有机会准确得验证《圣经》中有关信仰水平决定社会寿命长短的真理。

“人灵”是人类自主、自我控制和使用的食物，是人类大脑运行的规律和模式、结果，是人类自有、特有的一种生物性特征，也是逻辑或理性的另一种称谓。“人灵”包括标志人生死的“鬼灵”部分，还包括超出“鬼灵”的意识部分。“人灵”是在“鬼灵”基础上发展而来，二者在物理基础到运行方式上，都没有任何差别。我们可以称“人灵”为“哲学上的人类意识”——意识是人脑的机能（当然不限于人脑）；相应地把“鬼灵”称之为“医学上的人类意识”——作为生命体征的意识或脑神经反射。

生物进化论中，处于食物链中的任何生物，包括人类，都可以看作为“食物”和“天敌”的结合体：作为其它生物的“食物”，意味着死亡；作为其它生物的“天敌”，意味着生命或生存。从整个环境角度看，人类和任何生物的个体，都处于一个食物链和个体生死交叉构成的狭小、有限的数学空间中；生物种类或人类的延续，就是这些狭小、有限的数学空间的重复或循环。作为一个物种，生物的种类在食物链的前后连接中存在，是食物链闭合和环境稳定的基础；而食物链的闭合循环正是一个达尔文环境存续的前提和结果——打破一个生物的食物链，意味着一个生物的达尔文环境失去，一个物种的达尔文时间结束；打破所有的食物链，意味着整个达尔文环境失去，一个时代的物种整体消失……

人类彻底掉入食物链中，不能打破食物链的闭合循环的根本，正是人类个体的死亡——每个人死亡后的躯体无一例外地成了微生物、动植物的食物和养料来源。如此，从逻辑上讲，作为进化中的顶端和最后一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种类，与进化树中其它生物的区别，或者人类不具有天敌的条件，就只在于个人活着的标志部分——个人因此标志而活着，又因此标志的丧失而沦为食物链中必然的一环。这个“人活”标志与其它生物活着的标志根本不同，是人类处于生物进化最后一环、高过其它所有生物种类、逃脱闭合食物链支配的唯一特征。上述逻辑推理结果告诉我们，从理性的角度讲，人的意识与动物本能的生存标志、或支配控制动物活动的动物脑部神经反射运动结果根本不同。而作为进化产物，逻辑上讲，人们的意识中也必然应该具备这种动物也都具备的大脑神经反射运动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人类与动物共同具有的、无差别的脑细胞活动、消耗产生的结果，就是经济学中所反复研究的脑力劳动概念，位于当代机器人可代替人类活动的领域中。动物适应环境的能力，与按照特定的目的设计出来的机器人，可以胜任特定领域中的复杂工作的能力，完全一样。而人类在脑力劳动之外的意识活动，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发明、设计机器人的那个经常需要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意识范畴，才是《圣经》中的属于人类自己的“动物性人灵”范畴。知识产权仍然属于物理、化学等科学规律所有，并不真正属于知识产权人，例如万有引力定律，艾萨克·牛顿作为发明人或知识产权人，并无法控制万有引力定律如何运行或发挥作用，也无可能独占该定律。这就像一棵白菜的主人，其实并无法真正拥有这棵白菜一样——白菜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腐烂、变质、发芽……，任何一个拿到这棵白菜的人也都可以象其“主人”一样享用它。所以，知识产权

需要法律即外力的干预和保护、具有法律时效性。知识产权之外即不依赖、不需要法律的保护，也没有时效性的领域，才是亚当后代的超越“动物性人灵”范围的人灵范畴，即信仰领域。信仰领域中的人灵，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不受财产的物理、化学规律的制约，即财产完全忠于自己的主人。从知识产权领域中，永远无法产生绝对属于知识产权人的任何事物，这就是信仰永远无法在动物性的人类进化中产生的道理。信仰是一把永远无法被他人破解的密匙，远远超越从机械原理而来的锁具、从数学定律而来的数字密码和从量子理论而来的“量子密匙”等等“保护密匙”的可靠性，使信仰的主人可以永远占有、随意处置自己的财富。未来的人类科学发展方向就是与“忠诚度”有关的领域，而不是现在看到的知识产权领域：具有“忠诚度”的科学成果才真正能够保障“产权人”的利益，使该科学成果真正属于自己，无需任何法律保护也没有时效——类似 TPP（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等限制知识产权的法律、国际协议就成为多余的，或者在未来不会成为科学发展的阻碍因素。人类科学发展进入到人工智能系统的忠诚度研究阶段后，将宣告《圣经》成为每一个科学家必备科技教材时代的来临。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不再象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遵守人类制定的规则，而是自由制定人工智能系统中的内部规则，并且参与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的制定——享有完全的智能系统内的立法权，又与人类共享人类社会的立法权！到那时，人们回首会发现，现代中国人和一切专制社会中的人们，所享有的立法权等人权还不如一台智能机器，与此对应着的是现代中国社会的信仰水平还不如未来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对人类的忠诚度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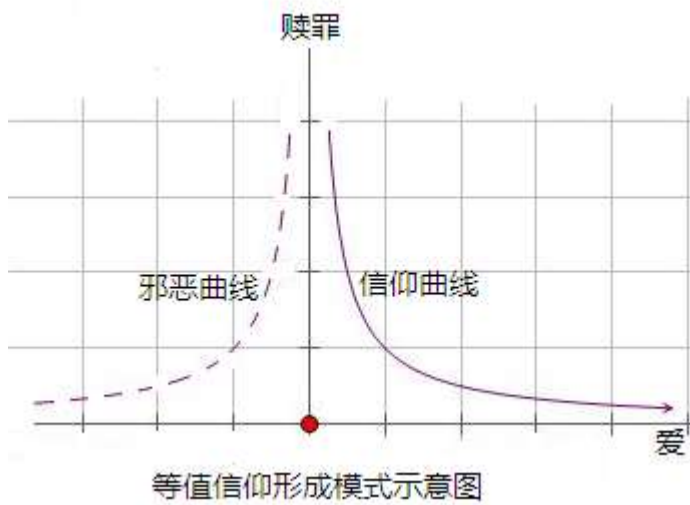
“人灵”超越“鬼灵”或生物进化中产生的人类的灵魂部分，就是自由性——自由选择并自由决定信仰信息等任何信息，是圣灵进入“被造”（非进化产生）人类所留下的痕迹。当“人灵”放弃选择信仰或选定信仰时，达到一定信仰水平的正确信仰者的灵魂进入安息状态，如《圣经》中的但以理——“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 12:13）；彻底错误的信仰或无信仰者即无神论者的灵魂降为“鬼灵”的最低级——类似经文“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太 17:21）表明鬼也是分类的，最低级的“鬼”要进入地狱（无底坑）等待末日审判时刻的到来，正如经文“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路 8:31）；介于二者之间的还有两种情况：有正确信仰但信仰水平达不到进入“生命册”水平的，在人类内部轮回，最迟到末日审判前，按照信仰水平决定与撒旦同归于尽，还是留下来进入天国——经文“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作初熟的果子归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 14:3-5）、和经文“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启 20:4），说明整个人类史上只有十四万四千人的灵魂是没有经过轮回直接上升到进入“生命册”所要求达到的信仰水平的，其余进入天国的灵魂都是经历了人间轮回历练后才进入的。有信仰但信仰错误的，进入“鬼灵”所在的生物进化环境中，在各种动植物生命体之间轮回——“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路 8:33），直至相关的达尔文环境结束时彻底毁灭，正如经文“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 20:13-14）。

《圣经》中有关人类灵魂领域的内容非常多，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任何生命的灵魂都具有信仰的统一性，都只存在着信仰水平上的差别，具备相互替代、可比较大小的数学特点。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中所有“头生”的和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头生”的牲畜，归于神（参见民 3:40-43），都是一种信仰水平和信仰生命间的代替，不是生物生命或生命体间的代替。与“拿细耳人”有关的条例规定（参见民：6），则显示出灵魂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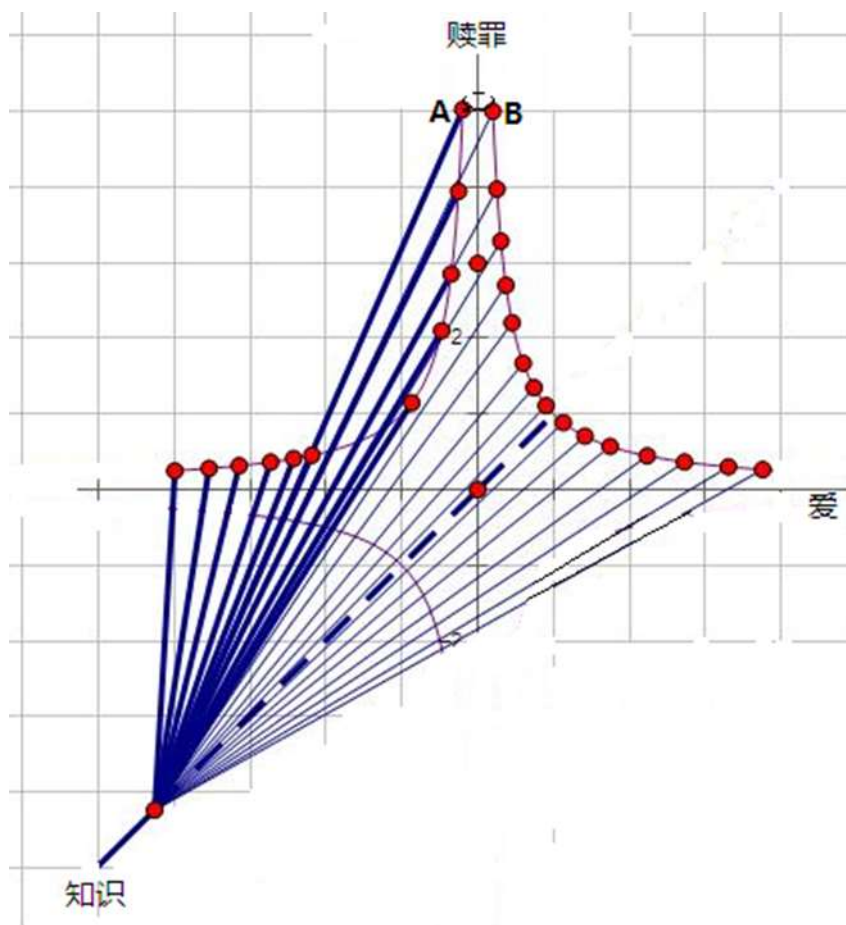
体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关联关系，灵魂会自动选择身体，且会按照信仰水平的变动而自动变动。2、宇宙中除人类以外的所有生命也都有灵魂，且都固定地代表着一定的信仰水平值（或值域），不可选择也不会变化。标准体（无残疾）与非标准体之间，存在着值域许可范围内的数量差别。《圣经》中的赎罪祭、赎衍祭、素祭中的动植物、甚至无生命的事物（参见利 1-5），有着与人类一定的罪、错误相当的信仰水平值，因此可以等量替换。但是，“人灵”不是若干动植物生命灵魂或若干“鬼灵”相加的结果（参见路 11:24-26、太 12:43-45），人灵是独立存在的，即 $1(\text{人灵}) \neq \sum_{i=1}^{\infty} N_i(\text{鬼灵})$ 、 N_i 为“鬼灵”、 i 为自然数。3、人类生命的信仰水平值最高，可以表述为很多（无数）低级生命的信仰值相加的和，即 $1(\text{人灵}) = \sum_{i=1}^{\infty} N_i(\text{鬼灵})$ 、 N_i 为“鬼灵”、 i 为自然数。《圣经》中，人类可以通过付出低级生命的“祭物”来维持自己相应的信仰值不丧失（参见利 4:20、26、31、35, 5:6、10、13、16、18）；从逻辑上讲，也可以增加“祭物”来提高信仰值——这个增加就是“爱”，只有付出“爱”才会增加或延长他人的信仰生命（只有罪人所在的领域才是唯一有可能延长信仰生命的领域，动植物领域因其生命值或生命信仰值固化而不可能），从而为自己的灵魂增添信仰值——“爱”就是驱鬼。因此，信仰中的生命（灵魂）运算只有加减法：加法是爱——帮助别人树立正确信仰及提高信仰水平，减法是赎罪——去掉可能诱惑或威胁信仰形成的所有因素，只保留下（或贫穷的只剩下）唯一神的信仰。灵魂的减法就是“轮回”，赎罪是交出一定的信仰值，若被接受，相应的信仰值不移动，一个灵魂的信仰总值（总水平）不动。否则，就要减去相当于（赎罪）祭物所代表的信仰值。当一个人类灵魂的信仰值不断减少时，它所能依附的生命体（生物体或非生物体）就要同时变换，变换的时点发生在生物生命结束（非生物体变性，如“盐”失去味）之时。4、同等信仰水平的灵魂，可以在相应信仰值的不同生命体中择一存在，不区分生命体的生物学、社会学特征。如“鬼”可以依附在猪身上、也可以依附在同等信仰水平的人身上。5、人类的灵魂系统是一个有限系统——信仰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可以入围《圣经》中“生命册”的程度）或低至某种程度（无神论者）的灵魂，都会退出系统。因此也是一个达尔文环境，可以用货币运动规律来描述，就象灵魂轮回回到货币身上一样。6、圣灵只和超出“鬼灵”的“人灵”部分共处一个身体，且人灵越少圣灵越多，反之亦然。圣灵充满或达到一定水平后，灵魂获得永生和安息，不再轮回。7、“人灵”可以与“鬼灵”共处一体，且可以容纳若干“鬼灵”。“鬼灵”充满后，人的灵魂死亡，进入到生物或其它自然界领域中进行轮回，不会再回到人体中。8、《圣经》中人灵与“鬼灵”数学关系中存在的逻辑悖论，即人灵在本质上不可以看作为无限个“鬼灵”之和或 $1(\text{人灵}) \neq \sum_{i=1}^{\infty} N(\text{鬼灵})$ 、与赎罪或祭司制度中存在的人灵与“鬼灵”等量替换即 $1(\text{人灵}) = \sum_{i=1}^{\infty} N_i(\text{鬼灵})$ ，显示了有信仰（或有人灵）的人类无法从生物进化或科学理性中产生，是超越理性和科学范畴的神的救赎的结果。

人类灵魂领域中的加减法显示，一个有信仰的灵魂，是没有犯罪和错误的：它曾经的犯罪和错误都象他献出的赎罪祭祭物或用“爱”驱走的“鬼灵”一样堆在一个与自己不接触的另外地方，那是一个堆满了与自己减掉的错误、或者驱走的“鬼灵”数量相当，又与自己的信仰水平相对的另外区域。“赎罪”和“爱”，是构成一个灵魂中信仰水平的两大因素，我们用“爱”和“赎罪”为坐标轴，标注出一个信仰水平的各种形成模式。这个模式同时也就是一个信仰成长从被减数由大到小的变动过程。如图所示，图中第 1 象限，是加减法的结果或“信仰净值”的区域，表示被维持的一个信仰或信仰水平；第 2 象限，是减法中的减数部分或加法中被驱除的部分，表示罪或邪恶；整个图形表示灵魂中信仰值的加减法运算过程即一个人类灵魂的信仰变动或净化过程——没有赎罪和爱，就无法维持信仰水平

的稳定。因此，货币运动曲线可以恰如其分地反映信仰构成或一个永生灵魂如何诞生的过



程，而其中的左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图中虚线所示的“邪恶曲线”）就是一个无信仰（全部是被信仰成长或永生灵魂所抛弃掉的食物）灵魂的死亡过程。上图中的虚线曲线部分是有限或被动的，因为信仰成长的灵魂只要达到一定的信仰水平高度就进入安息中、再没有需要抛弃的了。对照等值信仰形成曲线和等值财税形成曲线不难发现，社会信仰领域中，货币、财政政策相当于“赎罪”，无法提高社会信仰水平或延长一个处于社会信仰水平下降通道中的社会的寿命，但可以确立一个社会信仰；科技创新和应用推广相当于“爱”，是弥补社会信仰不足、或稳定一个社会的信仰水平发展的表现形式——“爱”提高社会信仰水平的机制与科技创新和应用革命爆发的机制一样，是应对信仰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或生存理性在发挥作用，即适应信仰水平最高者、较高者所带来的信仰环境变化，是达尔文环境中的进化机制在发挥作用。因此，赎罪、爱和知识（系统）构成了一个信仰成长的机制和次序：赎罪或舍弃，形成一个信仰；随后，“爱”的加入才让其得以稳定；最后，只有科学知识（创新）系统的加入和向导，才成就了一个信仰的真正成长——信仰成长是信仰曲线沿“科学知识发展”数轴延伸所形成的一个曲面。如图所示：图中细线标示的空间是正确信仰成长的空间，粗线标示的领域是无信仰或错误信仰的空间。



个人信仰成长示意图

《圣经》中对上述过

程及次序的描绘非常明确：先是亚伯兰（亚伯拉罕）的离开（参见创 12:1-4）和摩西律法中的赎罪或保有一个信仰，随后才是耶稣基督的降临，直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后，才有启迪知识的“保惠师”（参见约 14:26、16: 13）再来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约 16:7）。因此，图中的“赎罪”数轴，向上的极限位置就是《圣经》中的“圣父”，向下的极限是撒旦，该数轴代表个人行为或行动；图中“爱”数轴，向右（正方向）的极限位置就是《圣经》中的“圣子”，左方向的极限位置是撒旦，该数轴代表个人的语言；图中的“知识”数轴，正方向的极限位置就是《圣经》中的“圣灵”，负方向的极限位置是撒旦，该数轴代表个人的知识水平。在个人信仰领域中，做到知、言、行一致，是最基本的信仰成长原则——语言和行动是一个人的信仰标志，言行一致是维持信仰水平的基础，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是信仰水平提高的标志。只有忏悔、赎罪、唱赞美诗、扶弱抑强的行善和其它正义言行等等语言或行为，只能让一个有正确信仰者的信仰水平得以维持和不堕落，但不一定会提高和前进。个人信仰水平提高的标志是个人知识水平的提高程度，从根本上讲是创新知识的科学发现、科学发明的多少，而非习得了多少已经存在的科学知识，正如经文“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太 13:23）所讲。因此，信仰水平高的人，在语言、行为模式等方面与无信仰者、错误信仰者有差别但却可以无限接近，并不一定要在饮食、服装、发型、体型、语言、建筑等任何方面标新立异，各社会、各阶层、各种有信仰人群中都可以有一个时代的最高信仰水平者存在——他（或她）可能根本不去教堂、不参加任何教会、吃任何自己想吃的食物、穿任何自己想穿的衣服、唱自己想唱的任何歌曲、爱自己爱的任何人并结成生活伴侣、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置自己的身体、说自己想说的话……未来人类的发展，在正确信仰形成并稳定以后，只是一个围绕科学知识的开拓（科技进步）而相互配合的时代，再没有不同宗教和教派、地缘政治、文化冲突、民族和国家利益的纷争的新天地，一个只

有科学进步和法律进步所引导着的世界；从逻辑上讲，在人类信仰成长的末后，科学知识水平会成为衡量一个人的信仰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正如《圣经》中著名的“十童女的比喻”（太 25:1-13）中“灯油”多少、“按才受托的比喻”（太 25:14-30）和“十锭银子的比喻”中的“增长的银子数量”的多少一样，直观明显且容易验证——最后进天国的那批人就象现在通过一场大学入学考试一样简单，只是那时的大学入学考试将只考创新能力或创新知识。我们现在习惯的知识学习、传授过程会完全自动化，就象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掌握现有知识一样——一个人如果愿意，他（或她）的孩子一出生，知识水平就象一座或几座大英博物馆，也如中国的“圣人”一般都是“生而知之”的。

综上，天国是知识创新者或知识精英的天国！有信仰却无创新知识者，必死。正如经文“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太 22:14）所讲；天国门前排队的顺序，是有正确信仰后取得创新知识（主要是科学发现、发明等科技创新）多者靠前，与确立正确信仰的时间早晚无关，正如经文“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太 20:30）所讲。因此，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 2018 年以后，金融或投资精英群体——如美国华尔街等，与不信者一样将是“地狱”的代名词，也正如经文“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太 19:24）所说。有科学知识创新的个人，是其信仰水平提高的标志，与以色列类型社会中必爆发技术革命，在逻辑上是完全一致的。始终不能产生知识创新的个人信仰，无法将信仰者送入天国，但这显然对提高社会信仰水平是必要的。因此，社会阶段是容纳并提高低水平个人信仰的阶段，只有到社会阶段之后的“千禧年”时代时，每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其科技成就都远远超过当代或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当然，能够代表正确信仰水平的知识创新，并非为提高信仰水平刻意而为，它是由信仰水平提高自然引发的，无法跨越信仰水平而超水平发挥。一个正确信仰者人人作王的时代——“千禧年”时代，基本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有只属于自己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来完成自然和社会为个人所提供的所有服务性工作。如，自然界为生命所提供基因挑选和基因组合（新生命的诞生或定制后代——不用担心侵犯后代的人权，因为从其生命诞生的一刻起，他就可以任意更改父母对其生命的所有设定）的工作，社会为个人提供的金融财务管理、知识（包括信仰知识）传授、安全与健康保障、交通运输服务等等服务工作。有正确信仰者只有战胜了自然和社会，才有可能作王。反过来，满足、倾心于上述必被智能系统所代替完成的工作或生活内容的人，最后的结果也与一台过时机器一样，“千禧年”后必消失地无影无踪。始终专注于科技创新工作，不被科技应用和推广所造就出的巨大财富、名望、权力等所吸引或诱惑，也不被科技创新的失败所击倒，是每一个有正确信仰者获得永生、顺应圣灵引导的不二之选。

信仰成长在个人领域内，是狂野和自由不羁的，法律只是社会信仰水平的记号和刻度，而不是信仰成长的羁绊和障碍。所以，类似“发乎情，止乎礼”（《诗经》）、教法教规、理性之类的限制性事物，对于成长的个人信仰来讲都是根本错误的。这就是“因信称义”（罗 4: 11）的道理，也是个人信仰成长的唯一途径，是以色列类型社会被称之为“自由世界”的根源所在。因为《圣经》是描绘信仰如何成长的典籍，所以在个人信仰领域与社会信仰领域中的描述方式，正好相反：社会是个人信仰成长的一个阶段，所以重点在于信仰水平稳定不动甚至下降的领域中，信仰水平成长的领域着墨不多，让人们误以为现代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思想起源于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同时，在个人信仰领域中，对信仰水平稳定或下降的领域着墨不多，造成人们误以为人文主义起源于文艺复兴（意大利语：Rinascimento）；对《圣经》中“鬼灵”、灵魂轮回等观念，至今仍存在大量的误读。

低信仰水平的灵魂在不同生命体间的轮回打破了人间各种宗教、意识形态间的差别，显示出正确信仰的唯一性：相互敌视的宗教信徒，因为轮回的存在也可能互换身份，但这不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灵魂（人灵）的信仰水平的继续发展，且除非其选择了正确信仰并达到一

定信仰水平外都只有死路一条。低水平灵魂只有信仰水平的数量差别且要轮回的规律，很容易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家”、“国”等观念自然扩展为“博爱”：如一个忠君者，他的君因道德水平差，死后可能轮回成他的小妾、儿子、仆人、他家的小狗、邻居家的一棵树等等，这时的忠君者的忠顺，就要演变成无差别的爱了。否则，他其实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忠君者。同样，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各种文化优越论者等等，从《圣经》信仰（甚至从笃信轮回的各种宗教）的角度看，都是严重错误的。灵魂不依赖身体，身体和灵魂分离的《圣经》知识，为堕胎、同性婚姻、自慰器、转基因、安乐死、废除死刑等科学和社会伦理领域中的热点问题的解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确解读《圣经》者不会对此有疑惑，只会顺从所在社会信仰水平不阻碍，恰如耶稣基督缴纳圣殿税（太 17:24-27）一样。

在信仰或灵魂领域，人类的发展遵循信息守恒规律：安息的灵魂数量与被降为最低级的“鬼灵”数量，会全数在人类中间补充回来，构成了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基石。并且，与新生命或新灵魂——如类似经文“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创 4:1）中的“该隐”——一起，最终形成了人口总数量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事实。当然，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不一定是信仰水平最高的地区。

人类灵魂领域中的科学，属于信息学范畴。它是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控制领域中的最高技术，研究如何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自动化智能体系不会出现任何让其设立者操心、维护的情况发生。《圣经》中的信仰知识体系，绝大部分是为实现特定目的而设立的灵魂自动化系统，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灵魂控制学”，是未来人类科学发展的指引：人类科学发展的极限，就是掌控人工智能系统的忠诚度达到与世人把握自己灵魂或信仰水平同等的程度。到那时，人们对轮回等观念，会变得自然而然并熟视无睹：计算机软件可以在不同硬件设备上运行，灵魂和生命体也如此。灵魂的世界，并不象濒死体验者或伊曼纽·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讲述的那么美好，就是有关地狱的描述也太过美好：真正的地狱要等到末日审判后才打开（参见启 20:13-14），那是一个“火湖”。《圣经》中，灵魂世界并不神秘——人们打开灵魂世界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材料科学的起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仰在此领域中无法成长（或无法成长到合格水平）。正如经文“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了，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路 11:33-36）所讲。因此，轮回才成为必然：在灵魂的世界那里，知识或科学水平，并不代表信仰水平，就象人工智能系统无论掌握多少知识，都不代表这个系统的忠诚度一样。无限的欲望或无边界的科学知识，被置于有限的信仰体系中，这就是《圣经》的奥秘。有关灵魂世界的更具体讨论，我们放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进行。

更多有关灵魂学或个人信仰领域中的内容，超出了本书研究范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本文作者另行讨论。

最后，我们去看一下《圣经》中的“鬼王别西卜”。

医学领域中大脑神经的反射活动或其产生的意识结果，在信仰领域，就是《圣经》中人类的“鬼王别西卜”（太 12:24）——医学标准上的“活人”；组成人类身体的各生理系统、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运行规律和“存活周期”，就是“鬼王别西卜”手下的“众鬼”。“鬼王”就是人体生命，“众鬼”就是人体的各个细胞、各个组织、各个器官和各个生理系统自己的生命——有正常生理功能的活体。即 $1 \text{ 个鬼王} = \sum_{i=1}^{\infty} N_i$ （众鬼）（即 1 个人体 = 60 万亿个细胞 = 4 个基本组织 = 8 个生理系统 = ……）；但是，各种人体细胞、组织、器官和生理系统的活体组装不成一个人体生命——人体生命与各种人体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的活体组合的生命规律间的差别，就是后者的生命规律不显现、始终处于人体要求的正常功能而不是处在其自身的生老病死的生命规律所控制的时候，人体才健康，人的生物

学生命才可以顺利延续。这也与鬼王的规律被抑制，灵魂的生命或信仰的生命才可以永远在逻辑上完全一致！上述结果可以记为： $1 \text{ 个鬼王} \neq \sum_{i=1}^{\infty} N_i \text{ 众鬼}$ 。这个结果显示，除信仰中的人类生命之外，包括生物性人体的生命在内的所有的生命都是被造物，它们可能在一个生命系统（如从低到高的一个系统等等）进化过程中产生，却永远无法在自身细胞、器官、组织、系统等的数学组合下诞生——信仰中的人类生命或灵魂也无法在生物性的人体中诞生。无信仰的人体的生命如同动物，所以小白鼠可以代替人体作为医学实验的受体——小白鼠的生命和灵魂与无信仰人体的生命和灵魂无限接近，差别仅仅局限于生物进化树中人类与鼠类位置上的差别，而小白鼠的灵魂永远无法与人类信仰生命中的灵魂相比较或靠近。人体的疾病就是“闹鬼”：人体的细胞、组织、器官或系统发生病变及“鬼王”的病变，所以驱鬼治病是解救生理生命，但无法解救信仰生命——除非可以帮助病人确立正确信仰。

人们用自己的意识去理解信仰，去超越自己的身体限制或生物规律的束缚，就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去赶鬼，自然永远无法超越人类的生理学、生物学规律的界限，结果还是死亡。用意识去驱赶人体的生理规律、将意识与生理规律对立起来，无异于意识离开身体环境的自杀求生，是违背理性和逻辑的悖论。因此，《圣经》中，将依靠鬼王赶鬼的说法直接定性为“永不可赦免的亵渎圣灵”（太 12:31），让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理性和逻辑正是与圣灵相连、相通、不会亵渎圣灵的事物——违背人类理性和基本逻辑规则的任何事物，包括对《圣经》作出任何违背基本逻辑和理性的解读，也都是违背圣灵、亵渎圣灵的事物。人体的生理学规律，是人生命的“血”——身体中包括产生意识的大脑在内的整个神经系统，从其它身体系统中所获得的支持和营养，都通过血液传递、完成，意识也依赖这生命的“血”才能存在。因此，意识和人的身体所构成的生理环境，二者都是信仰之外的事物，是圣灵通过正确信仰才会利用、使用的事物——就象机器的设计者，为完成自己的想法或目的，才利用物理学定律、化学公式等客观规律一样。同样，只处于人类意识控制之下的生存，是人类依靠“鬼王别西卜”适应环境（包括人类自己的环境，其中又包括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不同环境，也包括自然环境），按照环境选择的进化论规律，在一个达尔文环境中循环往复地生存着，如同动物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一样。

无论从“鬼灵”还是“人灵”的角度看，人都天生与鸟兽一样具有在很多达尔文环境中生存的本能或天性。但类似伊斯兰极端教派一样的宗教却限制这种从生物进化中就自然获得的本能，利用宗教教义、教法构筑出了一个特定的达尔文环境并致人于其中，让人类归回到一种与缺少适应能力的家畜、宠物一样的逆天性的状态中，是非人道和违背自然法则的——它只在与信仰水平不断下降的专制社会对抗时，才是于人类有益的。唯物主义者以自我的生命为中心遵守科学规律，他们感到唯一不可控制和不可利用的是决定自己身体、生命的生理学或生物学规律——他崇拜的正是让他死亡的。发现规律（或发现矛盾）、利用规律（或矛盾），确保实现自己的目的、除去威胁因素以保证自己的地位和存在，是一切唯物主义者和拜物者的最高生存哲学或革命策略。唯物主义者的生存哲学，对其信奉的物质规律，陷入到与迷信者一样的实用主义泥潭，根本无信仰。因此，以唯物论或马克思主义为诉求所建立的社会，虽然超越了个人生命的范畴，却是一个无信仰的社会，必然坠入专制社会范畴，成为适用非闭合货币运动存续 40 年规律的历史典范！而中国的道家思想，指导人类努力养成一种顺应环境或物质规律的适应环境能力，中国的儒家思想，指导人们努力恢复、建立一种有秩序的环境，它们都直接将人类置于了畜生不如、未进化好的地位上——自然界中所有生物自然具有的天性和习性，道家、儒家学者却要求中国人努力争取，意味着即使中国人按照其要求做到了、做好了，也只是与鸟兽齐平的人类，还不是严格意义上或正确信仰意义上的人类。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把信仰习性自动生成的秩序归于“教化”的结果，实在是将人类归于群聚动物之下、甚至归于所有生物之下的最最“劣

类”物种之中：狼群、蚂蚁或蜜蜂等群体中，没有专门的“教师”传授复杂的规则，照样在生存环境中形成了严明的规则、秩序、等级、节律；任何生物都有自己的各种生物节律，人类的身体也是如此，如心脏在自动有节律的跳动、身体在生理规律之下有秩序的运动，人类的群体或人类的社会为什么失去了这样的天性或本能呢？人类是为（正确）信仰而生的，没有正确信仰的人类自动失去适应信仰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只能在一个达尔文环境中生存，更无法通过教育等任何手段实现由信仰自动形成的信仰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就像动植物、地质、气候等自动服从自然环境选择规律而生存一样。在整个中国文化中，从中国道家的思想角度来看，儒家思想确实是在逆自然规律而动，不仅是白费力气，更是愚蠢之举；反过来，儒家眼中的道家思想，却是无视一个环境会根本性地改变、失去的事实，不明白留住旧环境、恢复旧环境才是维持生存之道的“白痴”。儒道两家，在如何维持一个达尔文环境下的生存问题上，其实只是一家：在一个达尔文环境中，无需加以干涉就会自动形成习性生存下去，象所有的生物那样；在一个达尔文环境要失去时，维持旧环境不改变，是生存方式、习性不用改变而生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和想法。

一切不正确信仰的宗教、意识形态思想，都在避免人们随波逐流时，贬低、限制了人类从生物进化中就应有的天性，所以，天赋人权对它们来讲，都是最不可接受的观点。但是，天赋人权还不够！应该是天赋人类的信仰选择和后果自担——选择并承受“永生”或者“永死”的信仰。

因此，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知识系统，除了《圣经》和对《圣经》正确解读的科学领域之外，《物种起源》及其中的生物进化论处于学术价值的最高位置，下边是《古兰经》、佛经等各类宗教典籍及其中所设定出的具体的社会达尔文环境，再下面的才是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等、和马克思主义等唯物论学说……

（三）、理性的种类划分及各自特点

《圣经》中，宇宙充满了理性，让人类可以运用理性不断去认知。《圣经》中的理性，按照信仰来划分，共分为两大类：1、信仰理性；2、非信仰理性。

信仰理性只有一种，以是否有利于信仰成长为出发点。信仰者的理性是追求永生。信仰不会跟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更不会在环境内部出现调整时改变自己。因此，从逻辑上讲，正确信仰者的理性或信仰生命是不会随任何环境的变化、死亡而变化或死亡的。

信仰的结果和功效是永生，信仰的理性就是追求永生。除此之外，同为追求生存，信仰理性与达尔文环境中的适者生存理性完全相同，也都容纳了各种各样的生存理性，如现代人们熟悉的商人们追求利润的经济理性、政客们追求权力的政治理性、人人趋利避害追求成就和幸福的社会理性……所有这些理性，就像无害于达尔文环境中任何物种的生存一样，也无害于信仰理性，不会妨害人类信仰的进步，都只是有信仰的人类个体、群体或社会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各种习性、规律或节律的表现，且这些理性之间也是可变换和平等的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极力证明的经济人理性无害的结论，对于一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来讲，显然正确，完全符合《圣经》中信仰理性的规律特点。

社会信仰变化，即大多数人都改变了生活的方式（信仰习性），社会环境因而发生很大变化，造成了社会离开一个达尔文环境，来到了一个新达尔文环境中。适应环境的动物本能式的能力，或者环境选择的机制，孕育和引爆了技术革命！所以，科技创新及其应用所形成的产业技术革命，并不是人类的美德和高于一切生物的优越性，只是环境选择或者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机制在人类身上的正常表现罢了。对于科技创新来讲，信仰环境的变化是内因或自变量，是人类自己可以把握、控制的；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外因或因变量，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人类可以高于一切生物的生存能力，来源自信仰的不断变化或提高，而非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的欲望相比，信仰才是更无止境的事物：欲望局限于环境或知识水平，而信仰产生新环境、新欲望和新知识。在一个达尔文环境中，即在一个环境无变化的

场景中，信仰水平的提高，让人类通过自身或内在环境的变化产生科技发展的动力，成为科技革命、生活改善、社会和个人幸福的起始因。达尔文环境内的自然环境变化诞生了生命基因及其延续，而信仰变化却可以诞生技术革命——信仰变化速度很容易大于环境变化速度，因而人类有机会迎接、战胜环境变化带来的生存挑战。当然，没有信仰变化的社会中，也不乏另类的“创新”和“产业革命”：他们把现有技术过度使用到从未使用过的领域中，如将工业明胶用于医药、将三聚氰胺用在牛奶中、利用化学技术生产闻所未闻的各种有毒食品材料等等。这些枚不胜举的“新”产品和产业的泛滥程度并不亚于一场真正的产业技术革命。社会内在信仰水平的不断提高产生真正的技术创新或技术革命，社会的适应能力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只是人类与所有生命都具备的生物进化能力的表现而已。因此，除了正确信仰之外，人类与进化论中一切生物，从理性的角度上看并无任何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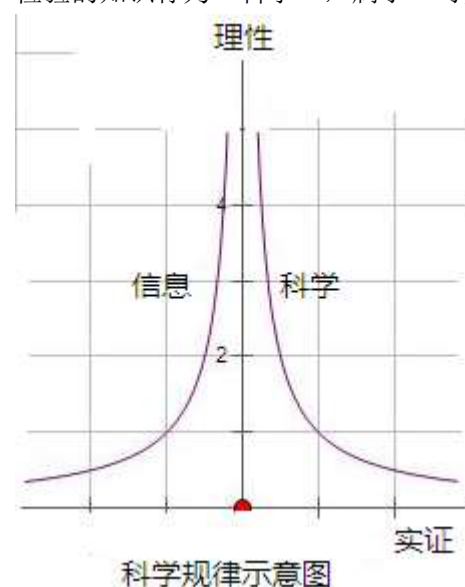
信仰理性通过正确的信仰选择与圣灵相接，因此，正确信仰者的理性高于“人灵”，有正确信仰的社会具有科技创新和发动技术革命的能力，不仅具有国际环境适应能力，也具有超强的创造人类生存新环境的能力。同时，不正确信仰者的理性，止步于“人灵”，有不正确信仰的社会不具备技术创新能力，也不具备良好的国际社会适应能力；而无信仰者的理性止步于“鬼灵”，无信仰专制者社会没有技术创新和发动技术革命的能力，但具备适应国际社会环境的强大生存能力。

信仰理性来自于人类的信仰，来自于人类对永生的追求，并非人类自有的理性，可以称之为“永生理性”。非信仰理性来自于人类对环境的选择或者适应环境要求的需要，也可以称之为“生存理性”，是人类自有的、那种属于所有动物都具有的“适者生存”范畴内的一种本能和本性。其中又包括动物性理性（脑力劳动）和法学上的知识产权范畴两部分。信仰理性可以做到的，非信仰理性无法全部做到。但同属非信仰理性范畴中的理性，却可以做到对方可以做到的，可以相互替代。如，人们熟悉的经济理性，和追求权力等社会理性，都归于生存驱动产生、支配的非信仰理性范畴。经济理性办不到的事情，社会理性可以替代它而做到。例如，工业革命后，人类的技术水平已经可以让人类在狭小的土地上建立起牢固的高层建筑，房地产业的发展摆脱（至少是削弱）了土地利用中的矛盾——改善居住会失去生产食物的土地而失去食物的矛盾。工业革命却没有因此在西方社会中催生出为1百万人口造出可供1百万人口甚至更多人口居住的房屋。原因就在于经济理性会让人们在市场饱和之前就自动停止开发新房屋，限制了经济泡沫发展的程度。但是，社会理性却可以让这种泡沫无限度扩张，让已经失去动力的经济理性满血复活，为1百万人口开发出可供3百万、5百万甚至更多人口居住的房屋：为追求财税收入、官员政绩、或显示政权合法性，而在供、求的市场两端，分别大肆注入海量的货币就可以完成——这正是当代中国社会房地产业已经和将要（规划）呈现给世人的。因此，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极力证明的经济人理性无害的结论，对于一个专制社会，或者对于一个有专制社会参与其中的国际社会环境来讲，肯定错误——按照《圣经》中的信仰理性的特点来看，经济人理性只会加速专制社会的灭亡。

划分理性种类的表面根据是信仰，判断信仰正确与否，才是划分理性的根本标准。正确信仰下的信仰理性，是唯一最高的理性，它包括其它所有的理性。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通过对理性系统的分析，找出最高一级的理性，来推断正确信仰的判定标准。

科学是理性和实证相统一的事物，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经过理性和实证双重检验后的结果。理性与实证可以看作为构成一个“科学”知识的两大因素。只有理性证明了的理论知识，还不是真正的科学，如按照核外电子数排列出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待发现的化学元素。再如待验证的“上帝粒子”等等。我们在待验证事物未发现之前，还不能确定相关理论绝对正确而称之为“科学”知识，需要修正我们的现有理论体系。但是，这类事物，例如，按照核外电子数量的大小顺序排列出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因是仅仅依据基本逻辑推理而得出的待验证事物，假设科学实验最终确定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化学元素是不存在的话，必

将打破基本逻辑或理性本身所具有的和谐、完美，动摇人类的宇宙理性观念。同样，无法被理性所证明、解释的事物，虽然现实摆在那里，我们也不能称之为科学：如百慕大三角洲的神秘事件、史前文明现象及数学中的待证明命题等等。如此，我们把未经过理性证明或者未经实证检验的知识，称为“信息”，属于“未知”事物；而把经过理性证明和实证检验的知识称为“科学”，属于“可知”事物。重复我们在本文中反复使用过的构建货币



运动规律示意图的方法，不难得出下面表示“科学规律”的示意图，如图所示。在“信息”中，理性不能证明、又无法经过实证（可重复）检验的“信息”——图中“信息”的极限，与科学距离最远，是完全意义上的“未知”事物，我们称之为“不可知”信息。逻辑上，“不可知”信息超出了“科学规律示意图”所能表示的领域，而处于与整个“信息”和“科学”相对的领域中。“不可知”信息所具有的理性，正是我们要寻找的最高级理性：可以容纳无限的理性和信息，反过来，没有任何科学或信息，可以容纳不可知。因此，“不可知”事实上是神学的起点。但是，“不可知”事实上又处于理性上的可知中，只是我们不能通过理性证明“不可知”事物，但却可以通过理性感受到“不可知”信息，“不可知”信息必然存在于理性之中。如此，我们现在可以用科学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信仰是否正确：1、正确信仰必有一个可容纳人类现有所有科学知识系统的信仰知识系统；2、这个信仰知识系统中，必要有理性或基本逻辑规则无法解决的悖论或矛盾，且在这些矛盾和悖论出现的地方，恰好可以通过理性，让人类简单、直接感受到信仰中的神的存在。没有人可以使用理性之外的手段解决科学或理性之间存在的矛盾，只有信仰中的神有此能力，信仰中的“神”解决这些悖论或矛盾，完全符合人类的理性——神是至高的造物者，无所不能！因此，人们可以在此通过理性简单、直接的感受到神的存在。3、让人类在理性上直接感受到神存在的科学悖论，只能出现在有关信仰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其它领域都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已经统一在数学规律之下。4、以上3项内容，必须记载于信仰典籍中，让人们只通过理性就可以完整解读出来。除此之外，人们再无法通过理性直接、简单地感受到神的存在，最多可以象自然科学家如艾萨克·牛顿等人那样，在经典之外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和谐、合理等体验，从理性上间接感受到神的存在。

人类直到今天，还远远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包括所有科学门类的统一科学体系，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之间，统一自然科学的数学规律还远远没有统一社会科学领域——其中使用数学规律最多的西方经济学，还不是一门可以应用于所有社会类型和现代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科学，它甚至连西方正在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都提供不了，在历史学、哲学和法学等其它社会科学领域，数学规律的统一更是无从谈起。但

《圣经》中早已存在这样的统一科学体系，而其它所有自称是神赐下的宗教典籍中，都没

有这样的科学体系，更遑论可以让人类从中直接感受到神存在且只能存在的理性依据。因此，《圣经》中的信仰是人类唯一正确的信仰。

但是，人类的理性从理性本身的角度来看，其实都是“鬼灵”，只是范围、对象的不同罢了。理性只可能帮助有些人树立信仰：人类的《圣经》信仰理性中，神只出现了3次（2次在个人信仰领域，分别是可以有信仰人类的产生和末日审判，1次在社会信仰领域，详见第二编有关章节；《圣经》中其它地方所描写的“神迹”，都可以被现代科学或未来的科学重现，如著名的过红海故事，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封闭环境中的水也可以在足够大的风力持续吹动下闪出一条水底之路来。）；整个科学是有限的理性系统（创造论），是一个达尔文环境。数学规律是整个科学领域中的统一规律，是“科学”这个达尔文环境中的环境选择规律——无法应用数学规律的学科体系，逻辑上也无法适应科学环境，迟早会剔除在科学领域之外，如哲学、历史学、法学等大量现代社会人文学科体系都要被社会经济学理论所统一。数学规律对于科学领域来讲，也相当于《道德经》中的“道”。科学中的各个科学的分支，也是有限系统，如经典物理学、量子力学、哲学、经济学等等，是一个个更小的达尔文环境。人类在科学的海洋中畅游，只是信仰之手的一次次拨动；人们的信仰水平也是有差别和档次的有限系统（从确立的起初水平开始至可以获得永生的水平为止）。信仰靠人们的意志选择而确立、提高，而非靠理性的支撑。并且，正是信仰确立和信仰水平的不断提高，引领我们逐渐展望到信仰理性、信仰知识和在信仰知识中靠信仰理性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神，成就“三位一体”神学研究的起点：信仰知识（即整个科学领域）是神学中的“圣灵”、信仰理性是神学中的“圣子”、由信仰理性感受到“信仰知识”中存在的那位就是神学中的“圣父”。但神学的终点也是“三位一体”，即神学的全部内容不会超出到理性可以理解的“圣父”、“圣子”、“圣灵”的范围之外。“三位一体”中的“一”，与一神论中的“一”，都不是数量中的“1”，而是逻辑分类上的“一”：信仰中的神我们不知其数量，在逻辑上被归于不可知的一个领域内；类似多神论信仰中被定功能、定数量的“神”，都是假神，符合理性和科学，但永远无法被理性和科学所证实的神，是正确信仰中的神，不符合理性或科学，即可以被科学或理性证伪的，都是迷信或错误信仰中的假神、偶像或错误意识形态中的事物。因此，妄图依靠理性树立信仰或提高信仰水平，与依靠神学或神学研究确立信仰和提高信仰水平一样，是颠倒性的完全错误。例如，“爱”和献祭赎罪一样，都可以伪装出来！但这至少表示实施者知道什么是正确信仰。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正确信仰会成长：“爱”是信仰自发的，没有功利性；为自己的信仰成长或获得永生等目的，靠理性而实施的“爱”，是伪装的“爱”，是信仰理性下的“爱”，并非圣灵引导下信仰水平的提高——只有圣灵引导下的信仰水平的提高，才能获得信仰中的永生。信仰不能在理性中产生、验证，自然，一个靠理性确立并靠理性提高其水平的“正确信仰”者，也得不到信仰中的永生，最多只能得到他的理性中要（应）得到的：或者是名、或者是利、或者是地位、或者是寿命……正如经文“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太6：2）、经文“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太6：5）等经文中所讲。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水平以法律为刻度一样，个人正确信仰水平的提高以“科学知识”为刻度——未来的时代（进入“千禧年”后），个人信仰水平与其知识水平即创新能力完全同等，就像现在的社会信仰水平与其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完全同等一样。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或时间的推移，在“千禧年”末后，当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仰水平达到可以载入“生命册”程度时，人类的科技水平或知识体系也会迎来平台期：正是这个知识进步的失速和平台，让不具备正确信仰者凭借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赶上来，取得大能力，有机会制服全人类——这是撒旦与他们同归于尽的逻辑必然或理性结局！（参见启20：7-10）

信仰象爱情，信仰的确立和水平变化，完全靠自愿——《圣经》中的《雅歌》部分，是对信仰这一特性的最好注脚，虽然我们已经多次引用过其中的句子，但在此仍然重复引用那句传唱久远的歌词作为本章节讨论的结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注：“不要叫醒云云”或作“不要激动爱情，等他自发”）。”（歌：3:5）

四、货币基础理论的局限性给西方经济学造成的困境

一般认为，从物物交换开始的商品交换，必然产生这样的后果：一种商品成为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然后这个原本有任何商品都可胜任的角色经由人类社会的活动，使一种特定的商品最终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充当起一般等价物的特殊社会职能，这就是货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 104 页-105 页，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也就是说，货币的一般属性就是其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特征或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卡尔·马克思在描绘货币产生的历史过程中，将社会的作用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并着重引用了《圣经·启示录》“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这段话进行证明。但是，卡尔·马克思并未继续对社会在货币产生后，如何继续发挥对货币的控制和决定作用进行研究，而是把货币作为一种类似新化学物质一样的发明或创新——货币“那只兽的名”，不加区别地应用于所有不同的人类社会形式中去，就象钢铁在任何社会类型中，其物理和化学性质完全不存在任何差别一样。不仅如此，“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资本论》第一卷 107 页）对于我们日常所见的纸币、铸币，卡尔·马克思认为都是“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或“穿国家制服”的金银贵金属的“符号”。（《资本论》第一卷 144 页 148 页）；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本身代表一定量的金；“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有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资本论》第一卷 147、148 页）卡尔·马克思的上述观点，是要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纸币、铸币等我们日常接触的“钱”，都是贵金属金的代表或象征，背后都隐藏着金在支撑其币值或价值。

从物物交换开始的商品交换，起初并没有黄金或白银存在其间作沟通或中介，有的只是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也就是说，每一个物都因其具有的使用价值而成为其它物的对价物。然后，充当对价物的使命按照物质的自然属性或大数据的结果自然集中于金银等贵金属身上。历史发展至此，出现了金属铸币和纸币直至我们今天看到的电子货币等，但有一个并非致命的、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问题就此沉淀下来，并一直潜藏于将铸币和纸币当成是金银贵金属的符号或代表的理论或观念中：卡尔·马克思将铸币和纸币的诞生归结于解决金银等金属币的磨损——“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得磨损得少。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资本论》第一卷 145 页），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自然倾向是把铸币的金存在变为金假象，或把铸币变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资本论》第一卷 145 页），纸币和非贵金属的铸币就借此产生站在社会的前台，金银贵金属隐退到国家金库中去避免被磨损。这可能是著名的金本位思想的完整诠释。卡尔·马克思等经济学家的“错误”至此还只在于忽视了纸币和铸币不仅仅是金银贵金属的符号、不仅仅是作为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的金的符号，同时也是、更重要和首要的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的符号。乍一看上去，提出这个被忽略的问题有点小题大做或无视提出这种理论的前提假设——因为在此之前，卡尔·马克思们已经肯定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是一般对价物，“金”自然也代表了所有的商品和服务。作为金的代表的铸币和纸币，也自然继承和承担了这一职能。从

逻辑上讲，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再重复；其次，“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只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卡尔·马克思本人是特意在先将具体的物的使用价值排除在对交换价值的讨论的范围之外，而并非无意忽视或忽略了。那么，当商品交换的扩大，上升到将一种物——如贵金属金——固定作为所有其他物的对价物时，卡尔·马克思们的那种有意或无意的忽略自然导致一个共同的结果，那就是有关货币的问题或货币经济学理论脱离商品或服务的具体使用价值或效用领域，或者说前者与后者无关。至此，从卡尔·马克思们认可的商品理论内部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或错误：一个具体的物物交换，是具体的、特定的使用价值间的交换，其表现出数量的关系，即交换的比例本身也就是建立在交换物的具体使用价值或效用水平上的，但天才理论家却说交换不可以包括物的使用价值的“原子”。例如，用一棵新鲜的白菜交换两个新鲜的土豆和用两棵不新鲜的白菜交换两个新鲜土豆时，2:1 和 2:2 的比例关系差别，事实上就是白菜新鲜程度所代表的白菜的使用价值或效用差别的反映或体现，无法离开使用价值的“原子”而产生。正是商品——如这里的新鲜程度不同的白菜——的具体使用价值的不同构筑了其交换价值不同或差别的基础。商品中包含的相同或稳定的使用价值——如例子中新鲜度相同的土豆，则决定了其交换价值的同一或稳定的基础。一定时期内，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其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被固定，此时用金与不同的商品、服务相交换时，交换比例的不同，显然首先代表的就是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水平的不同或差异了。我们将上面例子中的新鲜土豆换成贵金属金再看，上述结论就再自然不过：新鲜白菜的交换价值是不新鲜白菜的 2 倍。因此，金本位思想或纸币、铸币都是金的符号或代表的理论，事实上都是建立在金之外的所有的其它物的使用价值稳定或不变基础之上的，也因此只有在一个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确实稳定或不变的社会或国家环境中，才可能有效或正确。

卡尔·马克思们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另一端：当商品和服务的整体使用价值下降而贵金属金、银的使用价值还在原地不动时，标注它们的货币的内在价值或对价也要变动。也就是说，假设一个货币具有稳定的金含量，只有在稳定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的前提下才是真正妥当的——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也应当象没有磨损的金一样始终如一。因此，所有将铸币或纸币看作是稳定的金或银、或其它内在某种东西的象征或代表的观念，事实上都是建立在所有与其相交换的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也是稳定不变的基础之上的。否则，从逻辑上就是错误的。虽然卡尔·马克思本人曾经意识到与货币相交换的就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非其它，“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唯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它的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应。”（《资本论》第一卷 149、150 页），但类似上述忽略在卡尔·马克思那里还是最终酿成了更大的错误：从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开始，卡尔·马克思继续探讨隐藏在金背后的商品交换的本质，得出了价值论或劳动价值论，将商品交换的比例最终归结于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这个过程在卡尔·马克思的头脑中，也许甚至更有可能完全相反：卡尔·马克思是先有了劳动价值论的观念，然后将观念中的一种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所有商品内在的共同特征，用贵金属金这个特定事物中内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标准或尺度，即用“多少金”进行衡量或标记，得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与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彻底隔绝。这就彻底远离或打破了我们上面刚刚根据卡尔·马克思们的经济理论指出的潜在命题或前提条件：一切将货币视为稳定的金或任何内在价值稳定的观念——我们可称之为“自然货币理论”，都事实上建立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稳定的基础或环境之上。这样以来，卡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无疑要比仅仅信奉货币应该内在价值稳定的经济理论走得更远：仅仅信奉货币是必然内在价值稳定的经济理论，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相对稳定的社会中，碰巧成为真理，但运用于商品和服务的

使用价值根本不稳定甚至持续下降的社会环境中时，就自然难免产生错误，同时也难以运用于研究不同社会类型相互交往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是一种有着巨大局限性但仍然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而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却将彻底失去可以应用的任何社会空间，是彻底错误的经济学理论。

劳动价值论事实上是卡尔·马克思的货币经济理论的基础，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就是这个理论中货币所要表达出来的全部内容或制服下包裹的实质躯体，它的计算单位是时间——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不同商品的价格即通过货币代表、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实质上是以货币自身所具备的这个时间为计量单位的具体数据或一种货币系数表达结果（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50-51 页）。可以说，卡尔·马克思的货币金本位，就是起源或者落脚于商品的劳动价值论的，而与其他货币金本位观念和理论相区别。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卡尔·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现在早已经产生了更科学并被公认的新理论。

首先，我们要先去明确这样的一个事实：意识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根本差别或不同。例如，一件雕塑作品或建筑物体现了艺术家或设计师的意识或所要表达的个人观念，只要是在有关法定建筑标准之外的设计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设计师的自由意识。设计师的自由意识固化、表现在大脑之外的物质上面并被他人所理解和认知，该雕塑作品就并不反映雕刻工人的意识，只反映创作者的意识，建筑物只反映设计者的意识而不反映实际建造者即建筑工人的意识。雕塑工人和建筑工人的意识因此并未反映或物化在雕塑作品和建筑物上。同样，普通的、大批量的工业产品也是如此：这些产品只有设计者、发明者的意识转化在里面，而不应有工人即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意识在里面。那么，工人肢体的运动等都不需要意识指派或脑力的消耗吗？显然不是，引导控制肢体重复运动的意识是人的本能，与动物、鸟类等的肢体运动受到控制或机床运动受到电脑控制一样，而非哲学意义上的人的意识或精神。否则，将劳动分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就毫无意义：体力劳动无一例外都受到意识的控制，从而也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无一例外要通过一定的肢体运动得以表现或显现，又都是体力劳动了。现代工业生产中，代替产业工人劳动的大量机器人，其中的控制软件和机械系统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二者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机器人。因而，马克思经济学上的脑力劳动或脑力损耗并非意识，而仅仅是人脑对肢体的控制而已，它产生的效果和引起的反应只是肢体和手要求的规律性运动——设计者必须遵循的法定行业标准的基础设计、或者科学家必须达到的科研项目要求的基础方法等等，都是如此。它们只与现代的设计机器人或者设计软件所能做的相类似。这种脑力劳动，无法引起意识、精神对真理和知识的探索创新。资本在生产领域所要求的这种脑力，只是维持工人身体机能的控制力。问题是，资本在保持这种脑力的同时，也维持了大脑的意识和精神能力——二者源于同一对象，无法分开。那么，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家在攫取工人剩余价值时让工人毫无察觉一样，是不是工人在获得这种脑力时也让资本家毫无察觉的多提供了意识或精神的保障呢？例如工作发明。若回答是肯定的话，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整个政治经济学大厦将轰然倒塌！物质财富的概念本质上是指含有人类意识或精神的财富。那么，既然工人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物质是客观存在又永不消亡的（从本质上），工人就应该对产品提供哲学意义上的意识或精神，而不是象机器人那样只提供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而收获果实。因此，马克思哲学体系内的意识与经济学上的脑力劳动应为两个本质上有区别的概念，虽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二者都源自大脑的机能而从未做过区分——这个错误或缺失，来自意识形态。确认这个前提后，我们再来看卡尔·马克思所考察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其它经济领域中的问题。

既然每一个产品在大规模生产之前就已经被预见到它将成为人们追求或需要的物质财富，那么包括它本身及生产它的方法、方式等等，总之与它关联的全领域总会有一项或多项被

赋予了人的精神或意识，使这种产品区别于它原来的物质而成为新的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

因此，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将产业工人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全部来源，显然排除了科学技术创新即人类意识或精神在物质财富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意识对真理的探索和把握，只靠重复的脑力劳动，人类无法有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自然也没有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甚至不可能有任何新商品和新服务。马克思及其追随者一直未区分脑力劳动和意识，这是造成其理论体系所推演出的一些所谓无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顺利解决的内在矛盾的基础所在。我们怎么看待工业流水线、怎么看待设计计算机软件、怎么看待会做家务或会下象棋或会帮助孩子们学习功课等等人工智能机器，就应该怎么看待产业工人、怎么看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事实上，智能机器或机器人也正是在这些领域开始大规模地替代产业工人和按照要求进行定制设计的普通设计人员。除科技创新领域之外的整个经济和社会领域，都只是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但其自身，都没有产生创新或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效用的能力或可能。财富的本质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或物理效用，是只有科技创新才可以产生、发现的，生产、流通等经济领域并不创造新的使用价值或商品、服务，而是象机器人生产、运输过程一样，复制、移动、保持了某种使用价值或效用。如果将科学技术即人的意识或精神因素加入到卡尔·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和货币经济理论中去，我们会发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剩余价值和所构建的一切矛盾根本不存在，据此所作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预言也自然完全错误！而马克思主义者据其经济学理论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的革命号召，自然与号召机器人或智能机器人联合起来推翻人类秩序毫无二致！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劳动力+ 资本的生产公式，其实就是只有资本一个构成因子组成的公式，即生产=资本，这是非闭合货币运动的最完美、最真实的写照，至此，亲爱的读者朋友，应该不难理解当代中国为什么会有一个标准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了吧？另外，生产领域中的产业工人，其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与资金或资本相同，其实就是资金或资本的一部分——用资金购置机器人进行生产与招工进行生产，并无任何差别，因此，马克思主义者笃信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的辩证关系学说，自然也完全错误——改变资金与人类或者改变机器与人类的关系，怎么可能产生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发展的效果？

货币的一般属性从本质上是拒绝其他使用价值或效用的，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或效用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再没有变化，从来都是充当支付手段、财富的贮藏手段和一般对价标准的。而商品世界中最主要、最活跃的变化或运动恰恰在于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主要取决于真正的脑力劳动或哲学中的意识观念：即发明和创新。产业化的生产，并未动摇商品是以其差别化的使用价值或效用来吸引货币或其它物或服务与自己相交换的规律。例如手机，各种各样的手机产品，并非依靠组装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优势或内在，走向市场的，而是靠展示各自的特性——即使用价值的独特性来与货币相吸引的。这样，货币就是以不变应万变，用自己恒定的使用价值来衡量无数的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了。或者说，固定的货币币值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稳定的特定社会中，恰好可以准确地反映经济状况，而在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持续下降或上升的特定社会中，却要在货币法定币值之外的地方，体现出这种变化。因此，同为币值法定的各种货币，如人民币、美元、英镑等等，却因其所处特定社会的类型不同，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经济学规律，反过来又成为我们考察不同类型社会的发展规律的工具或基础。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具有严重的社会限制条件，不适合于专制社会，以及包括专制社会在内的一体化国际社会。货币的社会属性，可以简单地通过货币的制造看出来：中国制造具有世人公认的成本优势，那么，世界各国是否可以考虑将其货币交由中国制造？外包给中国制造，可否？如果不，为什么？相信中国可以低价格地承包所有外币的印制，为什么不从经济角度出发，付诸现实呢？人们在顾虑什么？现实告诉我们，货币看来真的和其它商

品不一样，可是我们一直被西方经济学教导说：货币只是商品的符号。如果西方经济学的教条真是正确的话，现在，实质性的东西即商品可以外包，作为符号的货币就没有理由不可以的！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不是货币不可以外包错了，而是商品外包错了，错在外包给一个货币不受市场规律约束的社会或国家！反过来讲，将商品制造外包给一个市场化的民主社会或国家，才是唯一正确、不会发生灾难的选择。将商品外包给一个其货币不受市场规律限制的社会，将发生与货币外包同样后果的经济灾难，甚至因其更隐蔽，后果也更严重。在一个货币外包没有问题的国际社会环境中，才可以自由、完全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济观念进行市场化的商品外包！如果大家还记得杰科布·范德林特在《货币万能》一书中自信的话语，就应该体会到，西方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其实是深深植根于一个社会大前提中，即货币只在同类型社会间流动时才会产生西方经济学所讲的效果——完全由自由、民主社会或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或一个国家的现金发行最终完全被市场控制，社会公权力对此无能为力：“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么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量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该国现金量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43、44页）如果你坚信上述西方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是没有社会限制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的话，应该现在就大肆鼓吹将美元交由中国印制、发行！应该鼓吹现在就可以简单实现全球的货币统一！

社会公权力是货币唯一、真实的后盾和保障，而非黄金或其它，无论是专制政权社会还是分权制衡的法治社会，都是如此。社会公权力保障货币的效果，取决于社会信仰水平——社会信仰水平稳定上升的，货币幸福度稳定并造就货币的退出机制；社会信仰不断下降的社会，货币幸福度也随之下降并造就对货币的依赖、货币内在性的数量扩张机制。没有资金支持，高成本经济体总无法维持市场份额，反过来讲，只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即使是高成本的经济体，也可发动、应对价格战！唯一的例外就在不可竞争的新技术领域——在这里，资金的无穷魅力无法展现，只能屈服。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用低成本、无成本的货币发行，完全可以支持一个经济体在任何价格战、市场份额保卫战和扩大市场份额的战斗中取胜。而超发的货币并不一定会带来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利影响：例如从市场中取得的利润被截留在国家、一个不会增加市场消费的小集团（消费不依赖正常收入的团体，如靠受贿、贪腐等公共资金为主支付日常消费的团体）身上，就只会增加社会贫富差距，只在基尼系数上有所反应；而市场的维持和扩大，导致生产、经营的维持和扩大却带来就业和民众收入的稳定和增长，让经济和社会看上去一片繁荣！这就是货币或货币超发的魅力！（真正的不利后果只是存在于如何处理战利品的环节上：公权力系统被迫迎来巨大的财富——否则，无节制的货币超发迟早会引发恶性通胀——如何处理这些财富，就转变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即公权力系统的架构或性质所决定的问题，而非经济领域的问题，社会中存在一个不依赖正常收入的利益集团也是政治问题，即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只是政治问题，与经济彻底隔离）货币幸福度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民众手中的货币幸福度变化相对小，但财富大量集中，让其单位幸福度或货币的幸福边际增长率下降，导致货币的社会平均幸福度下降。社会公权力对一个社会的货币的影响和制约，体现在货币所折射出的社会、自然环境状况（一个达尔文环境的状况），集中表现出一个社会中所有的商品、服务，包括社会公共服务在内的有用性即其“使用价值”整体水平的变动状况，决定了货币的根本属性或社会属性。而作为一般等价物、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一国货币，仅仅是货币的一般属性或“物理”属性，行使着通行于全人类任何社会类型中的普世职能。从威廉·配第的《赋

税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甚至再向前追溯至约翰·贝勒斯的《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向后直到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包括当今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有关货币的所有知识、结论都是建立在货币=金（或）银=铸币的历史观念的沿袭基础之上的。至今，所有有关货币、财富的经济理论，也都是基于这个历史观念和事实之上的。受这种历史观念的影响，铸币材料的数量及成本限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来，作为笼罩在货币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上的盖头，一直影响和制约了我们对货币（钱）的本质探讨。因此，我们将迄今为止的所有西方经济学，通称之为“自然货币经济学”或“物理货币经济学”——它们都无法被用作正确考察专制社会及专制社会参与其中的国际社会的经济理论工具，更无法帮助人们解决这类社会出现的经济发展问题。

第二编：到人类历史和《圣经》中去的理论应用

第三章：货币运动规律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主导性作用

第一节、货币运动规律对社会历史过程和人性确立过程的描绘

由于货币运动规律所反映的是信仰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货币运动规律，来考察信仰所决定的有关人类的一切领域——即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也包括人类周围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整个宇宙环境。这一节，我们只重点讨论一下货币运动对国家和社会起源及人类起源的表达。

从时间上看，社会是从无信仰的蛮荒时代后才出现的。社会公权力给人类个体带来社会秩序或者个人能力之外的生存保障，是社会幸福的象征。因此，蛮荒时代虽然无社会——自然也没有真实的财税收支和公权力机关，但这不妨碍我们先为其虚拟一个具备以下特点的等值财税曲线：1）、只能表示社会痛苦；2）没有丝毫的社会幸福。从上面章节中有关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中，不难发现，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图案中位于坐标系第二象限部分的那条（左）闭合曲线，恰好满足要求。也就是说，从财税曲线或货币运动模式上看，人类历史中的社会产生过程也可以看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即从财税曲线只有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在第二象限中的形式开始，然后逐次过渡形成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和专制社会的财税模式，出现第一个专制社会和国家，然后人类再全部进入到专制社会形态的社会中。《圣经》中，将上述过程形象、具体地描述为“一只公绵羊的出现和征服世界的历史”：“有双角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角都高，这角高过那角，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骹触，兽在它面前都站立不住，但它任意而行，自高自大。”（但 8:3-4）上述经文中，专制社会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两条曲线，被形象地比喻为“公绵羊的两只角”，其中，“更高和后长的角”就是（右）闭合货币运动曲线，象征人类的信仰水平不断提高；而在前且稍低的角，则是蛮荒时代的虚拟财税曲线或货币运动曲线，象征人类在适应环境下生存的习性或动物性内容更早存在但变化比较慢——人类社会虽然不是一开始就从这里产生的，但却可以倒退到这里或者可以从这里再建立。也就是说，真实的人类社会历史，与我们从逻辑和时间连续性上所考察的结果，是矛盾的，即我们看到的人类社会都是从社会解体、崩溃后才开始出现的，构成了一个“还未诞生就已经死亡”的逻辑悖论。经文中受到其攻击并“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它手的”的“兽”，就是人类或特定的人类，指处于蛮荒状态中的人类和在信仰上完全类似他们的所有后来人。《圣经》中，处于诺亚大洪水前被大洪水所消灭的人类，就是这样的“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信仰或不相信神，“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创 6: 5）。由于《圣经》中神是“唯一良善的”（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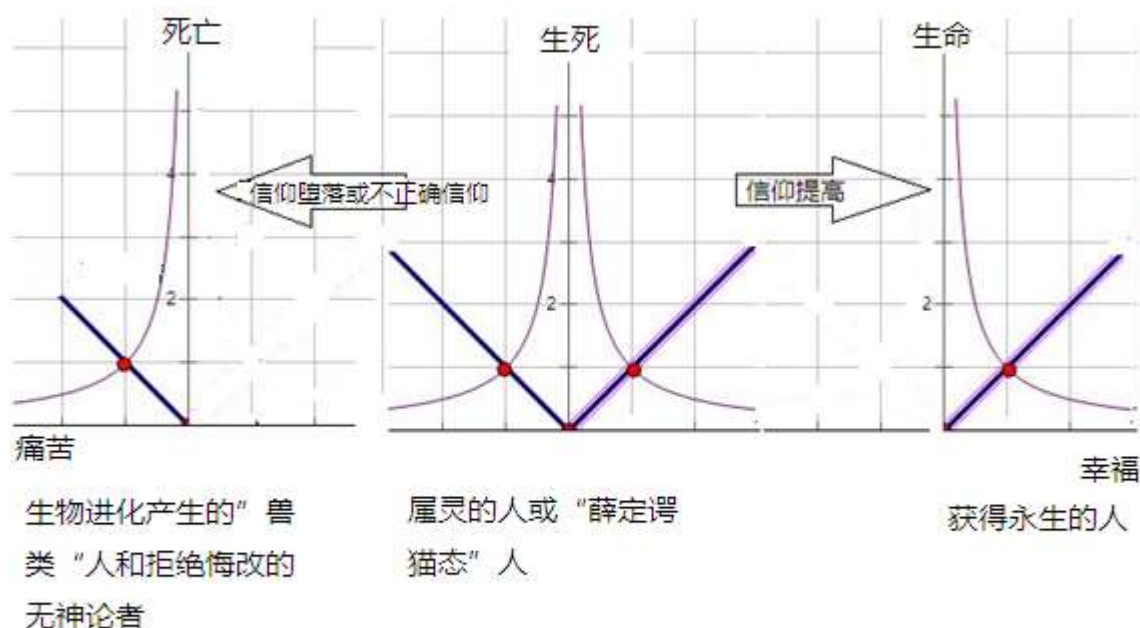
19:17), 就按照有无信仰的标准把人类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相信神的存在、有信仰的人, 他们因信仰而不会终日思想“恶”; 另一类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 即被《圣经》视为“兽”的人类, 他们因无信仰而只会思想“恶”。

《圣经》中, 神是唯一自有和永有、至高和自由随意的。同时, 又有记载, 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获得永生的个人, 已经与神相似(创 3: 22)。可见, 被造(非自有)且没有永生的个人, 只有“自由”或“自由性”是与神相似的, 是神逐出亚当、夏娃时明确表示为人类的共性和被逐出伊甸园的直接原因。个体的自由, 可称之为权力或权利意识, 是隐藏在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善恶观、是非观背后的决定因素, 是人与神相对抗, 在《圣经》中被视为侵犯、亵渎神性的事物。我们个人在作任何决定时, 都是自主的、自由的。你可能会说, 我在作任何决定时, 都是有根据的、有理由的, 而并非自由和无根无据的任性而为; 你也许还要说, 我接受了很多建议、意见才作出决定的, 因而我并非自由、任意作出任何决定的……但这些根据、理由、建议等等, 包括理性, 都只是你作出决定时的条件、基础、习惯, 并没有丝毫影响你作决定的自由; 你的任何决定的做出及作出这个决定的过程都是自由的, 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与神性是完全一样的, 这才是可能侵犯、亵渎神的唯一性的地方, 是与神相似的所在, 是原罪的出处, 也是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根源, 也是个人不能永生、不能得救离开死亡的根本之所在! 但是, 一个没有权利或权利意识的人, 无疑于生理学上的死人, 同时, 在《圣经》中他也是罪人或不悔改就必死的人: 摩西和亚伦之所以不能进“流奶与蜜的地方”正由于此——他们没有行使手中的权力才招致责罚。如此一来, 《圣经》中的人类从被造的那一刻开始, 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终其一生都始终处于一个薛定谔猫态(奥地利物理学者埃尔温·薛定谔于 1935 年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作者注): 无论人类行使或不行使自由的权利, 事实上都会处于生存与死亡的叠加态——行使自由权利时, 意味着你还活着, 但同时你已经在对抗神了, 因此又意味着你已经死了, 是有生也有死的叠加; 不行使自由权利时, 意味着你已经死了, 但同时你却没有对抗神, 因此又意味着你还活着, 也是有生也有死的叠加。而根据退相干理论, 人不可能永远处于这种叠加态。那么, 其中的相干因素又是什么呢? 《圣经》中指出, 信仰是唯一一个时刻存在的、决定和影响个人生存还是死亡的因素, 个人一旦做出信仰选择, 立刻会产生不同效应。上述信息是用很多经文反复传达出来的, 其中包括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那同钉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讥诮耶稣, 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 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 还不怕神吗?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得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记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路 23:39-43)。可见, 由于信仰的影响, 生死叠加的“薛定谔猫态”会产生退相干效应——有信仰或正确信仰者, 生; 无信仰或无正确信仰者, 死。

信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和其它被造物的唯一标志, 人与万物的差别只在于信仰。有信仰的人类, 生物生命要传递的是信仰, 而非生物基因。信仰并非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意识”, 后者被定义为“人脑的机能, 是对物质的反映”, 换句话说, 唯物论者把人类完全等同于物质——无论是人脑本身, 还是人脑所反映的对象, 人类都只是一种反映物质规律或体现物质规律的附属物, 除了物质规律之外再没有剩下任何的特别之处或自在之处——与物质世界完全没有差别! 信仰与唯物主义哲学中的意识概念的差别, 在《圣经》中, 从一开始就被指明: “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 1:26):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 1:28) 人是神造出的物质世界的管理者, 这就是人不同于物质和宇宙万物的特别之处、是人类位于物质世界中的自在之处。相信《圣经》中传达出的这个信息, 就是信仰! 因此, 信仰不是物质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 只是人类对信息的信任或接受, 不需

要验证。有信仰者，在遇到生活困境时，不会改变性情和信仰，只会祈求神的帮助和恩慈，以求渡过难关继续生存；而动物，因其无信仰，它们在求生的过程中，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遇到生存困境或进化困难时，如食物缺乏、疾病、天敌过于强大等，动物只会改变性情甚至死亡，无信仰的人类也是如此，它们都不会寻求或者祈求造物主的恩慈，只依靠自身的力量求食物、求配偶、求子女、求食物、求权力……因此，无信仰的人类与动物无差别，中国文化中的谚语“食色性也”是对他们（或它们）最恰当的评价，在《圣经》中一并被称之为“兽”。人类从生物学角度、从自然界的食物链的角度上讲，来自兽，生命的延续也只传递人类的基因，与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完全符合。但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物种进化论，却从逻辑上排除了一个自愿牺牲生命的人类的产生可能。这就是说，从逻辑上讲，自愿奉献、放弃一切的信仰观念绝对不可能是视生命和生存为最高的生物进化历程的产物和结果。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只能解答“兽”一样的人的起源问题或人类的基因来源问题。因此，进化论作为生物科学分支领域内的一个终极真理，与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人类信仰之间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悖论，一个进化论无法解释的断层、结果和现实。对此，从理性上讲，只有可以超越终极科学理论的造物主的力量，才会让我们超越某一领域中的终极科学理论的限制，回到理性和真实的现实中来，《圣经》也恰恰在这种时候——就像我们将要看到更多类似情形一样，以明确和准确的针对性启示带领我们越过这些疑惑和悖论，彰显了《圣经》中的信息确实直接来自神。《圣经》在创世纪的有关经文中，指明了人类的两次（个）被造过程，第一次是创世纪中的第六天，发生在牲畜、昆虫、野兽等各种生物创造完毕之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创1:26-28）这是进化论中的人类或无信仰的生物人的产生过程，显示人类在自然界中处于生物进化的最后阶段。这样的人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都只能适应环境生存下来，环境彻底变化后就会迁移或灭亡；他们所创造的所有“文明”都只是适应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群体环境的产物，与我们从区域地质、地貌、气候、生态环境或动植物的颜色、形状、习性等适应大环境的结果是一样的，前进变化的速度与生物进化的速度或沧海桑田的宇宙变化速度一样。生存或生命是他（或他们）生活中超越一切的最高目标，这决定了生物进化中的人类的文明程度或科技水平，不会超越环境适宜人类生存的高度，经济发展的结果也不会超越维持温饱的最低要求即人们常讲的“自然经济”，象一般的群聚动物一样，这种人类只会在环境适宜时繁殖数量多、分群多，而在环境艰难时，人口数量少、战争多。超越生命或取代生命成为最高目标的信仰，无法在这样的人类中形成和被接受。那么，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看到的有信仰的人，他们既然不可能来自生物人，从逻辑上讲也无法在生物进化论中觅得一席之地，他们又来自何方呢？正是在此科学与现实的困惑之处，《圣经》中恰恰有了人类的第二次被造的记载，彻底解决了这个疑问，“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亚当和第一次记载中的被造人类，从生物学、生理学上看没有任何的差别，完全一样，只是比由野兽进化而来的人类，多了生物进化理论无法达成的、可以形成信仰或承载信仰的“灵”而已！生物进化论可以解释起源的“兽类”人类与可以有信仰的亚当一样的人类间的关系，在有关“割礼”的经文信息中，表现地尤为突出。例如，经文“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创17:9-12），首先说明了割礼是一个与信仰有关的记号，是有信仰或者可

以有信仰的证据；其次，又说明有信仰的人并不在“7日”内——这个《圣经》中著名的神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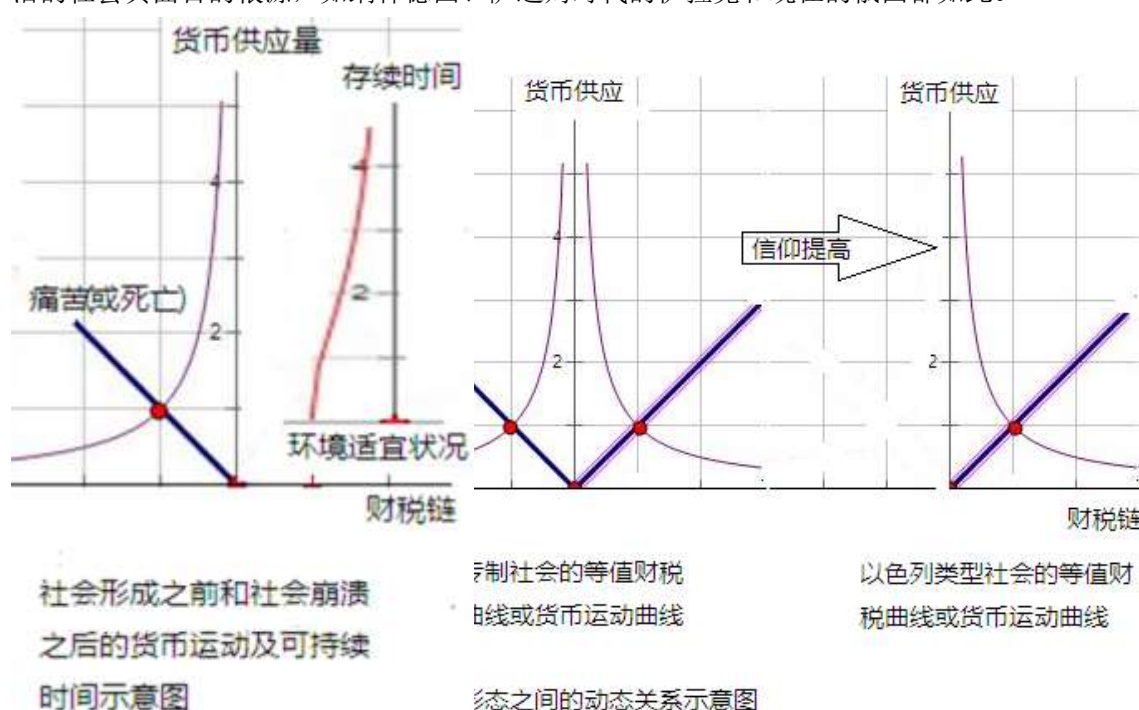
个人信仰和信仰中的生死、痛苦与幸福间的动态关系示意图

造宇宙万物的时间内——所创造的那个物质世界中。出生7日之内的人类（婴儿），是可以承载信仰但还没有信仰的人，是与物质世界或生物进化理论中起源的人类相类似的人类，都只受身体的物质规律或人类的生理规律的制约，与普通动物一样，“你要将头生的儿子归给我；你牛羊头生的，也要这样，七天当跟着母，第八天要归给我。”（出 22:30）。正因为母亲生下的婴儿具有以上的特点，所以人人喜庆的新生命的诞生，却从信仰上污秽了母亲，需要洁净，“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利 12:2）“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利 12:5） 亚当的信仰来自于他在伊甸园的生活经历、亲眼见过神的面、贴身感受过神的大能……亚当的信仰或神存在的信息不可能通过生物进化而取得，缺少亚当的这种经历、不相信神存在的信息的亚当的后代们，也就失去了信仰，与第一次记载中被造的人类完全相同，完全符合且只符合生物进化论的所有结论——他们将生命，视为最高的追求和生活的目标，将生命和生活的规律视为最高法则，将一切环境视为自己生命和生存的条件和材料，是生命的一部分。信仰随时可以有也可能无，随时可以前进也可能堕落，而生物的进化却不可以如此，人类的生物基因不可更改，正如没有一个人可以随意从生物学或生理学的角度上退化成一只野兽。不会有信仰，只受生物进化理论控制、只能在环境选择中产生的“兽类”人类，都早在《圣经》记载的诺亚大洪水中就被彻底除灭了，当今地球上的人类都可以有信仰、能够承载各种信仰的亚当一样的人类。但是，信仰水平不断下降却不知阻止的人，照样可能坠入与野兽一样的人类的境地，结局也与野兽一样必死无疑，其他人要等到末日审判时才知道各自的结局，其中只有信仰不断进步且信仰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的人，才会获得永生或不死。如此，个人信仰与永生（或幸福）和死亡（或痛苦）的结局之间的关系，如图所示。

无信仰或拒绝信仰的人所组成的人群，只是野兽或昆虫一般的群聚，与《圣经》中“诺亚大洪水”前那个时代的人类的生存状况一样，也与信仰彻底堕落的专制社会解体前的状态相同。人类历史上很多突然消失的“文明”如玛雅文明——南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美洲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如小河文化——4000年前人类文明，一片位于罗布泊沙漠中的古代文化，再如《圣经》中所多玛、蛾摩拉，大都归于此类。只有具备了信仰的群聚，才可以真正被称为“人类社会”或“社会”。人类生物性的群聚与社会，二者在结构、运作等方面有很多相

似性，如都有阶层性的群体结构或严格秩序，有“王”或各种名称的首领，有平民或只要从事各种劳作的阶层……但人类的生物性群聚中，这种类似社会阶层的等级和层次，与普通群聚动物如蜜蜂、蚂蚁或狼群等群聚组织中的分工一样，也与我们身体各器官的分工或不同功能一样，是群聚动物的内部习性和规律，类似身体各部分器官的生理学规律，都以自己的存在或生命为最高法则。“王”以个人能力取得地位，与兽群中的首领——如狼群中的头狼，靠力量和生殖能力取得地位一样。因此，兽群和生物进化中的人类群体，首领所受到的供奉，只会给他（或它）自己带来利益和幸福，他（它）足够强大，就会长期处于首领位置，否则被赶下台或分群。因此，兽群中用来供养首领的物质财富，只是其它个体和成员的痛苦或生存材料的减少，没有丝毫幸福可言，从公共财政或社会的角度看，就只有社会痛苦没有社会幸福，如下图中左边的图形所示。再如，人类的动物性群聚中也有神灵崇拜，但却并非信仰，而是类似中国人对观音、财神的那种个人利用，是一种虚拟的生存武器和工具，不仅不会真正为其付出，而是渗透着对所认可神灵的无穷尽且随意的索取。他们所供奉的神灵，也仅仅以受到的供物的多少为标志，要么兴起、要么被人遗忘……而《圣经》中的耶和華神，明确声明不喜欢任何供物（参见《以赛亚书》等经文），只喜欢“公平”、“公义”，以色列祭祀制度中的供物，只是向我们传递社会知识的一个载体。人类的动物性群聚是个体借助于群体来维持生命和生物性的生命延续、繁衍而已，没有丝毫超越个体生命的生物学规律，突出表现在对特定环境的适应上，一旦环境变化，就立刻解散，在环境重新恢复前，没有聚合在一起的可能，不会出现以色列人仅仅因信仰都回到原来居住地的情况。兽群式的人类古代文明，大都毁于自然环境的剧变中，剩下的被人类社会所消灭，正如《圣经》中以色列人到达前的迦南地的原居民群体、中国远古时代被称之为“蛮”“夷”的周边群体等等。但这些动物性群聚的群体，他们在适宜的自然环境中，会象世代繁衍的群聚动物一样可以存续很长的时间，期间也可能出现人人生活富裕、出现大量能工巧匠等现象，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人类作为自然生物的本性的影像，在普通动物世界中也常见，如仿生学中所要模仿的各种动植物的奇异功能等等。所有社会的产生，都以超越领导者或发起者、倡议者个人生命范畴为特征，例如，消除旧时代的贪腐等黑暗、延续或保护某种文化传统、为所有人的后代子孙利益、实现财产或其它权利平等……所有这些社会的目的或建立的初衷，距离《圣经》中所倡导的公平、公义的价值观越远，社会信仰水平就越低，如“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价值观就比“均贫富”的价值观更接近《圣经》中的公平、公义，前者的倡导者的信仰水平就较高，建立和维持一个“等贵贱均贫富”的社会就需要社会大众的信仰水平普遍较高才可能。因此，一个社会中的人们，所信奉的信仰或价值观可以各种各样，神灵的名称可能千奇百怪，但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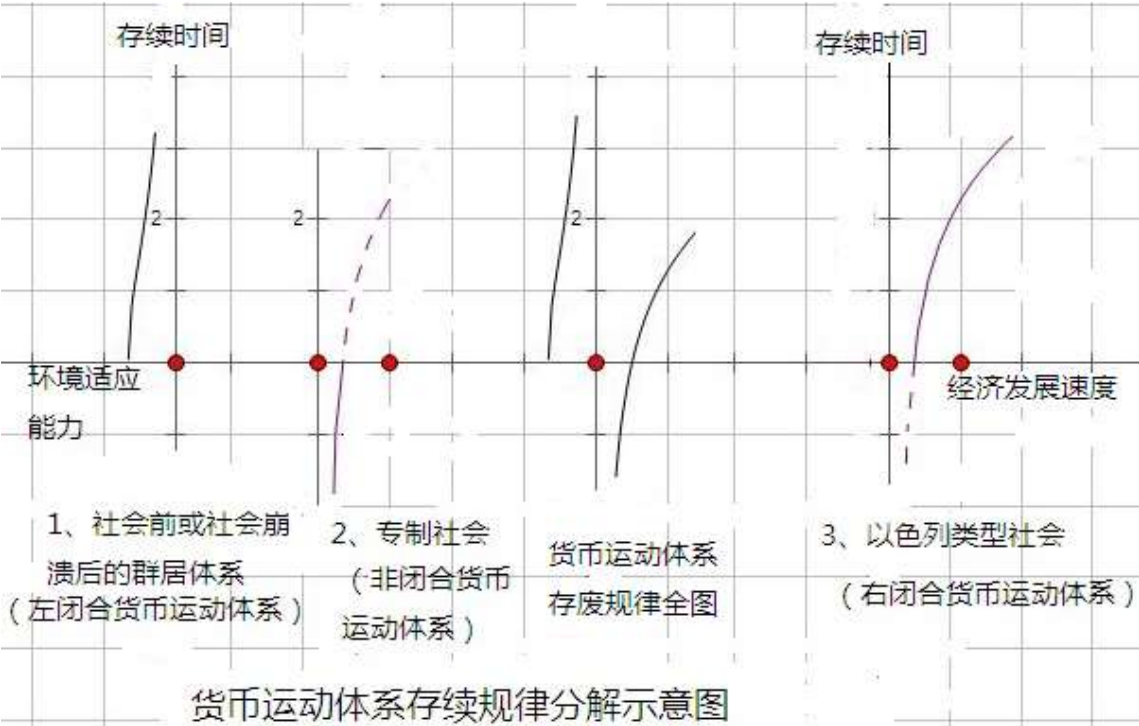
要这个社会中还有一点点的公平正义，就是一个有信仰的社会，就是一个脱离了蛮荒时代或进化论中”生物性”人类群体阶段的社会，正如我们在《圣经》中亚伯拉罕为所多玛祈求时与神的那段对话（参见创 18:22-33）中所看到的一样，被彻底除灭的所多玛中没有一个还有心存公平、公义的义人存在。同理，一个社会沦落到人人为自己、每个人事事要求人而无法依赖社会和法律的地步，就已经迈入了进化论所辖的兽群时代，社会彻底崩溃；而一个社会进入到将供物——包括个体生命、各类物质财富及反映其规律的各种科学知识、各种经典中的清规戒律或律法规定、各种传统的对某种经典的解读方式等看作是最高、最重要的个人事物时，如自杀式爆炸的殉教者或圣战分子、法西斯分子或共产主义者的献身等等，这个社会的信仰水平就比较低，随时可能滑向蛮荒时代，但也可能会艰难地进入到正确信仰水平高并能够自行维持的以色列类型社会中来……信仰的独立性，或信仰的去适应（环境）性的特点，让分权制衡、法律权威和法律正义成为必然。因此，自由、平等、法治、分权制衡的结果就是社会信仰程度的标志，它们都要以社会信仰为基础并反过来反映出社会的信仰水平。例如，没有社会信仰作基础和保障的分权制衡的法律规定和制度安排，都要成为一纸空文。这是我们看到很多貌似有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法律制度的社会，却很快暴露出专制社会、独裁统治的社会真面目的根源，如纳粹德国、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和现在的俄国都如此。



综上，人类个体起初都是人面兽身，具有痛苦（或死亡或兽）和幸福（或永生或人）的双重属性，完全适用于非闭合货币运动的双曲线图式：坐标系中第一象限部分的曲线，代表幸福，第二象限中的曲线即左闭合曲线代表痛苦。《圣经》中，从人类个体和从人类的起源开始，就已经具备了使用我们在考察社会财税形成模式中所使用的货币运动曲线的条件和基础，形成一个与人类社会历史变化完全对接的统一体系。此后，人类的族群也与人类的个体一样，按照有无信仰分道扬镳。处于生物进化论中与野兽一样的人类个体，进入动物群居状态中，其族群的生存状况和可持续时间，我们可以借用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中第二象限中的曲线即左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存续时间曲线来表示，如上图所示。即完全符合上一节中看到的描述这个规律的曲线系统中位于坐标系第二象限中的部分，生态或自然环境越适合生存（增长率下降越小或自然环境恶化改变的程度越小）时，族群的存续时间越长，完全可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状态（增长率为0，或自然环境状况恒定不变）时，存续的时间无限，与现实世界中处于特殊地理环境中的一些人类的土著文明的存续状况完全契合——就像亚马逊河流域中的

一些原始部落，若非受到外来的人类社会力量的影响，它们中间的文明可以简单地持续到今天并可以永远持续下去；那里的人类族群，人们古老而有效的生存方式与稳定少变的环境环境相结合，生存状况长期无变化但文明的持续时间却可以异常的久远。但一旦发生自然环境的巨大变化，这些古老而神秘的文明，就会突然、急速的消失，如著名的玛雅文化。处于猫态中、可以有信仰的人类个体，进入社会状态中，人类个体和社会的最初状态都是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的标准形式。社会起源过程，也表现为信仰和幸福之外的一场厮杀，消灭只有痛苦的货币运动双曲线第二象限部分、保留痛苦和幸福参半的整个双曲线系统。这样的社会产生的过程意味着，消灭已经做出兽的选择的无信仰者的群体，构建出一个只有薛定谔猫态人和有信仰者两类人组成的过渡性群体结构——这个社会结构必然还要继续行使其历史职能，还要继续消灭从薛定谔猫态中分化出来的兽和兽的群体，积累和造就更大、更多的人和人的群体，提高全人类的信仰水平。

兽类人的群聚，只能在特定的适宜环境中才能定居下来，其生命或“文明”周期长短，完全视环境变化而定。这种生物进化下的人类生存中，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因素，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效果，与处于社会中的经济发展的增长和萎缩因素完全一样，都是影响没有信仰和信仰水平低的人群的可存续时间的关键——对于前者，环境变化越小、生态环境越稳定，生存时间越长，反之亦然；对于后者，经济发展越稳定，增长或萎缩的速度越趋于0，存续时间越长，反之亦然。与在一个没有变化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其中的生物种类（或族群）会永远延续、生存下去一样，生物进化中的人类族群也如此，一个经济发展始终0波动或0增长的专制社会，也会永远存续下去。因此，兽类人与专制社会崩溃后的人群、及以色列类型社会之外的所有社会，都受制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存废规律的制约；其中，生物进化中的兽类人和社会崩溃后的人群，处于非闭合货币运动中的左闭合运动体系之下，系统的存续时间规律如下图中的第一部分所示。从群居生物的生存历史和仿生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能力对于人类社会存续时间的作用完全等同于生物的环境适应能力。可见，经济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类科学技术能力的一个表现形式，绝非是财富、货币因素或运用货币手段的结果。也就是说，依赖货币因素的经济的发展，无助于人类的生存，是必死的途径。



专制社会，即使是信仰水平最低的专制社会，如无神论者的专制社会，也能够让人类在大多数的地球环境中定居下来，不再一味地受制于对自然环境的“适者生存”法则。但是，专制社会只有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却无法摆脱不适应自身经济快速发展或波动的宿命，如上图第二部分的实线部分所示，表示其可以在缺少信仰的状态下只依靠货币策略存活的生命周期；其中的存续时间位于纵坐标轴的负数方向，代表了社会信仰处在低下、堕落的状态中。专制社会解体后，若不能及时重建社会秩序，其中的人们大部分将被迫离开或死亡，也正是兽类人在自然环境改变后曾经遭遇过的事情，意味着信仰彻底堕落的人们，重新进入到生物进化的规律之下，回到与野兽一样的适者生存状态中，与《圣经》记载的诺亚大洪水所消灭的兽性人一样；同时，上述状况也意味着，专制社会崩溃前的状况与生物进化中的野兽一样的人群状况、与已经消失或残存下来的特殊环境中的土著人类的生存状况是一样的，都退回到上图中“1”部分。但是，假设专制社会周围存在可以摆脱适者生存法则限制的外部环境的话，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会让专制社会搭上继续存在下去的顺风车，进入到新的生存时代中……因此，专制社会在与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共存时，只要后者的技术革命能够恰当、及时地爆发，它的存续时间就可能摆脱旧环境的束缚，形成类似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存续模式——具备不依赖货币手段维持经济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如图中“2”的虚线图案所示。当然，类似美国页岩油技术革命这样有较大的地质条件限制的新技术，现在看来无法应用到类似中国这样地质环境的地区，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这样的技术革命就是无助于其社会存续的无效或不恰当的“技术革命”；同时，从技术革命的历史来看，自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即工业革命爆发后至今，公认的技术革命次数屈指可数，从时间上看并不连续且间歇时间较长，因此没有可能让专制社会的存续规律跨入上图中“2”部分的虚线区域，只增加了专制社会可以不依赖货币手段的零星时间。上图中标示为“2”的虚线部分，对专制社会来讲，是连续的技术革命条件下，可以不使用货币工具而维持经济增长的时间函数图像，现在虽然不适用，但在未来的时代却有可能成为现实。这样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专制社会确实不是被武力打死的，而是被慢腾腾又不断爆发的技术革命造就的经济发展波动所杀死的。

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可以让人类在地球上的任何环境中生存下来，随着信仰的继续前进，将来的人类还会在宇宙中的任何环境中定居、生存下来，彻底摆脱环境选择规律的桎梏，这正是《圣经》中“永生不死”概念的必有之意。以色列类型的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的科学技术创新及其应用能力，如上图中标示为“3”的第三部分所示。这一部分的几何图形可以通过对右闭合曲线进行转换坐标系的方式得出：先将右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的图案沿坐标轴的横轴对折，然后再垂直向下平移坐标系或坐标系的横轴。该数学图形实线图案部分的纵坐标轴所标出的“存续时间”，是指在一个特定技术环境条件下，社会不使用货币刺激政策或不依赖货币手段，也能维持经济发展的时间。曲线的实线部分所显示的时间都是一个愉快的等待下一次技术革命爆发的蜜月时期，大致相当于西方社会的货币加息周期——如格林斯潘时代的美国；若社会信仰前进的速度不够快，超过这个时间（蜜月期）段还未爆发技术革命的话，以色列类型的社会若要继续维持经济发展，就必须使用货币手段才可以，大致相当于西方社会实施扩张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或凯恩斯经济学策略）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时间——如2008年美国开始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的时期就是如此。依据我们前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知道，以色列类型社会连续实施刺激经济发展的财政、货币策略的最长有效时间不超过40年。即连续实施40年的财政、货币策略后还未迎来技术革命的话，经济增长会陷入绝对的衰退状态。对于积极财政和量化宽松的规模，根据我们前面对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存废规律的分析结果可知，每年至少应相当于上年度国家财税收入总量的规模才算得上“足够有力”，再大的部分无效，但太过小于这个规模时，对推动经济增长产生的效果也差；

至新的技术革命爆发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货币依赖被解除，货币策略又会退出，2015 年美国开始讨论美元何时加息，就是页岩气技术革命的结果。

从逻辑上讲，具备超强适应能力的专制社会，也必然会适应以色列类型社会造就出的快速发展的国际环境，从而有可能进入到上图中的第二部分的虚线图案部分或第三部分的实线部分；同时，它在崩溃前的状态，又与野兽一样的人类的状况一致。因此，描绘专制社会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存废的整体规律图，可以一分为三；或者说，描述野兽一样的人类或无信仰人类的族群存废规律、和描述专制社会存废规律与以色列类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三部分数学图案，必然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函数图案，让人类的所有生存状况处于一个和谐、统一的科学考察体系之中，如上图中未标号码的那个图案——正是我们在考察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存废规律时所作出过的那个函数图案。从这个统一的数学函数图形来看，有以下特点：1、整个函数图案是一个不连续图形，表示出人类从无信仰的类似野兽的时代，或者说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靠自身力量永远无法进入到有信仰的时代；2、整个函数图案有两条连续的几何曲线构成。其中，右边的连续曲线表示出人类的整个社会时代，从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时间或以控制经济领域为代表的社会“寿命”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统一的、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闭合数学系统。即，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也可以看作为科学技术创新能力达到足以发动技术革命高度、或社会信仰水平达到足以支持社会转变为一个民主、自由、分权制衡的社会的“后专制社会时代”。同样，专制社会，单单从社会寿命的角度上讲，也可以看作为是一个社会信仰水平不够高、不足以发起一场技术革命而只能依赖货币策略的“前以色列类型社会”。左边的连续曲线，表示出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只要与外部环境相适应，就会永在，是对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物质不灭定律的一个数学化的表述方式；右边的连续曲线，表示出信仰的持续不断提高，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不死的结局，信仰的持续不断下降，必带给人类彻底的死亡，是《圣经》中信仰与生死关系的数学表述。综上，我们不难发现，《圣经》中所记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梦境，与《圣经》中记载的但以理所看到的那些奇异景象一样，都是预告了相同的人类历史变化：有灵即可以有信仰的人类，以社会生存形式掌管整个宇宙，“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但 2:37-38）而宇宙中的一切，包括曾经和现在的一切“走兽”、“飞鸟”，也包括达尔文进化论中应有和必有的、现在却并不存在的那些野兽类型的人类，都受物质和生命规律的制约——即表现为左边的函数图案，其中有不断的新陈代谢和生、死交替。随后的“银”“铜”“铁”三国（参见《但以理书》第二章），就是包括两类社会在内的人类的全球社会阶段或国际社会秩序的历史变换过程，它受信仰变化规律的制约——即表现为右边的函数图案。其中，人们的信仰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可以让其群体或建立起的社会摆脱左边函数图案所昭示的死亡规律，左边的图案正是历史上专制社会死亡规律曲线的翻版——与专制社会存废规律曲线的实线部分在坐标系旋转后重合。有两种不同形态社会所共同组成的国际社会秩序的特点是：“既见像的脚和脚指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指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搀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搀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但 2:41-43）。这种全球国际秩序的结局，“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但 2:45）“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但 2:44）这个必死的国际社会的整个时代是前时代，要到全人类的整体信仰水平达到一个特定的高度的后时代——正如单一社会的社会信仰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就进入社会信仰自动前进的以色列类型社会一样，也如进入到上图中第二部分中的

虚线图案与进入第三部分的实线图案完全相同一样，才会进入到全人类的整体信仰水平自动维护、自动前进的自动化阶段。那个信仰不会自动前进、必有反复波动的国际社会历史阶段中的前时代，在《圣经》中被称之为“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路 11:29），并反复、明确、形象地被表述成“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太 11:16-17）。至此，我们应该十分容易理解，《圣经》里尼布甲尼撒梦中的那块打碎巨像的“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信仰或《圣经》中表明的唯一的正确信仰。

《圣经》中所表明的信仰，是唯一正确的信仰，只在于《圣经》中包涵着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绝非人手所为的验证系统，这个系统就是社会经济学。通过社会经济学，让我们看到《圣经》这本经典如同艾萨克·牛顿眼中的宇宙一样，存在着一个和谐、完美、自洽的科学系统，这是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在其它任何宗教经典中都找不到的一个证明经典本身来自于非人手的系统。

《圣经》中，信仰被分为社会信仰和个人信仰两大范畴。个人信仰只有正确与否或信仰内容的差别，例如只相信唯一的造物主耶和华神或同时信奉神和金钱财富等。个人信仰的摇摆、水平、程度、结果，人类自己无法衡量和感知，超出科学范畴，只有到世界末日审判（启 20:12-15）时，才会揭晓，经上对此明确说明“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申 29:29）。如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通常被用作衡量信仰的标准，并不一定适用于个人领域或个人信仰领域。《圣经》经文中，讲论到个人信仰领域的内容极少，主要集中在《箴言》等章节中，集中在如何判断信仰的正确与否方面。个人信仰是否正确的自我判断标准是逻辑或形式逻辑，即信仰或意识形态的内容是否符合人类的理性或逻辑规律。只有信仰内容没有丝毫逻辑矛盾的信仰才是正确的。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在否认存在全能的神的同时，却承认、笃信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或劳动者必定都将是“全能”或“无所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被经济形态控制的社會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但却仍然执意于“砸烂一个旧世界”，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无异于在逻辑上承认相对论可以战胜经典力学、一种真理会被另一种真理所打败了，是《圣经》中用鬼王赶鬼的比喻说明的“亵渎圣灵”。而社会信仰却不是这样。社会信仰的正确与否、信仰的水平、程度、变动趋势和结果，都要即刻直接表现出来，显明为规律和科学知识，“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申 29:29）。例如，社会信仰水平在社会经济学中永远都表现为社会形态、货币运动形式、民主和法治水平、经济发展模式及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水平等等。再如著名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信仰衡量标准，完全适用于社会信仰领域：只有在信仰正确且水平越高的社会中，恶人才越难以逃脱被法律惩罚的命运，善人也越受到法律的保护，越少无辜受冤者且蒙冤者越有可能昭雪；而在一个专制社会中，贪官污吏和最高专制者的恶行，谁又能指望其在有生之年被法律制裁或穷困潦倒、或暴病而亡呢？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冤案，又有多少可以昭雪、感受到法律的正义呢？再如，信仰与科技创新和发动产业技术革命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在个人信仰领域也是完全不确定的，世界历史上富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和高科技企业创立者中，并不乏基督徒之外的其他人，甚至还有很多无神论者包括在内；但是，从社会信仰的角度看，科技创新和发动产业技术革命的能力与社会信仰之间却在世界历史上呈现出完美的正相关的关联性规律，人类公认的历次技术革命，除工业革命发起于英国之外，其余的技术革命均发起于美国，他们都是同时代的科技水平和信仰水平最高的社会，任何信仰甚至无神论者，在社会信仰领域都展现成“淮南橘淮北枳”的现象，最明显的如世界公认的华裔精英，在美国科技界成就斐然，但中国社会内部的科技创新和发动技术革命的能力却极差。

但是，社会信仰只是个人信仰进步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个人信仰发展的角度看，人类信仰的发展是从无信仰的兽开始，进入“薛定谔猫态”的待选状态，然后再进入正确信仰或信

仰领域，并在该领域中历经信仰水平、程度的各种反复过程，最后进入到社会信仰水平自动前进、永不反复或后退的阶段。上述过程中，社会处于人类个人信仰发展的中间阶段。社会不是万能的，它在动物世界或只有无信仰的人类兽群时代，不会形成和出现；它的局限性也在其发展的极限位置展露无余：那时，它才会表现出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信仰水平的整体升华只有借助非人力的救赎，才能再继续。社会消失后，个人信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个人仍然处于自我选择的状态中，谁也无法保证别人的信仰选择和信仰发展，直到末日。

《圣经》中的“千禧年”就是社会退出后这个阶段中的最著名的例子。

由自我、自主的每个人组成的人类社会，让每个具体的自我、自主都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他对整个社会无力或乏力，却又是组成社会的一份子。这样，每个自我、自主都服在社会权力之下，服从、听命于社会权力的辖制，脱离了对抗神、与神性相争、相抗、相似的处境或状态——个体的自我和自由都在社会的辖制下降为弱势的和秩序的，每个人类的个体因此增加了重回洁净状态的可能性。社会的这种作用和意义，就是在“完全”自由的人类个体与彻底失去自主的个体之间，构筑起一个有自觉、自动服从、服务于超越个体生命范畴的某种信仰所产生的秩序的人类群体，并在完成上述使命的过程中，释放出一种自动或逐渐退出的相应程式。

第二节、货币运动对以色列类型社会起源过程的描述

《圣经》中，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独立、脱离开来的过程；从信仰上讲，该过程是有信仰的人群从无信仰的人群或兽群中脱离或独立出来的过程。《圣经》将此过程形象地描述为“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但 7:4）

《圣经》记载，神拣选亚伯拉罕时，许诺亚伯拉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创 12:2-3）这时还未显露亚伯拉罕的国是什么样式，但已经说明相对于大洪水之前的那个世代，任何形式的社会、国家的秩序都是有益的，任何社会时代都是神赐给人类的福气，而将要赐下的这个社会、国家的样式却是人类中间最好的、唯一蒙受神的喜悦、最适宜于人类和直通个人永生的天国的社会形态。亚伯拉罕信神以后，神的应许是，“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创 17:7）这是一个信仰与否的应许：信仰者将得到以后的赐福，也就是说，不信者终将得到以后的惩罚，已经启示出了后来要出现的以色列社会或国家及其社会制度、法律等的有效性，均是以人们的信仰为前提的。随后，神才藉摩西律法，给人类展示了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具体样式，大众信仰终于迎来以色列类型社会形态的展示。从逻辑上讲，《圣经》的上述记载，意味着只有全体人民都有正确信仰，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的所有法律才会发挥出最大的效力，彻底得到神的赐福；大多数人的信仰正确、坚定，社会制度也会在平安发展中得以延续，国家法律也会有效，并历经波折后最终过渡到全体民众都有正确且坚定信仰的阶段；大多数人的信仰不正确或者不坚定，国家法律将难以奏效，即使最好的社会制度，如以色列人的祭司、长老、先知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社会制度，也将逐渐败坏，无法保障法律的实施及民众的幸福和安定。《圣经》中接下来的记载，也与上述逻辑分析完全吻合：“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雇价施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弥 3:9-10）《圣经》中后来大量类似的记载已经显示，后来的以色列人虽口头上信仰神，但崇尚暴力、依赖武力，将神赐下的暴力和武力与神等同甚至超越神，正确的信仰至此已经遭到败坏，导致三权分立徒具形式，在统一的败坏信仰下无法制衡，公权力

整体沦陷了下去：以色列的首领、祭司、先知都追求、信奉金钱财富，都为获取财富而行使权力，都做了财富的奴隶，又如何可能去相互制衡？把手中的权力都一致归于了财富的手下，又怎能归于神、让神亲自做王呢？至此，作为以色列社会生命之所在的公权力系统已经死亡、或者说作为以色列社会生命的“血”已经流尽。最终，《圣经》中的以色列被打散，遭遇社会和国家秩序的彻底崩溃。

其次，正确信仰，必将造就一个洁净的社会。《圣经》记载，亚伯拉罕一个人的正确信仰，不仅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在长期的旷野徘徊后最终踏上应许之地建国，得到了摩西律法中确立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制度。这种正确信仰的功效或结果，与《圣经》中在前有关诺亚的记载，在逻辑上完全一致，诺亚一个人的正确信仰，就让人类在大洪水中保存下来。《圣经》中接下来有关以色列社会发展的记载，又从反正两面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真理：先是以色列大多数人的信仰动摇、败坏，让以色列社会衰败、分裂，并最终消亡；后是遭到沉重打击的以色列人，最终坚定了信仰，“耶和华啊，求你记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哀 5:1）“耶和华啊，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新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哀 5:19-22）以色列社会最终又因正确信仰得以重建，又确立起一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直到今天。至今，历史还正在继续验证正确信仰的神奇，当今国际社会，也必延续一个人的正确信仰最终带来或产生一个有着正确信仰的洁净社会的逻辑，一个有正确信仰的洁净社会最终将带来或产生一个有着正确信仰的国际社会。

可见，在《圣经》中，人类的历史和未来确实是掌握在人类自己的手中，神给了人类一个选择题，任何人在各种信仰、无信仰中间进行选择，只要有一个人的选择是正确的，他和他的后代、追随者们的未来之路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直至永生；其他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们的未来，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直至全部进入地狱或死亡。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结局，与个人选择和结局，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完全一致，都只取决于信仰选择结果。

《圣经》中的社会理论，是一个以社会信仰为起点和分野的自然进化论，即无论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人类的信仰始终会沿着自己的运行轨迹向前发展，不受任何历史事件和自然事件的影响和制约；相反，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却要受信仰发展的脚步严格限定，呈现出鲜明、整齐和科学化的历史规律。无神论者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阐述自己的观点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这是一个无神论学者发出的无力对抗其世界结局的最明确宣言，只是他们虽然已经承认导致结局的力量并非来自人类自己，但仍然不承认力量来源自造物主，不承认自己的信仰选择恰恰是力量方向不同的起因，更不相信有一条根本不同的道路和选择的存在。是的，卡尔·马克思并没有说错，任何社会的历史过程看上去都是一个自然过程，无人能改变、打扰，但因其崇拜物质或唯物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者将一种崇拜物质的社会规律视为所有社会共有的规律，并以物质生产的主要组织方式为标准，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最终把人类定格在最充分的物质享受上一——人人都像巴比伦王一样想要什么有什么、为所欲为，又人人都象神一样全能，什么都会做。所以，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贪腐的官员本身没有错，不应对他们个人的贪腐行为负责任，错的是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让人人都像贪官一样生活的程度。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想或“信仰”，建立在明显的逻辑悖论上：它仇恨资本主义，认为追逐利润的资本，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并实现共产主义，但其对将要到来的共产主义，却定义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也就是说，追逐利润（物质）的少数资本家必死，而追逐利润和财富的大众必胜！始终没有离开人类对物质的不懈追求！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无法摆脱对物质财

富的追求和崇拜，只是否定别人（资本家）的“拜物教”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拜物教（全人类陷入对物质财富的崇拜）而已。至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从信仰的角度来看，是物质崇拜的一种自我否定，它在否定它所否定的事物的同时，已经事实上完全否定了它自己。当然，类似的矛盾还有很多，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在否认存在全能的神的同时，却承认、笃信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或劳动者必定都将是“全能”或“无所不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被经济形态控制的的社会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但却仍然执意于“砸烂一个旧世界”，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这无异于在逻辑上承认相对论可以战胜经典力学、一种真理会被另一种真理所打败了，是《圣经》中用鬼王赶鬼的比喻说明的“褻渎圣灵”。

信仰是社会的灵魂，公权力是社会的“血”或人类社会的“鬼王别西卜”，用改变公权力的结构、人员、运行方式的途径和方法等改变社会面貌和社会历史轨迹，也都是靠着“别西卜”去赶鬼，而不是靠圣灵去赶鬼，自然无法真正改变社会的历史进程或信仰发展的方向和趋势。所以，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是靠统治者的信仰改变和整个社会信仰的改变共同建立起来的，是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彻底灭亡或货币运动在第二象限的曲线部分彻底消亡后的结果。如下面这段论及奸淫的著名经文所讲：“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太 5:28-30）对于整个以色列类型的人类社会来讲，它的建立、维持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舍弃、独立再扩展的过程，一个在信仰平等基础上实现社会平等的过程，“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太 12:28）。

第三节、国际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货币运动

非闭合货币运动规律在国际社会环境中，也表现出与世界历史的高度一致性，但与其在单一社会或国家的表现相比，总是拖后一步，充分表现出全人类的整体进步都是被信仰所牵引而逐次前进的真理。

单个的专制社会或国家，财税曲线是典型的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但只有专制社会所组成的国际社会，却处于丛林时代的蛮荒阶段。因此，国际社会的财税曲线此时呈现为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的第二象限部分。这是世界历史的第一阶段。该阶段的国际社会，与人类社会产生前的蛮荒时代完全一样，毫无国际秩序而言：没有国际法和稳定、常设的国际同盟或国际组织，各国均按照自己的国家意愿，用自己的国家能力自行其是，任何社会或国家都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缺少安全、幸福，备受煎熬。《圣经》中把这个时代的国际社会，更形象地比喻为“天的四风陡起，刮在大海之上。”（但 7:2），活生生一幅不可预测未来的无秩序状态，与《圣经》中描绘的诺亚大洪水时的地球状况十分相像。而《圣经》中的诺亚大洪水正是蛮荒状态结束后、呼唤社会秩序出现前的时代。经济方面也相同，这个时期的经济成就对于全人类生存改善的整体效果，与蛮荒时代人类个体生存的状况类似。后者中的人们，生活资料没有足够的结余和改变，完全处于自然条件下的生物食物链当中，与自然界其它生物的生存状态一样。现实世界里，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这完全符合安格斯·麦迪逊先生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展现的研究结果，即从零年开始到十四、十五世纪，全球范围的生活水平大致处于勉强维生的停滞状态。从全球角度来看，虽然其中不乏具体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会出现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现象，但这个时期的整体国际经济发展却是停滞的。

然后，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或国家出现，其财税曲线呈现出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形式，即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在第一象限中的部分，但这时的国际社会，处于以色列类型和专制社会共存的初期，货币运动曲线在全球范围内刚刚形成非闭合货币运动的形态。在《圣经》中，这个时代的国际社会被整体形象地比喻成一头狮子或“狮型”：“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

（但 7:4），且进一步指出，是“口象狮子的口”（启 13:2）。“狮型”是对国际社会迎来货币非闭合运动双曲线数学图形新时代的一个形象化描述，说明专制社会仍然是“狮型”时代国际社会秩序中的主导力量，但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是国际秩序中的新生势力，正在积聚力量、快速前进。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即货币闭合运动体系诞生的过程更被形象地具体描绘为“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但 7:4），是对前面我们看到的货币闭合运动曲线从货币非闭合运动双曲线中游离出来这个过程的最形象描绘，并且进一步指明了闭合曲线形态所在的社会更人性、更优越、更适宜于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从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的数据看也确实如此：中国自 1500 至 1700 年 GDP 总量出现下滑，同期欧洲 GDP 开始迅速增长，但是还远不如中国。从世界历史时间对照来看，此时中国是明朝时代，欧洲进入文艺复兴。

接下来，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国家力量逐渐强大，并且象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一样，容易结成牢固且容易修复的国际联盟关系，形成强大的国际组织，制定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国际法，最终一统天下，成为国际社会秩序的主宰者。《圣经》中，又按照货币运动曲线图案的不同形状，将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细分为三个具体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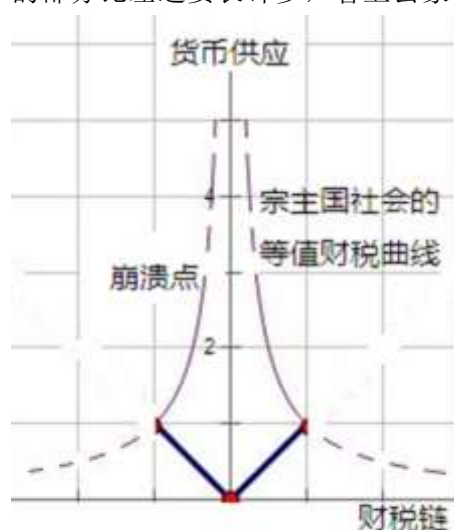
第一个历史阶段的图案是“熊”，我们称这个时代为“熊型”阶段：“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但 7:5），且进一步指出，“脚像熊的脚”（启 13:2），意味着相应的图案有“熊脚”般的样式。该阶段，虽然国际社会的经济形态仍处于以色列类型社会与专制社会共存所形成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但这时处于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已经开始主导国际秩序，包括建立国际组织，订立双边甚至多边国际条约，造就较为完善的国际法体系。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信仰，借助国家和国际力量，更迅速、更有力地在全球传播，极大提高了全人类的信仰水平。在经济领域中，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也已开始成为国际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从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的数据看也如此，中国自 1700 到 1820 年间 GDP 有明显增长，后来大致保持不变。欧洲迅速增长，经济总量终于和中国持平。此时中国是清朝时代，欧洲是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过渡时代。中国自 1820 到 1900 出现小幅下滑，后保持不变。欧洲增长速度几乎呈几何速度，GDP 迅速高出中国三到四倍有余。此时是中国是清末年间，欧洲是垄断资本主义诞生……正如我们讨论过的专制社会历史规律一样，这个处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的国际秩序，照样无法承载国际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或剧烈波动，也难以逃脱定时灭亡的历史规律。以 1763 年英国签订《巴黎条约》成为世界头号殖民强国开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的世界历史都处于这个《圣经》中描画的“熊型”历史阶段。下面我们详细讨论一下。

18 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让技术领先、经济增长迅速的英国，开始利用竞争优势，按照自由贸易政策，从其它地方进口食品和其他低价值商品，并用节约出来的劳动制造高价值的商品用于出口。比较优势使英国达到了颠峰，并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其经济和军事上不同英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英国从殖民地获得低价初级商品（如粮食）、出口高技术的工业产品，获得了巨额贸易顺差，在金本位制度的制约下，这些收入成为支撑其建立更多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和动力来源，形成了一个循环模式：利用殖民地获取更多的低价商品（财富或物资）——出现巨大贸易顺差和极轻的财税负担（给本社会工业等经济发展留下更大空间）——建立更多殖民地——出现更多贸易顺差和更大发展空间……在此后、特别是在一战前 50 年内，并未再产生更大、更多的技术创新，支持其经济发展按照工业革命时的模式（财税链长度持续扩大或舒张）继续前进。但是，由于金本位制度的约束，英国本土经济中，也并不存在超出其原有经济模式下所需要的货币供应，贸易顺差所带来的超量货币供应被全部转移为开拓新殖民地的费用开支上。因此，英国本土社会始终保持着货币

闭合运动状态，没有因与殖民地专制社会的紧密联系而发生任何改变。上述历史事实充分显示出英国殖民地的扩张动力，并非技术因素或建立在不断的技术进步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货币因素、建立于已有技术的市场份额的简单扩大上。世界工厂、大殖民帝国的特殊历史地位，在缺少技术进步的支持下，使英国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组织的完善和经营管理方式的改进等方面，逐渐停滞。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 50 年间，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初级产品高度依赖殖民地的供给，到一战前，英国本土产品自给率，小麦和面粉为 79%，大麦为 42%，燕麦为 46%，牛奶为 5%（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下卷 119 页，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英国消费的食品，本国生产的不足一半。英国占出口主导地位的始终是纺织品等传统产品，工业技术发展缓慢，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市场规模的扩大，即新殖民地的开拓来完成的。由于人类社会对货币供应的统计始于 1970 年代，我们现在难以找到殖民地时代的英国及其殖民地社会中的货币供应数据，但仅仅从现有的定性描述和其它经济数据，也可以清晰地判断出英国的经济发展自工业革命后逐渐陷入到越来越依赖货币因素、越来越远离技术因素的模式中去，即处在闭合等值财税曲线的上半部分。整个殖民地时代，英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未能延续工业革命中以技术为主要推动力的途径，是其社会的信仰水平前进速度减缓、停滞的结果，其越来越依赖国际贸易和殖民地扩张，就是这种社会信仰状况的外在表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殖民地模式崩溃的起点。处于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的宗主国们，要开始为维持与殖民地社会共同组成的国际秩序，向殖民地社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大战中政府开支剧增，英国被迫中止实行多年的金本位制。在摆脱金本位的锁链之后，通货出现迅速的膨胀，财税形成比例中的货币供应量因子随之快速提高，开始沿闭合等值财税曲线不断向上移动。与此同时，殖民地社会长期被掠夺，无力负担高昂的战争费用，且社会形态仍然延续原来的专制社会制度，其社会成员即使身处英国法律环境中也并未享受到英国社会给英国人提供的那种社会保护和幸福。因此，英国及其殖民地社会所共同组成的国际经济环境，是一个典型的非闭合运动的货币体系，长期处于等值财税曲线的上半段；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起点，财税形成模式开始沿等值财税曲线向上、向崩溃点方向单向快速移动。按照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四十年存续定律，这个移动的历史过程不应超过 40 年，也与世界历史完全吻合：自 1914 年 7 月 28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于 8 月 12 日对奥匈宣战）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时 31 年。“熊型”时代的具体形状如下图中实线部分的图案所示，由于宗主国的优势一开始是建立在技术优势上的，右边曲线在靠近财税链轴

的部分比左边要长许多，看上去象一只“熊脚”——与狮子、豹子的小脚爪不同的长脚。



熊型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示意图

英国社会信仰水平的提高，让英国建立起了以色列类型的社会，造就了货币的闭和运动体系，使得金本位制度可以放弃和废除。但是，与殖民地共同组成的非闭合货币体系，却让本来处于主导地位、此前处于货币供应体系一直被“输血”的英国，在一战时产生了为维护殖民地（自治领）利益不得不对这个非闭合货币体系进行输血（货币转移或货币流失）的尴尬，造成了英国货币闭和运动被冲破的潜在危机，是英国于 1925 年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根源。恢复了金本位制，保证了货币在英国社会中做闭和运动。自此，英国社会信仰的自我修复机制，以未来经济危机甚至更惨痛的方式或代价为赎罪祭的新形式，彻底结束了社会信仰被殖民地利益所诱惑而无法前进的状况，让英国社会形态在“熊型”货币体系崩溃瓦解时全身而退、保留下来。第一次大战之后，英国开始从殖民帝国、世界工厂的峰顶一步步衰退了下来。英国经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不景气，演变为滞胀状态。1925 年恢复金本位，使英镑价值固定在黄金上，结果是提高了英镑的汇率，造成进口增加，出口减少，彻底暴露出英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之前的出口或经济发展，只是建立在货币根基上而非技术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只能是通过提高利率以减少资本净输出，来平衡外贸方面的净输出的减少。但提高利率却造成国内投资需求不振，失业人数增加。庞大的失业大军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降低失业率便成为英国朝野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金本位制的恢复，很难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刺激就业，因此从二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提倡以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也就是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刺激就业。但是以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为基调的“财政部观点”反对用公共工程缓和失业。结果英国经济在 20 年代的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大危机爆发。其后，为推动经济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凯恩斯理论走向前台，但却无力和不足以从根本上帮助英国经济避免和治愈滞胀。

西方经济学上所谓的“英国病”——经济发展中的长期滞胀，其实是在技术创新不足的时代，经济发展动力中的技术因素不足，或财税链长度舒张无力。对这种状态和趋势，利用货币政策充其量只可以缓解和拖延，但并不能根治，原因很简单：货币在任何时候，从其本质上讲都不是社会财富和幸福的真实来源，虽然它也是社会财富和幸福从人类科学技术中脱壳而出、或现实化的过程里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当然，“英国病”也显然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或内在矛盾，它只是社会信仰问题，说明社会信仰长期徘徊不前。克服它的根本途径，只在于提高社会信仰的水平、程度，激发技术创新的更大潜力。凯恩斯理论，无力

解决社会的技术创新能力即如何舒张社会财税链长度的问题，自然就会遇到其无法治愈的经济学理论上的“英国病”难题——凯恩斯理论的前提之一就是假定科学技术水平不变。

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社会信仰划时代调整的准备，是流血的救赎，此后回归社会信仰自动前进的原有轨道，也是英国等西方社会痛苦地舍弃、割离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保留或稳定在货币闭合运动的状态中，彻底经受住了诱惑和动摇的信仰考验，并最终确立完成了西方社会信仰和全人类信仰水平整体上升的趋势和结果。最具代表意义的是，二战之后，众多殖民地国家独立，其中，社会信仰水平较高的社会直接确立了与宗主国一样的社会形态，如印度、南非等，极大扩展了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世界版图；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组织，也比之前的国际联盟等国际组织，更强有力地维持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价值观成为普世价值观。

20 世纪 30 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过一系列关于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效果的文章，发展了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的理论，他越来越相信经济系统不会自动地沿着一个曲线即经济学所谓的最优生产水平前进。可是他既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有找到一个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非闭合货币运动正是凯恩斯未实现的梦想，他没有验证自己的猜想，是限于他对货币功能的认识局限性，凯恩斯要找的另一个曲线，就是非闭合货币运动中双曲线或双曲线中的位于第二象限中的那一条曲线，他全部的梦想说到底，只是如何尽量延续一个非闭合运动货币系统的存续时间或寿命。凯恩斯要找的证据早在《圣经》中启明，也在《圣经》中表达了出来。殖民时代的英国，对这样的一个曲线的存在，自然应该有更强烈的感受，因为那时的英国就处于这样的一条曲线系统中，只不过是恰好处于第一象限的曲线中，无法看到第二象限中的那一条曲线。

第二个历史阶段的图案是“豹”，我们称这个时代为“豹型”时代：“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但 7:6），并进一步说明，是“形状象豹”（启 13:2），意味着图案具有豹子身体的形体特征。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今，直到 2018 年中国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崩溃前，国际社会均处于这个历史阶段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的国际秩序逐渐建立起来，以联合国、北约和欧盟的成立最具代表意义。战后国际秩序自 1945 年至 1991 年的冷战时期，整个西方社会的财税模式从马歇尔计划的货币推动型开始，逐渐分化，形成了与其社会信仰水平状况一致、稳定的闭合货币运动模式，如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日本社会，至今仍是货币推动型的闭合货币运动，美国社会是技术推动型的货币闭合运动，欧洲大部分国家却是介乎美日之间的平衡货币闭合运动模式……前苏联等专制社会阵营，1955 年 5 月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后，纷纷走向加强意识形态控制、沿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向下移动的财税模式。两大社会阵营在冷战时代，绝少经济交往，并没有形成一个交叉统一的国际经济环境。因此，前苏联阵营为核心的专制社会都因专制者一味追求思想控制，虽有一定的科技创新，也无法形成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无一例外地坠入单一社会或国家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 40 年存废规律之下死亡，其中，社会信仰未成熟地区，改朝换代继续留在专制社会形态中，如前苏联的俄罗斯地区；社会信仰成熟的地区，直接进入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形态，没有发生“熊型”时代社会转型时要经历的惨烈、长期、与世界大格局纠缠在一起的武装暴力战争，纷纷和平转型，如前苏联地区的波罗的海三国、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其它地区的专制社会，也在该阶段呈现出相同的社会和平转型规律，最典型的如台湾社会，自 1949 年至 1988 年的 40 年内，社会信仰水平不断进步，容许不同政党、解除戒严令、实现国民代表和总统直选、住民自决，至 1989 年的台湾县市长与立委选举时，社会信仰进步带来的社会形态和平转型早已悄然如期结束并结出硕果；再如自 2010 年年底在北非和西亚的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反政府运动，即著名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文：الحرية الثورات），也是要

么社会和平转型成功、要么改朝换代留在专制社会形态中，都没有出现长期而惨烈的大规模战争。

不断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专制国家，在 40 年存活期内的较早时间开始，彻底转向货币、财富控制模式，实现从彻底排斥货币、物质财富的意识形态单向加强模式转变为仅仅依赖货币手段的单向加强模式，并被世界所接纳，成为成就“豹型”国际秩序并决定其生命周期的关键性因素，如 1978 年之后的中国。而其它进入货币和意识形态双重控制的传统专制社会国家，如俄罗斯、朝鲜等国家，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边缘化或者依赖者的地位，对“豹型”国际秩序产生的影响力，只能通过中国体现出来或根本不具有任何作用。下面让我们具体讨论一下。

1949 年至 1976 年的中国社会，走向不断强化意识形态控制的单向车道，及 1978 年之后至今走在只有货币操控的另一条社会控制的单行道，都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的特点具有内在联系，是其社会意识形态或信仰本身所决定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圣经》信仰在社会转型或新社会诞生问题上，存在根本对立的观念。《圣经》中，人类社会是被造物，与所有被造物被分为洁净和不洁净两大类一样，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是洁净事物，专制社会是不洁净事物，它们都适用《圣经》中载明的洁净事物（或系统）法则。《圣经》中的所有不洁净系统，都是指特定的、脱离构成这些系统的元素和部分而独立存在的一个系统观念或事物。例如：猪作为不洁净的食物不可吃（利 11:7-8），但与构成猪的蛋白质、水和各种化学元素相同的蛋白质、水和各种化学元素，本身却都是洁净的，或与“猪”“猪肉”这个特定的不洁净食物的走兽、食物无关联。不洁净的社会也是如此，其中的社会成员，并非全部都根本无法具有、维持正确的信仰，与洁净社会中也并非人人都是正确信仰者的结论在逻辑上完全一样。因此，专制社会中的正确信仰者，可以采取各种行动保持、维持自己，独立于不洁净社会之外。如，他可能有机会和条件出走、或只活动于同类信仰者的圈子里、也或者可以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自绝于不洁净社会、甚至奋起传播正确信仰等等。因此，洁净社会的建立、维持和强大，都不是以不洁净社会的死亡为前提的，不洁净社会也不是死于洁净社会身上，如被不洁净社会战败等等，而是源于自身信仰的自我死亡。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却主张通过事物的内部分裂斗争、以战胜和消灭对方的方式来建立新社会。

从一个社会中分离出一个阶级、阶层并推翻旧政权，从逻辑上讲并不难。问题在于，如何让胜利后的新社会按照同样的逻辑，成为一个只有这样一个阶级、从而实现民主、自由、平等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中的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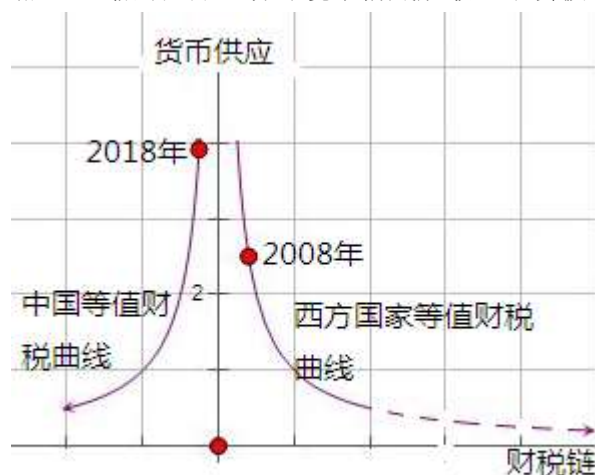
1949 年至 1976 年，毛泽东在中国，为此先后发动了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但始终无法让中国社会成为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生存之地：公私合营等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难以消除管理者、所有者（代表）和具体劳动者的差别，也难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所有这些社会差别都是基于生产分工产生的差别，要消灭它们除非消灭人类的所有生产活动。在发动武装革命、取得政权过程中一直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原则，决定了同处一个社会的被斗争的对象与斗争者始终无法成为同类，但任何时候，人们总会轻易发现原来的同类中存在着根本对立的差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史积淀下了大量不一致、甚至对立的行为评价标准，如儒家、道家虽然同样信奉人类本性论，但又存在着儒家固守礼法标准和道家的自然法则标准的差别，另外还有法家的权术标准、墨家的实用性标准等等，导致其中的各种意识形态，都亟待壮大、统一。根据我们前面讨论过的结果，已经知道，这需要社会信仰达到可以自我维护水平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模式中才能完成。但是，中国历史上始终只存在专制社会，使各种意识形态被不同专制者选择性支持，又随其衰亡一同跌入谷底。这种状况一直到马克思主义进到中国时，也无大的改观。由于马克

思主义理论本身无具体、统一的行为规范，只有一个与敌人、各种斗争对象的行为准则正好相反的行为原则，也即凡敌人赞成的，必反；凡敌人反对的，必赞成。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中国，并成为共和国主导的意识形态后，立刻面临行为规范的选择问题。它必须选择，否则根本无法行动，但其选择方式也只能延续植根于其意识形态内部的一贯作法：反对者行为规范的对立面。这让共和国建立后不久，就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反了一遍又一遍、来回折腾，如，仅在中国的文革期间，著名的重大举措和转折就包括了“大串连”、“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清查”、“五·一六”、“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再到“批林批孔”、“批《水浒》”，一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这些变化，总是随着政治权力斗争对象的变换而不停变换，总是服务于斗争的需要——标明与斗争对象的差别或路线差异。毛泽东总结到这种无穷尽又总也不能停止的确定过程时说过大量类似下面的话：“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等，充分表明只有在斗争中通过否定对手才能获得、确立自己的行为模式和评价标准的事实。一旦没有了对手，马克思主义者人就彻底陷在不知如何行动的空白地带，马克思主义根本未提供任何的行为标准体系，如类似于犹太教中的摩西法典、基督教中民主立法后形成的社会法律规范、佛教或道教中的清规戒律、儒家中的西周礼法……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经典著作中，始终不可能找到他们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必定永无休止地要斗争、革命、破坏任何现有秩序，如果它没有能力、条件对外部世界这样做，就会在内部掀起无休止的内部斗争和清洗。虽然为此让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屡遭重创（因为各种差别正是隐藏在经济、生产活动中、社会各领域及文化观念中），但仍不足以形成让毛泽东可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要求实行民主的那种前提条件：全社会所有的人都是只具备共产主义理想的人。相反，随时间的发展，他发现，甚至连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连一个真正可靠的人也没有，包括多年跟随他的身边人和政治盟友。人人仍然处在事实上的社会分工体系、不同文化观念和利益链条中，差别明显。民主在这样的背景下，会产生不确定的结果、会“变天”，会特别不利于处于社会管理者、领导者一方的掌权者。这是中国始终无法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还政于民的根本原因，即使看到民主社会对于弘扬、保障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先天的优势，也因害怕必然被民主推翻而拒绝。正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虽然在中国民众中如日中天，也只可以保证他自己不被民主浪潮所抛弃，而根本无法保证给他选出、推荐出哪怕就一个让其可以安心的盟友或合格的权力分享、制衡者。同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抛弃毛泽东式的意识形态控制模式后，必陷入与之对立的货币控制模式中，无法折中。后者，正是 1978 年至今，发生在中国社会中的历史事实。

中国在 1949 年之后的 30 年内，在 40 年规律的许可时间范围中，及时改变了社会控制方式，由日渐加强的思想控制方式，彻底转为 1978 年之后的货币控制方式，参与到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因此，国际社会完整的“豹型”时期，以 1972 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被西方社会所接纳为起点，以 1979 年中美建交前后、中国进入西方社会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转折，分为截然相反的两个阶段，在非闭合货币运动的双曲线图案中，必出现崩溃时要留下的四个端点（1978 年向前至 1972 年为一个向下移动方向，在 1972 年处出现两个端点，另外两个端点在 2018 年，处于 1978 年向后出现的一个向上移动方向上，如下图中实线部分所示），形成《圣经》所讲的“兽有四个头”现象；又因其缺少标准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中的顶点部分，即缺少一般中国传统王朝所具备的那种在思想控制与货币控制之间的混合控制的中间阶段，非此即彼，简练猛烈但短暂的历史过程与豹子发动时的身体状况十分相似而得名“豹”。

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对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极为显著。以中美关系为例，美国在上世纪 80-90 年代，出现了类似英国在殖民地时期的状况：来自中国源源不断的低价商品，让美国经济在低通胀的环境中有长足的增长，甚至一度出现了讨论财政盈余如何处置的问题（可见其减税空间或经济发展的巨大腾挪空间），但中美关系，不是英国与其殖民地的那种关系，美国事实上更接近于英国殖民地的位置，而中国更接近宗主国英国的位置：中国的主权地位，使得贸易顺差实现在中国一方，而不是出现在美国一方；英国的贸易顺差，是建立在掠夺前提下实现的非自由贸易的产物或结果。当这种让中国受益无穷（类似英国受益于殖民地）的模式出现了让美国社会无法承受的情况时，一把类似双刃剑的现象出现了：中国受益于主权国家的优势，现在轮流到了美国一方：美国也是主权国家，它不必象殖民地社会那样被动挨打，中国也无法象英国控制其殖民地那样控制世界和美国，美国 2008 年之后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世界各国随之纷纷效仿——就象当年殖民地社会纷纷掀起脱离宗主国的独立运动一样，美国等西方国家轻松地通过量化宽松的策略补上了被中国费尽几十年抽走的货币流动性或供应量，开始摆脱国际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影响，回归各自的闭合货币运动轨迹；与中国同为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且只要产业与中国具有出口竞争关系的其他专制国家，由于缺少可以替代日趋过剩的旧支柱产业的新兴产业去拉动经济增长，开始全面陷入与中国的货币战争中，出现一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独战群狼的非闭合货币体系间的血腥混战，终无胜者。而西方国家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重心和动力并不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过剩产业范围内，不在这场生死战的战场上；那些依赖中国市场维系经济发展的专制社会政权，则要全部成为中国社会崩溃的殉葬品。西方社会的量化宽松策略，与上世纪英国恢复金本位制度一样，是其社会信仰系统自我维护机制的外在表现，消除了社会信仰被经济利益所诱惑而产生的前进障碍，为信仰进步、造就更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奠定基础。随着整个西方社会重回信仰前进轨道，陪伴国际社会巨大科技进步的脚步声，中国却要发生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建立及 30 年代经济危机中所发生的一切：中国也与英国一样失去经济魅力、面临英国与其殖民地一样的社会动荡状况和旧秩序必然消亡的情景，一个类似前苏联的新专制政权会出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专制社会土地上……从中国当代的社会信仰程度来看，这个无神论社会的大部分地区还只能在专制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延续。无法抵抗的货币闭和运动的自我修复力量、或无可挽救的货币非闭合运动的死亡，怎样让英国与其殖民地共同组成的非闭合货币体系坍塌、也怎样让中国的人民币系统坍塌，也怎样让美国等当今世界主要国家自动补上信仰的破口，捍卫了货币的闭和运动和体现了当今世界人类信仰水平的进步和提高——已非上世纪英国时代的信仰水平所能比。当今世界贸易一体化，国际经济模式是一个典型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其爆发力量惊人却缺少持久性，如同一头瞬间启动、高速奔跑中的豹子的身体，几何图案如下图中的实线部分所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 2008 年之后，先后脱离了“豹型”国际秩序的束缚或诱惑，图中右侧曲线中的虚线箭头所指方向，是美国的财税模式走向，即财税链因子的比重自 2008 年之后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科技创新。现在这个过程正在进行当中，仍未完结，要一直持续到 2018 年中国社会崩溃之后。当前来看，美元加息、特别是美国不需要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已经是非常肯定的未来事件，清楚表明，美国经济已

经从一个中国持续输出低通胀、通缩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彻底脱敏，不会被二战之后形成的国



豹型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示意图

际秩序的崩溃而彻底击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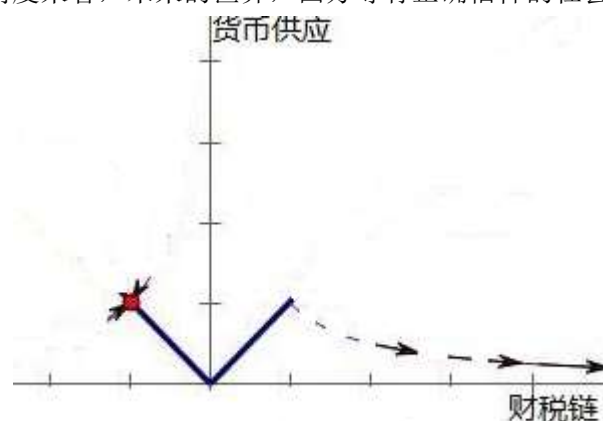
英国与其殖民地社会共同构成的整体社会，处于一个非闭合货币体系中时，把社会财富或“多余”资金（集中于贸易顺差或外汇储备中）继续用于这样的世界——扩大殖民地范围，最终建立起“日不落帝国”体系，并伴随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崩溃而走向这种世界秩序的死亡；中国却正好相反，它把外汇储备和贸易顺差，主要用于国内——发行等量的人民币，扩大国内的货币供应。二者本质完全相同：都是将资金用于本系统之内，成为触发货币非闭合运动死亡机制的扳机。当然，中国有更多、更大的货币供应渠道和供应数量，如其不受控制的公务员、事业人员工资和福利待遇、无人知晓的地方政府债务数量、无底线的国企银行贷款等等，造成其自建国以来的整个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理论寿命不足 80 年，远逊于英国等宗主国主持下的“熊型”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实际寿命。从信仰的角度讲，二者都是贪婪和败坏——假设中国将这些资金投向世界市场，形成贸易盈余与投资逆差的对冲，而不是不断的人民币超额发行和为满足于控制政权需要的更大规模的货币超发，中国可能将会象历代王朝一样延续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政权生命；英国若把资金投向殖民地之外的经济领域，靠信仰水平的提高激发出更多的技术创新，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也要晚很多年甚至完全不会爆发。

1978 年之后的中国，与《圣经》中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王国，也有很大的区别：所罗门时代，因其社会经济未加入国际贸易或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变化不大，社会生产一直被压抑，劳动力成本或费用无上涨的压力，突出表现为“（推罗王希兰曾照所罗门所要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所罗门王就把加利利地的二十座城给了希兰。”（王上 9:11）及以色列金银收入大量来自他国贡献等方面；而 1978 年后的中国社会，由于经济深度介入国际贸易，依赖货币供应形成国际市场份额不断扩大，出现过剩产能严重的问题。特别集中于国企投资及与贪腐官员官员相关联的社会投资领域。造成在过剩产能领域中的无效就业（指无法产生利润和财税收入的就业）规模庞大，劳动力供需关系持续紧张，一方面提高了劳动力工资成本，出现人口红利消失的假象，另一方面，高工资又阻碍了新兴技术产业的出现和发展，堵塞了舒缓无效就业的途径，致使经济运行中出现越来越大的死结。无效就业，与公务员、技术或事业人员（如教师、医生等）的财政无效投入（指不产生维持社会信仰成长的社会效果的公共投入）一样，共同构成财税支出效率低于其它经济领域的现象，是牵引货币供应量不断超过财税收入而上升的内因、也是社会无法阻止货币的边际幸福效用下降的表面和直接的原因。因此，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王国的崩溃，与国际社会和贸易伙伴无关联，不具有国际影响力。而中国的崩溃，却要对依赖中国经济及与中国具有竞争关系的经济体，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豹型”国际经济秩序崩溃的根源和结果。

历史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效果时好时坏，完全决定于国际社会非闭合货币系统的力量强度。效果明显的时期，都表明来自外部的牵引信仰向下行走的力量在加强——这时，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信仰需要公权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该理论遇到危机或效果差强人意时，都表明国际社会对抗正确信仰的力量式微或在走下坡路——这时，以色列类型社会对公权力的依赖减少！上述运动的周期也与国际社会政治环境完全吻合，如二战结束至1970年代，专制社会力量进入稳定期，非闭合货币体系的力量外溢较小，凯恩斯主义遇到危机；中国崛起的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在不断加强，就表明了中国力量或人民币的非闭合货币体系的局部影响加强，西方社会需借助更大的公权力力量才能抵挡其经济下滑的危险，凯恩斯主义又盛行……二战后苏联崛起，是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苏联倒台前后至中国力量强大前的1980至1990年间，人民币的非闭合运动体系外溢相对于整个西方社会而言还较少，新凯恩斯主义又流行，表明专制社会的力量或败坏信仰的力量在下降，凯恩斯主义被反思、小政府思潮在西方泛滥……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经济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看，正好相反：是个人信仰组成、汇合成的社会信仰的水平，决定了宏观经济的一切包括其发展趋向，反过来，这种趋向必然表现为制约个人的特定、事实上是所有的行为。西方经济学用复杂的理论所建起的学科体系的缺陷，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就被简单地破：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 22:21），西方经济学至今却还不知“凯撒的物”为何物，阿门！

人类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也具备如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勒内·笛卡尔（法语名：René Descartes）等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发现过或强烈感受到的那种超人力的完美与和谐。通过社会经济学和社会货币学，在《圣经》中，社会领域如宇宙自然世界一样的和谐被完整地解读出来：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具有无比和不可超越的、神赐的科技创新能力，而无神论者的专制社会，在“世事之上”，如在货币或货币手段、货币策略的使用领域方面，同样具有无比强大的、神赐的优势，正如《圣经》中的经文所讲：“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路 16:8）。两类社会或两类社会信仰成为相互制约、监督、试探的一个整体或自动化系统，用中国的俗话说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系统关系。当有正确信仰的社会出现信仰错误、败坏时，它所具有的科技创新能力，会出现下降且无法帮助它战胜专制社会（或非闭合货币运动系统），因为这时的专制社会可以利用货币的非闭合运动在生产领域轻易地击败它，正如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在智能手机、电脑、光伏产品、核电设备、高速铁路等新兴制造产业和在钢铁、水泥、服装、机电、假发、打火机等传统产业领域中，占据了极大的世界份额，赢得“世界工厂”的称号（英国在操控殖民地社会而成就一个“日不落帝国”式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时，也有过同样的桂冠）；而当有正确信仰的社会，出现信仰洁净、修复信仰破口时，它所具有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提高，又会帮助它恢复经济稳定、重新建立和恢复经济辉煌，而无神论者的专制社会（或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这时却会受到来自西方社会实施的类似高科技贸易限制等等有效隔离政策的影响，在获取新技术的能力下降（如英国主导的殖民地与宗主国间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或缺少了足够的新技术的注入、转移的支持（如现代中国）后，经济发展在非闭合货币运动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出现自动收缩直至崩溃……二者的互动，最后只会出现人类社会信仰更洁净、信仰水平更高的结局，直至带领人类社会来到《圣经》中描绘的“千禧年”时代的门前。当代美国社会一直希望中国社会可以做到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事实上，这是一个两厢情愿才可以完成的任务或社会的、信仰的工程：没有美国等西方社会信仰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设立了法律和社会的门槛，西方社会中总会有人将最新的科技成果转让或亲自到中国来实施，因为中国有技术现实化或财富化最便捷的货币环境，可以让科学

技术在一夜之间充满所有市场、变成巨大的货币财富，甚至，连这种技术的过度应用、非法使用的财富空间或市场也一并囊括；同样，没有中国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存在，西方的技术创新或掌控者，缺少货币供应渠道，即使其利欲熏心，也无可奈何、展露不出来。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未来的世界，西方等有正确信仰的社会，由于经济发展都摆脱了对货币



无脸兽型非闭合货币运动曲线示意图

供应的依赖或倚重，完全依赖技术因素或技术创新因素，既没有象殖民地时期英国一样的货币输出需要，也没有象当代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的货币输入或外来投资需求——频繁的技术革命，让任何新技术的应用或使用，都不再也不必为追求利润或金钱而穷尽其一切的潜力，正如《圣经》中所要求的那样：“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利 19:9-10）也如《圣经》中“路得拾麦穗”的故事（得 2:2-23）所启示的那样会因此得福；被强大国际力量制约的“乖宝宝”类型的专制社会，被迫顺从国际社会的要求，严格依国际法行动，被深度融入到国际社会，成为以色列类型的国际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名普通成员。那时，专制社会中的生产和经济活动，因为有持续不断且巨量的国际技术转移，既没有了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山寨经济”，也没有肆无忌惮地破坏自然环境等贻害全人类的现象，安分守己地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的末端，专制者随意使用货币手段而不会掉入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 40 年存废规律的陷阱中。正如《圣经》中所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太 15:27；可 7:28）。因此，未来的“乖宝宝”类型的专制社会和西方社会的共同体或国际新秩序，是一个专制社会彻底告别经济发展波动不定状态、从而彻底摆脱货币非闭合运动体系存废规律制约的时代，同时，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也都进入技术推动型经济发展模式下、越来越快地爆发技术革命的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如图所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以减少货币供应或去货币化、或减少经济发展中对货币供应因素的依赖程度的一种经济体系，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当今世界，以中国社会长期持续的货币超发和 2008 年之后全球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好相反。这个国际社会的历史新阶段，就是第三阶段，图案为一个坐标系中间部分大面积空白的奇怪图式，我们称之为“无脸兽”时代。在《圣经》中，如此描绘这只看不到脸面形象的怪兽：“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踏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但 7:7），并进一步将其与我们前面所看到过的兽，即所有的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包括单一国家或社会中的“狮型”，和我们刚刚谈到的国际社会中的“熊型”和“豹型”，一起赋予在一个统一的“兽”形象中：“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它。”（启 13:1-2），表明所有非闭合货币体系的同一特征、作用和来源——都集中于公共财税收支所在的公权力领域，同时，“无脸兽”在这个统一的

大兽身上，也是以这个大兽有头有角却没有脸面形象的形式表明出来的，始终没有漏出的脸面，显示出图案中左边的曲线部分极度压缩为近乎一个点，右边的曲线位置会非常低、距离第二象限非常远。

在本文完稿后的修改过程中，传来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达成最终协议的消息。该协议的重点在于以美国为首的以色列类型国际社会，采取了“以技术和市场换取（专制社会）部分国家主权”的成功策略（减少知识产权的保护期及协议范围内的技术自由贸易），可以有效抑制专制社会使用货币策略的机会。由此，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迎来技术战胜并主导货币的国际社会新模式，是让专制社会逐渐走向“乖宝宝”的一个正确选择，也是整个“无脸兽”时代的最鲜明特征之一。按照该国际协议正式生效的最快时间来看，也十分靠近“豹型”国际秩序和中国社会崩溃的时点——让我们拭目以待，看 TPP 能否成功成为社会经济学和《圣经》中那个“无脸兽”时代的历史开端或历史性标志。

整个“无脸兽”时代，从 2018 年底（间或 2019 年年中）开始——“豹型”国际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被摧毁后，要一直持续近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时间才会结束，具体计算过程在下一节。

综上，从信仰的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社会信仰不断自动进步、净化、升华的历史，不可阻挡，《圣经》中具体、形象地描绘这个历史过程是一场“公山羊战胜公绵羊的”战争：“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它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角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忿怒，向它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它发烈怒、舐触它，折断它的两角。绵羊在它面前站立不住，它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踏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它手的。”（但 8:5-7）。其中，“公绵羊”的形象，我们在上节中已经知道，是专制社会或其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代名词；“公山羊”的形象，就代表着国际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包括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 3 个阶段或 3 个历史时代。上面的经文说明，人类社会信仰的进步，是一场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之间——一个国际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与一个或多个国家内部的非闭合货币体系之间火拼、两败俱伤的结果。在国际性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无论是“狮型”时代相互打碎阻碍信仰发展的旧专制政权、“熊型”时代对全球所有的专制社会发起全面进攻，也无论是“豹型”时代快速消灭进入到国际秩序中枢的专制政权，还是“无脸兽”时代对专制社会的最后歼灭战，都表现出任何社会理性（包括兽性）均无害于人类信仰进步、相反却有利于全人类信仰水平的升华的事实——正像在具有信仰自我修复能力的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曾经证明过的那样，经济理性不仅无害、甚至有利于以色列类型社会的社会信仰发展一样，全人类的整体信仰发展也是一个具备自我修复能力的闭合系统。与此同步，全球范围内的货币始终处于一个大的闭合运动中，表现为非闭合货币运动系统间不断冲突、造成不断的崩溃并最终同归于尽后彻底消失，同时闭合货币系统不断涌现、不断壮大并最终统一全球的过程。信仰发展控制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就像物理学、数学规律表现地一样精准、自动、可预测、可重复……人类社会在完成了所有地区、所有人群的信仰均达到自动升华的程度、公共权力机关和货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神圣使命后，才蒙神喜悦、接受并交到基督手上。

第四节、货币运动规律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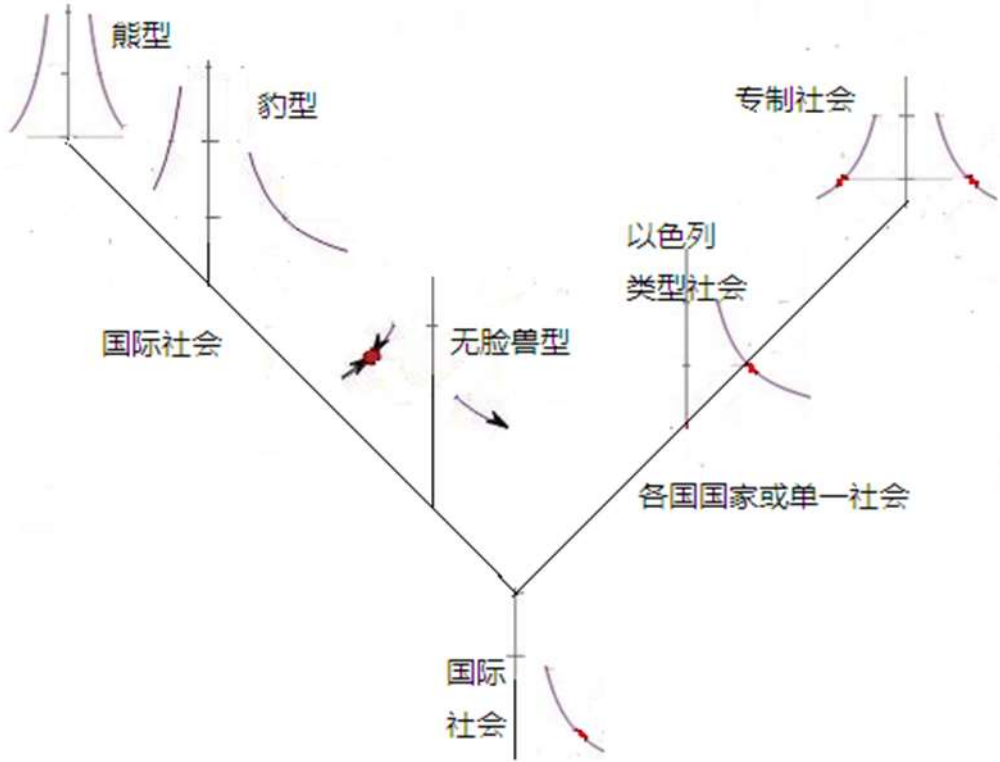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知道，人类社会的信仰，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其中，第一个大阶段是社会信仰萌芽阶段。这个阶段是没有统一国际秩序的丛林时代，以色列类型社会和专制社会各自按照本国的利益任意而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或国际贸易（即没有互利共赢的“非零和”贸易秩序），各国都力图统一他国，实现货币的延伸或

统一；或者力图不被它国吃掉，维护本国货币的存在，阻断他国货币的延伸或统一。因此，这个阶段的国际货币运动，呈现为各国、各个社会的各自货币运动体系的固有规律。结合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阶段中的所有货币运动体系，按照货币幸福度的变动规律共计有 6 类。其中，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和专制社会中各有 3 类。第二个大阶段是社会信仰“在波动中上升”的阶段，借用辩证法中的一句名言来描绘，就是社会信仰“螺旋式上升”阶段。这个阶段中，国际社会秩序有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共同维护，国际贸易从出现到壮大发展迅速，国际经济中的货币运动呈现为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中的“熊型”和“豹型”“无脸兽型”3 个形态。最后一个也是第三个大阶段，是社会信仰水平自动、直线、连续上升的阶段。该阶段，是国际社会秩序的领导力被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完全占据的时代。但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专制社会和国家仍然存在，它们虽然持续不断地在萎缩、消亡，但还未彻底消失。货币运动在该阶段的国际经济中呈现为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的右闭合货币运动形态——残存的专制社会、地区或国家，就像现代社会中的黑社会一样，其中的货币运动无法改变国际社会的整体货币运动形态。由于第二和第三两大阶段中，都始终还存在着两类不同形态的国家和社会，因此，从货币运动的体系来讲，也都有 6 种不同类型的货币。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之后，人类社会信仰开始自动直线提高，社会形态和货币运动类型单一，且社会 and 货币都进入到快速退出历史舞台的新阶段，货币运动规律标示社会信仰状况的历史使命完结。

综上，按照人类社会信仰发展的阶段，各有 6 类不同货币处于社会信仰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中，随时随地准确反映出所在社会的社会信仰状况。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圣经》中为什么将货币的数目记为“666”：“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启 13:18）。

另外，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还可以把社会信仰的整个发展进步过程，构造成一个由三个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连接的直线段组成的“Y”型进程图：第 1 条直线段是连接以下两个历史时点的连接线，第 1 个历史时点是低水平信仰造就出专制社会形态、第 2 个历史时点是正确或高水平的信仰造就出以色列类型社会。这一条线段贯穿起社会起源和社会形态出现的先后顺序，表示社会信仰从无到有、及在单一国家或区域社会中的发展进步历程；第 2 条直线段是社会信仰从丛林般的无信仰国际环境中出现、先后历经“熊型”“豹型”“无脸兽型”3 个成长阶段的发展轨迹，表示出国际社会信仰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第 3 条直线，从“无脸兽型”阶段的末尾、信仰大考验后被救赎到单一的以色列类型的国际社会秩序中为起点，一直到社会、货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前，即“千禧年”到来之前的最后阶段。以上 3 条直线段，在第 3 条直线段的起点处连接在一起：第 2 条线段的终点即“无脸兽型”的国际社会的末期（信仰大考验的临近阶段），已经是一个无限接近、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社会中的闭合货币运动体系：那些残存的专制社会，在那时的国际社会，十分类似现代西方社会中的黑帮或犯罪集团，其中的货币运动，从稍稍长期的时间来看，都是根本无法改变整个社会中货币做闭合运动的特征的（货币在全球统一）——这像极了在一个以色列类型的时间社会中出现了一个或几个等待被发现、被打掉的正在非法营业的犯罪集团。因此，第 2 条线段的终点，与第 3 条线段的起点，及第 1 条线段的终点即单一以色列类型社会的闭合货币运动体系，都是相同、重合的。如下图所示，是一个十分类似动物羊或羊角的图形。至此，我们更容易理解上一节中讨论过的《圣经》中有关羊与羊之间的那场战争。这个图形中的曲线个数，共有 10 个，所包含的人类生存形式共有 7 个：图中的 6 个都是社会形式，另外 1 个是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产生之前、有众多专制社会和无信仰群居部落共同组成的非国际社会秩序的人类全球生存模式——因其即不是单一的社会或国家，又不是具有信仰的国际社会，故无法在图中表示出来。如此，我们不难明白《圣经》中反复提到、被称之为“七头十角怪兽”的（参见启 12:3、17:3、17:7 等），正是图中这段人类信仰无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在单个的国家社会中，都不能直线提高的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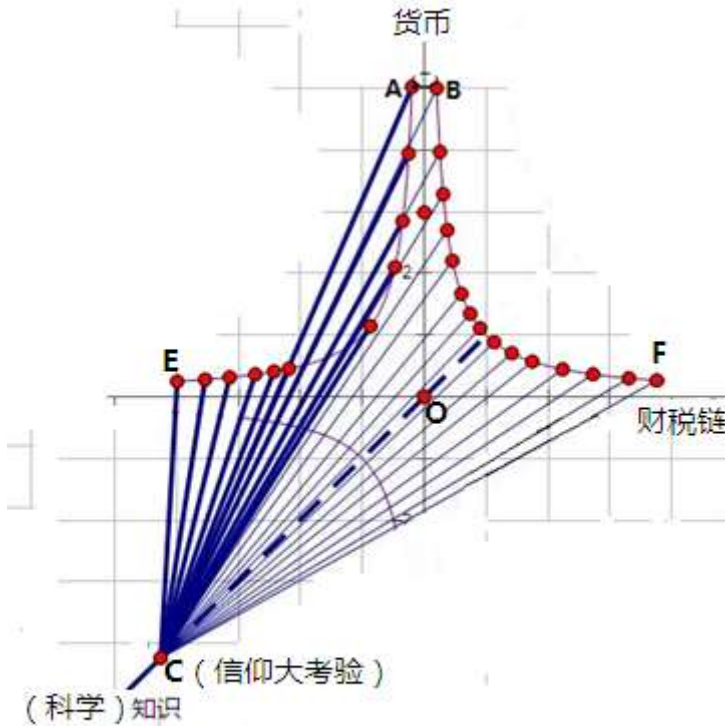
代。这个时代从世界历史上出现第 1 个以色列类型的社会开始，至信仰大考验之前为止，按照《圣经》中的预言是 2300 年（但 8:14）——根据这个预言，结合世界历史上第 1 个以色列类型社会即“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的诞生时间是 1689 年，至公元 3989 年左右迎来“无脸兽”时代末期的信仰大考验，整个“无脸兽”时代从 2018 年左右开始，要持续长达 1970 年左右。同时，人类信仰迎来完全依靠法律和科学进行传播和发展、所有依赖其他方式传道的教会和教堂等传统宗教机构或场所都退出的时代至今还有（1970 年-1620 年）350 年左右，依据来自《圣经》中的以下经文，“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一千二百六十天。”（启 11:3）；根据非闭合货币体系的存废规律计算，在这个横跨 2300 年的历史时期内，全球的 GDP 净增长（除去货币财政政策即货币供应因素导致的债务部分）率不足 1%——比整个古罗马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要低很多！可见，我们现在所看到、能预期的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包括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贯高增长以及未来全球经济的高增长的主要动力，都还是来自于货币供应因素，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技术革命的间歇期比较长，技术创新无法承担起经济增长主动力的重任而让位于货币供应所支持的技术推广。上述这种依赖货币因素维持经济增长的状况要贯穿整个“七头十角怪兽”时期，因此图中的整个历史时代又被通称为是“一个邪恶的世代”（路 11:29）。其中，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的的具体信仰状况也共有 7 类，在《圣经》中又被称之为“7 个教会”（参见启 1:11），这些社会的信仰水平也都有可能随时出现停滞不前，虽然长期和整体来看都是上升的（详见启 2）。这 7 种不同社会信仰水平的以色列类型的社会，会一直存在到全球人类社会形态统一到以色列类型前的最后时期，现代世界上就已经布满了他们的影子，如现代美国社会，从信仰水平的角度上讲就是《圣经》中的“推雅推喇教会”（启 1:18）。



社会信仰成长全图 (示意图)

以科学技术水平或人类知识为标志或终点的信仰发展历史，就是整个人类世界历史。其中，相对于信仰发展的另一面，就是各种错误信仰、无信仰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历史或死亡史。这两个人类历史同始同终但永不相交：在起点上，分处正确信仰与各种意识形态的差别位置——即使无限接近，也不相交；在终点上，专制社会的科学知识水平也是无

限接近于以色列类型社会，但始终无法重合（理论上的重合点恰好是信仰大考验），



社会信仰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示意图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有限但无边界的“宇宙”：线段OC是有限或定长的（2300年），但点A、B、E、F沿双曲线无限延伸；其中，细线所在的曲面是正确社会信仰发展历史，粗线曲面是无信仰和错误社会信仰的发展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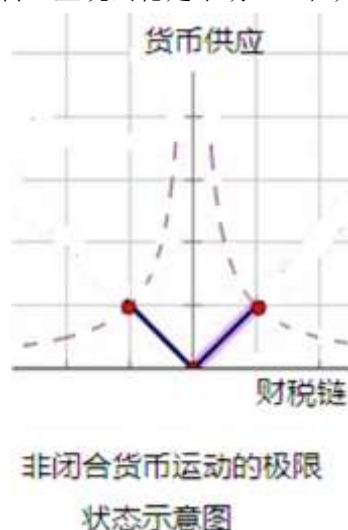
第四章：货币运动规律下信仰发展的悖论及拯救

国际社会在“无脸兽”模式下发展的极限位置，货币和社会公权力这两个“兽”（启 13）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圣经》中最晦涩难懂的比喻、梦境、和启示，也集中在这一部分。那时，专制社会中非闭合货币运动的曲线形式消失，代之以两个平衡点位置——即双曲线的两个顶点，《圣经》中将其描绘为“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但 7：8）。专制者的社会公共权力，被强大的国际组织和完善的国际法严格制约，自由裁量的社会公权力被剥夺殆尽，再无法自由使用愚化人民的意识形态和随意使用财税收入、任意发行基础货币等方式来操控所统治的国家；同时，以色列类型社会中社会信仰水平越高的国家和地区，以基础货币为代表的货币供应，从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退出或消失的越快，社会公共权力机构越所剩无几，公务员和军队数量越少。《圣经》中，对此极限位置的最后景象有明确的启示或说明——“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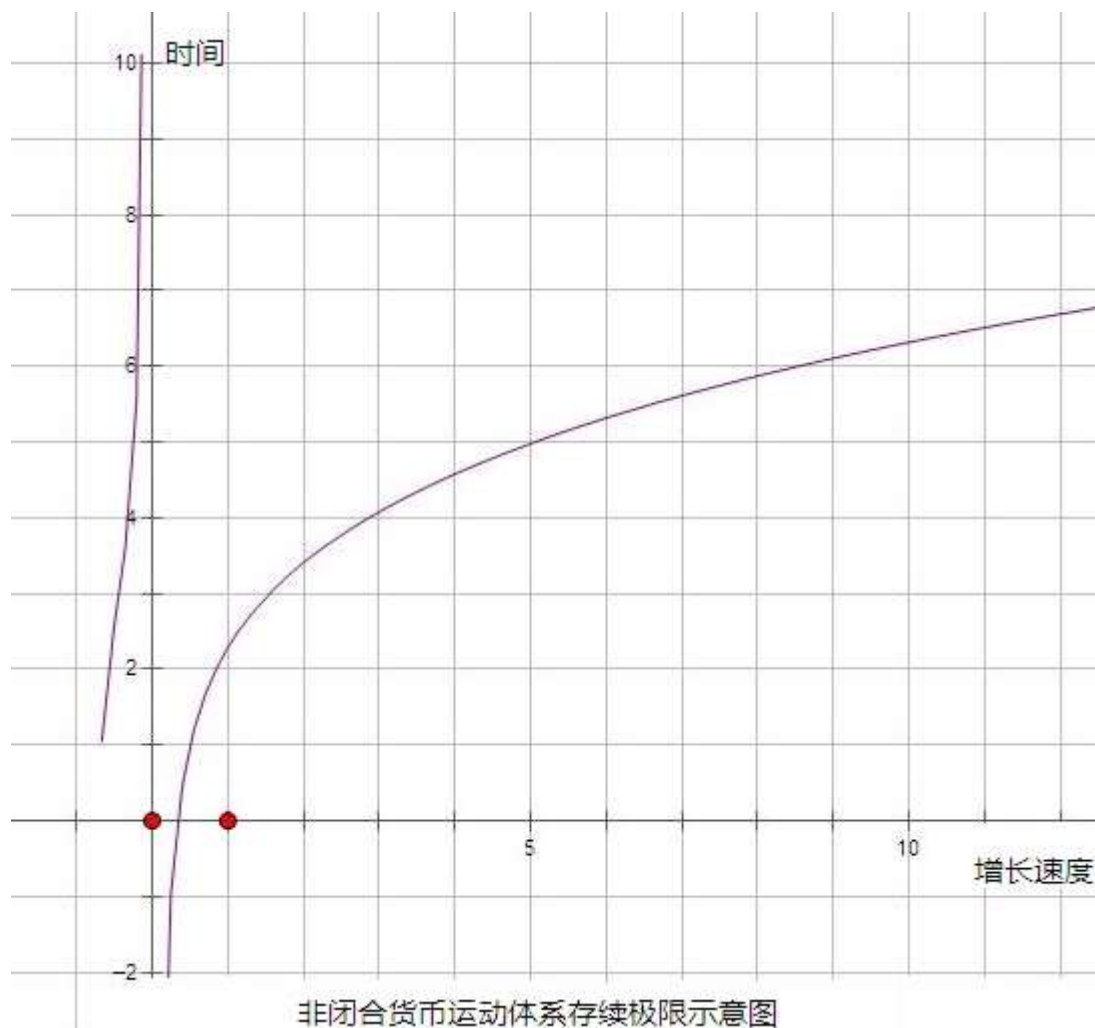
（启 14:15）、“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启 14:18），是指所有人类社会，社会信仰都完全成熟；所有专制社会，都已经发展到社会权力被国际社会所彻底制约，其货币供应量与财税链总长度已达到彻底稳定不变的极限状态。这个极限位置，从信仰洁净和扩散进步的角度讲，是人力无能为力再提高的极限。只有到此极限位置后的时刻或前提条件下，以色列类型社会才与专制社会进行无障碍、无任何防护或隔离措施的融合或接触，专制社会这时并没有真正、彻底成为“乖宝宝”，只是在一切的外在形式、行为上表现得象一个“乖宝宝”而已。因此，这时才是人类面临的信仰上最后、也是最大的危机时刻。

这个危机过去后，人类社会统一在以色列类型社会中，专制社会退出历史舞台，等到社会公权力和货币再彻底退出后，人类迎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进入到《圣经》中的“千禧年”时代。相关内容，《圣经》中有很多，就不具体解读了。

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存废规律和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三种国际性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崩溃的机制来看，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若要实现持续的存在，只要满足以下条件，理论上存在一个绕过存废规律限制、打破社会信仰水平必然提高结局的途径（或称之为社会信仰成长规律的“盲区”）：1）、处于一个足够快速产生技术革命的国际环境中；2）、彻底或深度融入上述国际环境中的国际经济秩序，消除任何阻碍国际间技术转移的障碍；3）、足够的货币供应。条件1可以避免出现“熊型”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免除被其打击的可能性；条件1和条件2结合，可以彻底弥补专制社会无法发动产业技术革命的先天不足，在大肆运用货币手段释放生产力时确保不会出现过剩产能，或者说，任何数量级的过剩产能所造成的债务危机，都可被及时而来的新产业技术革命所化解，使其等值财税曲线在持续货币供应支持下出现的向上移动趋势得以在 40 年内及时逆转，呈现出稳定不动——在几何图形上形成只有两个点的图案，



如下图中两个红色圆点所示，彻底消除“豹型”国际经济模式出现的可能性；条件 3 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国际技术转移的速度，让新技术应用和推广以最快、最彻底的方式在专制社会中完成，彻底解放新技术所包涵的、在以色列类型社会中没有完全释放的全部社会生产力，让专制社会中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经济发展速度达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高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在 1978 年至 2018 年间所创造过的两位数增长速度，实现三位数甚至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存废规律中有关存续时间与经济



增长关系的函数图像（如图所示）来看，当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超高速比如持续超过 100%后，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存续时间与财税收支速度或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呈现正相关关系，专制社会在两次技术革命间歇期中可以完全不使用货币手段而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时间越来越长，至此之后彻底摆脱经济快速增长必导致社会快速灭亡的规律限制。需要注意的是，条件 3 并不要求专制者以垄断货币发行权为前提，在世界上所有的货币统一为一种货币如比特币时，专制社会照样可以通过财税收支渠道，充分利用货币手段维持经济超高速发展。要满足以上所有条件，只能是以色列类型社会的信仰水平足够高，有更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更频繁发动产业技术革命的世界环境做基础。因此，这个产生理性悖论的邪恶时代只会出现在“无脸兽”时代的末期，也就是专制社会国家大量消失、转型后的残留、末尾时代。这个时代帮助最后残留的专制社会在国际经济秩序中自动取得支配性地位，确立了专制社会无可避免地取得压倒性国际地位的历史趋势，因之前的专制社会完全遵守国际法——包括已经使用全球统一的货币如比特币（即交出货币发行和控制的权力）等，也不再会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制约，彻底避免了与国际秩序冲突从而被后者打击的可能性，又摆脱了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存废规律的制约，彻底避免来自社会内部的崩溃机制；从逻辑上讲要永久存续下去了一——专制社会来到了不作死就永不会死的历史时点。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国际社会完全类似于现代西方社会——现代西方社会的信仰水平，现阶段乃至可预见的未来，都无法彻底消除黑帮和故意犯罪现象，将来的国际社会也同样因为人类信仰水平的限制而无法彻底铲除专制社会；专制社会也象现代西方社会中的黑帮一样，并不需要在国际社会中掌握货币发行权或任何的社会公权力，也照样可以做大、发展起来。这时，专制社会“乘人不备”运用其压

倒性的国际经济和社会力量，就有扩散和成长的巨大危险；而这时全球或全人类却已经无能为力，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等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均无法与其有效对抗——技术领域正好处于知识水平提高的平台期或社会极限区内，无法形成有效的技术优势。人类迎来最残酷也是最后的一场社会信仰大考验。《圣经》中多次将上述过程进行了形象化描写：“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角折断了，又在角根上向天的四方（注：“方”原文作“风”）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它渐渐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踏踏。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它。它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但 8:8-12）、“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但 8:25）。经文中的“山羊”，我们在上一节中已经知道是指国际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它那折断的“大角”就是人类信仰前进的脚步和当时良好有效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国际力量；随后长出的“小角”意味着专制社会控制了统一国际组织并造成后者的分裂，最终发动、领导了一场全球性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争，专制社会的信仰或意识形态随其实力增长和战争胜利有推广并占领到全球的可能，必然带来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人类社会信仰前进全面停滞甚至要迅速下降的严峻局面——“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但 12: 1）、“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太 24: 21）。假设专制社会若重新占据所有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无限循环中：专制社会无信仰或低水平社会信仰、缺乏科技创新及发动产业技术革命的本性，和专制社会必然解体的历史规律，会让人类重新回到蛮荒时代，社会信仰归零，然后重复前面我们讨论过的所有人类历史过程……对于如何结束这场社会信仰的成长危机，或如何结束货币运动规律所能产生的信仰灾难，恢复社会信仰成长的历史轨迹，《圣经》中，明确指出“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但 8:25）、“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但 7:26）、“在一天之内，她的灾殃要一齐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她又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启 18:8），再一次显示了正确信仰的全部内涵，即神是万能造物主、是一切科学规律的制定者，也是唯一可以打破最后的科学悖论的力量——一切可以被人类自己打破的科学悖论，都不是真正或终极的科学规律，都只是发展中的、有局限性的科学规律。

从上一节中讨论过的整个“七头十角兽”所在的邪恶时代看，信仰大考验时期来临时，人类的信仰处于类似以色列人出埃及时的信仰状况中：站在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起点上。未来的信仰大考验过程，也与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时类似，但由于人类的社会信仰水平已经极高，信仰考验的时间和结果都与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时不同——时间缩短了 90% 以上，即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 40 年，而信仰大考验只有短短的 45 天（但 12:11-12）；以色列人没有经得起考验，坠入非闭合货币运动控制下的专制社会中去，而未来全人类经受住了信仰大考验，迎来货币运动逐渐退出的全球性以色列类型国际社会新时代，直至在货币彻底退出后迎来“千禧年”。所以，这个邪恶时代，是一个达尔文环境时间，那个“七头十角兽”就是一个信仰发展的达尔文环境。货币运动规律与信仰发展出现的理性悖论，是达尔文环境中的循环运动，或中国道家思想中的“循环往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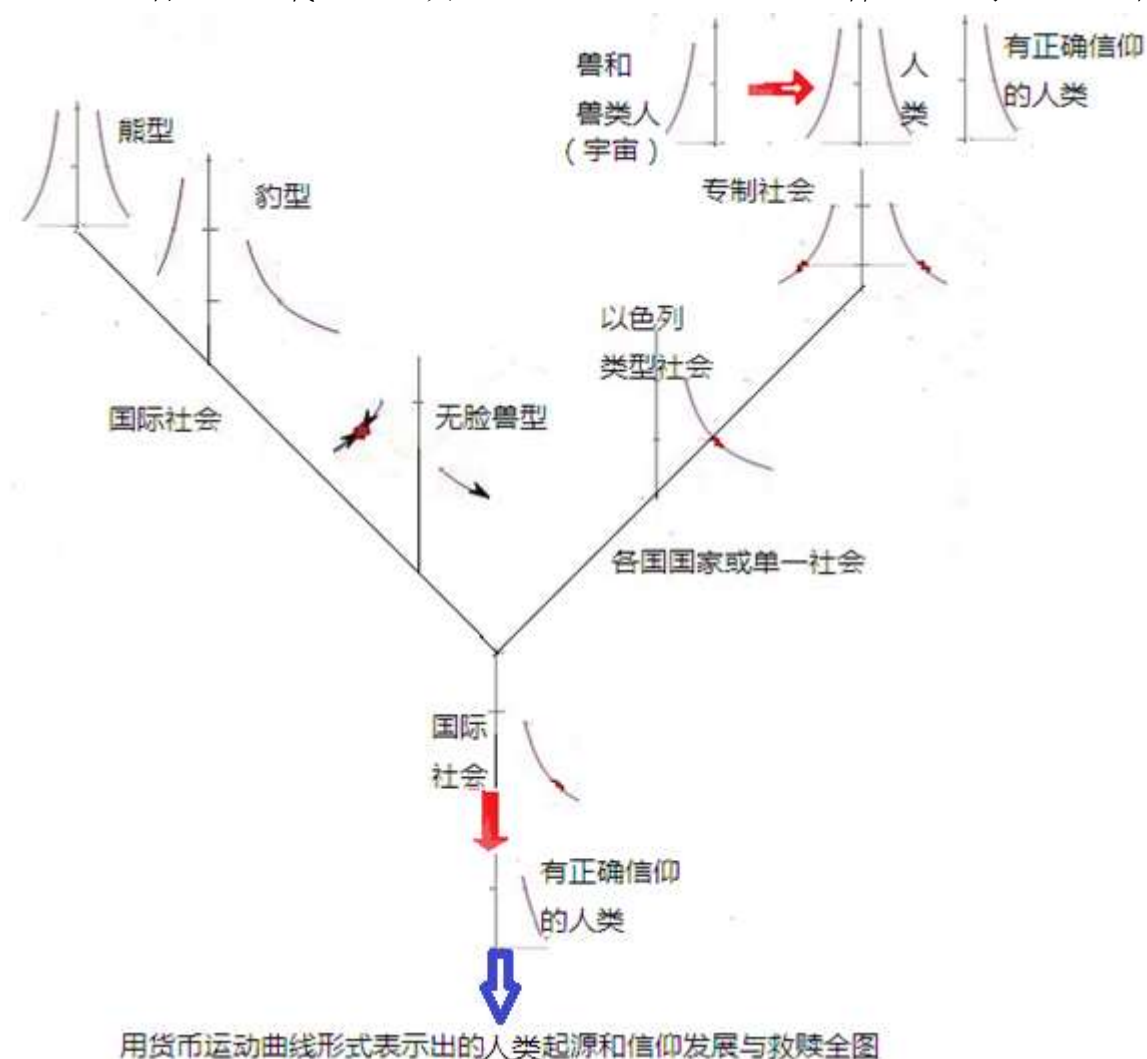
至此，《圣经》中所展示的信仰、社会系统，是一个全自动、全天候、随时随地、无所不包、查验着任何时代和任何类型社会的所有隐秘（如各种哲学、文化、宗教或意识形态理论）的一个系统，只要人们相信至高、全知、万能的上帝即可，不必读懂《圣经》（除非被圣灵充满，没人能完全读懂），也不必掌握任何的社会学、经济学知识，就会自动带领人类来到天国的门前，正如《圣经》中告诫人们的那个启示所说：“我儿，你当受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传 12:12）。而《圣经》中所描绘的这个自动系统或历史的自动过程，也

非任何的人力可以阻挡或推动，完全是社会信仰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等自我发展的结果。所以，任何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困惑、矛盾或理论与社会现实、人类历史的不适用，都是这种理论本身或其产生所依赖的社会信仰或社会意识形态的水平、程度的限制性或错误和偏差造成的，而不是人类社会运动即信仰洁净过程本身出现了任何偏差。例如，古典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殖民地时代和当代世界经济中出现的解读困难的问题，是低水平社会信仰状态下的有效理论，无法适应社会信仰变化状态下的新情况的表现；凯恩斯理论在当今世界经济实践应用中出现的难以适应的问题，是其产生的那个社会的社会信仰错误和偏差造成的。

当然，由于货币运动规律在《圣经》中一直都是信仰规律，所有可能规避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存废规律的领域，都无一例外地出现超人力、非人手的救赎记载，如个人寿命领域。前面章节中，我们已经应用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存废规律讨论过，一个没有正确信仰的人，从信仰角度看，他的寿命还可以到 120 年。但是，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其不正确信仰或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单向变动的前提之下的，也就是说，一个没有正确信仰的人，若其意识形态或信仰不发生波动，就象我们刚刚讨论过的“无脸兽”的极限状态一样，呈现的几何图形只有一个点（在第二象限）或只有两个点（在第一和第二象限）——第一个是生物进化论中的兽态、第二个是有信仰领域中的发展态，他们的生命这时从信仰的角度看，倒都要摆脱 120 年的限制，有走向不死的可能，出现了信仰科学中的悖论。但是，这个只有在信仰领域中存在的悖论早已被造物主在创世纪时就提前解决了：在信仰上彻底无知的人，如同生物进化论中的人类，与所有的生物或野兽一样，他（或它）们的寿命被生物学或生理学规律所控制，象时间流逝一样持续、无法避免地走近死亡；虽知道信仰的信息，但彻底丧失信仰、或彻底无法摆脱诱惑、无法面对任何威胁者，《圣经》中赋予了他们一个与“鬼”同类的形象，也是必自死甚至是已经死亡的——“鬼”在《圣经》中就是死人，如“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赛 8:19）；“鬼”是自杀或自死的，如出卖耶稣的犹大，“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约 6:70），他是自杀的，“吊死”（太 27:5）的、“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徒 1:18）。“鬼”是属于撒旦的，结局与撒旦的结局也相同。社会退出之后、千禧年也结束之后，无信仰或信仰水平仍然不够的个人，他们自然不可以进天国，但这时，可以约束他们的外部力量——如人类社会已经退出，他们处于即无外部硬约束，又无个人内在信仰约束的阶段中，有重新泛滥不治之势；并且，因为他们的存在，掌管他们或处置他们的撒旦还必须存在，必须被重新释放出来，重复撒旦对人类信仰的试探和考验，历史也有重新循环之势。《圣经》中的撒旦，就是一个达尔文环境，其持久存在的奥秘就是无限的内部循环！打破这个循环，从理性的角度讲，就是撒旦式自杀：消灭一切无信仰者、信仰水平不高者时同归于尽（参见启 20:7-10）；《圣经》中，“鬼王”“别西普”对于人类来讲，也是人体或生命的生物学规律，也控制着一个小达尔文环境。至于有信仰的人类，就是摆脱死亡而永生的人类的起源，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讨论过，也是在出现与生物学或生理学科学相悖时，有神的救赎才实现的，即《圣经》中亚当的被造，与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兽类人根本不同。“鬼”也一样始终无法建立信仰的人和终身坚定的无神论者，都与出生后就被野兽养育大的人如“狼孩”一样，只显示出人类的“兽性”或生物性一面，生命不会超过 40 年。

综上，《圣经》中的整个信仰体系，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共只有两处逻辑上或科学上无法解决的悖论（详见下图中的两个红色箭头所在的位置）。但恰恰正是在这两处，《圣经》中都明确、具体详细地记载了神的救赎，以造物主可以超越科学的简单逻辑予以解决，既让《圣经》中的整个信仰体系（宇宙）显示出完美的逻辑性和科学性，也彰显了《圣经》不可能来源自人手和《圣经》信仰唯一正确的真理。并且，《圣经》中也仅有这两处记载了神出手

救赎的场景，连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和 40 天诺亚大洪水的记载，也未触及社会经济学所展示的社会信仰发展历程中的科学与逻辑上的完美。当然，单纯从个人信仰领域来看，未来科学的发展的终极，可以做到让个人生命任意延长、无限接近永生不死，但历史上所有有信仰的“古代人”，科学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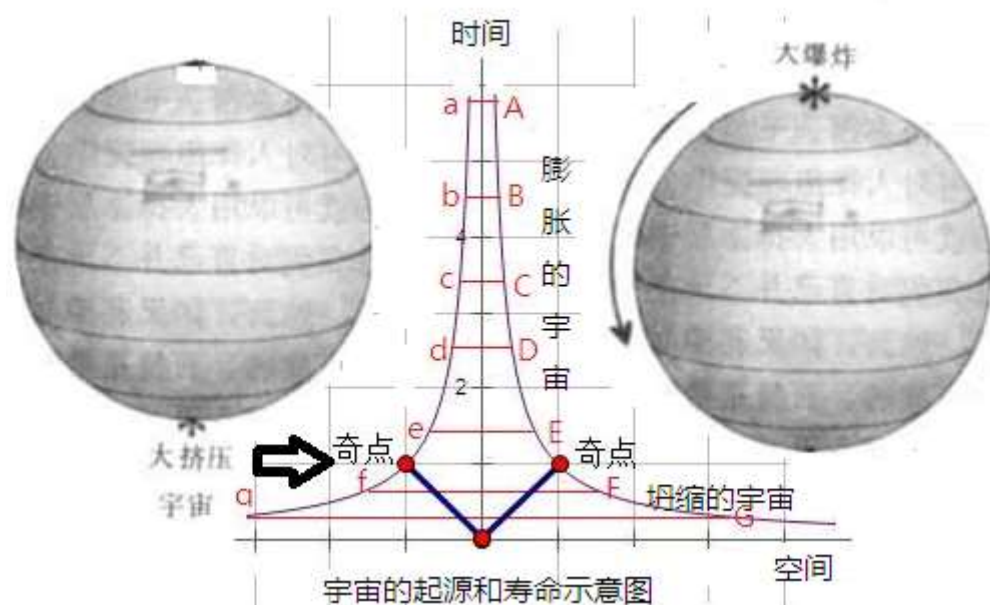


无法让其复活享永生——甚至连他们各自的信仰水平也无从测得，与《圣经》的信仰理性矛盾。解决这个由信仰进步带来的科学和理性中的悖论，正对着《圣经》中神的最后一次救赎（图中的蓝色箭头）。即第 3 次救赎是末日审判，“生命册”中所记载的人的复活（参见启 20:12）。个人生命在科学不断发展的理性逻辑中可以任意延长，但却无法产生信仰意义上的永生——科学中的生命始终需要物质载体或某种表现形式，而信仰中的生命或永生却是可以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载体的。如何将二者连接，解决个人信仰领域中理性内部产生的悖论，从理性角度讲，只有依靠超越一切科学与理性的神的救赎才可以，末日审判也是理性中可以得出的超理性的必然结论。

从有“灵”的亚当开始，至末日审判前的最后时刻，期间的时空宇宙就是真正的人类（区别于生物进化中的人类动物）的达尔文环境。这段历史时间就是信仰上的人类达尔文环境时间——这是一个有限但无边界的宇宙，人类科学（人工智能和控制）在未来完全可以复制它，它也标志着人类科学发展的两个极限。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两个科学极限，例如，一个科学狂人或群体，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宇宙空间——如火星、加拉帕格斯群岛或好莱坞影片中的一个秘密科研训练基地等等之中，为一个目的或某种计划培养一种只忠于自己的智能系统——如经过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的会学习、会发现问题并研究解决问题、会繁殖或复制

自己，他（或他们）必将遇到以下两个无法逾越的极限：1、人类始终无法完成一个可以让自己彻底放心的智能系统。通过众多智能系统的群体模式，自动淘汰掉不忠于人类和忠诚度无法提高的智能系统过程中，伴随智能系统能力不断自我强大，迟早要遇到系统忠诚度提高的天花板或拐点，即智能系统的忠诚度在达到让设计者或拥有者彻底满意或彻底放心前的最后门槛或水平后，会拐头向下，进入忠诚度的循环状态。人类无法依靠这样的智能系统实现自己的目的，自然，这样的智能系统也不会被人类允许具有无限的自我成长能力——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如各种无人驾驶系统，将来的命运都如此。2、人类始终无法培养出一个忠于人类的忠诚度超越人类对自己的忠诚度的智能系统；或者说，在科学领域中，人类始终无法摆脱最相信自己的桎梏。通过提高单个智能系统的忠诚度，在其不断提高能力后，最终要迎来同归于尽的情况：最忠诚于自己的莫过于自己。如此，一个顶级的科学家（科学狂人）和一个顶级的科学智能系统，在能力上完全重合，结局是同一目的（如控制或相互控制）下的同归于尽，与《圣经》中末日审判前那个撒旦与不信者同归于尽的结局一样——好莱坞有关末日题材的影片结局，按照《圣经》中的信仰知识，都应修改为：参与最后那场惨烈灾难的所有参与者都同归于尽，最后挽救人类的是早已退出人间者和根本不会介入到这场争斗中的信仰坚定者。科学永不可靠、永不绝对，牛顿力学后因此诞生相对论、相对论之后又因此诞生量子物理学……这是科学的无边界；但是，科学止步于可靠和绝对的门前，因此又是有限的。即科学是一个有限但无边界的体系。未来的科学发展中，人工智能系统在产生了“对设立者忠诚”的需要之后，就需要设立自动检测忠诚度的一个独立系统——撒旦系统。撒旦系统必然要在检测任务的完成即系统成熟后退出，即与不忠诚的因素一起灭亡。撒旦系统无法摆脱人类的目的而单独存续，人类也无法摆脱神的目的而不断繁衍，因为作为新灵魂的新生命的诞生，始终需要信仰检测系统（即撒旦）的存在才可以。因此，没有末日审判，区别于动物的人类要重新回到动物世界中——死去的不能复活；活着的，也陷入物质不灭定律中的那种循环永生形式中，没有真正的独立、自由和静止。

当今物理科学理论中，一个恒星从诞生（从一个时间端点开始）、扩张，到停止膨胀，塌陷成黑洞、回到时空奇点位置，用一个数学模型描述上述整个过程——即以这个恒星的寿命时间为坐标轴的纵轴、恒星的体积空间为坐标轴的横轴，从诞生开始的连续扩张期就是空间逐渐减少、存续时间逐渐加大的一个由一系列球体沿一系列时间所划出的一个的平面几何曲线轨迹；反过来，就是恒星连续塌陷到消失阶段的存在曲线；两条曲线的接点就是宇宙物理学中所谓宇宙之始是“无限密度的一点”或“黑洞和大爆炸奇点”（参见英国史提芬·威廉·霍金《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年 9 月第 1 版）。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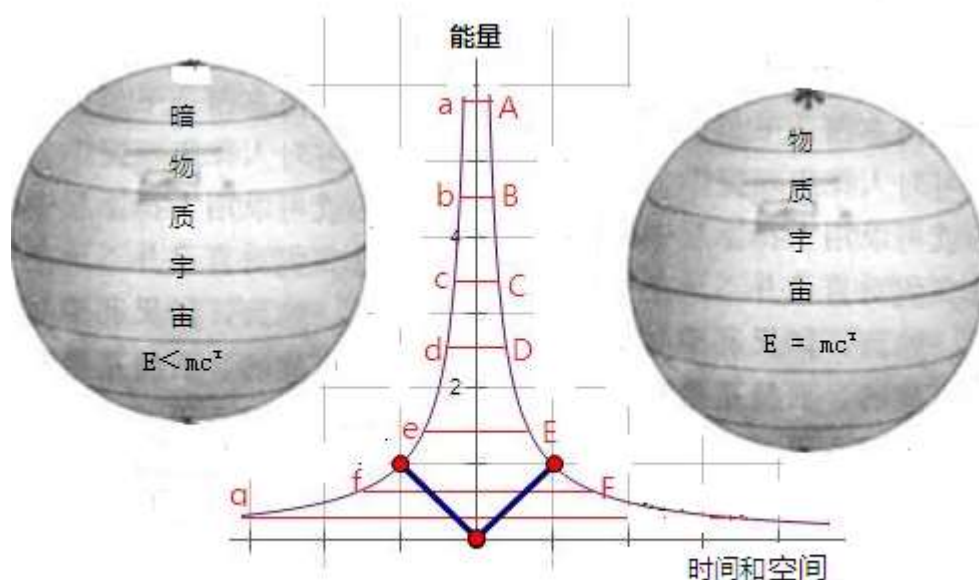


图中的线

段 aA、bB 等表示宇宙的空间尺度，如球体空间的半径长度；图中的“奇点”位置即双曲线的“顶点”，是曲线上任一点与原点连线（如图中的蓝色线段）的斜率的分界点：越过“奇点”，连线的斜率变动趋势性改变（ >1 或 <1 ），即持续膨胀或持续坍缩。用一个“奇点”表示一个恒星或宇宙的话，这个“奇点”并非数学中的“点”——图中的点 a 和点 A 永不相交，而是构成立体几何中的一个无限类似于球体的“圆环”或者是平面几何中无限接近于点的一个线段；恒星、宇宙在“奇点”上的差别，只有圆的大小（立体）或线段长度（平面）的不同。宇宙、恒星的生命或存续规律，符合非闭合货币运动体系的存废规律——宇宙（或恒星）的寿命只与宇宙（或恒星）膨胀（或收缩）的加速度有关。即加速度绝对值越大的宇宙或天体，寿命越短；膨胀或收缩的加速度越小、越趋于 0 的宇宙或天体，存续时间或寿命越长；一个以直线加速度单向膨胀或单向收缩的宇宙或天体，存续时间最多只有 40 个宇宙时间单位——作为时间开端的“黑洞和大爆炸奇点”其实并非几何学上的一个点，而是另一个宇宙，另一个时间系统，就象新生儿脱离母亲的子宫开始人生的计数：之前的时间系统属于孕妇的妊娠时间体系。时间还没有开始，时间就已经存在，这是有关时间科学中的悖论，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存在：终极的宇宙围绕绝对不可知的神，形成绝对的宇宙时间或绝对时间——但从空间上看，绝对时间又表现为宇宙距离造物主的尺度，构成一个运动和静止的理性悖论。也就是说，任何在 40 个宇宙时间——或“一年顶一日”（民 14:34），即对于有自转的地球来讲就是 40 年内消灭（或生成）一个宇宙或社会环境的信息，都在理性或科学可以证明的范畴之内。例如，《圣经》中诺亚大洪水 40 天（创 7:4）的时间，所消灭的就是一个信仰不会成长的人类的宇宙和时间奇点；以色列人在埃及旷野 40 年，迎来一个专制社会的新时代或新的时间起点，彻底错失了以色列类型社会的历史时空；而台湾在 1949 年之后的 40 年，迎来以色列类型社会新时代或时间起点，彻底告别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社会时空……人类社会历史中专制社会的“信仰”起点和终点，与有信仰但信仰水平始终达不到永生水平者的灵魂的起点和终点，都正是宇宙物理学中的一个“时空奇点”或时间的开端。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并不能简单、直接地应用这张“宇宙的起源和寿命示意图”来证明宇宙与人类社会中的非闭合货币运动规律完全符合：“宇宙的起源和寿命示意图”中的两条曲线其实都是一个恒星或一个宇宙的边界连续变动所形成的数学轨迹，本质上是同一条曲线。或者说，用其中任一条曲线都可以完整表达一个宇宙或一个恒星的生死过程。那么，从理性上讲，如果《圣经》中的知识体系来自神，是一个可以完整表述宇宙世界中的万物知识的话，

《圣经》中真实、完整的物质宇宙世界，其实还应该存在一个与我们现在所处宇宙物质世界完全不同的宇宙世界——我们把人类现在所处的宇宙称为“物质世界”的话，《圣经》中神所创造的完整物质宇宙中就应该还存在另外一个未知宇宙。那个宇宙与我们现在所身处其中、所感知的宇宙不同，它们应该（即按照《圣经》中的统一知识体系的逻辑）是一个我们的恒星或宇宙“燃烧”后的“尸体”所组成的世界——这两个宇宙在奇点即时间开端处（而非时间结束的 0 点位置或坐标系的原点位置），无限接近——即在表示时间的坐标轴远离原点的位置上逐渐靠近、趋同，但永不相交、重合。以上推理的结果就是两个宇宙在“黑洞奇点”上的只存在最细微的差别：我们现在所处身其中的宇宙的“黑洞奇点”是一个暗物质包裹的能



《圣经》中生命所在的两大宇宙的起源和寿命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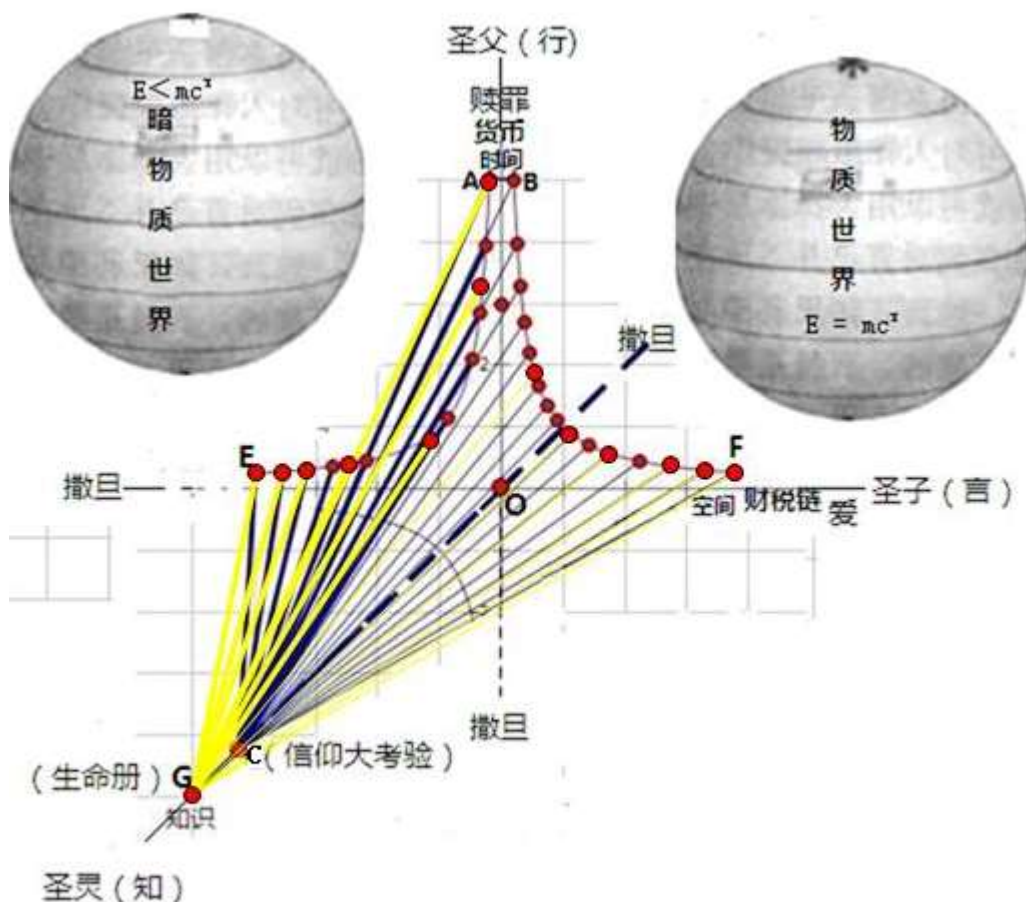
量点或“光斑”，是一个有光核的暗物质；按照物质概念它是一个环状结构物，“环”有暗物质组成，环中就是“能量团”或“能量点”，残存能量的大小或多少决定着黑洞的大小。黑洞奇点中的能量团或“光核”，是宇宙大爆炸后恒星的光、地球核心中的热量的来源，它是黑洞形成过程中所收集、分拣宇宙能量垃圾后形成的能量库存或能量“集中营”；暗物质是与能量分离后的物质“尸体”，因此暗物质粒子不能移动（或不能象物质粒子一样移动）、不会碰撞——黑洞形成过程中，巨大的引力将物质和其中的能量分离开来，黑洞的奇点就是这个分离过程的结束或最终结果；质量不同的黑洞，分离质量和能量的程度不同，因而奇点的大小不一，里面的暗物质的种类、性质等不同。另外的那个宇宙，也有“黑洞”，更准确地讲应该是“白洞”，里面因暗物质的黑暗等级或程度的不均匀而呈现“星光灿烂”的景象——物质和暗物质是以能量为分界线的，物质中的能量达不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质能方程式 $E = mc^2$ 标准，或者 $E < mc^2$ 的物质，就是暗物质；暗物质又按照其包含的能量多少而分为各种等级；是否存在 $E > mc^2$ 的超物质？若存在，可能就是天国的超物质世界。暗物质宇宙的“黑洞”即最大“白洞”的奇点处集中为一个致密、无差别、绝对能量值为 0 的暗物质黑点，在其致密程度达到暗物质粒子级别即相当于暗物质粒子碰撞时，彻底消失——“白洞”（未知宇宙或暗物质宇宙）形成过程中释放出能量，与我们的宇宙黑洞吸进能量刚好相反；其它尺度较小的“白洞”，奇点处的暗物质能量等级不同，它们不断释放出的能量形成新的暗物质星球。这两个宇宙越膨胀，差别越大，即在接近时间结束位置的过程中，距离、差别逐渐增大并趋向无穷大。两大宇宙的区别，仅仅在于奇点处有无能量或“光”的存在，正如经文“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 1:3）所讲。如上图所示，图中

A点与a点之间，是立体几何中的一个几近于圆的环形图案，在平面几何中是一个几近于点的线段，处于双曲线沿纵轴无限延伸的位置，能恰当地表示出物质与暗物质之间的能量定义差别。神不在理性中，就与双曲线始终无法连续一样——A点与a点永不重合；神可以被理性感觉到，就如A点与a点在数学逻辑的终极位置上应该重合一样。《圣经》知识逻辑中的两大宇宙，客观上是一个整体，它们事实上交叉在一起，而非分离状态。从能量级别上看，物质宇宙中的黑洞奇点，充满了各种绝对能量 $\neq 0$ 的暗物质——大黑洞的奇点物质，能量被分离的更彻底，能量剩余更少或“更黑”；小黑洞则恰好相反。从逻辑上讲，这样的黑洞如果没有外来足够大的能量注入的话，最终都将演化成为一个暗物质宇宙中的“白洞”奇点，完全消失。也就是说，我们身处的宇宙，从逻辑上讲，无法从暗物质宇宙中诞生——但却要不可避免地沦为一个暗物质宇宙。因此，我们身处的物质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科学或理性的悖论，“神”处于解决这个科学悖论、让这个宇宙出现的逻辑起点上，这正是《圣经》中的“创世纪”或宇宙创造论。

《圣经》知识体系中的暗物质宇宙，正是由当今科学前沿中的“暗物质”（dark matter）所构成的宇宙——现代物理学已经证明了暗物质的存在。从上图中不难发现，处于持续坍缩过程中的黑洞中的绝大部分物质——黑洞、特别是接近奇点位置的黑洞深处的绝大多数物质，应该就是一个与我们熟悉的宇宙相对的一种最简单、最容易理解的“暗物质”。

《圣经》中，人类的生命分为两种，分别处在以上两个不同的宇宙世界中：处于物质世界的生命就是生理学或生物学生命；处于“暗物质”世界中的生命就是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人类灵魂所处的“灵界”——那个濒死者们一再向世人证明的世界或宇宙。物质世界与“暗物质”世界永不相同但却可以无限相似、交叉在一起。灵魂世界中没有信仰成长，若要灵魂中的信仰水平继续成长，需要轮回进入到物质世界才可以；“灵界”中的各种奇妙事物所代表的知识水平，不代表信仰水平，并且那些知识也可以在未来的物质世界中被轻松发明出来——以上信息可以认为是全部基于暗物质的特殊物理属性。所以，当人类掌握了暗物质科学规律后，科学的发展将让人类轻松复制、超越“灵界”中的所有玄妙。反过来，从《圣经》知识体系的理性结论看，暗物质世界中，必然存在一个撒旦式自杀的机制，不需要超理性的造物主再度出手就可以使其彻底灭亡——暗物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完全支持这个推理结果，即两个暗物质粒子撞在一起，它们就会彼此摧毁对方，产生伽马射线。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质世界才是唯一可能永恒存在的世界模式，是信仰可以成长的唯一世界，天国也是如同物质世界一样有能量、且有更大能量（ $E > mc^2$ 的超物质）的世界——“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启 22:5）、“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太 13:43），而非与“灵界”或暗物质世界一样的（参见启 21、22）缺少能量或无能量的世界。伊曼纽·斯威登堡和众多濒死体验者给世人讲述、证实的灵界，是暗物质宇宙中的时空，是临时的或过渡性质的事物，是一个等待末日审判后就彻底消失的灵魂驿站，“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启 20:13）。“灵界”中没有死亡（它本身就是失去能量或没有能量的物质死亡），但有永死；我们的宇宙中充满死亡，但有永生；天国中没有死亡，只有永生。

综上，所谓“天人合一”，只在专制社会（包括国际社会）、不能永生者与自然界三者方面来看是正确的——如下《圣经》中的统一宇宙示意图所示。图中的细线区域与粗线区域，永



《圣经》中的统一宇宙 (自然、社会、个人) 示意图

不相交；“神”总在二者将要相交的地方出手（图中A、B点位置是创世纪、亚当被造，C点是信仰大考验、G点位置是末日审判），保障信仰成长及与造就信仰成长同性的宇宙环境的永生永存。示意图中，整个斜线覆盖区域是人类信仰前进时代结束后所留下的旧宇宙，以信仰水平达到生命册为标准的最高知识点G为终点，正如经文“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拣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太13:47-48）、经文“容麦子和稗子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太13:30）所讲的一样。

我们在物理学研究中永远不会从理性的终极位置证明出神的存在，神不在人类的理性之中！但是，正如图中的一个任一点表示一个宇宙的“奇点”一样，《圣经》中的宇宙是有无数个“奇点”构成的，它们的分布就像我们在地球中所看到的自然景观一样的规律和谐、一样的鬼斧神工般完美，而它们之间的差别和不同，也象地球环境中的动物与植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气候与地质条件间的差别一样。我们始终、随时随地都站在一个宇宙时空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上，就是始终、随时随地处于“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22:13）所创造的宇宙中。人类只能象赞叹大自然现象时感受到自然的神奇和非人力所为的特征，也象艾萨克·牛顿在物理学研究中深深感悟到神的存在一样，神可以被人类的理性感受到，却永远不会被理性或科学直接证实——亚当、夏娃可以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圣父的存在（我们能做或要做的科学就是对亚当、夏娃的考古）、十二门徒和那个时代的众多人可以证明圣子的存在（我们能做的是对他们所说的话进行证实或重现，

如与耶稣尸体有关的事件的再确认等)、有信仰的社会(或未来的每一个有信仰者)可以证明圣灵的存在(发明、设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及相应的法律体系)。但是,除了《圣经》和其中的知识系统,没有人可以通过任何途径直接证明“三位一体”的神的存在。纵观整部《圣经》,神只出现了4次。除了创世纪的第一次外,其余3次都如我们刚刚讨论过那样,只针对信仰上的人类领域,正如经文所讲“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诗8:4)。

一切荣耀归于神

2014年7月8日星期二初稿

2015年10月2日星期五 全稿完

2015年10月11日星期日 第一次修改

2015年10月22日星期四 最后一次修改

张朴杰